

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



# 批判性历史视野下的 中国卷烟业

Matthew Kohrman、  
甘泉、刘文楠、  
Robert N. Proctor

编



# 批判性历史视野下的 中国卷烟业

Matthew Kohrman、甘泉、刘文楠、Robert N. Proctor 编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2018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and recording, or in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加利福尼亚斯坦福

©2018 年斯坦福大学（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董事会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保留所有权利。

未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事先书面许可，禁止以任何形式或方式，不论是电子的还是机械的，包括影印和记录，或在任何信息存储或检索系统中复制或传输本书的任何部分。

在美国用无酸、档案级别纸张印刷

国会图书馆在版编目数据

Names: Kehrman, Matthew, editor. | Gan, Quan, Dr., editor. | Liu, Wennan, editor. | Proctor, Robert, editor.

Title: Poisonous pandas: Chinese cigarette manufacturing in critic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 edited by Matthew Kehrman, Gan Quan, Liu Wennan, and Robert N. Proctor.

Description: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 Series: Studies of the Walter H. Shorenstein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and index.

Identifiers: LCCN 2017046984 (print) | LCCN 2017048149 (ebook) | ISBN 9781503604568 (e-book) | ISBN 9781503602069 (cloth: alk. paper) | ISBN 9781503604476 (pbk: alk. paper)

Subjects: LCSH: Cigarette industry--China--History.

Classification: LCC HD9149.C43 (ebook) | LCC HD9149.C43 P65 2018 (print) | DDC 338.4/7679730951--dc23

LC record available at <https://lccn.loc.gov/2017046984>

封面设计: Christian Fuenfhausen

排版: Bruce Lundquist 使用 11/14 Adobe Garamond

# 目录

前言	Robert N. Proctor	I
致谢		V
引言	Matthew Kohrman	001

## 第一部分 跨越革命边界的工业变革

第一章	试验：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的卷烟业	刘文楠	041
第二章	畸形垄断：1950年代卷烟会议与中国烟草业国有化	沙青青	066
第三章	“大跃进”期间的中国卷烟工业	皇甫秋实、Matthew Kohrman	085

## 第二部分 以视觉文化与历史操纵获取合理性

第四章	资产阶级堕落还是无产阶级享受？对比1949年前后中国男性吸烟的视觉文化	Carol Benedict	109
-----	-------------------------------------	----------------	-----

第五章	守护员工伦理：中国烟草博物馆在慢性暴力 中自我陶醉	Matthew Kohrman	151
-----	------------------------------	-----------------	-----

### 第三部分 金钱和渎职

第六章	圈起“现金牛”：毛泽东时代以来的烟草税改革	Matthew Kohrman、甘泉、胡德伟	179
第七章	治理烟草业：精英政治、省市级利益攸关方和 历史背景	李 成	203

### 第四部分 阻挠控烟

第八章	中国的过滤嘴卷烟和降焦减害的谎言	Matthew Kohrman、孙鹏、Robert N. Proctor、杨功焕	239
第九章	协助烟草业：中国学术界与烟草业的协作	甘泉、Stanton A. Glantz	271
第十章	阻挠手册：中国烟草业规划如何抵制世卫组织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吴宜群、李金奎、庞应发	299
后记		Robert N. Proctor	325
本书撰稿人			342
索引			346

## 前 言

中国已晋级世界卷烟超级大国。到 2014 年，中国卷烟厂独占世界卷烟产量近一半，年产 2.6 万亿支。按一支卷烟约 85 毫米长计算，中国一年生产的卷烟首尾相接，长约 2.2 亿公里。这足以绕地球 5,500 多圈，或者从地球到太阳，然后差不多再折返地球。

管理这一生产的是人类历史上最赚钱的国家垄断之一：中国烟草总公司（中烟总公司）。中国做事情规模大是有名的，卷烟领域也是如此。每年，几十万公顷土地用于种植烟草，用于烤制烟叶的树木数以百万计，一辆辆火车满载天然和合成化学品用作添加剂，数百万人的劳动大军从事烟草制品的生产和销售。烤烟房、工厂、仓库、商店，把一条供应链串起来，输送着卷烟滚滚而来，装进各个品牌的优美包装盒上市。

不过，规模大不是中烟总公司唯一的显著特征。同样惹眼的是其扩张带来的同样显著的破坏性。不管产自哪个国家的卷烟都会夺走人的性命，并且致死率可以预计：一个人吸一百万支卷烟，约三十年后就会死去。这一概率八九不离十，因为作为有形的 viii

(致病性)物品,全世界的卷烟大同小异。所有卷烟都输送一系列相同的有毒物质,从氰化氢、一氧化碳等气体,到镍、镉、铅等致癌金属,还有钋-210等放射性同位素。因和果之间有延时,所以世界范围内卷烟造成的灾难未来还会愈演愈烈。

理解中国这一不断加剧的灾难是必须的,理清这一灾难的源头也是必须的。东亚有记载的文明约有四千多年,烟草在东亚算是新生事物。十六世纪,商人和传教士首次把烟草种子带到中国,中国才开始种植和使用烟草。在中国机器制造的卷烟出现得更晚了。二十世纪初,世界第一批跨国烟草公司来到中国,才开始大量销售卷烟。据说大约130年前,Buck Duke打开一本世界地图,指着中国说:“这里就是我们将要卖卷烟的地方。”

Duke和他的英美烟草公司选择实现梦想的这块土地却饱经磨难。二十世纪,中国大部分居民深受常年战争、饥荒和社会动荡之苦,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样的困境,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又受益于这样的困境,世界最大的卷烟产业最后胜出。先是Duke等人和许多中国资本家孵化了卷烟业,后来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接管并悉心培育它。中国卷烟业克服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在迈入二十一世纪时,比Duke预想的更大、更富、更致命。这一付出惨重代价的胜利是如何实现的,鲜有学者研究。中国共产党如何把几个萌芽期的企业培育成了当今工业的巨头?

ix 在编写这本书时,我们希望促进对中国的卷烟生产作批判性历史研究。在中国,目前许多人每天接触有毒的卷烟烟雾。卷烟是工业产品,也是致病的产品——这是我们的立论的起点。卷烟是让人上瘾的致命产品,处在复杂制造系统的尖端,有着很少有



人研究的丰富（且越来越丰富）的历史。我们的历史研究将挑战把卷烟仅仅看作消费品而非工业产品的视角（也是世界学术界和公共卫生界通常采用的视角）。我们的目标是挑战在对卷烟的讨论中以消费者立场为主导——假定“戒烟”只是消费者承担的责任（“快戒嘛！”），而不审视围绕卷烟生产的各个方面。这就像遏制疟疾，只关注蚊子，却忽略了水塘沼泽一样。在中国，卷烟是一种充满各种象征意义的产品，由坐拥巨大财务资源和政治力量的国有企业生产。这类企业善于使自己晦暗不明，但是在恰当光线照射下，也可以破解其晦暗。

书写历史，涉及理解（和重述）人们生活的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历史书写告诉我们，我们出生时的世界不一定是我们离开时留下的世界。从这个意义看，历史能增权赋能，帮助我们理解必须做什么，必须不再做什么。卷烟已经是关乎我们生死的重要危险因素，但是未来不一定非要重复过去。一千年后，人们很可能回望现在，会思考为什么如此小却又致命的东西会捕获数以亿计人的心和肺，又是什么知识使人们摆脱了世界上最完美的成瘾品。希望这本书能提供一些答案。

Robert N. Proctor



## 致 谢

xi

本书项目获得斯坦福大学休利特国际研究和调查捐赠基金 (Hewlett Endowment Fund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Research)、Shorenstein 亚太研究中心和美国癌症学会的资助。特别感谢 Karen Eggleston、Gi-Wook Shin、Andrew Walder、Tom Glynn 和 Lisa Lee 对本项目早期阶段的支持。多名优秀的本科生研究人员提供了帮助，其中 Linda Shin 最值一提。承蒙多位匿名审阅者和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Kate Wahl、Jenny Gavacs、Geoffrey Burn、Marcela Maxfield、Olivia Bartz 和 Alan Harvey 的坚定支持，他们令本书添色不少。书中任何差错是作者的责任。



# 引言

1

Matthew Kohrman

本书的目的是推开一扇审视卷烟生产的大门，质疑长久以来烟草控制研究聚焦于消费的正统观念。我们另辟蹊径，提供另一种史学研究视角，揭开几十年来遮蔽、保护和培育世界人口最多国家卷烟行业的面纱。本书是进入这一长期被忽视的研究领域的通道，促使更多人拿起自己的铲子，挖掘中国卷烟制造和营销的历史，发现攸关当今最大健康灾祸的政策新知，揭示此灾祸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如何平息这场灾祸。

\* \* \*

2013年夏天闷热的一天，在位于Raleigh的北卡罗来纳州农业厅办公室，发生了一件怪诞的事。在农业厅里真人大小的印第安人木雕的注视下，官员们满面笑容地宣布，这份合同签署后，当地农民能更容易地向远方的客户销售一种作物。

签约仪式的新闻稿里没有只言片语提到人们消费这些农民的

产品——烤烟——会上瘾，而且会中毒。<sup>①</sup> 新闻稿也根本没有提到这份新合同将让人丧命，吸烟造成的死亡也许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灾祸。

不仅是北美洲的农民卖烤烟给这个买家。在非洲东部、南美  
2 洲和亚洲的大片地区，现在也都有农民为这个客户种植和烤制烟叶。这个客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或“新中国”）的农业和商业巨头，它有两个可互换使用的名称：国家烟草专卖局（简称“国家烟草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简称“中烟总公司”）。

使用两套名称的做法，透露了政府和大公司为一体之两面，这是当代中国和世界许多地方商业烟草业的基础。它也表明了国家烟草局/中烟总公司卷烟制造的向心轨迹：它的工厂使用购自全世界的烟叶，其生产的卷烟几乎都在中国国内销售。不过，两套名称没有表达出来的是中烟总公司的规模。与最接近它的全球对手相比，它在几乎各个方面都更大，尽管其生产和销售基本仅限于一国。如今全世界范围内卷制、包装和发运的每五支卷烟中，两支是中烟总公司制造的，它的产量比世界上四家最大的上市烟草公司的总和还多，包括：Philip Morris 国际公司、英美烟草公司、日本烟草国际公司、帝国烟草公司。<sup>②</sup>

一个常见的错误观念是经过公共卫生干预，吸烟流行已是很

---

① “China Tobacco International Opens Company in N.C.,” North Carolina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Consumer Services, June 27, 2013, <http://www.southeastfarmpress.com/tobacco/china-tobacco-international-open-north-carolina-office>.

② “Tobacco 2016: New Insights and System Refresher,”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2016, retrieved from Euromonitor Passport database.

久以前的事了。一些国家的公共卫生宣传确实成功降低了吸烟流行率，尤其是在教育程度高的人群中。中国受过大学教育的居民吸烟的可能性比十年前低，2015 和 2016 年全国销售的卷烟总量几十年来第一次下降。<sup>①</sup> 不过，如果有人说大烟草公司濒临破产，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那就大错特错了。卷烟生意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出现，在 21 世纪继续产生巨额利润，按照目前的趋势，全世界每日吸烟者人数预计仍在继续攀升，尤其是在中低收入国家。<sup>②</sup> 在这本书出版的年份，全世界生产和销售的卷烟将多于 1990 年，2020 年制造和消费的卷烟是 20 世纪中期全世界水平的三倍。<sup>③</sup> 世界许多区域的卷烟业务其实一点儿没有垮台，而是继续作为赚钱机器。<sup>④</sup> 中烟总公司当然毫不含糊。自 1982 年成 3 立以来，中烟总公司在最初的 35 年左右时间里，维持了年利润双位数增长。仅是 2000 年到 2012 年这 12 年间，公司利润增长七倍，使中烟总公司位居世界上各行业销售额最大的前三十名之

---

① Paul McClean and Lucy Hornby, “China Tobacco Sales Fall for First Time in Two Decades,” *Financial Times*, June 20, 2016.

② Ver Bilano et al., “Global Trends and Projections for Tobacco Use, 1990-2025: An Analysis of Smoking Indicators from the WHO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Systems for Tobacco Control,” *Lancet* 385, no. 9972 (2015): 966-76.

③ Michael Eriksen, Hana Ross, and Judith Mackay, *The Tobacco Atlas*, 4<sup>th</sup> ed. (Atlanta: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2012), 28; “Market Sizes, Historical/Forecast,”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retrieved from Euromonitor Passport database.

④ Gary A. Giovino et al., “Tobacco Use in 3 Billion Individuals from 16 Countries: An Analysis of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Cross-Sectional Household Surveys,” *Lancet* 380, no. 9842 (2012): 668-79.

列。<sup>①</sup>到2010年，中烟总公司赚取的利润超过沃尔玛全世界业务的总利润。<sup>②</sup>

为了使这家巨头公司更赚钱，中国各地制造卷烟的工厂渴求不受限制地获得质量更好、价格更低的烟叶。不过，怎样满足这个需求呢？1982年，中烟总公司成立之初就有的一项使命是整改国内烟叶生产，包括大力投资于农村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这次整改对村民有利有弊。毛泽东时代后，农民在其他方面有了选择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和把作物卖给最高出价者的自由，但是涉及到种植烟草，到现在还是受到当地干部的定期微观管理，要求他们把烟叶按照北京预先制定的价格，低于市场价卖给中烟总公司的代理。不过对卷烟厂来说，烟叶生产整改是一次发财的机会。从1980年代初到2010年代初，国内烟叶收获量增长了两倍。中国现在烟叶产量全世界第一，产量超过后面九个烟草种植量最多的国家的总和。<sup>③</sup>

这次整改硕果累累，到2012年，中烟总公司的领导开始担心供过于求，轻踩刹车，在后续三年中降低全国烤烟产量约17%。<sup>④</sup>但是，似乎“高质量”烟叶仍然紧缺，所以，中烟总公司启动了大举收购特定烟叶的项目，不管产自哪里。这一紧缺可能是中国

---

① 中国烟草总公司：《规范两端 严控总量——行业加强卷烟和烟叶生产总量控制》（北京，2013），[http://www.tobacco.gov.cn/history\\_filesystem/2013yckz/jd8.htm](http://www.tobacco.gov.cn/history_filesystem/2013yckz/jd8.htm)。

② Daryl Loo, “China’s Tobacco Monopoly Bigger by Profit Than HSBC, Walmart,” *Bloomberg News*, March 6, 2012.

③ Eriksen et al., *Tobacco Atlas*, 52.

④ 中国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search.htm?s=烟叶产量>



田间种植的技术缺陷所致，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国家最大烟草公司董事会会议室里做出的精明决定，他们决定营销更多使用“优质”烟叶卷制的卷烟，因为这类卷烟不仅更加安全，而且社交中更受尊重。中国越来越多的客户群尤其青睐用烟草业评级师所定最高标准烟叶制造的卷烟品牌。云南、广西等地因大量种植达到这些标准的烟叶闻名，但是收获量还是不够。结果，在巴西、津巴韦等遥远的地方，中烟总公司的高管签订合同，建立物流中心，以便减轻工厂获得最高等级烟叶的压力。<sup>①</sup>梁占华女士就是这样的高管之一。2013年6月，就是她站在北卡罗来纳州农业厅厅长办公室里，胜利地宣布中烟总公司第一家北美烟叶购买机构在美国传统农业种植地带的核心开始启用。办公室里唯一一张表情肃穆的脸，至少从农业厅发布的照片看，是办公室里木制印第安人吉祥物雕像的脸。

\* \* \*

土著美洲人第一次被误认为是印度人是15世纪。此后不久，生产和销售烟草制品的业务就与民族国家的崛起纠缠到一起。从欧洲向北美洲移民的过程中，民族国家诞生了，它的政治新颖性

---

① “Brazilian States of Alagoas and Bahia to Export Tobacco to China,” Macau-hub, 2012, <https://macauhub.com.mo/2012/08/29/brazilian-states-of-alagoas-and-bahia-to-export-tobacco-to-china/>; Andrew Medrum, “Zimbabwe’s Tobacco Making a Comeback,” *Global Post*, May 10, 2012, <https://www.pri.org/stories/2012-05-10/zimbabwes-tobacco-making-comeback>; and “China Tobacco International Opens Company in N. C.”

促进了烟草与“人民”之间越来越多的相互倚赖。<sup>①</sup>这种倚赖如此重要，以至于到20世纪中期，国家不仅频繁地给予当地卷烟生产企业优惠信贷和补贴，还设立了特别授权的政府办公室监测、协助甚至投资这些企业。20世纪，许多国家还建立了自己的从田间到工厂的烟草垄断。在冷战结束后，对卷烟制造业的国有化减少了一些，但是在世界范围内，政府与卷烟生产商之间的联盟直到今天依然牢固。当然，这些联盟与金钱和烟草的成瘾仙药尼古丁有关。从地理大发现开始，烟草让人们迅速对尼古丁上瘾的独特能力创造了巨额利润和税收，是令民族国家着迷的貌似不可或缺的财务资源。

一些读者可能希望本书对一个经济学问题提供理论依据。1880年James Bonsack获得第一台自动化卷烟卷制机器的专利后，那么多有着各自不同政治经济色彩的民族国家，不仅扶持烟叶买卖，而且还投资高度机械化的卷烟生产业务。怎么会这样？Allan Brandt所称的“卷烟世纪”背后是否有一个超越本地经济结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或其他主义）的普遍公式？<sup>②</sup>比如说，卷烟业的发展难道是采用了工业革命之初出现的应用经济学原则？这一学说最早是Alexander Hamilton和Henry Clay等政治家首先倡导的“美国学派”和“国家制度”，后来则冠以“进口替代型工业

---

① Iain Gately, *Tobacco: A Cultural History of How an Exotic Plant Seduced Civilization* (London: Simon & Schuster, 2001).

② Allan M. Brandt, *The Cigarette Century: The Rise, Fall, and Deadly Persistence of the Product That Defined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7).

化”等名称而四处传播。<sup>①</sup>难道说 Hamilton 和 Clay 的秘诀（从越来越高效的农业获取资本，把该资本再投资到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立高关税，引领特色商品出口）真的是促使民族国家和卷烟制造在 20 世纪的美洲、亚洲、欧洲大陆和非洲部分地区密切结合的特殊粘合剂？

这种思考方式的一个问题是太容易掉进理论问题的狭隘“兔子洞”，以致于难以容纳本书涵盖的实证材料，而且还要求从其他国家获得特别多的比较证据。这也会干扰本书的撰稿作者认为对研究中国的卷烟制造更为重要的问题和主题。本书汇集了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公共卫生、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多个学科杰出的思考者。出于对当代中国的共同好奇心，对学术研究中一个大漏洞的不满足，对跨学科方式能促进为紧迫社会问题提供所需解药的信念，我们联手探求答案。中国 1949 年前的烟草业获得大量学术关注，<sup>②</sup>但是 20 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烟草业史则少有人问

---

① 关于美国应用经济学思潮在中国的兴起，Hamilton 和 Clay 等人一开始如何阐释，如何由 Friedrich List 传播到俾斯麦治理下的德国，之后经由日本传播到亚洲，见 James Fallows, *Looking at the Sun: The Rise of the New East Asi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 (New York: Vintage, 1994); Arthur Kroeber, *China's Economy: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and Joe Studwell, *How Asia Works: Success and Failure in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Region* (London: Profile Books, 2014).

② Sherman 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Sino-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 1890-193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Wennan Liu, *"No Smoking" for the Nation: Anti-Cigarette Campaigns in Modern China, 1910-193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and Carol Benedict, *Golden-Silk Smoke: A History of Tobacco in China, 1550-201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津。<sup>①</sup>我们编写此书的主要目标是着手弥补这一缺漏，为新的研究领域——中国卷烟业的批判性历史研究——奠定基石。我们希望，未来的研究和政策制定若想从源头上遏制当代烟草流行，这本书将成为必不可少的“起跳板”。

与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共产党”）最高层的其他人一样，毛泽东酷爱读史，烟瘾也很大，是卷烟工业化的大力支持者。共产党在“解放”前的卷烟制造试验是怎样预示了新生的共和国将治理卷烟供应链等同于“为人民服务”？1950年代初，是什么因素说服地方主管当局把遭受战火蹂躏的私有卷烟业国有化，并在共产党后续多次政局动荡中把它作为优先重点？毛泽东思想在社会、象征和财务诸领域中逐步取得主宰地位的过程，如何奠定了

6 卷烟制造和卷烟消费大规模扩张的基础？除了利润和白色烟卷儿，新国有化的烟草业还“生产”了什么，使它能把卷烟生产和抽吸卷烟（尤其是男性）等同于行使公民权？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世界范围对烟草制品毒性的新医学讨论越来越多，而1982年北京则成为新成立的中国烟草总公司/国家烟草专卖局的所在地，是什么促使北京下双倍赌注要作为烟草治理的枢纽？在此之后，处于中国卷烟制造巨大网络中的各个区域又是如何适应以下相互矛盾的力量：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去中心化，中烟总公司下的统一管理系统，以及在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盖茨基金会等资金提供

---

<sup>①</sup> 关于中国大陆烟草业从20世纪中期到现在的情况，有一些中文文献，但是许多离严谨的实证研究相去甚远。这些文本获得中国烟草总公司这家或那家子公司的资助，一般主要是为了庆祝赞助的子公司的商业成就。

者和公共卫生激进人士合力推动下兴起的全球控烟运动？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这本书优先关注三个主题。

## 常态化

“卷烟常态化”是第一个主题。这个短语说的不只是吸卷烟行为如何被视为正常举动。毕竟，对今天中国国内和国外的许多人来说，点燃一支烟来吸的行为是要避免且惹人厌的。我们的目标是揭示卷烟作为消费品无处不在是如何被视为无关紧要、理所当然、司空见惯的。卷烟已经成为全球消费主义的经典内容，虽然从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1566—1625）和中国明朝崇祯皇帝（1611—1644）起就开始抵制烟草制品，过去五十年公共卫生宣传也不断加大。今天，从咖啡馆到药店，从杂货店到加油站，在几乎所有国家卷烟都随手可得，常常紧邻糖果、快餐和美容产品，放在显眼位置展示。卷烟是如何变得如此常见的？

毋庸置疑，这部分归功于机械化生产的迅速发展。在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段内，机器制造商使卷烟唾手可得，在中国更是如此。1880年，全世界生产了大约100亿支卷烟，其中大部分完全是用手制作的。<sup>①</sup>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光是中国就每年生产约7800亿支卷烟，几乎全是机器卷制。到1976年，即便经历了“大

---

<sup>①</sup> Judith Mackay and Michael P. Eriksen, *The Tobacco Atla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30.

跃进”（1958—1961）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这样的混乱，中国国内卷烟产量增加了五倍，达到每年4910亿支。到2010年，使用新进口的设备（购自德国Hauni、意大利GD、英格兰Molins等公司），中烟总公司各工厂每年生产超过2万亿支卷烟，分属100多个不同中国品牌，占中国卷烟销售量的95%以上。<sup>①</sup>

在此期间，尼古丁已经成为地球上消费最多的精神类药物之一。<sup>②</sup>现在全世界十亿人对尼古丁上瘾，每年燃烧大约6万亿支卷烟获取尼古丁，用它来调整情绪、抑制饥饿感、提神醒脑。卷烟在中国第一次成为大众消费品是在20世纪初，至少在城市中是这样。那时候中国正在禁止鸦片贸易，这一时间上的重合让多位学者提出，卷烟在中国一开始的成功也许是因为正经历化学品戒断的中国人需要卷烟作为合法方便的提神之物。<sup>③</sup>

与在其他地方一样，不能把卷烟在中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常态化过程看作简单的化学品成瘾过程。在其他文化背景中，众所周

---

① 刘铁男主编，熊必琳副主编：《烟草经济与烟草控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142页；Hong Wang, “Tobacco Control in China: The Dilemma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ealth Improvement,” *Salud Publica de Mexico* 48, Supplement 1 (2006): 140-47; “The Chinese Tobacco Market and Industry Profile,” Campaign for Tobacco-Free Kids, 2012, [http://global.tobaccofreekids.org/files/pdfs/en/TI\\_Profile\\_China.pdf](http://global.tobaccofreekids.org/files/pdfs/en/TI_Profile_China.pdf); and Cheng Li, *The Political Mapping of China's Tobacco Industry and Anti-Smoking Campaig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2), 18.

②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Neuroscience of Psychoactive Substance Use and Dependence*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4), [http://www.who.int/substance\\_abuse/publications/en/Neuroscience\\_E.pdf](http://www.who.int/substance_abuse/publications/en/Neuroscience_E.pdf).

③ Frank Dikötter, Lars Laamann, and Zhou Xun, *Narcotic Culture: A History of Drugs in China* (London: C. Hurst, 2004), 201-2.

知，机器卷制的细丝烟叶卷儿不仅仅是输送尼古丁的工具。<sup>①</sup>在中国也是如此。多年来，卷烟是精神疏导，也是象征性符号；是情绪调节剂，也是形成自我和社会的文化表达。<sup>②</sup>在中国各地，卷烟作为象征性符号如此重要，以至于现在吸烟者和不吸烟者常常要在工作、社会交往、地位区分、形成归属感和排他性的日常活动中，不可避免地使用这种符号语言。我讨厌这个地方都是便宜烟卷的味儿。来，抽我一根…别，来一根我的，我的这个好多了。呀，你抽得起这种烟？旁边有女的当众抽烟，我还是觉得不对劲。不了，谢谢，我不会抽。我戒了，全凭意志力。小孩子不能吸烟。吸烟害处大。没事，来一支吧。我们家是xx省的，我们喜欢吸那里产的烟。吸烟的人一般档次低。我希望我老公再戒一次烟。真爷们哪有不吸烟的。太可怜了，你还买这个牌子；该换个好的了；这些是乡巴佬吸的。在中国，这些与卷烟相关的话，会在对话中反复出现。

就好像在法国喝什么葡萄酒、在美国开什么汽车，<sup>③</sup>对住在中国的人来说，是否吸烟、吸什么烟、什么时候吸、怎么吸、在哪里吸、与谁一起吸，代表了很多文化意义；这又全有赖于以下无可争议的预期：卷烟制造便捷，到处都有卖，随时都能来一根。人际关系、社会价值和物质世界的成功在不同程度上都依赖一个

---

① Richard Klein, *Cigarettes Are Sublim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② 关于卷烟作为符号，见 Peter Hessler, *Country Driving: A Journey through China from Farm to Factory* (New York: Harper, 2010), 233.

③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人使用卷烟与人交往的能力。近些年因为公众健康警告和禁止吸烟的规定不断增加，处理好人际关系变得更复杂了。

卷烟是怎样成为中国日常生活中如此复杂，但又令人期待，甚至司空见惯的一部分，帮助人们界定自己、空间和地位？中国蔓延生长的烟草业又是如何围绕卷烟贡献了种种文化象征，而非仅仅生产大量高度成瘾的烟草制品？

我们知道，20世纪初，较早进入中国开展机制卷烟业务的公司销售产品并不容易。一开始，人们对这一商品类别无甚兴趣。如果当时需要购买烟草制品，人们喜欢的形式是鼻烟，以及旱烟、水烟用的烟丝。为了占有市场，英美烟草和南洋兄弟等卷烟制造商开始支持开发新的文化媒介，比如包装、广告和电影，用积极的卷烟广告覆盖中国的大片区域。<sup>①</sup>这类信息传播强调了卷烟不是鸦片替代品，而是一种在各种维度上定义自己的方式：从传统到现代，从男性到女性，从地方到全国，从外省到大都市，从赤手空拳打拼成功的老板到聚会上娱乐大家的明星。我们还知道，卷烟公司在早期的信息传播中常试图把卷烟的象征符号植入有关中国国粹和民族本源的观念。许多时候这是通过品牌开发和植入式产品广告实现的；“新中国”、“大中国”、“爱国”等数不清的卷烟品牌投放市场，大加推广。总之，有些东西起作用了。到20世纪中期，吸卷烟已经成为一种共有的习惯和个人表达方式，尤其是那些家境富裕、教育程度高、政治上居高位的人士。

9 卷烟作为象征符号系统的“变”与“常”表现出的规律

---

<sup>①</sup> 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patterns), 如何与中国烟草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重组和扩张的方式相关联? 中国共产党在 1949 年胜利前的活动如何奠定了这些规律的基础?

为了激起你对本书各章节的兴趣, 我先围绕卷烟常态化和品牌定位之间的关系, 简短回答一下这些问题。在 20 世纪中期, 卷烟制造商广泛地尝试各种品牌名称, 多达数百个, 并且定期重新设计成功商标的包装, 有的甚至一年几次。一些选择品牌象征的最初手段这些年来经久不衰, 从 1930 年代沿用到今天。比如, 烟草业坚持使用对国族意识意义重大的象征。今天这一类型的著名例子包括“熊猫”、“中华”和“中南海”(北京之前的御花园, 现在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办公地点) 等牌子。

我们也看到最近 50 年里品牌定位有不小的象征变化, 一些变化是短期的、手段性的, 另一些变化则更加长期, 具有策略性。总的来说, 人民共和国早期的卷烟营销商不再采用有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意味的图形和意义, 1920、1930 年代英美烟草公司等机构使用的明显的“外国”图案被抛弃了。设计师尽职地拥抱适合当时革命精神和毛泽东时代国家建设过程中各种政治运动的主题。他们的榜样是人民解放军 1949 年前在根据地经营的农村作坊里最先推出的卷烟品牌。1950 年代推出的许多新卷烟品牌包括: “解放”、“土改”、“反美”(抗美援朝时代的创新)、“劳动”、“丰收”和“大跃进”。<sup>①</sup>

---

① 王天培:《独具特色的云南烟草广告》,《红云红河》杂志总第 34 期, 2012 年第 4 期, 第 46—51 页。

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尤其需要提到，1949年以后，品牌象征的两个其他变化分别是地方性和性别。新成立的共和国的许多城市成为卷烟的品牌名称。北京、上海、武汉、天津等牌子，常常配上受推崇的城市标志性建筑物的符号形象，以粗体字形式出现在包装盒上。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卷烟上迅速消除了性别的象征。

10 革命前几十个明显迎合女性的品牌，比如“美女”、“情人”、“飞女”、“富女”，在1949年以后迅速消失，之后的50年中只出现了几个女性主题的品牌（比如，“女战士”，“新女性”）。在大清帝国晚期，男性和女性都使用烟草制品，常常从袖珍鼻烟壶吸两下，或者嘬两口填满切碎烟丝的旱烟或水烟，喷云吐雾。<sup>①</sup>而且，在20世纪的前50年，不管是迎合男性阳刚还是女性温柔妩媚的意象，都常见于营销商大力推广的卷烟品牌。不过，到1950年代，行为规范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是针对女性的规范。在1949年后的中国，对男性自我认同而言，拥有卷烟被认为是更恰当的，是成功的共产主义男人的标志；但是这样重新定义以后，对女性就有问题了。毛泽东时代的宣传者努力教一个年轻的国家如何辨识国内外的恶行，经常把吸卷烟的女性描述为轻佻的资产阶级“摩登女郎”，甚至是妓女和叛徒。<sup>②</sup>

1949年共产党掌权后，中国各地的工业重组极大地影响了卷烟常态化的许多方面，这是贯穿本书大部分章节的一个主题。品

---

① Timothy Brook, “Smoking in Imperial China,” in *Smoke: A Global History of Smoking*, ed. Sander L. Gilman and Zhou Xun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4), 84-91.

② Benedict, *Golden-Silk Smoke*, 199-239.

牌定位又一次提供了考虑这些进程的一个视角。就像许多商业领域一样，1950年代，中央规定中国各地的卷烟公司逐步国有化、合并，置于省市级党政控制之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当地党政官员把烟盒当作宣传喇叭，歌颂自己建立当地商誉的能力，同时满足中央对工业化重组的要求。当地政府官员把产地信息写在烟盒上作为装饰：每个烟盒上都用大号字体说明这些卷烟是哪个当地卷烟厂生产的（比如上海卷烟厂、武汉卷烟厂）。1949年以前，中国的烟盒极少说明生产地点。新的做法在烟盒上大胆说明生产厂，也使当地官员以能向区域内民众提供这种商品为荣，因为烟草在中国有很长的消费历史，而卷烟更是当时报纸上经常提到的国家新领袖日常消费的烟草产品。

在商业物品丰富的今天，我们很容易忽视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获得卷烟等物品的重要意义。对大多数人来说，1950年代和 11 60年代是物品相对稀缺的二十年。即便我们认为最不贵的消费品一般也难以获得。市政府通过国营商店向人们销售标明卷烟厂产地的卷烟，但同时也免费发放，这是城市居民通过基于户口系统的定量配给券才能获得的待遇。1960年代，许多城市越来越多向居民发放各种基本必需品的定量配给券。定量配给券也是当地政府官员的宣传喇叭。卷烟配给券一般说明，是这个城市的人民政府发放的，能兑换该城市最近国有化的当地工厂生产的卷烟。通过这些配给券，卷烟常态化迈出了一大步，卷烟开始被当作一种基本必需品和城市生活才有的权利，与米、糖、肉、布和自行车同等重要。不过，举起宣传喇叭也有风险。当地城市党政部门需要特别小心，他们监管下的卷烟不能与党的纲领违背。1949年以

后，这意味着消除含有资产阶级奢靡、性工作或反革命情绪的一切象征。由于害怕严厉的纪律处分，没有几个管理卷烟生产的党政领导敢让工厂的烟盒明显吸引女性。通常的做法是按照工厂所在城市给卷烟品牌起名。这个做法听起来有些乏味，但是对许多保守、寻求表彰的当地官员来说，已经足够了。同样，城市的品牌定位也有效地为成分大同小异的卷烟赋予了与归属感、价值、专有权、城市、政府权威相关的积极象征意义。

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卷烟品牌又发生了变化，这时不管城市还是农村，卷烟供应越来越稳定。在毛泽东掌权时期首次出现的许多卷烟品牌消失了，例如“跃进”、“坦荡”、“巨星”、“奉献”、“坚强”等。而配给券制度同样消失了，大部分以城市命名的牌子也不见了。虽然过去三十年烟草业加速生产，今天中国销售的国产卷烟品牌总数远低于毛泽东时代。国家烟草专卖局监督着品牌减少的过程，就像园丁照顾一片过度生长、管理不善的果园一样。<sup>①</sup>这是国家烟草局机构的核心使命：增加效率，把稀缺变为增长，把卷烟作为新的消费主义时代的中心。国家烟草局1980年代从当地党政部门接收中国卷烟业务的许多管理权，之后不久就开始兼并重组，关闭小型卷烟厂，实现规模经济。

---

① 从2001年到2014年，全国卷烟品牌总数从1183个减至89个。同时应当指出，在此期间，卷烟制造商增加了品牌家族中的产品种类数量。就像 Philip Morris 公司现在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销售万宝路品牌的多个品种（比如 Red、Gold、72's Edge、Smooth），中国卷烟制造商现在大多数品牌销售多个品种，用不同的方式包装，按不同的价格水平销售。见 Steve Shaowei Xu et al., "Trends in Cigarette Brand Switching among Urban Chinese Smokers: Findings from ITC China Survey," 在第十一届亚太烟草或健康大会上宣读的论文，北京，2016年。

国家烟草局仍旧允许推出少数新品牌，其中有些品牌令人立刻想到毛泽东时代之前和之后的伦理道德象征。1990年代，出现了“高贵”、“西方”、“电子时代”等新品牌。不过，在涉及性别规范方面，国家烟草局的立场是一贯的。中国烟草总公司下属公司今天推出的品牌几乎没有明显迎合女性吸烟者的。说象征决定了行为，总是有风险的，但是学术界和日常观察者大多认为如今男女吸烟率依旧差别这么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20世纪中叶确立起了女性吸卷烟的负面意义。差距有多大呢？全国调查表明，过去二十年，约60%的25到64岁的男性是每日吸烟者。同样的调查一直表明，女性吸烟率不到3%。<sup>①</sup>

当然，品牌定位和烟盒设计不是中国烟草业定义和重新定义卷烟与消费者体验之间规范性关系的唯一方式。还有其他哪些重要机制？尤其是，烟草业如何融合运用了工艺创新、公共关系、大众媒体、基于阶层和心理的营销？这两个问题我们在本书中都试图回答。

为了更好地理解第二个问题：融合运用的重要性，让我们考虑过去十年中国卷烟的一个显著趋势：价格差扩大。1990年代，国家烟草局取消了毛泽东时代的价格上限，允许烟草经销商老道地利用后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严重分层的社会状态。这样，中国出

---

① 这是依据1996到2010年调查的25到64岁成年人的情况。杨功焕等著：《中国吸烟与健康研究：1996年全国吸烟行为的流行病学调查》，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Qiang Li, Jason Hsia, and Gonghuan Yang, “Prevalence of Smoking in China in 2000,”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64, no. 25 (2011): 2469-70.

现了最便宜品牌（零售价现在约每盒 1 美元）和最贵品牌（每盒 35 美元以上）之间巨大的价格差。这种价格差异对将卷烟（正如中国今天的任何其他物品一样）改造成不同阶层和收入的象征是有效的。不过，彰显身份地位对共和国时期的卷烟而言，并不是新功能。即便在毛泽东思想最热忱的年代，中国卷烟行业一些雄心勃勃的厂家就已经把一些产品打造为地位象征，比如“熊猫”等最顶级的品牌只供应给党政精英人士。而“云烟”这种一开始为党政精英人士制造的品牌过去二十年市场增长迅猛，“云烟”品牌下的有些品种是中国所有卷烟中最贵的。这就引起了许多作者在这里会问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20 世纪中期毛泽东时代烟草宣传者提前预见了中国当前卷烟业的情况？

## 危害生命

危害是贯穿这本书的三个中心主题的第二个。研究事情如何变得习以为常，如何作为正常现象渗透日常生活，是文化学者探究的关键思路。不过，研究中国烟草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文化渗透这个简单问题。国家烟草专卖局 / 中国烟草总公司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卷烟制造商。规模最大意味着这个政府商业巨头拥有独一无二的耻辱：可以说它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个制造死亡和社会痛苦的公司机器。

当然，工业制造已经在全世界危害人们一百多年了。从工业革命之初，有害的产品（从杀虫剂到药物、酒精饮料，到喷雾

剂、清洁剂，到刀具、刀片、手枪）就在全世界制造和销售。近些年，记者常常曝光中国生产的劣质产品（比如奶粉、玩具、药物），不管人在重庆还是芝加哥，在广州还是危地马拉城，人们对这些产品会倍加关注。不过，中国各地工厂生产卷烟的数量远远超过刀具刀片，或者药物玩具。而且，中国这些卷烟厂试图达到更高的生产效率，一直在推动规模和强度都史无前例的全球灾难。

这场全球灾难已经有了代价。预计代价会越来越大，它在全世界已经出现一段时间了，现在仍在肆虐。全球范围内，这场灾难作为提前死亡的单一最大死因已经十多年了，甚至在像美国 14 和新西兰这样相距遥远、吸烟率从 1970 年代已经显著下降的国家也是如此。<sup>①</sup> 十多年前，言辞通常谨慎的美国癌症学会的首席执行官 John Seffrin 把卷烟归类为“人类发明的最有效的杀人机器”。<sup>②</sup> 2008 年，他进一步把卷烟称为“世界上最严重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作证指出，如果继续按当前的速度消费卷烟，“它会夺去今天在世的 6 亿多人的生命”。<sup>③</sup>

---

①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port on the Global Tobacco Epidemic, 2009: the MPOWER Package*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9); “Health Effects: How Does Smoking Harm Us and What’s in a Cigarette?,” Health Promotion Agency, 2010, <http://www.smokefree.org.nz/smoking-its-effects/health-effects>; and “Tobacco Statistical Snapshot,”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2012.

② John Seffrin, “National Conference on Tobacco or Health/Tobacco--Greatest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November 20, 2002.

③ Adam Gorlick, “Tobacco Companies Compared to al-Qaida,” *Standord Report*, Stanford University News Service, May 21, 2008, <http://news.stanford.edu/news/2008/may21/tobacco-052108.html>.

影响全球人口健康的负担，中国早就开始承受。如今中国居民的一半以上经常接触卷烟烟雾（一手烟和二手烟），即便在特别拥挤的北京等城市，卷烟烟雾对室内空气污染的影响比雾霾还严重，全球卷烟灾难正在中国各地上演。<sup>①</sup>目前，中国每年超过一百万人死于接触卷烟烟雾，这是艾滋病毒和艾滋病导致每年死亡人数的三十多倍。<sup>②</sup>而且，假定当前水平的卷烟烟雾接触量继续下去，今后二十年发病率还会继续大幅攀升，到2030年死亡人数预计又增加两倍，达到每年350万人。<sup>③</sup>传统思维把这些死亡人数激增归因于人们“选择”吸烟。不过，我们认为这个解释还不够。不够，是因为它忽视了过去一个世纪，烟草业及其同盟如何把吸烟培养成日常生活正常的一部分。不够，因为它忽视了尼古丁是所有药理物质中最具成瘾性的物质之一。特别不够，因为它忽视了供应这方面。统计学者告诉我们，根据对中国典型吸烟者成年男性的调查，从1950年代以来，人均吸烟量持续攀升。男性

---

① “Second-Hand Smoke Greatest Source of Indoor Pollution in Beijing: Study,” Xinhua, September 12, 2012, [http://www.china.org.cn/environment/2012-09/21/content\\_26601998.htm](http://www.china.org.cn/environment/2012-09/21/content_26601998.htm);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obacco in China,” 2013, <http://www.wpro.who.int/china/mediacentre/factsheets/tobacco/en/>.

② 2012 China AIDS Response Progress Report, Ministry of Health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2, [http://files.unaids.org/en/dataanalysis/knowyourresponse/countryprogresreports/2012countries/ce\\_CN\\_Narrative\\_Report\[1\].pdf](http://files.unaids.org/en/dataanalysis/knowyourresponse/countryprogresreports/2012countries/ce_CN_Narrative_Report[1].pdf); 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obacco in China.”

③ “Experts Raise Estimates of Deaths Caused by Tobacco-Related Illness in China,” Xinhua, January 6, 2011, <http://infoweb.newsbank.com/resources/doc/nb/news/1349C0ooEB2808Eo?p=AWNB>.



人均吸烟量从 1950 年代初平均每天一支卷烟，到 1970 年代初增加到每天四支，到 1992 年增加到每天 10 支，到 1999 年增加到每天 15 支。<sup>①</sup> 这是急剧增长。不过，把这个 15 倍的增长主要归因于生活方式，从根本上掩盖了烟草业自己炫耀的产量上的成功，掩盖了中央和省市政府部门对供应链的巨大投资极大促进了年均吸烟量剧增。毕竟，这些投资使同期卷烟产量增长约 20 倍（见图 I.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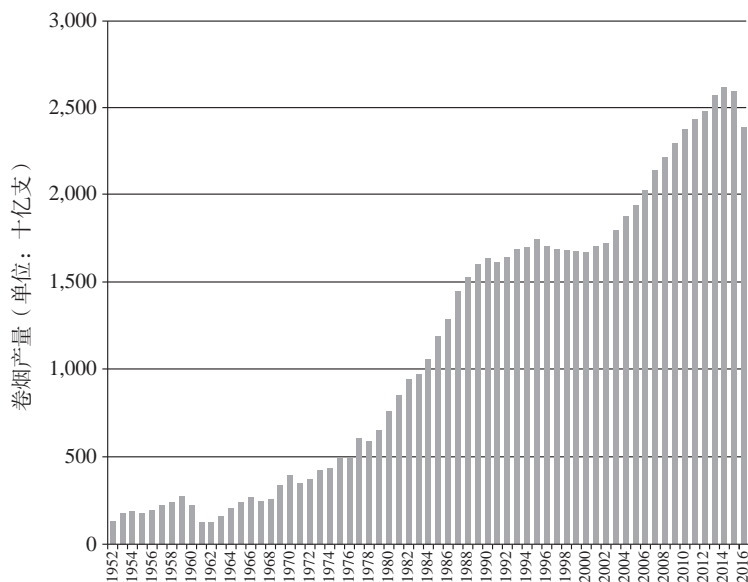


图 I.1

中国 1952 年到 2016 年卷烟产量。中国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search.htm?s= 卷烟产量](http://data.stats.gov.cn/search.htm?s=卷烟产量)。

① Richard Peto, Zheng-Ming Chen, and Jillian Boreham, “Tobacco: The Growing Epidemic in China,” *CV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4, no. 1 (2009): 61-70.

15 这个制造巨头的崛起，挑战我们对供需的关系的一般理解。在中国接触卷烟，是未得到满足的需求被令人愉快地满足，还是巨大的过量生产形成了需要处理巨大剩余存量的处境？

当然，考虑到全国不断攀升的卷烟产量，这些年来寻求治疗烟草导致各种疾病的患者也让医院应接不暇。呼吸科、心内科、  
16 心胸外科等科室尤其人满为患，越来越多人罹患恶性肿瘤、肺气肿、心脏病和其他威胁生命的疾病。过去三十年，中国单是肺癌导致的死亡就增加了三倍。<sup>①</sup>中国卫生部流行病学家对因果关系实事求是，把全国肺癌的几乎全部病例都归因于接触一手和二手卷烟烟雾。<sup>②</sup>

也许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全国各地的死亡往往通过统计数字呈现。但是，必须记住，每一条逝去的生命不能只用数字衡量。任何死于烟草的人都不只是一个数据点。她是一位姐妹、母亲、阿姨、老同学。他是一位兄弟、父亲、叔伯、邻居。他们的生命深深地融入社会和情感之网。中国死于卷烟的男人和女人撕裂人生网络，不只是他们自己的网，还有数不清的其他人的网。他们的死亡无一例外地使家人、朋友和亲友长期遭受痛苦，涉及情感、道德、心理和财务上的灰飞烟灭。<sup>③</sup>

今天，烟草致人死亡的影响扩散开，中国不受影响的人很少，再过十年，不受影响的人会更少。这种破坏的洪水越漫越高，要

---

① Jun She et al., "Lung Cancer in China: Challenges and Interventions," *Chest* 143, no. 4 (2013): 117-26.

② 《2006年中国吸烟与健康报告：控烟与肺癌防治》，北京：卫生部，2006年。

③ 李晓亮著：《失去的不只是健康》，昆明：云南出版集团2013年版。

求各个部门提供符合伦理的回答，包括学术界。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回顾过去对展望未来至关重要。回顾过去，对培养新的道德至关重要，并从而形成未来的新政治。起码，应培养反对中国烟草使用攀升的民间势头，多个社会领域的人们需要更好的信息，了解卷烟行业的参与者和盟友如何塑造了中国当前的状况。

## 吸烟问题政治化和卷烟行业去政治化

为了使中国不再是全球卷烟灾难的主角和受害者，必须更多了解生产是如何进行的。尤其必须回答两个问题。首先，国家烟草局 / 中国烟草总公司的制造部门是如何获得了这么多危害人健康的自由，铺天盖地地给人们提供一种物品，而这种物品如果人们完全按其指定用途使用，会夺去一半日常使用者的生命？第二，17 近些年为遏制卷烟流行做了哪些工作，中国烟草总公司如何与区域制造商协调消解这些控烟努力？这两条探究的线索，分别衔接本书的第三个主题：政治化和去政治化。

把某件事框定为政治化的，那么就需要人们去抗争；若框定为非政治化的（比如“纯粹”审美或技术性的问题），那就不值得抗争。这样的框定几乎总是涉及知识，但是也涉及情感和历史。为了能说清楚，请考虑东亚过去在烟草领域之外的一个例子，这件事最近经历了剧烈的政治化。1937年，在六个星期的时间里，日本帝国陆军官兵在中国南京市杀死了几十万中国平民和士兵，广泛实施了强奸和劫掠。几个违法者后来被审判，并判定

有罪。虽然这些事件十分残暴，但是在毛泽东时代（1949—1976年），中国媒体基本没有提到，内部阶级斗争是当时政治的优先重点。到了1980年代，中央的改革者开始需要有动员国族的新方式，现在我们所称的南京大屠杀开始被以极具政治性的方式表述（framed）。这种表述通过电影、小说和学术研究等长期的多种媒介来实现。通过这种表述，促使今天中国公民感到南京大屠杀是国族心中的一个脓包。通过这种表述，人们会期望中国领导层对日本政府态度强硬，开展昂贵的军事演习，表明中国绝不允许日本再次在中国土地上实施这样的暴行。

把这与中国国内卷烟行业使该国正在遭受的伤害并列比较。外国人首先引入中国的这种行业，现在用有毒产品的巨浪淹没中国（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数是南京大屠杀的三倍），但是，它引起的民间愤怒如何受到高度限制？换句话说，中国今天卷烟导致的死亡通常是如何政治化和去政治化的？

一个回答是有差异性的问题化。吸卷烟被当作一个问题，但是卷烟行业却不是。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在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政策下，国际控烟讨论开始进入中国。此后，越来越多卫生倡导者、政策制定者和不同领域的专家援引烟草相关的致病统计，要求党和国家更好地向公众宣传烟草的毒性，实施反吸烟措施。这些控烟专家大多采取了自上而下的管制干预方式，使公民避免对吸烟做出有风险的决定。这种方式把“吸烟”行为作为问题，而基本上忽视了卷烟行业及其产品。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项公共卫生条约，提供了对这种不平衡方式的动力、制度正当性和行为准则。公约提供的主要是从需求侧

来解决复杂公共卫生问题的方法。它对各国提出的许多要求是代表国民做出干预，使公民对如何管理吸烟带来的风险做出更好的决定。相比之下，公约只制定了极少的议定书来遏制全世界烟草业生产高度成瘾产品的自由。没有一项公约议定书要求制造商披露他们的产品是如何制造的。没有一项议定书要求卷烟种植者对产品进行改良（比如降低尼古丁水平），使它减少成瘾性。没有一项议定书积极鼓励政府在人民中培养不只是对吸烟，也包括对烟草业的政治意识。

在这个国际控烟的背景下，中国 2005 年签署了公约后，吸烟的问题化发生在几个层面。以下是几个例子：党和国家实施一系列越来越严格的卷烟广告禁令，限制人们接触烟草业的商业语言。在公共场所实施禁止吸烟规定，要求人们学习不在禁烟的场合吸烟。要求在卷烟包装上采用稍微增大的关于“吸烟”危害的文字警告标签。分配小额资金，鼓励传播卷烟使用带来危害的知识，增加对卷烟消费的流行病学监测，推动在大城市设立戒烟门诊，资助学校劝诫青少年不要开始吸烟习惯的项目。我希望你再次阅读以上这些例子。每一项都强调吸烟行为，并且通过间接方式，不强调烟草业的重要性。

当然这种趋势不是中国独有的。这是一个全球现象，在几乎 19 所有情形下都很少有人研究。当前，统计学者把美国一年 50 万提早死亡人数归因于卷烟。但是即便在美国，虽然烟草管制者还算成功，今天除了律师召集的原告以外，也很少有人以任何直接方式挑战卷烟制造商。也许这是因为与中国一样，美国控烟很少培养对受害者的研究，只是认为吸烟者应该怪自己。过去五十年北

美的控烟项目规划主要是让人们能够做出健康决定（注意：没有做出健康决定的人并不是粗心大意），但是很少触达幸存者或其家庭，更不用说鼓励他们动员起来对付工业化侵犯者。美国这几十年有民间的支持和基层动员，使用粉色丝带和红色丝带，开展多项社会运动，旨在改变乳腺癌和艾滋病毒 / 艾滋病的政治经济学。但是，对肺癌和肺癌的主要因果链，基本上没有任何政治动员行动，尽管北美每年死于肺癌的女性远多于乳腺癌，死于肺癌的美国人死于艾滋病毒 / 艾滋病的十倍。<sup>①</sup> 换句话说，烟草业去政治化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但是，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卷烟生产国，中国可以说是调查这个现象的最重要环境。

这引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中国卷烟行业如何避免成为问题？

最重要的是卷烟行业在政府和日常生活中小心维护其地位的方式。在这个如此多商业活动形式已经高度私营化的年代，卷烟制造和销售一直是政府的领地。国家对供应链的控制，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党统治的威权主义系统中，不可避免地赋予一个行业和它的主营产品一些体面。同样，供应链较大部分仍旧是融入当地的，公民感受到的尤其是如此，这就使烟草业更有体面。位于北京的国家烟草局 / 中烟总公司官员的确管理国家庞大的卷烟行业。但是，人们拿一盒烟的时候，感到的是区域性的东西，融入

---

① “Lung Cancer Fact Sheet,” American Lung Association, 2012, <http://www.lung.org/lung-disease/lung-cancer/resources/facts-figures/lung-cancer-fact-sheet.html> (accessed August 2013); and “HIV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a Glanc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13, [http://www.cdc.gov/hiv/pdf/statistics\\_basics\\_factsheet.pdf](http://www.cdc.gov/hiv/pdf/statistics_basics_factsheet.pdf) (accessed August 2013).

省市协会网络的“当地”工厂制造的产品。今天，国内生产的烟盒上仍旧几乎从不说明“中国烟草总公司制造”，而是一般在侧面说明是国内某个城市的老工厂（比如长沙卷烟厂），毛泽东时代以后的企业（比如贵州烟草工业公司），或新的大型“烟草集团”之一（比如上海烟草集团，红塔玉溪烟草集团）制造了这个产品。只要国家烟草局/中烟总公司劝诱烟草业合并，试图推动工厂形成“集团”，所有卷烟制造单位就会在产品名字中带有容易识别的省、市、地区的标志、而且在营销中强调这些。这暗示了区域主义仍是烟草业的特征，尤其是在省级层面。当地党政官员及其管理的媒体定期鼓励人们吸当地品牌，作为为家乡自豪、支持当地经济的方式。有些宣传说，吸当地烟，周围的每个人都从利润中受益。

但是，当然，中国更大的卷烟制造业形成的资金并不总是留在当地，因为中央抽走了大部分。人民共和国今天的烟草业是中央运营的国有垄断，也是一系列区域化的公共卡特尔（cartels），按照 Jean Oi 所说的“地方国家统合主义”运行。<sup>①</sup>它是政府和工

---

① 根据 Divakara Babu Chennupati and Rajasekhara Mouly Potlury, “A Viewpoint on Cartels: An Indian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Management* 53, no. 4 (2011): 252-61, “卡特尔是彼此竞争的公司之间的一种正式（明确）协议。它是生产商和制造商同意固定价格、营销和生产的正式组织。卡特尔一般发生在寡头垄断行业，卖方不多，一般涉及同质产品。卡特尔成员可能就固定价格、行业总产量、市场份额、客户地区分配、操纵投标、建立共同销售机构、瓜分利润等一个或多个事项达成一致。如此串通的目的是减少竞争，从而增加单个成员的利润。我们可以区分私人卡特尔和公共卡特尔。如果是公共卡特尔，政府会参与进来执行卡特尔协议，政府的管制权防护这些卡特尔不（转下页）”

业的混合组合，不断变化，有许多内部张力和区域利益攸关方。通过复杂的个人关系网、法规和法律，这个组合使用中央政府的权力，阻碍外国竞争者和无证的造假者。同时，它力图使区域性卷烟企业遵照中央的各项法令和党的优先重点。比如，中国烟草总公司管理跨越国界和省界的烟叶流动，但是，却难以打破奉行保护主义的当地企业和省委领导设立的当地卷烟销售最大化的区域障碍。中国每年卷烟生产的配额同样也存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张力。中国烟草总公司每年向卷烟厂分配生产配额 / 上限，规定工厂应当制造的总支数。但是，管理这些工厂的当地企业剧烈地竞争市场份额，急于展示当地 GDP 增长的政府领导也鼓励他们这么做，所以这些当地企业向北京施压要求获得更高配额，以及在卷烟业整合期间吞并其他企业的权利。

- 21 大多数公民可能不会意识到这种体制性策略，尤其是考虑到多么鼓励人们对卷烟只考虑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烟总公司已经存在三十多年了，所有的国内卷烟企业都是它的下属公司，但是，

---

(接上页) 受到法律诉讼”(253)。根据 Jean Oi,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5, no. 1 (1992): 99-126, “地方国家统合主义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指的是“财政改革把增加的收入财产权赋予地方政府，使地方官员有寻求地方经济发展的强烈激励。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获得了法人公司的许多特征，官员扮演董事会的角色。国家和经济的这种合并方式代表了一种新的机构性发展，我把它称为地方国家统合主义。我想明确说明，这里使用的‘统合主义’与之前研究中的用法不同。我用地方国家统合主义指地方政府协调本区域经济企业的工作，就像一个多元化商业企业一样”(100—101)。另见 Barry Naughton, “Implications of the State Monopoly over Industry and Its Relaxation,” *Modern China* 18, no. 1 (1992): 14.



这些下属公司的名称都不强调中央政府拥有，而是更多强调其在当地的根基。中国今天的大部分卷烟都是同质的用纸把烟叶包起来的二十支一盒，卷烟的多样化通过不同的品牌和口味实现，主要是依靠名称、烟标和香气，有些可以追溯到 1950 年代某个卷烟企业最早成立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城市。大多数中国人习惯了在看烟盒的时候，看到的不是工业化阴谋或危害，而是政府认可的、充满积极家乡意味的品牌。人们习惯了看到的是一个社会和政治表白的机会，表明对某地的自豪和忠诚。

这联系到烟草业避免自己成为问题的另一个方式：对利润的呈现。中国许多居民今天都意识到卷烟是国家的赚钱机器，但是对烟草业的财政所知甚少，包括收入如何形成和分配。<sup>①</sup> 在 1980 年代以前，就像大部分政府事务一样，烟草税是国家机密。随着 1980 年代初监管烟草业及其税收的机构开始对公众发布年报，最近开始发布季报，这似乎开始改变。不过，这些报告的目的不只是为了透明，更多是服务自己的政治表演。每份报告一般内容寥寥无几，但是发布时总是大张旗鼓，报告的结论往往再次确认烟草业是党和国家的一个“支柱”产业，与任何其他行业一样，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为政府“为人民服务”的使命做出贡献。我们从这些报告中还能得知的一般是全国范围和许多省市政府的卷烟利税三十年来一直快速增长。根据 1981 年的一份报告，烟草业上缴了约 75 亿元“利税”。<sup>②</sup> 到 2012 年，上缴利税涨了一百多倍，

---

① 胡德伟编：《中国烟草税收：历史沿革、现状及改革》，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 2009 年版。

② Li, *Political Mapping of China's Tobacco Industry*, 91.

达到 8640 亿元（1400 亿美元）。<sup>①</sup> 这些报告也使我们能看到总体上卷烟相关的税收占中国征收的各项政府税收的相当大比例。比如，2010 年，中国卷烟相关的税收占中央政府征收税收的十四分之一。<sup>②</sup>

如果说政治表演中披露的烟草业盈利的信息很少，只有几个让人惊异的统计数字，卷烟制造和销售收入的支出情况就更不透明了。从烟草业获得的巨额资金用于全国的哪些政府预算，买了什么？针对去政治化，我们可以假定国家的卷烟行业——对国家而言如此高产并且越来越肥的一头“现金牛”——能够讨好共产党的最顶层，缓解不满。同样，我们可以假定党的领导人，尤其是处在中国烟草腹地（比如云南省，1990 年代末烟草业利税占省政府收入约 80%）的领导人，容易受到烟草业的拉拢（即使不算直接腐败），并进而自己积极游说中央管理者提供有利于烟草业的政策。最后，我们可以假定，这些年烟草业有时候偷偷地、有时候大张旗鼓地花费资金，转移公众对烟草制品带来危害负有责任的关注。不过，只是假定这样使用了烟草业利税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也询问和记录：烟草资金通过什么方式积极地用于去政治化？我们必须询问和记录：在使用烟草公司的慷慨施舍，消除卷烟生意导致的疾病和死亡的政治化时，烟草业参与者及其代理人扮演

---

① 《烟草行业 2012 年上交国家财政 7166 亿同比增 19%》，新华社，2013 年 1 月 17 日，<http://business.sohu.com/20130117/n363764597.shtml>。

② 《2010 年我国烟草行业实现工商利税 6045.52 亿元》，中央人民政府，2011 年 1 月 18 日，[http://www.gov.cn/jrzq/2011-01/18/content\\_1787549.htm](http://www.gov.cn/jrzq/2011-01/18/content_1787549.htm)；国家统计局：《2011 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77 页。

了什么角色？

与今天世界上其他大型卷烟制造商相比，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更难回答这些问题。今天任何人有互联网连接都可以轻松地获取 Philip Morris、帝国烟草、RJ Reynolds、英美烟草、Lorrillard 等公司 20 世纪初以来的几千万页公司内部文件。这些文件大部分通过北美的诉讼被判定公开，可以在 Truth Tobacco Industry Documents 网站免费查看。根据这个巨大的档案库，历史学家已经揭露了这些年中国以外卷烟生产商拨付大笔资金，用来平息公众愤怒、分散注意力和欺骗公众的种种方法。<sup>①</sup>

以上这些揭露促使我们探究太平洋彼岸烟草公司的模仿。中烟总公司的下属公司以怎样的方式复制外国竞争者的支出优先重点，把现金流的一部分用于使用谎言把自己包裹起来？中烟总公司的下属公司设计了什么新颖的技巧？我自己的研究（包括过去十年开展的多项访谈，以及花在云南烟草科学研究院图书馆的时间，这个研究院是中国烟草业资助的最大的准科学公关机构之一）告诉我，至少从国家烟草局 1982 年成立以来，中国卷烟制造商仔细研究外国公司如何缓和公众对卷烟危害的意见。而且，通过记者报道和初步的学术界探究，目前虽少但已逐渐增多的知识表明，中烟总公司下属公司远不止是简单研究了一下。国家烟草局的下属公司似乎采取了与西方烟草公司类似的各种技巧，混淆、误导、发布虚假信息和拒不承认等等，都是为了转移公众和政策制定者

---

<sup>①</sup> Brandt, *The Cigarette Century*; and Robert Proctor, *Golden Holocaust: Origins of the Cigarette Catastrophe and the Case for Aboli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对严肃应对烟草使用危害的关注，同时表现烟草业的负责任、讲道德。<sup>①</sup> 这些技巧似乎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式：

- 对烟草带来的风险，鼓励公众采取个人责任的视角，而不是公司责任的视角；
- 推出宣传“低焦油”的产品，有时候将其命名为“淡味”，然后把它作为更安全的替代产品营销（其实一样致命）；
- 消解要求烟盒印有有效警告标签的倡议；
- 形成对卷烟、吸烟和二手烟有误导性的“科学”知识；
- 阻碍为了降低卷烟消费的税收改革；
- 烟草企业捐赠资金、支持与烟草不相关的事业时，比如扶贫、农村教育发展、减轻自然灾害等，宣传其慈善行为。<sup>②</sup>

---

① Matthew Kohrman, “Smoking among Doctors: Governmentality, Embodiment, and the Diversion of Blame in Contemporary China,” *Medical Anthropology* 27, no. 1 (2008): 9-42; Matthew Kohrman, “New Steps for Tobacco Control in and outside of Chin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2, no. 3 Suppl (2010): 189S-196S.

② 周增瑞、程永照主编：《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对案及对中国烟草影响对策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Yuanjin Ni, “Xinhua Insight: WHO Official Urges China to Print Graphic Warning Labels on Cigarette Packs,” Xinhua, July 15, 2011, <http://infoweb.newsbank.com/resources/doc/nb/news/13885BE5A8A30BBo?p=AWNB>; John Garnaut, “Losing the Battle in a Country Where Tobacco Sponsors Schools,” *Sydney Morning Herald*, August 26, 2012; 谢广荣, 《贵州省政协机关、贵州中烟向息烽旱区捐赠矿泉水、大米》, 2013, [http://www.tobacco.gov.cn/html/30/3005/4537882\\_n.shtml](http://www.tobacco.gov.cn/html/30/3005/4537882_n.shtml) (2013 年 9 月访问); Gonghuan Yang, “Marketing ‘Less Harmful, Low-Tar’ Cigarettes Is a Key Strategy of the Industry to Counter Tobacco Control in China,” *Tobacco Control*, no. 2 (2013): 167-72.

本书的出版对曝光这类虚假信息宣传的内部做法特别及时。过去十年，中国各地环境抗议越来越常见。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24 在新知识的武装下，在国营和私营企业等工业污染大户威胁自己时，已经不堪忍受，纷纷打起官司，发起抗争。中烟总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迄今为止避免了这类集体抗争，部分是因为他们成功地管理了民众对危害的认识。任何随机观察者都见证了中国过去三十年控烟知识增长。多个渠道（媒体、学校、流行文化）宣传吸烟本身固有的危害。调查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2010年，大部分中国成年人，高达80%“意识到”烟草烟雾导致“疾病”。<sup>①</sup>此外，2010年，与四年前相比（39%），意识到“吸烟”导致肺癌的中国成年人高出一倍（77%）。所有这些看起来都是公共卫生的好消息。但是坏消息是，部分由于烟草业的活动，民众对烟草的认识，与烟草毒性和接触烟草烟雾导致四十多种危及生命疾病的知识，还存在极大差距。想一想中国今天的三个主要死因：心脏病、脑卒中和肺癌。到2010年，80%的成年人不知道卷烟导致全部三种疾病。同时，大多数成年人对二手烟的健康影响仍不够了解。五分之四的成年人不知道二手烟导致儿童患肺癌、成年人患危及生命的心脏病和肺病。<sup>②</sup>

烟草业训练公众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的最重要渠道之一是警告标签。中国烟盒已经印有警告十多年了。不过，国家烟

---

① Yan Yang et al., “Awareness of Tobacco-Related Health Hazards among Adults in China,” *Biomedica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3, no. 6 (2010): 437-44.

② 同上。

草专卖局一直阻挠扩大警告形式和内容的所有努力。目前，警告可怜地使用最平淡的语言不温不火地描述一种有风险的行为（而不是一种危险的产品）。警告标签用小号字体表述：吸烟有害健康，戒烟可减少对健康的危害。这样的措辞对烟草业再好不过了。这一措辞使烟草业倡导者有理由说已经采取了符合伦理的行动（警示了公民，鼓励他们采取负责任的行为），而实际上，让公众对涉及的危害程度基本一无所知。

烟草业的营销也同样有隐患：吸“更安全的卷烟”，能容易地  
25 限制烟草本身固有的毒素。近期，小型电子烟企业更促进了这一观念。不过，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传统卷烟企业已经发布“淡味”信息几十年了。近期一项全国调查显示，86%的受访者没有意识到“低焦油”不等于“低危害”。应当指出，烟草业的“低焦油卷烟更安全”的说辞，不仅在普通公众心里扎根。全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公民中有一半人，包括54%的医学专业人士，现在对烟草业低焦油卷烟/安全卷烟的假新闻信以为真。<sup>①</sup>

\* \* \*

以下介绍本书各章内容。在第一部分，我们介绍早期共产主义领导人如何接受了卷烟制造，如何种下了今天常态化、去政治化和造成危害的种子。刘文楠介绍了很可能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管理卷烟业务的历史。这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的陕甘宁根据地。沙青青探讨1950年代初，党的领导人和卷烟制造商如何激烈地辩论对烟草业的国有化。他聚焦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一次卷烟行业

---

① Yang, “Marketing ‘Less Harmful, Low-Tar’ Cigarettes.”

会议。上海是当时卷烟行业的中心，在 1949 年初，有一百多家烟草公司生产烟草制品。皇甫秋实和 Matthew Kohrman 审视大跃进时期的卷烟市场。他们认为，大跃进的动荡帮助形成了 21 世纪中国卷烟行业的一些特征，并使之常态化。这些特征包括：大众消费，政府管理商业物流，生产本地化，卷烟内容作为创新的目标，工业细节比对人的危害更优先。

在第二部分，我们介绍烟草业受益于视觉文化和历史再现的各种方式，努力使卷烟常态化，对卷烟危害去政治化。Carol Benedict 审视中国 1920 年代到 1970 年代广告、卡通和宣传招贴画中的吸烟形象。她表明，这些图示生动地刻画了毛泽东思想观念中的吸烟行为和男性阳刚气质，无意中流露出 1930 年代出现并持续到 1949 年以后女性吸烟不恰当的观念。Matthew Kohrman 将注意力从视觉媒体转向历史对话。他带我们到专门新建的烟草博物馆逛一逛，展示烟草业开始使用历史再现，给员工打防备指责的预防针，向他们灌输对职业伦理的自豪感。 26

在第三部分，我们考察中国烟草业的税收和腐败，这两个方面对烟草业的常态化和有差异的政治化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素。Matthew Kohrman、甘泉和胡德伟介绍中国烟草税政策的演变，提供了迄今为止这方面最详细的描述之一。他们表明，近些年，虽然卷烟相关税收大多由中央政府获得，国家复杂的烟草税政策网络激励当地卷烟制造商和省市领导人扩大生产。李成则绘制了精英政治、当地政府和烟草业利益群体的动态。他聚焦毛泽东时代后不久的云南省，介绍烟草治理的关键特征，包括省市领导人如何与工厂协调，游说中央领导人，烟草相关的腐败如何渗透党

和国家的多个层面。

在第四部分，我们更全面地介绍在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年代，烟草业如何试图使烟草去政治化。Matthew Kohrman、孙鹏、Robert N. Proctor 和杨功焕介绍中国“淡味卷烟”的历史，介绍 1959 年装了过滤嘴的卷烟如何第一次试点推出款待政府领导人。然后，为了促进政府收入，在邓小平时代（1976—1997）早期，几家企业转而生产过滤嘴卷烟，宣传说这种卷烟更现代、更高质量。在邓小平时代末期，加大宣传“淡味卷烟”的说辞，在 21 世纪头十年，国家烟草局主导了“降焦减害”公关宣传。甘泉和 Stanton Glantz 审视过去五十年间烟草业和中国学术机构之间发展的关系。他们表明，在 1990 年代，在公众越来越担心吸烟带来的危害时，烟草业越来越多依赖科学家参与烟草研究，更多通过他们批驳公共卫生的信息。吴宜群和她的同事分析烟草业研究人员编写、宣称是维护消费者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科学成就”的关于《公约》的两本中文书。这两本书过去 27 十年由北京一家有声誉的出版社出版，是烟草业的宣言，是对干扰公共卫生不害臊的手册，每一本都提出了化解控烟政策的一套“最佳实践”。

在后记中，Robert Proctor 发挥他在研究、写作和质疑世界其他地方烟草业阴谋诡计的广泛经验，向我们提供一些总结性思考。

\* \* \*

虽然这本书揭露了一系列歪曲和损人利己，我和我的共同作者们仍旧怀有希望。正是这种希望最初把我们 2012 年聚到北京大学，讨论我们如何开启烟草研究的一片新天地。那时还有一个因



素把我们聚在一起，并且一直激励着我们。我们都认为，利用多种不同学术背景来更好理解中国卷烟是如何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事。我们对跨学科研究方式的热忱，结果之一是这本书不像大部分已有的研究烟草的专著，它既严肃地考察生产，又认识到生产涉及的远不止制造商品。我们认为，卷烟生产是一个覆盖范围很广的流程，涉及相互依赖的多种物品的组合、意义网络、社会关系、政府管制、科学研究、劳动体系、空间和阶层差别、具象化的性情、以及彼此竞争的伦理。

为什么要用力如此之多、涉猎如此之广来研究卷烟生产？因为它既涉及公共卫生的核心，也涉及全世界日常被烟草烟雾危害的那么多人。说得更准确些，涉及是否让防烟控烟继续在欠缺设计的束缚下艰难前进。<sup>①</sup> 中国和其他地方的防烟控烟很容易继续聚焦一个小的方面，也即常常不负责任地聚焦对消费者及其行为的控制。很容易继续把目前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如何帮助人们避免受误导而做出吸烟的决定。而 21 世纪的防烟控烟，可以更有实质内容，更有成果。可以扩大聚焦的孔径，开始主动地割断卷烟生产的千丝万缕，使其不再每年生产几万亿支新卷制的卷烟淹没我们的世界。<sup>②</sup> 本书各章的目的是审视现有模式，打破对过往和其他可能性的单调认知。我们倡导的当然是支持吸烟者戒烟意愿的一种方式，但我们倡导的方式也更热切地探究生产卷烟本身所涉及

---

① Matthew Kohrman and Peter Benson, "Tobacco,"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0 (2011): 329-44.

② 张西流:《控烟应从控烟企开始》，《法制晚报》，2015年5月25日，[http://dzb.fawan.com/html/2015-05/25/content\\_553942.htm](http://dzb.fawan.com/html/2015-05/25/content_553942.htm)（2015年9月访问）。

28 的方方面面。我们倡导的是呼吁书写一部新的历史，最终形成应对烟草问题的新的政治方式。我们需要的，也是本书努力激发的，是对烟草制造予以开放性的历史评价，广泛地评估卷烟的各个方面：企业报告、报纸上的形象、税法、对官僚争吵的回忆、丢弃的包装盒、博物馆陈列的画像……

把历史探究的亮光照向极少研究的角落，有可能出现新的觉醒和迄今为止不曾想见的社会行动。<sup>①</sup>现在是让中国的卷烟市场感受这束亮光的时候了。

---

<sup>①</sup> Walter Benjamin,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llumination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1968).

# 跨越革命边界的工业变革



1



# 第一章

37

## 试验：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的卷烟业

待客开水不装烟，  
领得衣被用三年，  
淡巴菰一亩公粮缴，  
糖萝卜二分私费贍。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 1944 年作“生产节约诗”

烟草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和贸易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众日常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民党政府，大量物资来自国统区。然而，1941 年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面临巨大的财政经济困难。边区政府决定用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方法来解决物资匮乏、通货

膨胀等问题，其中也包括发展卷烟业。这是共产党政权第一次独立、系统地经营这一行业。<sup>①</sup>

38 本章探讨了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卷烟（当时政府文件多称为“纸烟”，区别于手工卷烟，为本书行文统一，除引文外皆用“卷烟”）生产和销售，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共产党政权为何要在这样恶劣的自然和经济环境中发展卷烟业？边区政府如何将卷烟生产和管理整合入其新型治理中？通过这些尝试他们获得了哪些知识和经验，确立了哪些国家建设的原则？

\* \* \*

在边区自力更生的经济大环境下，卷烟作为非必需消费品的性质经历了一次范式转型。起初，卷烟消费被批评为消耗资源，进口卷烟使当地现金外流，卷烟消费被视为额外的奢侈性消费而受到限制。然而，共产党逐渐意识到卷烟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工具。当地卷烟生产作为增加边区收入的重要副业而受到政府鼓励，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一范式转型有助于吸烟行为的常态化，使共产党政权将其视为受尊重的行为，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尊重将传遍全国。

在陕甘宁边区，烟草对健康的影响却很少被提及；相反，吸烟被视为安抚战时焦虑的心理慰藉，予人享受的奖赏，消遣的工具，而新中国建立后又成了令人向往的好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

---

①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烟草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黄正林的《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也提及边区的烟草业和烟酒专卖。

分。边区政府关注烟草产品，尤其是卷烟，主要是因为它们影响经济，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延续到今天。陕甘宁边区有关卷烟的所有政策——税收规则、禁止外来卷烟、鼓励公营卷烟业——都围绕着将卷烟视为经济产品的认知——一种能够帮助共产党实现自力更生目标的产品。 39

## 陕甘宁边区经济大环境下的烟草生产和消费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治下的陕甘宁边区，包括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宁夏东南部，处于黄土高原中北部的农村地区。1937年抗战爆发初期，边区包括26个县，全区面积12.9万平方公里，人口200万，到1939年国共矛盾加剧，国民党政府包围并占领部分边区县镇，使边区面积减少为9.9万，人口降为148万。<sup>①</sup>陕甘宁边区从地理上说，地广人稀，交通闭塞。虽然以农业为主，但是耕种技术落后，农作物亩产量很低。在抗战之前，边区几乎没有近代工业，延安作为边区最大的城市，也只有少数手工业。因此，“整个边区的经济是一种水平极低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对外处于封闭的状态”。<sup>②</sup>

共产党在边区建立政权以后，虽然利用政治动员和土地所有

---

① 严艳：《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研究，1937—195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5页。

②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435页。

制改革等方式鼓励农业生产，并依靠从敌占区迁入边区的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逐渐发展起纺织、化工、军工、机械、造纸等各类轻工业，但整体而言，边区经济仍然具有传统农业经济的特点，工业发展不足。因此，边区地方经济对外界依赖很大，必须通过出口食盐、皮毛、甘草等当地土特产，换取必需的纺织品、药品等日用工业产品。于是，边区经济就面临典型的城乡贸易“剪刀差”问题，也即出口低附加值的工业原料和农产品、进口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造成财富从农村流向城市。1941年初皖南事变之后，国共关系恶化，国民党政府不再向边区提供现金和物资补助，并对边区实施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不仅工业产品匮乏，而且贸易“剪刀差”问题更为严重，出现巨额贸易逆差。<sup>①</sup>在这样的经济大背景下思考陕甘宁边区的烟草业，才能充分理解边区烟草生产、消费和管理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因素。

作为一个传统上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和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一样，抗战之前的陕甘宁边区以旱烟为主要烟草消费方式，因为旱烟可以作为农业生产之余的副产品，屋后田边少量种植，就可

---

① 根据边区1943年进出口贸易状况统计，进口647264万元，出口536472万元，其中出口物资中占68%的是所谓“特产”，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以下简称《史料摘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编，第50页。根据陈永发的研究，这里的“特产”指的是鸦片，换句话说，边区不得不依靠秘密的鸦片贸易来维持进出口贸易的平衡，而且即便如此也无法逆转整体上的贸易入超。详见陈永发《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一文，载《新史学》1卷4期，1990年12月，第41—117页。



以满足个人需要，后期加工也比较简单，是农村社会可以自给自足的嗜好品。<sup>①</sup>战前的陕甘宁地区，社会中上层有吸食水烟的习惯，卷烟厂商也不遗余力地推销机制卷烟，但数量很少，并未形成风气。抗战以后，随着外来人口进入后方，尤其是进步知识分子、军政职员以及来自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难民等，卷烟消费的习惯被带入了陕甘宁边区，对卷烟的需求也大大增加。<sup>②</sup>

旱烟、水烟、卷烟带给人不同的消费体验，而不同的烟草消费方式也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偏好和社会差异。旱烟一般用中国本土烟叶直接晒干，简单加工后做成烟丝，用竹制烟管吸食。旱烟的烟碱含量高，口味辛辣，但胜在成本低廉，用具简单，而且能自己生产，所以广受农村中下层民众欢迎。水烟的加工较早烟复杂，烟叶晒干后需要加植物油和香料，然后卷制成大块，再刨成细丝，最后放入细长形的模具中压制成条，包装出售。吸食水烟时需要有金属制的烟壶，烟草燃烧产生的烟经过水烟壶中的水过滤，口味更加醇和。水烟为技术含量较高的手工业产品，比旱烟贵，而且水烟壶需要定期清洗，点烟和吸烟的过程也较早烟复杂，在传统社会中往往是中上阶层的烟草消费方式。

卷烟从19世纪晚期由外国商人引入中国，又经英美烟公司等外国烟厂在中国不懈推广，成为烟草消费的时髦方式，尤其流行于沿海各大城市。与旱烟和水烟的最大不同在于，卷烟并不是

---

① 民国时期中国农村的烟草消费习惯，参见 Carol Benedict, *Golden-Silk Smoke*, pp. 171—77, 185—198。

② 《陕西省志·烟草志》，第5页。

简单由纸卷烟丝而成的烟草制品，而是有相当高技术含量的工业产品。卷烟点燃后直接吸食，因此不能用口味辛辣的土产晒烟来制作，要由美国引进的弗吉尼亚烟叶（也即“美种烟草”），用熏烤的方法加工（所以又称“烤烟”），去除烟碱的刺激性，才适于直接吸食。熏烤后的烟叶要经过去茎、发酵、切丝、烘干等多个步骤才能成为制作卷烟的烟丝。包裹烟丝的盘纸也必须紧致有韧性，燃烧时不产生额外的烟。卷烟工业的革命性在于1880年邦萨克（Bonsack）卷烟机的发明，它可以在1分钟内生产200支纸卷烟，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大量的机制卷烟进入市场，成为社会各阶层都可享用的大众消费品。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卷烟携带、吸食方便，口味醇和（尽管对人体的有害影响与其他吸烟方式相比并不减少，甚至可以说更有害），又代表时髦的生活方式，再加上烟厂不遗余力地推销，迅速在城市居民中流行起来，基本取代了以旱烟和水烟为代表的传统烟草消费方式。

1937—1939年，陕甘宁边区是爱国青年向往的圣地，大量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进入延安，中共领导层中也有很多在城市生活过的，有吸卷烟的习惯（最著名的就是毛泽东），他们组成了边区卷烟消费的主体。在国民党政府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之前，边区的卷烟供应主要来自周边的国统区，甚至有辗转从日本占领地区运入的。根据1941年12月记者对延安卷烟消费市场的调查，销路最好的是便宜的国产卷烟，大西湖牌（5元10支）、华山牌（5元10支）和司令牌（2元10支）。<sup>①</sup>不论价格高低，边区的卷烟

---

<sup>①</sup>《解放日报》（延安）1941年12月24日，第4版。

消费的偏好都是以美种烤烟为原料的机制卷烟。

一方面，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水平落后、工业基础薄弱、高度依赖外援；另一方面，除了当地普通民众有吸旱烟和水烟的传统外，由于抗战而进入边区的移民以及政府机关学校的工作人员，带来了吸卷烟的新偏好，而他们喜欢吸食卷烟只有通过贸易从边区之外购得。因此，卷烟消费必然会使边区已经非常高的对外贸易逆差更加严重。在国民党对其经济封锁日益加剧的1941年，边区物价飞涨，尤其是轻工业制品，外来的卷烟价格更是从1938年的0.1元一盒涨到了平均4元一盒，与此同时土产烟丝才3.5—4角一两。<sup>①</sup>在这种情况下，边区贸易总局在1941年12月15日向边区呈请禁止外产卷烟入境，也在情理之中了。

## 经济压力下的禁止卷烟进口

根据1941年9月29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货物税修正暂行条例》，非边区产品在边区销售，烟类税率分别为：卷烟40%，水烟20%，曲沃烟20%，兴隆烟20%，什办烟20%。<sup>②</sup>卷烟的税率是其他烟草制品的一倍。如果说高税率意味着“寓禁于征”，那么在全面禁止卷烟进口之前，边区税务部门已经有抑制卷烟消费

---

① 《解放日报》（延安）1941年12月24日，第4版。

②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18页。

的意图了。然而，高税率显然并未有效阻止卷烟消费，1941年的  
42 卷烟进口仍然高达1000多万元。<sup>①</sup>由于国民党加强经济封锁，从  
1941年开始，边区政府贸易局开始调整其进出口物资管理的政  
策，开始有计划地以边区剩余土产换回必需品或无替代品，同时  
限制奢侈品（卷烟、酒、雪花膏、香皂、香粉）和迷信品进口。<sup>②</sup>  
于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第三次政务会议中同意了贸易总局提出  
的完全禁止卷烟输入的要求，并于12月23日随即颁布命令，宣  
布从次年1月15日开始禁止任何卷烟入境。

1942年1月14日，边区政府正式颁布了惩治贩卖卷烟的办  
法。办法不仅规定从1月15日开始禁止所有卷烟进口，而且从3  
月1日起所有商店不得售卖卷烟，允许转口贸易，但税率提高到  
80%。违反规定者，卷烟没收，并处以3—5倍罚款。店家未及卖  
出的存货应在贸易局登记代售。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禁售令只针  
对外来卷烟，“系指外来之五福、仙岛、风车、前门、炮台及其他  
牌或无名牌之卷烟，至于水烟、曲沃烟、兴隆烟、旱烟及土制烟  
丝，不在禁止之列。”<sup>③</sup>这说明了此命令并不打算完全禁止烟草消  
费，而是为了纠正吸烟方式，用边区比较容易生产替代物的烟草

---

① 同上书，第407页。

② 陈云起草的“陇东贸易分局工作须知”（1941年7月1日），《史料摘编》第4编，第111页。

③ 《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1月17日，第4版。这里专门提及的几种外来卷烟牌号中，仙岛（8元10支）、前门和炮台都是颐中烟草公司生产的品牌，风车则产自位于营口的启东烟草公司，而颐中和启东都是卷烟业巨头英美烟公司在华烟厂。允许入境的曲沃烟产于山西曲沃县，兴隆烟产于河北兴隆县，都是质量较好的旱烟丝。

消费方式，去替代最易造成现金外流的机制卷烟。

禁售卷烟的命令并未立即获得有效执行，一直到3月初，市面上还是有很多商店暗中售卖卷烟。于是延安市税务局于3月7日对全市100余家售烟商号进行大检查，查出卷烟2289条。其中存烟最多且全未向贸易局登记的，是“XX公营商店”，“占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sup>①</sup>公营商店指的是政府、军队、机关学校开办的商店。由于1940—41年边区经历严重的经济危机，很难再负担大量非劳动人口的生活，于是边区政府要求以上这些部门发展公营经济，做到自给自足。为了尽快提高收入，这些部门往往投资商业，依靠公权力的便利，从贸易差价中获取高额利润。另一个典型例子是边区战时进出口物资管理部门仍然把卷烟列入“特许”入境物资，而且各分区专署都有这样的“特许”权。一方面对外明令禁止，另一方面内部“特许”进口，执行上的这种内外有别，成为后来禁令实施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sup>②</sup>

当然，在禁令颁布之初，税务部门仍然表现出强制执行的决心。1942年4月，由于私下出售卷烟的黑市仍然在延安市存在，卷烟禁售令反而“抬高纸烟价格，使贩者更加有利可图，而设法偷运”，于是贸易、公安、税务三局再次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声明，强调禁令，限定在4月10日之前各商店要将存烟登记上缴。<sup>③</sup>公安局的加入，强化了禁售卷烟令的实施，短时间内不再有

---

① 《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10日，第4版。

② 《陕西省志·烟草志》，第542页。

③ 《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4月12日，第2版。

新闻报道卷烟黑市的存在。然而，由于前面提到的公营经济的其他部门往往借机盈利，税务部门对此无能为力，卷烟的供给事实上一直没有断绝。而且，由于卷烟禁售令禁卖不禁吸，消费群体的存在保持了市场对卷烟的持续需求，在供给稀缺的情况下，抬高商品价格，更加鼓励了走私和黑市。这两点可以说是1年多之后卷烟禁售就弛禁的主要原因。

不管禁止卷烟进口是否有效，在1942年初这项命令的出台，可以看作是边区一揽子经济措施的一部分，并非单纯针对吸烟本身的害处，而是针对其“外来非必需品”的属性采取的节约措施。边区政府颁发的禁卖卷烟命令称：“查纸烟一项，并非生活必需的用品，对于身体既没有益处，对于金钱却是很大的消耗……在此抗战进入艰苦阶段，全国高唱节约救国的时候，我抗日民主模  
44 范的边区，为了要杜绝无谓的消耗，平衡出入口贸易，以克服战时财政的难关，以加强抗战的力量，对于纸烟的输入，应该首先严厉禁止。”<sup>①</sup>《解放日报》在刊登禁止进口卷烟命令的同一版，刊登了《杜绝漏卮——香烟——一千八百万》一文，劝诫读者为了节约而戒吸卷烟，改吸烟斗，用土产晒烟制成的烟丝来代替外产卷烟。<sup>②</sup>

然而，在边区当时的经济状况下，有足够现金购买力的人其实相当少。底层士兵和农民收入非常低，基本上没有现金收入，

---

① “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禁止纸烟输入的布告”（1941年12月2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转引自《中国烟业史通典》，1561页。此布告亦刊登于1942年1月

② 《解放日报》（延安）1941年12月24日，第4版。

而且他们也往往偏好消费自己种的土产旱烟，而非卷烟。有现金津贴买得起卷烟的往往是各级干部，他们是在禁令实施前最大的卷烟消费群体。边区领导层的吸烟比例也相当高。虽然确切的统计数据很难获得，但就其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而言，毛泽东的烟瘾之大是有名的，而且习惯吸卷烟，边区参议会议长高岗也吸卷烟。边区战时进出口物资管理部门把卷烟列入“特许”入境物资，很可能也是为了满足这些领导的嗜好。<sup>①</sup>在禁卖不禁吸的卷烟禁入政策下，卷烟不仅不能完全在市场上禁绝，反而提高了黑市卷烟的价格，使得吸卷烟成为某种特权——要么有资格获得配给，要么有钱买。

## 从“寓禁于征”到“全面禁止”

由于卷烟进口禁令实施不力，走私猖獗，反而减少了税收，所以1943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烟类征税暂行条例，用“寓禁于征”的方式代替从1942年初开始的卷烟进口禁令。禁令的解除也可能是因为1943年陕甘宁边区经济情况好转，在经过一年多的大生产运动之后，已经基本解决了生存问题，所以对非必需消费品的需求也开始逐渐提高，于是对卷烟消费的限制也从严格控制供给转向用税收调节。

45

---

<sup>①</sup>《陕西省志·烟草志》，第542页。

表 1.1 1943 年 6 月陕甘宁边区烟类征税暂行条例税率<sup>①</sup>

	纸烟		水烟		包烟		卷烟		入境旱烟	
	税 (费) 率	起 征 点	税 (费) 率	起 征 点	税 (费) 率	起 征 点	税 (费) 率	起 征 点	税 (费) 率	起 征 点
入境	40%	1 条	20%	1 封	20%	5 包	30%	5 合 5 斤	10%	2 斤
过境	20%	同上	10%	同上	10%	同上	15%	同上	5%	同上
边产	10%	同上								
附注							包括雪茄			

由表 1.1 可知，边区政府对不同烟草制品的税率，按照旱烟、水烟（包烟）、卷烟（指烟叶包裹的卷烟）、纸烟（指纸包裹的卷烟）的顺序递增。如果按照“寓禁于征”的思路来看，这样的税率梯度说明政府最希望减低外来纸烟消费。为了尽可能减少在烟草嗜好方面的入超，在各种烟草制品中，对纸烟的税率最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税则对边产纸烟也开始征税，这说明到 1943 年 6 月边区已经能生产纸烟了，而且为了保护边产纸烟，其税率大大低于进口纸烟，与作为农村手工业产品的旱烟和水烟税率相同。

<sup>①</sup> “陕甘宁边区烟类征税暂行条例”（1943 年 6 月 12 日），载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 4 册，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49 页。



在恢复机制卷烟进口的同时，边区政府的财政经济部门还有更大的野心，计划实行烟酒公卖制度，把整个烟酒生产、营销、进出口贸易都纳入统一管理。然而，从现存的《陕甘宁边区烟酒公卖暂行章则》中可见，当时设计的公卖制度有先天缺陷。这个“暂行章则”规定由税务局下设各级烟酒公卖部门，公卖品进出边区和边区内买卖权都归公卖部门。公卖资本为800万元，分8000股，由公卖处发行1000元票面的股票，其中一半由财政厅认购，另一半向公营机关合作社或边区公民招集，如果未招足，则由财政厅购买。如此制度设计，其实是建立一个涵盖烟酒生产、供销、贸易各环节的公营企业，已经超出了单纯政府税收的范围。然而，“暂行章则”还规定，公卖处要保证每年红利为百分之二百，股东可以分期领取红利中之半数，而公卖总收益中又有40%为公卖费，上交边区政府财政。所有生产公卖品的作坊工厂都要登记，产量多寡由公卖机关分配指定，产品全部由公卖部门收购，收购价按品质优劣，以成本的20%为利润，按此比例为产品定价。<sup>①</sup>

公卖部门虽然采取股份制企业的形式，但运作完全不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不考虑产品质量和市场需求，固定20%的利润率，制定200%的红利目标，这类理想化的“计划”表现了共产党干部在处理他们不熟悉的经济问题上缺乏经验，他们设计的制度也因此操作中很难推行。 46

《陕西省志·烟草志》的作者指出，这一公卖制度实际上只在1943年5月—9月在延安试办，1944年3月又曾短暂试办，都未

---

<sup>①</sup>《陕甘宁边区烟酒公卖暂行章则》，《史料摘编》，第4编，第156—164页。

能推广到边区全境。当时有关部门从延安的试验中总结了几条推广公卖制度的前提，包括严格控制走私、鼓励扶植代售的小商人、政府在保证税收的前提下不图厚利。<sup>①</sup> 这几点总结从侧面暗示了公卖制度设计本身的不合理，尤其是获利预期过高这一点。而且，参与卷烟走私的其实以军队机关等“公家人”为主。因此，仅仅停留在字面上的“烟酒专卖制度”虽然表现了边区经济贸易政策上的变化，但在实际上的影响十分有限。<sup>②</sup>

就卷烟而言，公卖制度除了对盈利预期太高，控制走私的能力有限外，还有一个致命缺陷，就是边区卷烟生产能力的低下。萌芽中的边产卷烟产业不仅产量小，而且以手工卷烟为主，使用的烟丝和卷纸质量都很差，很难与边区外已经成熟的卷烟工业产品竞争。因此，即使有税率差别保护边产卷烟，仍然无法抵挡开禁之后的大量卷烟进口。据税务部门统计，从1943年7月到11月，登记入境的外产卷烟就达83820条，这还不包括走私入境的数量。以当时平均价格每条4000元计算，高达3.4亿元，折合小米4.4万石。<sup>③</sup> 1石相当于300斤，以一人每天1斤口粮计算，可供36000多人1年的口粮。这对当时经济仍相对困难的边区而言，

---

① 《陕西省志·烟草志》，第552—553页。

② 研究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的黄正林对这份“暂行章程”评价很高。根据此文本，他认为“从禁卖到公卖是边区烟酒贸易政策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一方面规范了边区的烟酒公卖，使边区烟酒公卖政策得以贯彻执行；另一方面，公卖政策的推行，打击了不法商人，增加了边区的财政收入。”，见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一书，第477页。他没考虑到公卖政策的实行情况，所以过高估计了公卖制度的意义。

③ 《陕西省志·烟草志》，第542页。

是相当大的开支。

针对外来卷烟充斥市场的现象，1944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全边区所有公营商店和脱产人员，抵制外来纸烟，经营、吸食边产纸烟。”<sup>①</sup>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以身作则，在1月28日的《解放日报》头版头条上刊登了他的生产节约计划，其中就包括“自三十三年（1944年）一月二十五日起，戒绝吸外来纸烟。”他还作生产节约诗一首：“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淡巴菰一亩公粮缴，糖萝卜二分私费贍”<sup>②</sup>其中“淡巴菰一亩公粮缴”指的就是他自己种植了一亩烟叶田，作为生产自给的一部分。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边区参议会议长高岗继而在2月5日的《解放日报》上刊登自己的节约计划，其中也有“以后不吸纸烟，改吸旱烟”一条。<sup>③</sup>

1944年2月8日，边区政府宣布卷烟进口再次全面禁止，规定外产卷烟必须在3月20日之前售完，未售完者由物资局统一收购，销往边区境外。有了1942年卷烟进口禁而不绝的教训，这一 47  
次的禁令更加彻底，不仅不许进口，而且连过境都不允许。<sup>④</sup>为了“便于有计划的进行对内对外贸易，争取出超，并实行保护边区生产”，1944年颁布的《修正陕甘宁边区战时管理进出口及过境物资暂行办法》也把卷烟、香烟、雪茄、水烟都列入了禁止进口物

---

①《陕西省志·烟草志》，第542页。

②《解放日报》（延安）1944年1月28日，第1版。

③《解放日报》（延安）1944年2月5日，第1版。

④《史料摘编》，第4编，第579—581页。

资之列，把通过物资局进口卷烟的官方渠道也切断了。<sup>①</sup>在1944年7月1日颁布执行的《修正陕甘宁边区货物税暂行条例》中，烟类进口只允许包烟、杂拌烟、叶子烟，税率均为30%，并明确规定卷烟、纸烟、水烟禁止入境。<sup>②</sup>

1944年初全面禁止卷烟进口与1942年初的禁令一样，与整个边区的生产节约运动有非常紧密的关系。边区从1943年底到1944年初，正在自上而下推广动员生产节约运动，各个部门和人都纷纷制定更为严格的节约计划。在这样的大气候中，卷烟这样的非必需消费品，尤其是会引起现金外流的外产卷烟，自然首当其冲地成为“节约”的对象。另一方面，也因为边区在大生产运动中，农业、工业、手工业生产能力和一年多前已经大有提高，有余力发展本地卷烟业。以边产卷烟代替外产卷烟，也被作为更高的生产目标提了出来。

## 边区国营卷烟生产的其他方面

陕甘宁边区从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上来说，并非不适合烟草种植，但是由于农业技术水平一直较低，所以并没有大规模烟草种植，农民一般自己种点晒烟自用。陕甘宁边区成立以后，1939年边区政府也小规模发展过烟草种植业以增强边区经济收入，还从山

---

①《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5册，第263页。

②《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5册，第115页。

西、四川等地引入美种烟草，试种烤烟，但为了不影响粮食生产，强调“公营公种”，将烤烟的种植生产控制在政府部门手中。<sup>①</sup>

1941年春皖南事变后，边区政府以“自力更生”为口号，发动各政府机关、学校、部队等公家部门进行大生产，各部门自行解决一定比例的生活供给。于是烟草生产也成为各公家部门农业生产的一部分。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的事迹，毛泽东在1942年12月政府高层的报告中重点表扬了他们开辟了2.5万亩耕地，种粮食、种菜、种麻、种旱烟，自种的旱烟满足了战士们的吸烟需求。<sup>②</sup>1943年边区经济情况好转，生存问题得到解决后，边区政府机关还把旱烟列为生产自给的项目之一，一方面解决个人消费，另一方面也可以用烟草交换其他日用品。<sup>③</sup>烟草作为经济作物比粮食价值高，在口粮、棉麻等必需品农业生产得到保障后，机关部队等公家机关和农民都开始扩大烟草种植面积。48

1942年初禁止外来卷烟在边区售卖的命令下达后，贸易局就开始着手筹备烟厂，落实“以土货代替外货”的口号。<sup>④</sup>与此同时，烟草产量的增加更鼓励了边区土产卷烟的生产，用边区自产的烟草生产手工卷烟。1943年有些机关单位开办烟厂已经颇具规模，比如边区财政厅办的西北烟厂、中共中央党校办的裕丰烟厂等。1944年初卷烟再次禁止进口后，为了满足民众对卷烟的需

---

① 《陕西省志·烟草志》，第527页。

②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卷五，第830页。

③ 《陕西省志·烟草志》，第528页。

④ 《解放日报》（延安）1941年12月24日，第4版。

求，增加生产收入，物资局更是有针对性地鼓励边区卷烟生产。公营卷烟厂1944年发展到7家，职工150人，1945年增长到30余家，是边区卷烟的骨干。到1945年春，全边区公私营的手工卷烟作坊总数已达200余家，年产卷烟70万条。但这些作坊中大部分都是几个人或者十几个人的小作坊，甚至有些只有一个制作手工卷烟的木匠，在做其他生意的时候，兼营卷烟。<sup>①</sup>

1943—44年，边区的烟草生产乃至卷烟业有长足发展，产品数量大大提高，质量却未见多大起色。虽然边区从1939年起就已经引进了产量更高、品质更好的美种烟草，但受技术条件所限，种植美烟的范围有限，主要由集体农场种植，个人大多种旱烟。而且即使种植美烟，熏烤技术难以掌握，“多数烤烟晒制，内在、外观质量欠佳。”<sup>②</sup>边区卷烟所用的卷纸也是质量低劣的粉纸，要用石膏、白矾和水涂刷，然后晒干，以免漏气。粘合剂则用普通面粉调制。<sup>③</sup>边产卷烟全用木制卷烟匣手工制作，产量不高而且粗细长短不一。1945年6月19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纸烟制造业管理及征税补充办法》中有一条规定“各烟厂所制纸烟一律不得使用含有毒素之材料，并不得以硫磺或其他有毒物质熏染烟丝及涂刷厂纸。”<sup>④</sup>这从侧面说明边区卷烟业的技术水平之低，产品质量之劣，某些厂家不得不用硫磺等有毒物质改善产品外观，因为

① 《陕西省志·烟草志》，第532页。

② 《陕西省志·烟草志》，第539页。

③ 《陕西省志·烟草志》，第533页。

④ “陕甘宁边区纸烟制造业管理及征税补充办法”（1945年6月19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5册，第474页。

硫磺熏蒸可以使食品色泽鲜亮、防霉。

边区公营卷烟业的管理模式也影响了其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由于公营经济采用的是供给制，也即“原料、经费按预算向主管机关领取或报销，产品由主管机关接收处理”，工厂职工不管效率高低、产品好坏，都根据配额领取供给。<sup>①</sup>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高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对1943年的公营工业发展做出指示，批评政府、机关、军队各系统经营的工业缺乏协调，处于无政府状态，浪费严重，要求公营企业加强统一管理，原料供给、产量和销路都应由上级部门制定计划，但同时他还要求在企业内部管理上要奖惩分明，提高生产效率。<sup>②</sup>于是1943年各公营卷烟厂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进行改革，把供给制改为制造费制和营业制。制造费制“是由有关机关供给工厂原料，订做产品，并付给厂方一定数额的制造费和利润”，而营业制则由工厂自行购入原料、销出产品，自负盈亏，利润与上级分成。制造费制其实还是变相的供给制，此前提到的“公卖制度”，采取的就是类似的模式。企业只需完成上级交予的生产任务，既不需要考虑成本核算和销售出路，也不需要产品质量负责，由政府部门给予固定比例的制造费。西北土产公司在1943—1944年投资卷烟工业，经济损失近3亿元，就是因为制造费制度下企业生产的低效，“没有原料向公司要，产品不论好坏都要买”。<sup>③</sup>在生产技

---

① 《陕西省志·烟草志》，第540页。

②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卷五，第822页。

③ 《陕西省志·烟草志》，第540页。

术落后的情况下，生产厂家又与原材料和产品市场脱钩，很难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而且，在统一计划的公营经济中，作为非必需品的卷烟本就不受重视，产品质量、销路等具体问题更是要让位于贸易平衡这样的大局考虑。

对边区卷烟业更严重的打击还是军队和机关支持下的大规模走私。1945年5月，税务总局向边区政府递交了一份“外烟走私情况及亟待处置办法的报告”。这份报告称，即使有政府禁令，当时外烟走私还是极其严重，4月份延安附近三县的走私外烟就有2万多条，估算价值至少边币4亿元。这些走私烟“绝大多数是军队与公家生产部门搞的，间或有些老百姓的股份，他们也是借重公家及军队之庇护”。税务部门即使发现了军队走私、公营商店卖外烟，也没有办法，因为军队有武装护送，公营商店声称有财政厅批准。而少数被缉获的“藉口说代首长买的”，只能不了了之。报告中详细记录了6个案例，都是部队走私外烟。而部队之所以走私，主要是因为边区经济困难，号召军队生产自给。部队出于政治需要，纷纷表示完全自给。而实际上，由于驻地位置、资本、人员组成等各方面原因，有些部队不能做到自给，完不成上级指定（甚至是自定的）的生产目标，于是只能通过走私来增加收入。<sup>①</sup>大批外产卷烟进口造成边产卷烟滞销，价格猛跌。而且由于边区烟厂技术落后，生产手工卷烟成本高，差不多同样的价钱或

---

① “外烟走私情况及亟待处置办法的报告”（1945年5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5册，第464—470页。这种情况此前应该也有，1942年初的卷烟进口禁令后来无法有效执行，很可能也是类似原因，只是当时没有如此详细的报告留存下来。



者稍贵，就能买到质量好得多的外烟。这样需求刺激了供给，军队和机关就越来越大规模地走私卷烟，黑市外烟的价格因而更加便宜，也就更没人买边产卷烟了。

技术水平低、原材料质量差、外货倾销、生产过剩，这几点是陕甘宁边区卷烟业失败的主要原因。而在其他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有些地方的卷烟生产就相当成功，可以与陕甘宁边区的情况略做比较。基本上，陕甘宁边区遇到的卷烟消费带来的现金外流，在其他根据地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各根据地也都往往采取禁止输入、提高进口卷烟税率、实施公卖等方式来限制卷烟贸易，试图平衡贸易，从而维护根据地经济。然而，其他根据地与陕甘宁边区也有着相当大的不同。

### 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卷烟生产和消费

其他根据地与陕甘宁边区的不同，最显著的两点在于军事化的程度以及与经济发达地区的距离。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地处后方，留守部队数量较少，在抗战期间除了1940年与国民党军队有小规模冲突，并没有直接接触战场，因此部队的军事化程度低，与机关的区别并不大。而其他抗日革命根据地则都直接与日军接触，有大量处于战斗状态的部队，如晋冀鲁豫地区有八路军，苏南地区有新四军。在战争中，军队往往是卷烟最大的消费群体。卷烟携带方便，又能安抚士兵的紧张情绪，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卷烟都是西方各国军队的军需品。对战场上的

军人而言，卷烟不是非必需消费品，而是鼓舞士气的必需品。<sup>①</sup>日军士兵在正式伙食之外的消费品配额就包括每人每星期卷烟四十支。<sup>②</sup>但共产党的军队后勤供给不足，即使前线部队也需要自己发展生产来解决供应问题，所以这些部队往往在后勤部门组织随军卷烟生产，解决部队的卷烟供应。

这些部队生产卷烟其实反而比地处西北后方的陕甘宁边区更为便利。因为处于前线，他们与经济较为发达的敌占区接触更为频繁，可以方便地从敌占区引进卷烟的盘纸、卷烟机和技术人员。而且晋冀鲁豫和苏皖地区都靠近成熟的美种烤烟种植区，正可为卷烟生产提供充足的原材料。在烟丝和盘纸质量有保障的情况下，用手工卷制的方法也能生产出优质卷烟，甚至可以在满足部队供应需要之外，返销到敌占区去盈利。其中最成功的例子就是淮南根据地新四军第二师开办的新群烟厂。新群烟厂生产的“飞马牌”香烟，不仅满足了部队的供给需要，而且还因为价廉物美外销到敌占区。

新群烟厂的成功就在于并不是盲目投入生产，而是遵循工业生产的规律，提高产品质量，满足市场需求。他们从敌占区千方百计运进卷烟机，并请来在英美烟公司工作过的技师，按照英美烟公司的配方制作烟丝。他们还派人穿越封锁线到安徽凤阳一代的美烟种植区购入高质量烤烟。1944年，上级下令随军产业一律

---

① 参见《香烟：一个人类痼习的文化研究》，第六章“军人之友”。

② 日本士兵大会，《伙食、“酒保”和“下给品”——“日本士兵要求书”说明之一》，《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11月6日，第4版。

归地方政府管理，新群烟厂才与部队脱钩，当时盈利1万多元，有工人200多。<sup>①</sup>这与陕甘宁边区那些在大生产运动号召下盲目开办的烟厂有很大区别。

## 结 语

赛尔顿在《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中高度评价了“机关经济”，认为这种经济模式帮助了边区度过经济难关。<sup>②</sup>然而，边区卷烟业的历史说明，“机关经济”也都有其问题。政府部门计划统筹下的生产和经营会由于计划本身的不合理造成生产和销售的失败。“机关经济”带给各部门的生产压力则会促使其“剑走偏锋”，参与走私，牟取暴利，使部队机关等“公家人”成为政府政策的最有力破坏者。这些往往是过去研究陕甘宁经济史的学者忽略的方面，也是后来公营经济出现各种问题的先兆。

抗战后期陕甘宁边区烟酒公卖制度的尝试，尤其是政府部门出于计划经济的考虑对卷烟业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控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解放前后卷烟业国有化和专卖制度的建立。

- 
- ① 刘智惠、岳新：《记新群烟草公司》，《中国烟草》1985年第1期，第1—4页。  
胡弼亮：《新四军二师的供给和生产》，《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和思考——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论文集》（四），2005年，第295—297页。
- ②（美）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著，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7—241页。

1949年2月共产党政权又在东北解放区建立起了烟酒专卖制度，控制卷烟和酒类的产销，其目的是“为增国家收入，限制无益消耗”。<sup>①</sup>这次的专卖制度吸取此前的教训，在大力发展国营卷烟厂的同时，限制东北区外卷烟进口、取缔手工卷烟并加强缉私工作，使东北解放区的卷烟产销量都大幅增长。正如沙青青在下一章讨论的，在1950年举行的全国卷烟工业会议上，“东北模式”（计划性生产、国家专卖）成为改革卷烟业的重要依据。我们不清楚当党的领导人在设计“东北模式”时多大程度上反思了陕甘宁边区专卖制度带来的问题。不过很显然，他们采取的是与之前不同的方式。

从1930年代末到1940年代末，什么是中国共产党试验卷烟业的核心考虑？当然是利润。卷烟制造极有可能为党带来高额的经济回报。然而，处于所有这些试验中心的还有延续到1949年后的一套话语。陕甘宁边区的试验引起了管理层的大量讨论，涉及到原材料的采购、数量、质量、税收和走私等问题。在这些讨论中，一些概念将深入人心。其中有两个概念在20世纪后半叶尤其变得常态化。第一是生产香烟是共产党政府的责任。第二是需要政党国家内部克服香烟生产的障碍和粗制滥造的来源。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就悄悄地把这些概念变为正式文件。1953年，当卫生部在规划其初步方案时，建议将戒烟作为公共卫生宣传的支柱之一。毛泽东和中共高层的其他人拒绝了

---

<sup>①</sup> 《东北解放区烟酒专卖暂行条例》（1949年2月20日），《中国烟业史汇典》，1585页。

这一建议，同意湖南省委和中南局的建议，推迟执行卫生部等发起群众性戒烟运动，因为这是“对生产有妨碍的工作”。<sup>①</sup>这个新生的政权由此定下了基调。政府健康部门将靠边站，而刚刚国有化的卷烟业将采用更好的方式来培育烟叶，生产和销售卷烟。

---

① 《中央关于同意推迟执行群众性戒烟运动的指示的电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72页。感谢沙青青提供这条史料。

## 56 第二章

# 畸形垄断：1950年代卷烟会议与中国烟草业 国有化

沙青青

“所有党政人员一律不要用外国及外商的纸烟，亦最好不吸私营纸烟”。

——1950年11月22日，毛泽东对食品工业部部长杨立三关于全国卷烟行业会议总结报告的批示（中国烟草博物馆）

### 背景情况

1930和40年代，上海是卷烟生产的中心。共产党1949年春解放这座城市时，上海市生产卷烟的工厂不下112家，也许是当时世界上卷烟工厂最多的城市。在这些工厂中，只有中华卷烟厂

一家是国有的，所有其他卷烟厂都是私营的。<sup>①</sup>对需要税收收入、希望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年轻共产党政权来说，这既是机会，也带来了问题。共产党很快成立了烟草接管组，管理烟草业的国有化，这并不出人意料。<sup>②</sup>

但是这个新成立的小组该如何推进工作呢？如何把上海市星罗棋布的卷烟厂乃至全国的其他卷烟厂转变合并成一个思想统一的政府机构？

到1949年夏天，上海市一度繁荣的卷烟行业突然陷入危机，这项任务的复杂性开始显现。夏天过后，这座城市卷烟厂通常的旺季9月到来，但是，产量却急转直下。原料和商品价格飙升，制造卷烟的成本超过了零售市场承受能力。上海卷烟厂制造的卷烟越多，损失就越大。大部分卷烟厂感受到减产的巨大压力，并且的确减产了。

产量骤降可能使许多共产党领导人毫无防备。如刘文楠在第一章中提到的，在1949年全国解放前，共产党在偏远的根据地经营自己的卷烟行业。在这些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管理原材料供应，向共产党军队稳定输送廉价卷烟。不过，后来证明，根据地的生产模式不适合解放后。它在复杂程度和规模上，都不如20世纪中期的上海，更不用说全国了。

---

① 《上海卷烟工业概况》，国营中华烟草公司编印内部刊物，1950年2月25日，第1页。

② 《上海市轻工业处报告》（1949年6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接管上海》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

这就涉及本章的核心话题：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二年，也即1950年夏天，举行的一次会议。中国主要烟草公司的代表在1950年7月的第三个星期被召集到北京，参加在食品工业部举行的会议。这是人民共和国首届全国卷烟行业会议，会上矛盾重重，但对中国当前卷烟专卖制度的构建却十分重要。食品工业部副部长宋裕和在开幕会议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感谢各位代表“都怀着最高热情充分信息来解决目前卷烟工业上存在的问题”。宋副部长赞扬与会代表在全国卷烟工业形成“大团结”，称他们都帮助“展开了……光明的远景”。<sup>①</sup>

这次会议并不成功，不仅没有达成共识，还暴露了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日益恶化的矛盾。上海代表在会上激烈地反对党的领导人设想的大部分快速前进步骤。面对冗长的讨论，会议组织者没有办法，只得同意有必要对卷烟行业重组采取温和的方式。实际上，也许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让改革者认识到，上海将是设计和实施新生的卷烟集团改革的第一步。解决如何合并上海众多卷烟厂的难题，将是建立全国专卖的关键。

这一章探讨第一届全国卷烟行业会议及其后果，特别关注上海市制造业的整体环境。依据在上海档案馆近期发现的档案材料，  
58 本章将让人们看到中国烟草业历史上相对空白的一段历史：共产党接管政权后的最初几年所做的决定，将引导建立世界上最大的

---

<sup>①</sup> 宋裕和：《第一届全国卷烟会议开幕词》，《中国烟草月刊》1950年第4、5期合刊，第581—582页。



卷烟公司。<sup>①</sup>

\* \* \*

1940年代，上海市贡献全国三分之一的GDP，是中国战争时期的工业中心，卷烟产量是这座城市经济威力的晴雨表。这里用来分析卷烟产量的相关单位是“箱”（当时一箱等于50,000支卷烟）。即便在1948年，经过十多年战争，上海卷烟产量仍旧超过100万箱。<sup>②</sup>但是，随着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战役打响，这一切都改变了。攻打上海的激烈战役涉及50万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这场战役中，超过10万人丧生，其中主要是国民党士兵。当时上海市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停顿下来。解放战争对上海市工业的影响从卷烟产量上立刻就能看出来。1949年初，在上海战役前几个月，上海卷烟制造商每个月生产超过10万箱。<sup>③</sup>但是到了5月份，随着解放军南下，产量暴跌，减少了99%以上。虽然上海的工业基础设施大多完好无损，共产党巩固新政权后上海的卷烟行业并

---

①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烟草行业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两个时段：其一是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段，其二是1980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关于前一个时段有大量的研究，此处不细述。对该时段的概述性研究可参见方宪堂主编的《上海近代民族卷烟工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后一个时段的研究可参见：Peng Yali, “Smoke and Pow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Tobacco,”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Oregon, 1997); Wang Junmin, “Market-Building as State-Building in China’s Tobacco Industry,” Ph. D.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2007); 陶明：《专卖管制下的中国烟草业——理论、问题与制度变革》，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05年。

② 《上海卷烟工业概况》，第13—14页。

③ 同上，第17页。在本文中，箱是生产单位，当时一箱装有50,000支卷烟。

没有迅速恢复。6月份产品只有2.4万箱。到了12月份，本应是“旺季”，但是卷烟产量只有3万箱，是“上海卷烟工业前所少见”的水平。<sup>①</sup>

中国大江南北凡是销售卷烟的地方，都感受到上海卷烟产量暴跌。1949年6月以后，上海卷烟占中国所有卷烟销量的比例下降约50%。这当然没有逃过共产党最重要的财政领导人的注意，比如新成立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在1949年6月的会议上，陈云指出“从上海运出去的东西少，主要是纱布、纸烟等”。对共产党来说，尤其关注的是上海的卷烟税收收入直线下降。

59 作为计划经济的倡导者，陈云对他认为的解决措施直言不讳，他说“力争上海主要行业（纺织、印染、纸烟等）的开工率维持到三分之二”。计划让上海的卷烟厂“恢复生产，以增加税收”。<sup>②</sup>

为了达到陈云的要求，减轻影响经济其他许多部门的严重经济差距，中央和上海等地方当局开始采取集中规划方式。1950年3月3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使党更多控制国家财政收支、商品管理和市场流通。<sup>③</sup>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个月内，中央政

---

① 同上，第17—18页。

② 陈云，《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1949年8月8日），《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③ 《国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第一辑·财政管理体制（1950—1980）》，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版，第31—36页。

府两个部门向全国主要卷烟公司代表发出了参加中国烟草业会议的邀请。

## 目的地：北京

### 第一届全国卷烟行业会议

全国各地共 69 名代表来到北京参加这次会议。这些代表来自五个不同的区域：华东区、东北区、西南区、中南部地区和华北地区。在与会代表中，华北代表团最大，有 31 名代表。华东区次之，有 29 名代表。西南区有 22 名代表，东北和西南区各安排了 7 名代表。在华东区 29 名代表中，21 名来自上海；这 21 名代表中，5 名来自国营部门，14 名来自私营企业，2 名来自合资企业。<sup>①</sup>

会议在 1950 年 7 月举行。召集这次会议的机构值得一提，分别是食品工业部和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这两个单位的参与，表明了共产党思维中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共产党领导人此时已经倾向于把卷烟视作日常生活基本必需品，与大米和食用油相当，所以党的最高领导人把卷烟制造的最初责任授予食品工业部。中央政经委的主任们显然意识到，重振卷烟销售，会有助于为党的其

---

<sup>①</sup> 《全国第一届卷烟工业会议代表名单》（1950 年），《上海卷烟工业同业会出席全国卷烟工业会议的有关文书》，档案编号：S68-4-73，上海市档案馆藏。

60 他优先事业提供资金，所以中央财经委全力支持召开这次会议。

会议于7月18日正式召开，接下来十天里，代表报告了各自的当地情况。会议成立了四个小组，分别解决原料、生产、成品规格和推销问题。每个小组首先讨论提案和政策建议，然后向全会秘书处汇报。<sup>①</sup>原料组、生产组和产品规格组聚焦生产技术，而推销组则辩论如何改革中国卷烟市场和供销机制，后者成为这届会议上争议较大的焦点问题。

会议报告和相关档案文件表明，在为期十天的会议期间，讨论了多项问题，并轻松得到解决。在这些方面，文件介绍了与会者友好对话的流程，新成立的共产党国家坦诚地介绍了准备如何把卷烟行业纳入社会主义经济。这些方面的商讨如此顺利，以至于总结报告只是就事论事地表述了一系列相关决定。

比如，报告敦请食品工业部规定全行业统一的利润率。报告说，食品工业部应制定卷烟分销的每个阶段，包括从卷烟厂出厂到批发到零售的价格，从而统一利润率。<sup>②</sup>

生产规划是此次会议显然十分和谐的又一例证。报告请食品工业部确保卷烟厂遵守涉及计划生产的新原则。企业不仅要遵守“按需定产”的原则，还要遵守“地理环境、国营或私营、机械化程度”的原则。<sup>③</sup>

---

① 《与会须知》，《上海卷烟工业同业会出席全国卷烟工业会议的有关文书》。

② 杨立三：《全国卷烟工业会议总结报告》，《上海卷烟工业同业会出席全国卷烟工业会议的有关文书》。

③ 《首届全国卷烟工业会议的重大收获》，《中国烟草月刊》1950年第4、5期合刊，第554页。

原料也是会议报告明确阐述的一个话题。报告规定对于烟叶，政府“统一计划烟叶种植、复烤、分等定级制定标准规格，和适宜之价格，加以有条件之管理。”此外，“对于非生产目的囤积居奇，操纵烟叶、卷烟纸、铜精纸之非法经营扰乱市场，应予以取缔”。<sup>①</sup>这些活动由哪个机构来监管呢？报告说，中央将成立新的“统一采购机构”。政府将设立“统一采购机构并领导各区分机构，由分机构再与各厂发生联系”。<sup>②</sup> 61

翻阅这些档案材料，似乎可以看出中国新的领导人对会议有几项期望。中央希望会议评估中国各区域烟草生产商的现状，就相关政策与厂商进行对话。我们也清楚看到，会议希望通过谈判，为计划中的卷烟业社会主义改造构建合法性基础，以期与会私营企业支持过渡机构，最终进入社会主义经济。<sup>③</sup>

不过，这些希望对与会者来说有的容易实现，有的不容易。对利润率、生产技术和原料的讨论公开坦诚，大家意见一致，但是对税收、专卖（后文将谈到，这是预料中的必然结局）和市场划分（即禁止跨地区的贸易）就难得多。

考虑到涉及的巨大税收收入，以及对卷烟生产商利润的潜在损害，税收是会议的一个关键问题。税务总局派了一名工作人员观察和回答代表的问题，不过有时候辩论变得激烈起来。一些最直言不讳的代表来自上海，急于表达他们对税收的顾虑。他们强

---

① 杨立三：《全国卷烟工业会议总结报告》。

② 同上。

③ 宋绩成：《漫谈今后卷烟工业经营方式的改进：参加首届全国卷烟专业会议的感想》，《中国烟草月刊》1950年第4、5期合刊，第568—569页。

调，如果（在新的价格控制和原料成本增加之外）再提高税收，卷烟企业的利润就没有了。上海的卷烟厂专门要求降低营业税，以维持销量和利润。他们建议，如果征税要增加，应该增加对低档卷烟的征税，也就是其他省市的竞争者生产的卷烟。<sup>①</sup>上海代表也希望有独立的审计系统评定商业税。现有的“民主评议”制度不涉及审计实际的财务账户，而是根据卷烟厂与税收代表的谈判一起确定某一年份须支付的税负。

新政权的税务总局对这些提议不为所动，拒绝了降低营业税的要求，因为“其他货物税率很高的行业都照纳百分之三的营业税，如果卷烟能减低，那么其他行业亦将仿效，所以是不能改变的”。对低档卷烟征收高税率，税务总局指出“需要研究考虑再予发表”。对商业税，税务总局同意“查账稽税要比民主评议好得多了。可一是税局办事人员不够，二是有些厂商账册的不健全，所以只能采取民主评议来替”。<sup>②</sup>

与会者同样关心的还有中央政府是否会成立全国烟草公司。不过，这个问题与其他问题不同，会议组织者拒绝对此进行公开的对话。“这种当属政府领导，不能提出讨论，至于机构成立的时间及办法亦应当由政府自行决定”。<sup>③</sup>会议总结报告指出，在会议召开前，党的领导人已经确定了一种方式，报告表示成立“全国

---

① 《华东卷烟工业提案汇编》（1950年7月），《上海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出席华东区卷烟工业会议的有关文书》。

② 《章拔炯在首届全国卷烟工业会议传达大会上的报告辞》（1950年8月7日），《上海卷烟工业同业会出席全国卷烟工业会议的有关文书》。

③ 同上。

性卷烟工业管理机构”，实现“统一掌握政策，制定计划、执行业务”。此外，报告指出，在建立这个管理机构前，“各地卷烟工业均可成立有国营烟厂参加之同业公会”并且，“国营厂代表应起领导作用”。<sup>①</sup>

会议上不是所有对话都顺利进行，市场划分问题就是其中最难谈判的一个问题，包括上海生产商将获准在全国哪些地方运输和销售商品。要理解这里涉及的紧张关系，先要了解建国初期各地区间的政治竞争。

1950年，中国全国烟草行业按照两种模式同步运行。东北地区1948年11月解放，已经开始实施“市场专卖”，而中国其余地区仍按照自由产销、自由贸易的原则运行，上海市强大的烟草公司就是例证。<sup>②</sup>在中央的许多政府领导人看来，烟草行业当时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无政府状态。自由市场环境下的制造和生产常常导致产量过高、偷税漏税和其他问题。在会议前夕，周恩来指示“加强中财委私营企业局工作”，加强对私营企业和市场的控制。<sup>③</sup>结果，如何使用计划对市场实行更大控制的问题就作为重要议题列入会议议程。会议组织者也试图利用会议探索在全国推行东北地区烟草专卖制度的可行性。

63

---

① 杨立三：《全国卷烟工业会议总结报告》。

② 食品工业部烟草组：《整风文献：卷烟工业之警惕》，《中国烟草月刊》1950年第3期，第675页。

③ 《关于调整公私关系加强私营企业局工作的指示》（1950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3—44页。

从食品工业部副部长宋裕和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就能听出这些意图的端倪。在讲话中，宋副部长比较了东北和上海卷烟行业，指出东北地区从1949年2月到12月，每个月平均生产7,678箱卷烟，从1950年1月到4月，每个月生产约14,000箱，增加了78%。而上海1950年1月到4月每个月平均生产35,593箱，比上一年同期下降36%。宋副部长继续总结道：“前者是从半殖民地经济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以后正在发展的现象，后者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急速变革中暂时衰退的情况”。他进而指出，需要由政府来进行市场和工业结构的重新调整。<sup>①</sup>

在会议的第四天，推销组正式开会。一个关键议题是“地区市场能否划分”的问题<sup>②</sup>，这意味着是否要禁止跨越地区的卷烟分销和销售。东北地区一家国营烟草公司的代表提出了一个初步方案，建议明确划分地区市场。他虽然“列出的理由、办法等不下十项”（大多集中在促进地方经济上），但是没有获得多少支持。中南区的广州和郑州代表、西南区重庆代表、华东区山东和上海代表大致都反对划分市场，认为这是对他们市场垄断地位的威胁。会议的官方记录清楚表明，这种僵持不只是困扰了推销组。地区市场划分的问题迅速演变成十天会议“最重要、最中心的问题”，简而言之，是“东北模式”和“上海模式”的斗争。<sup>③</sup>

---

① 《对如何挽救目前世界上海卷烟业面临十分严重危机声中即须紧急采用的适当业务步骤》（1950年8月），《上海卷烟工业同业会出席全国卷烟工业会议的有关文书》。

② 《全国卷烟工业会议工作日报》（1950年7月21日），《上海卷烟工业同业会出席全国卷烟工业会议的有关文书》。

③ 《章拔炯在首届全国卷烟工业会议传达大会上的报告辞》。



本质上而言，市场划分问题围绕着是否建立地区性烟草企业联盟，一个区域市场的卷烟只供在那一个地区销售，禁止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外销。<sup>①</sup>东北地区已经从1949年2月实施了这样的制度，即只有这个地区生产的卷烟能在这个地区销售。不久之后，华北部分地区复制了东北模式。扩大这种模式是否可以“免去造成竞争市场，而影响生产”，是政府主管当局希望得到解答的一个问题。<sup>②</sup>

7月24日的讨论激烈地反驳了成立地区性企业联盟的建议。一方代表来自上海和其他传统的卷烟生产区域，他们希望保留在全国市场的主导地位。另一方代表来自已经成立国营企业联盟的地区和卷烟生产设施还很初级的地区。为了打破僵局，华北区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他们把原先的提案弱化了一下，改为“这一次的提议划分区域并不是绝对的市场互不流通，只是各地区行销到外区的卷烟应该有一个适当的限制，不能够盲目地倾销，打破了整个计划性生产”。<sup>③</sup>

这一提议的反对者不为所动。他们坚持立场，反对修改后的提议，因为它仍旧违背了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批准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规定的“国内贸易自由”原则。华北区的北京代表试图用新的措辞打破僵局，提出建立“地区专卖制

---

① 《各地提案汇编：十二、关于提早实现卷烟分区专卖制度问题》，《中国烟草月刊》1950年第4、5期合刊，第628页。

② 《东北区私营代表黄少明发言》，杨国安编著《中国烟业史汇典》（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3—1694页。

③ 《章拔炯在首届全国卷烟工业会议传达大会上的报告辞》。

度”。但是这个提议也遭到反对。上海地区的一位代表马上指出“此案实在有变相地划分市场的嫌疑”。华北区的提议未获通过。<sup>①</sup>

7月29日，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党的干部杨立三做了总结报告，对地区市场划分问题，“除东北早已成为专卖区外，内地各省市依照市场需要，得自由运销，并进行合同制、责任制，照税务会议拟定，到其他地区的联营，要经过当地政府批准才得经营。”报告也要求“注意避免供过于求，造成盲目之竞争”。<sup>②</sup>

换言之，会议最后达成了妥协。东北区没能把它的制度在全国正式复制到其他每个地区，上海小组也没能维持他们希望的全国范围市场自由。幕后的计划经济学家希望立即设立全国性国有专卖的计划暂时受阻。

## 上海在会后的步骤，以及毛主席对卷烟工作的指示

全国卷烟工业会议闭幕后，1950年8月又召开了公开会议，向更多人传达会议结果的信息。<sup>③</sup>在传达会议上，强调了对税收条例和地区专卖的考虑。两个月后，华东区军政委员会组织了更大

---

① 《全国卷烟工业会议工作日报》（1950年7月24日），《上海卷烟工业同业会出席全国卷烟工业会议的有关文书》。

② 杨立三：《全国卷烟工业会议总结报告》。

③ 《上海卷烟同业公会为通知参加工商登记会议》（1950年8月4日），《上海卷烟工业同业会出席全国卷烟工业会议的有关文书》。

范围的任务布置会议。<sup>①</sup>上海的企业对这两次会议都不满意，认为中央分配给他们的生产配额过少。这些企业提出反驳，请求“调整上海方面的任务总数字”。<sup>②</sup>

不过，一个月后，一场疾风暴雨席卷了中国烟草行业，让一切天翻地覆。1950年11月，毛泽东亲自对卷烟行业字斟句酌地做出了指示。毛主席用本章引言中的词句，指示党政官员不要用外国烟，亦不要吸私营公司生产的纸烟。中央主管当局把这些批示看作同意接收外国经营的烟草公司。在一年半时间里，这个进程就进行得差不多了：上海的英资颐中公司同意接受转让条款，著名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停止运营。接收外商烟厂为上海卷烟行业更大的变化奠定了基础，尤其是改组中国的许多家私营烟草公司。

为了征服上海的私营烟草公司，主管当局决定以各种方式向它们施压，包括操纵原料成本。陈云为此定了调子：“现在有些资本家有这样的想法：……政府搞原料工业，他们搞制造业，包袱都要你背，他们赚钱，我们当然不能这么办”。<sup>③</sup>相应地，主管当局指示国有的中华烟草公司1950年12月成立上海卷烟工业烟叶联购处。上海有另外20家卷烟生产企业加入这个新的机构，包括17家私营烟厂。中华烟厂经营烟叶联购处，但是私营企业承担

---

① 《为准备华东工业部函定期召开华东卷烟工业会议希推派代表准备资料出席》，《上海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出席华东区卷烟工业会议的有关文书》。

② 《清查复实销根据及各厂间的分配根据》（1950年9月2日），《上海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出席华东区卷烟工业会议的有关文书》。

③ 《一九五一年财经工作要点》（1951年4月4日），《陈云文选》第2卷，第136页。

原料采购和分配的大部分成本。

不久之后，主管部门采取了其他步骤进一步挤压私营企业。比如，1951年5月，财政部颁布《专卖事业条例（草案）》和《各级专卖事业公司组织规程》，把“卷烟用纸”列为国家专卖品。中国专卖事业总公司成立，负责控制烟叶、卷烟纸和生产卷烟使用的其他原料的加工和生产。<sup>①</sup>这些措施的结果是卷烟生产大幅合并。到1952年，上海私有烟草公司比例已经降至只有24%。考虑当时到私营企业仍占上海市工业总产值的61%，这一降幅尤为剧烈。<sup>②</sup>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正在重组管理框架结构，包括成立全国烟草专卖局的前身。1952年6月2日，轻工业部成立中国烟草工业公司。并且，把上海烟草公司更名（新的名称国营上海烟草公司只使用了一段时间），生产的卷烟全部由中国百货公司华东区公司包销。1953年10月，国营上海烟草公司撤消，所有经营业务移交轻工业部烟草局，所属工厂划归工业部华东办事处烟草工业处领导。

除了所有这些重组，50年代初掀起政治运动，对上海市私营卷烟公司的自主权予以沉重打击。1951年底到1952年初，共产党掀起了“三反”和“五反”运动，目的是消除国内那些被认为破坏共产主义国家建设的资本主义和相关机构，包括针对党政机

---

① 《关于抄发“专卖事业暂行条例草案”的通知》，《中央税务公报》1951年第11期，第1—3页。

② 《上海卷烟工业概况》（1954年），上海市档案馆，B163-2-389-61。

关工作人员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以及针对私营工商业者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在这些运动导致的一波混乱之后，上海市国有烟草公司1952年6月掀起了自己的运动：民主改革运动。民主改革运动迫使卷烟企业在工厂设立“民主改革运动办公室”，揭露公私矛盾和劳资矛盾。这种“揭发”促使上海市副市长方毅建议增强对卷烟公司的监管，到1953年，上海市各私有卷烟厂都必须接受全职的市政府代表派员驻场。<sup>①</sup>这些市政府派驻员的任务包括提升“人民的权利”，加强监管，推动私营企业改造。

随着中国进入50年代中期，历时五年的国家建设已经剧烈地改变了上海的卷烟生产面貌。解放前，上海市有约100家卷烟厂。到1954年初，只剩下23家。1949年，上海只有一家国有卷烟厂，到1954年，国家部分或全部持有的工厂控制了卷烟生产的70%以上。而且，更多变化即将到来。到1954年底，兼并使上海卷烟公司的数量降至14家，其中5家是国营公司，9家是公私合营公司。<sup>②</sup>也就是说，到1955年初，中国的卷烟工业国有化已经基本完成。所有私营烟草公司已经消失，被国家接收或解散。

虽然这些年卷烟厂的数量因合并而减少，但是卷烟产量没有减少。这想来有些奇怪，因为解放时，中央当局多次批评国家烟草业的卷烟生产过度向上海集中，上海卷烟厂产能比全国其他地

---

① 《方毅传》编写组：《方毅传》，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202页。

② 《上海烟草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烟草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上海市私营卷烟工业行业合营总结报告》（1955年），档案编号：B5-2-47-54，上海市档案馆藏。

方大得多。但是，随着国有化接近尾声，批评之声消退，上海的卷烟产量开始攀升。1954年，上海生产了1,405,792箱（约700亿支卷烟），超过1948年的历史最高产量。这占当年中国生产的全部卷烟的几乎一半。而且，所有这些上海产卷烟只有12%调拨给当地市场，其余分销到全国各地。与早先要求的“地区市场划分”不同，曾经受到批评的“本地生产、供销全国”的现象更加突出了。<sup>①</sup>

这表明新成立的政府批评上海卷烟业的真实原因，不是因为“生产过剩”，而是为解放后立即打击私营卷烟企业提供方便的理由。一旦对卷烟行业完成了合并和国有化，国家很乐意壮大上海制造的威力，使上海重新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卷烟生产基地和销售中心。

## 结 论

经过几十年为国家领导权的奋斗，1949年中国共产党需要迅速获得资金建设新国家。为此，我们可能以为共产党会马上对所有卷烟厂实施国有化。这一章呈现了一个稍微不同的叙事。我们了解到，共产党的方式一开始受到卷烟行业内部分裂的影响。中央主管当局认为卷烟行业非常重要，希望实现全面的接管和控制，但是一开始对国有化采取谨慎的方式，尤其是对卷烟行业的首要

---

<sup>①</sup>《上海卷烟工业概况》。

城市。于是他们先与卷烟生产商磋商，评价对生产的可能影响，并与利益攸关方谈判后，再选择改革政策。

这一过程中一个重要事件是1950年第一届全国卷烟行业会议。在此次会议上的斟酌考虑，对新政府对卷烟行业的理解和处理显然产生了影响。上海与会者抗拒地区市场划分的专卖制度，导致中央决定先建立对烟叶和卷烟纸等原料供应网络的控制。有可能上海代表的抗拒促使毛主席1950年11月12日宣布只购买国营烟厂生产的卷烟。在此之后，上海私营卷烟企业经济上生存的选择自由变得越来越受限。进退维谷之下，私营企业或者倒闭，或者同意出让，到1955年，几乎所有私营卷烟企业都消失了。与此同时，政府对上海卷烟行业的批评减少，政府的投资开始获得巨大回报。

这些是新中国卷烟和卷烟生产常态化的关键时刻。新中国的 69  
启幕阶段，对设立后来成为今天国有巨头中国国家烟草公司的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这一章提醒我们，政府政策和政府官员在日常生活某些琐事的常态化中能起到突出作用。

本书的一项主导原则如序言部分所述，是我们以面向未来的思路审视历史。这使我们不仅能更好地理解人们如何创造了我们今天熟知的世界，而且可以想象不同的未来。所以，请大家考虑：如果1950年11月这片土地上最重要人物的批示不是本章一开始引言里的那几句话，会怎样？如果在第一届全国卷烟行业会议后，毛主席的批示是这样说的：“党政官员不得吸烟，应当消除卷烟生产”，会怎样？如果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党的领袖没有把全国几百家卷烟企业国有化、合并，没有策略性投资上海等城市和全国其

他地方的卷烟生产新设施从而培育卷烟生产，而是采取了一些非常不同的步骤，卷烟行业的轨迹与我们看到的轨迹会不会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呈现？那样的话，今天卷烟在政府财政、消费文化中的“正常”角色，乃至其影响人们生死的作用，一定会被认为不同寻常。这另一番情景颇值得我们深思。



## 第三章

### “大跃进”时期的中国卷烟工业

皇甫秋实 Matthew Kohrman

1958年8月7日，正当“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时，毛泽东 73  
前往河南许昌视察烟草生产。望着长势喜人的烟田，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对许昌地委副书记马金铭、专员王延太说：“你们这里成了‘烟叶王国’了。”临行前，毛泽东还嘱咐当地干部群众：“你们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啊！”<sup>①</sup>

然而，当时在许昌没有人想到，毛泽东的临行寄语预示了在未来几十年深刻塑造国家的事件。本章将探讨“大跃进”对中国卷烟制造业的影响。卷烟工业如何适应这场如今遭到批判的1950年代末的政治动荡？这场运动有什么长期影响？我们认为，虽然“大跃进”对中国各个领域都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但这场运动培

---

<sup>①</sup>《中国烟草工作》编辑部编著：《中国烟草史话》，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3年，第283—285页。

育了中国 21 世纪卷烟部门的一些典型特征并使之常态化，尤其是大众消费、物流的政府管控、将卷烟成分作为创新对象、生产在地化，以及产业发展相对于身体健康的优先性。

“大跃进”几十年来一直很少受到学术考察，但随着近年来这段历史的细节越来越多地披露，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sup>①</sup> 总体而言，这些历史研究关注这场运动直接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但“大跃进”引发的复杂多样的社会经济实践却依然鲜为人知。本章聚焦于“大跃进”对商业领域的影响，这提示我们，这场运动最初的目的并非人为破坏，而是社会经济转型。

中央政府通过大规模的运动在短期内实现经济转型的目标，这并不是共党政权的创举。王国斌发现，清政府为了增加中央财政收入而发起运动，在 18 世纪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sup>②</sup> 当然，这些早期的社会经济动员在很多方面都与“大跃进”不同。对于 1950 年代末的运动，毛泽东及其关于迅速转型的独特话语所发挥的极大作用尤其引人注目。

1955 年 10 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开

---

① Frank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New York: Walker & Co., 2010); Kimberley Manning and Felix Wemheuer, eds., *Eating Bitterness: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and Famine* (Vancouver: UBC Press, 2011); and Yang Jisheng, *Tombstone: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1958-1962*, introduction by Edward Frie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translated by Stacy Mosher and Jian Guo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

② 王国斌：《18 世纪以来中国财政变迁及相关问题》，《史林》2006 年第 2 期，第 2 页。

始尝试使用这种话语。十月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合作社在农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生产模式的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毛泽东成为在农村发展合作社的主要倡导者，在1955年的六中全会上，他不仅宣布了这一主张，还要求在口号“又快又多又好”的指导下发展合作社。随后，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他又提出将“又多又快又好”作为各种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sup>①</sup>

1950年代中期毛泽东选择的话语——“又多又快又好”并未获得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的一致拥护。在毛泽东看来，这些反对只是坚定了他的决心。他在三年内排除了几乎所有的反对意见。1958年春，不仅“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成为《人民日报》社论的基本内容，而且“跃进”话语开始在政府机构中成为主流。最明显的是，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采取“跃进”话语解释经济目标应该如何制定并应用于各级政治组织。这次会议宣布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sup>②</sup>这标志着国家管理体制内“大跃进”的开端。

“大跃进”的发动对烟草工业产生了什么影响？回顾毛泽东 75  
1958年8月视察河南的新闻简报，我们很容易相信烟草和卷烟生产在“大跃进”时期迅速发展。我们也很容易推测，将烟草种植作为重点直接导致农业管理失当，从而引发饥荒。但事实并非如

---

①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2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64页。

② 汪海波、董志凯主编：《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58—1965）》，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第8—9页。

此。这场运动并没有实现卷烟工业部门的短期跃进。烟草种植也没有在农村直接引起使大量人口挨饿的灾难。诚然，“大跃进”政策与卷烟工业之间的联系会带来长久而广泛的健康问题，但这一后果在几十年后才会显现。毕竟，与烟草相关的疾病会潜伏几十年之久。

所以，“大跃进”当时如何塑造烟草和卷烟生产？也许它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加强了已经存在的治理逻辑。这种逻辑假定卷烟是通过善治来解决的管理问题，并非健康本身的问题，而是日常经济交易的问题。根据这种逻辑，期待卷烟的生产和销售是正常的；期待卷烟成为政府收入的来源是正常的。而成为问题的是物资调配：从避免短缺和损害到监督供应链、基础设施、人员配置、包装、运输、分配和销售的所有事务。鉴于其巨大的破坏性，“大跃进”使卷烟业的物资调配变得更为关键。“大跃进”不仅激发了影响接下来几十年烟草工业结构的管理实验，而且还巩固了一种观念，即卷烟业原本是一个大量进口的产业，共产主义政体的参与者应该努力改变这种局面。

## 原料短缺

农业部是“大跃进”时期受这种逻辑激励的政府部门之一。一般认为农业部的主要职责是粮食供应，尤其是在1950年代。但  
76 烟草在该部门的工作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在农田应该如何利用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在中国农业经济的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全新

的问题。明清时期，士绅就曾担心，烟草种植会争夺农业资源，从而危害粮食生产，并最终促使政府出台了禁止种植烟草的政策。<sup>①</sup>“大跃进”时期，地方层面关于烟、粮争地的矛盾再次出现，而且烟草仍是失败的一方。这正是农业部试图缓解的问题。在1959年的报告中，农业部为烟草种植面积从“大跃进”开始急剧缩小而感到担心。用于种植烟草的土地面积远远低于农业部当年的原定计划，较1958年减少62万亩。<sup>②</sup>

能否取得烟草种植大量需要的肥料是农业部尤其关心的问题。农业部1959年的报告表明，在之前的一年内，河南、山东、安徽、贵州等地的烟田施肥水平显著降低，以致这些省份烟田总面积的大约一半未施底肥。<sup>③</sup>

“大跃进”不只加剧了在土地和肥料管理方面的争执，也不仅是造成了物资调配应服务于烟草还是粮食的冲突。“大跃进”时期，以牺牲农业生产为代价，大力发展特定的工业生产形式——尤其是钢铁，加剧了卷烟生产获取各种必要资源的困难。

“大跃进”尤其扰乱了劳动力的供应。这严重打击了烟草种植，因为烟草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作物。1958年和1959年的农业劳动力是如此混乱，以致烟田未经整地和耕作粗糙的现象严重，普遍没有做好移栽烟苗的准备工作。农业部的报告指出，1958年的第一茬种植杂乱无章，只能寄望于二茬烟和秋冬烟。由于劳动

---

① 王文裕：《明清的烟草论》，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2002年。

② 农业部：《关于烤烟汇报会的报告》，（59）农村伟字第17号，1959年8月18日，上海烟草博物馆藏，卷烟工业1959，第43—46页。

③ 同上。

力供给不足，晚烟的移栽期也较往年推迟。<sup>①</sup>

1960年，全国多地的情况恶化。全国烤烟种植面积减至500万亩左右，比计划减少140多万亩。河南省要求增拨的三千吨化肥，贵州要求增拨的七百吨化肥，均未得到解决。烟农缺少二茬烟的肥料。河南和贵州都深受劳动力短缺的影响。仅贵州一省，在15万亩的晚烟烟田中，草荒就占20-25%。劳动力中断还意味着种植烟草的土地通常没有做好病虫害的防护。各地青虫灾害频发。在河南襄县，40%的烟田遭到青虫危害。<sup>②</sup>

不同于大多数农作物，烟草不仅需要大量劳动力，还需要燃料。烟草种植的最后一个阶段需要燃料来烘干和熏烤烟叶。由于“大跃进”运动以钢铁工业为优先，加上劳动力短缺，很少有烟草种植地区能够获得所需的燃料，无论是麻经、煤炭，还是其他可燃的材料。大量已经长成的烟草无法及时烘干和熏烤。1958年，由于缺少煤炭，河南许昌烟区烂掉了5000万斤烟叶。而1959年的情况也并未好转。时至4月底，该地区只收到当年所需60万吨煤炭的15%。<sup>③</sup>煤炭短缺导致全国许多烤房都关门停业。这让农业部深感不安。在1960年的一份报告中，农业部具体指出，在湖北、江苏、黑龙江等省建立的新烟区，80%以上的烤房已经停业，

---

① 同上。

② 农业部党组：《关于要求解决烤烟加工物资问题的报告》，（60）党发165号，1960年8月26日，上海烟草博物馆藏，卷烟工业1960，第32—33页。

③ 农业部党组：《1959年上报烤烟播种面积的落实情况》，（59）党发033号，1959年5月15日，上海烟草博物馆藏，卷烟工业1959，第31页。

即使像河南等老烟区，烤房的缺口也达 17000 座。<sup>①</sup>

在中共的档案中，可以找到更多关于农业部担忧烟草种植的资料。农业部不仅提交报告，提醒党内各级干部注意，还试图促使党的重要领导人直接干预。例如，1960 年农业部部长廖鲁言曾提交报告，直接劝说周恩来，从钢铁工业向卷烟工业抽调煤炭。<sup>②</sup>

轻工业部和商业部对卷烟制造的忧虑，不亚于农业部对烟叶生产的担心。1958 年 5 月，第二商业部和轻工业部联合召开了一次会议，主要的议题就是确保卷烟厂商能够获得充足的原料，尤其是烟叶。轻工业部副部长狄景襄向与会者报告称，卷烟厂很难 78 获取准备妥当的烟叶，到 8 月许多卷烟厂的库存都将耗尽。<sup>③</sup>而卷烟工业固有的物资调配因素使卷烟企业在获取烟叶时更加困扰。共产党政权继承的卷烟工业面临地理上的挑战，因为大部分卷烟制造业集中于沿海地区，而大多最好的烟草种植区处于相对隔绝的内陆。以天津和上海为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 年），这两个城市虽然远离重要的烟叶产区，但生产了占全国产量 45% 的卷烟。

这种地理格局是轻工业部在“大跃进”的混乱中立即遭遇的问题。在 1957 年到 1960 年之间，全国烟叶产量下降了将近三分

---

① 农业部党组：《关于要求解决烤烟加工物资问题的报告》，（60）党发 165 号，1960 年 8 月 26 日，上海烟草博物馆藏，卷烟工业 1960，第 32—33 页。

② 农业部党组：《1959 年上报烤烟播种面积的落实情况》，（59）党发 033 号，1959 年 5 月 15 日，上海烟草博物馆藏，卷烟工业 1959，第 31 页。

③ 《狄副部长在北方五省卷烟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8 年 5 月 12 日，上海烟草博物馆藏，卷烟工业 1958，第 69—73 页。

之一，从 25 万吨跌至 18.6 万吨<sup>①</sup>，政府部门和中国新近国有化的卷烟厂必须探索和适应。他们通常采取了以下几种形式。

其一是基础设施。今天，中国烟叶和卷烟生产的中心是西南省份。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以坐落于缅甸、老挝和越南正北方的云南为例。由于英美烟公司在 20 世纪初的投资，以及云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作为国民政府避难所的地位，1949 年该省已经在为卷烟提供烟叶，而且省会昆明有许多小型的卷烟厂，但这两方面的产量都很少，远不如其他地方，甚至比不上河北、安徽和山东等地。到 2007 年，中国三分之一的烤烟和五分之一的卷烟都在云南生产。那时，云南的两家烟草巨头——红塔集团和红云集团生产的卷烟总数超过任何其他省、直辖市 40% 以上。<sup>②</sup> 云南在卷烟业中地位的上升分为几次浪潮。最重要的一次始于“大跃进”运动，当时红塔集团的第一家卷烟厂在小镇玉溪建立，并尝试生产了“人民公社好”和“丰收”等如今早已被遗忘的品牌。

79 小镇玉溪并非一个意外的选择。这是基础设施宏观政策的组成部分。1958 年，轻工业部宣布，全国卷烟制造中心需要去中心化。地方被鼓励建立新的省级和县级的卷烟制造设施。这对烟草种植区非常有利，这些地区不用再忍受“成品调入，原料调

---

①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中国工业五十年：新中国工业通鉴》第三部，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年，第 71 页。

② Cheng Li, *The Political Mapping of China's Tobacco Industry and Anti-Smoking Campaign* (Washington, DC: Brooking Institution, 2012), 91, 119.



出”的安排。<sup>①</sup>但这对之前的卷烟制造中心和没有大规模烟草种植经验的省份也构成了挑战。以山西省省会和最大的城市太原为例。山西没有大规模种植烟草的历史，但在1950年代，太原建立了很多卷烟厂。这些卷烟厂所需烤烟的85%到90%都从省外输入，依靠河南、山东、贵州、东北等地供应。卷烟业去中心化的计划启动以后，太原这样的城市发现原料难以输入的问题非常严重，以致当地的卷烟厂在1959年停产。<sup>②</sup>包括上海在内的其他地方的老厂，也不得不停工或更改卷烟配方。<sup>③</sup>上海卷烟厂生产的甲级品牌“中华”和“双喜”的生产计划亦由11000箱减少为3400箱。<sup>④</sup>

早在“多快好省”成为政治口号以前，上海许多1949年以前建立的卷烟公司已经开始接受国家管理下的合并，这些公司被并入今天的上海烟草集团。但在1958年初，合并力度明显加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多数上海的卷烟厂由于缺乏原料而基本闲置。在5月至8月之间，私人企业长期用于卷烟制造的建筑被改造成制造玩具、电子仪器和各种工具的国营工厂。不久之后，著名的南洋烟厂和鲜为人知的上海卷烟三厂被改造成南洋电机厂和

---

① 《狄副部长在北方五省卷烟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8年5月12日，上海烟草博物馆藏，卷烟工业1958，第60页。

② 《太原烟草厂厂长常银贵在山西省1960年烟叶生产会议上的发言》，1960年2月28日，上海烟草博物馆藏，卷烟工业1960，第9页。

③ 商业部：《关于解决上海烟厂停工情况致李副总经理、程、牛副主任》，第354号收文，1959年4月23日，上海烟草博物馆藏，烟草烟叶1959，第5页。

④ 商业部、轻工业部：《关于甲级烟的生产报告》，1959年6月15日，上海烟草博物馆藏，卷烟工业1959，第46—47页。

上海手表厂。<sup>①</sup>如今上海的卷烟工业能够利用市中心杨浦区的一座巨型工厂实现如此高效的管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跃进”。

调整不仅发生在基础设施的层面。卷烟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对于上海的几家专注于质量的卷烟厂而言，解决烤烟供应不足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将部分粗支烟改为细支烟，以减少烟叶消耗。<sup>②</sup>但  
80 一种更常见的做法是改变卷烟内部可燃物的种类，使用低档烟草或者烟草以外的填充物。<sup>③</sup>由于烟叶货源质量低下，一些沿海地区的卷烟厂在1959年4月上旬和中旬被迫改变卷烟配方达七次之多。<sup>④</sup>

如今，全世界几乎没有卷烟是只用烟叶制作的。现代卷烟的配方非常复杂，有湿润剂和香料（如糖、甘草、咖啡）、化学制品（尤其是氨，被用于使烟丝膨胀起来并增加尼古丁的刺激性），以及意想不到的烟草成分，包括大量现在被称为“复原烟草”的东西，那是由早期被卷烟制造商丢弃的烟杆和烟叶中脉复原的烟草。<sup>⑤</sup>

“大跃进”迫使卷烟厂商在改变制造卷烟的烟草原料方面变得更加娴熟。诚然，此类改变在中国并非没有出现过。20世纪

---

① 董浩林主编：《上海烟草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50页。

② 同上，第7页。

③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中国工业五十年：新中国工业通鉴》第三部，第1112页。

④ 商业部：《关于解决上海烟厂停工情况致李副总经理、程、牛副主任》，第354号收文，1959年4月23日，上海烟草博物馆藏，烟草烟叶1959，第5页。

⑤ Robert Proctor, *Golden Holocaust: Origins of the Cigarette Catastrophe and the Case for Aboli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初，英美烟公司就开始改变中国的烟草品种，尝试用本地烟叶替代进口美种烤烟。<sup>①</sup>在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中国的卷烟厂商也曾采用土种的晾晒烟替代烤烟，以降低生产成本。但在“大跃进”时期，此类改变不仅是产品设计的问题，而且成了政府政策。政府机关命令烟草厂商以在中国前所未见的系统方式利用替代品。走在最前列的是轻工业部和商业部。1958年上海烟草工业公司成功地将烟秸皮掺入其低档品牌（丁级）之后<sup>②</sup>，工业部和商业部于1959年又发布新规定《关于大力收购烟杆皮、烟杆嫩梢的联合通知》。这项规定要求卷烟厂按比例掺入替代品：最低档的卷烟戊级烟掺用50%，丁级烟掺用15%，丙级烟掺用10%。<sup>③</sup>1960年，戊级烟掺用烟秸的比例又进一步提高。

由于烟秸含木质纤维成分较高（占50-60%），一些卷烟厂的经理担心掺用烟秸会降低产品的质量和价值。但这并非他们唯一的顾虑。这些卷烟厂缺少钢材来制作将烟秸妥善处理成烟丝的额外设备，因而无法达到加工烟秸的技术要求。为了解决利用烟秸的技术难题，1960年2月，轻工业部和轻工业工会全国委员会还举办了为期6天的“烟秸处理技术经验交流会议”。来自9个省市

---

① 陈翰笙著，陈绛译：《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9、91页。

② 食品工业部工业管理局、合作总社烟联局等：《关于丁级烟（指新牌）掺用烟秸皮的联合函》，1958年1月7日，上海烟草博物馆藏，烟草烟叶1958年，第24页。

③ 轻工业部、商业部：《关于大力收购烟杆皮、烟杆嫩梢的联合通知》，（59）轻工计字第398号，（59）商字第269号，1959年9月25日，上海烟草博物馆藏，卷烟市场1959，第7页。

的轻工业厅（局）干部和 24 个卷烟厂的代表前往上海参加了这次会议。<sup>①</sup>

但这次会议之后，政府官员和工厂经理依然为如何更好地掺入烟秸而苦恼。例如，一份国务院的档案显示，由于无法在掺用烟秸的同时维持最低的技术标准，太原烟厂 1960 年上半年计划生产的 41000 箱卷烟仅完成了一半。<sup>②</sup>轻工业部和商业部的监督员不无忧虑地发现，1960 年初太原烟厂掺用烟秸仅占卷烟填充料的 14.2%，远远低于规定比例。<sup>③</sup>

鉴于烟秸使用难以推行，1960 年晚些时候，轻工业部和商业部又布置卷烟工业进一步采用烟草以外的填充料。新批准的填充料五花八门。最常用的填充料是制糖工业的副产品——甘蔗渣、甘草渣和甜菜废丝，由轻工业部负责调剂供应。其他的填充料均为“平常食用”植物的叶茎，包括荷叶、豆叶、芝麻叶、萝卜叶、香蕉叶、薄荷叶、酒花叶、车前子叶、梨叶、桃叶、樱桃叶、苹果叶、榛树叶、柞树叶、向日葵叶、番茄叶、地瓜叶、芋头叶、马铃薯叶、玉米皮等等。轻工业部和商业部不仅协调这些材料的

---

① 轻工业部、中国轻工业工会全国委员会：《关于转发烟秸处理技术会议总结，请进一步发动群众更多更快更好处理烟秸的函》，1960 年 3 月 10 日，上海档案馆藏，B189-2-387-27。

② 《国务院收电要求核减卷烟生产任务》，1960 年 7 月 27 日，上海烟草博物馆藏，卷烟工业 1960 年，第 19 页。

③ 轻工业部、商业部：《关于生产卷烟掺用烟秸进行情况的联合报告》，（60）轻工食字第 204 号，（60）商糖联字第 248 号，1960 年 4 月 14 日，上海烟草博物馆藏，卷烟工业 1960，第 6—8 页。

收集，还制定了新的使用比例。<sup>①</sup>

这种对于卷烟填充料的关注揭示了“大跃进”时期的一个重要转变。卷烟生产在 20 世纪初是中国的一种税收来源，而 1949 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卷烟工业国有化，“大跃进”开始构建起一套新的政府和卷烟的关系。在“大跃进”时期，政府不仅是卷烟工业的受益人和所有者。它越来越成为一个焦虑不安的管控者，努力维持卷烟供应的稳定，并将卷烟生产和供应作为正常秩序的基石，即便处于极端动荡的时期。

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个问题，不妨对烟头进行考察。在 20 世纪初，对于节省开支的烟民而言，抽取烟头中的烟丝重新制造手工卷烟变得越来越常见。拾烟头甚至发展成了一种职业。<sup>②</sup> 据估计，82 在 1930 年代的上海，专门靠拾烟头度日的人有一千人以上。<sup>③</sup> 大跃进时期，捡烟头从自由市场的生存策略变成了政策。商业部因为要向民众持续不断地提供新的卷烟而倍感压力，于 1959 年 10 月下达了《关于开展收回烟头、加工烟丝的通知》。这份文件号召各单位、服务行业和街道收购烟头，改制成烟丝。商业部甚至规

① 卷烟的填充料扩展至非烟草材料之后，各级卷烟掺用填充料的比例为乙一级 5%，乙二级 10%，丙一级 15%，丙二级 20%，丁级 25%，而戊级烟不再生产。轻工业部、商业部：《关于卷烟不掺用烟秸改用其他填充料的报告》，1960 年 9 月，上海烟草博物馆藏，卷烟工业 1960，第 10—19 页。

② 卡尔·克劳（Carl Crow）著，夏伯铭译：《四万万顾客》，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第 43 页。该中文版所依据的英文版为 Carl Crow. *Four Hundred Million Customers*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37).

③（作者不详）：《拾烟尾》，《文摘》第 1 卷第 4 期，1937 年 4 月 1 日，第 115 页。

定卷烟厂以每斤（约 500 克）0.5—0.8 元的价格收购烟头。<sup>①</sup>

## “停车让路也要跃进”

如今在中国内外，现代卷烟工业的根本原则都是机械化、自动化和效率。推行这些原则成了“大跃进”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卷烟管理的核心问题。如前文所述，钢铁和相关行业（如煤炭、能源和机械）在 1950 年代末具有政治优先性。向这些和其他重工业投资的期待如此之高，社会各部门为重工业“停车让路”的压力如此之大，以致其他行业的管理者都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在各自的管理领域内“停车让路”，但依然实现明显的“跃进”？

卷烟工业给出了几种解决方案。通过创新降低劳动成本是最被看好的一种。为此，卷烟部门试图契合“大跃进”工业计划提出四个目标，即生产机械化、工序连续化、环境卫生化、部分操作自动化。而支持烟草工业实现这些目标的还是轻工业部。在 1960 年《关于卷烟工业大跃进以来技术革命情况的报告》中，轻工业部表彰了最近的技术创新，例如制造铁木结构的简易包装机、应用风力送丝机、安装传送带、发明抽梗机器等。轻工业部表扬这些创新不仅使中国三分之一的卷烟厂实现了“连续化生产”，还

---

<sup>①</sup> 商业部：《关于开展收回烟头、加工烟丝的通知》，1959 年 10 月 6 日，上海烟草博物馆藏，卷烟工业 1960，第 37—39 页。

显著降低了劳动成本。仅抽梗机一项就使卷烟工业裁减了 6700 个 83 工作岗位。<sup>①</sup> 其他的技术进步还包括：促进青烟发酵的装桐汽枪、节约制作浆糊粮食的刮浆机、防止卷烟沾染油渍烟的卷烟机刀头接油装置、卷烟跑条自动停车机等。在 1958 年的一份题为《卷烟工业技术革命的先进人物》的文件中，上述及其他发明都因为提高了各方面的工业生产率而受到表彰，其中包括将 10 支装卷烟包装机改装成 20 支装。<sup>②</sup>

对于“停车让路也要跃进”的另一个解决办法是通过厂际合作和竞赛来提高工业效率和生产率。当代中国烟草工业的管理者经常促使工人通过友好竞赛来提高技术水平。“大跃进”时期，卷烟厂根据“学、比、赶、超”的毛泽东主义原则也采取了类似的方式。竞赛通常和生产会议结合在一起，比如北方五省卷烟生产会议与南方十五省卷烟生产会议。1958 年，山东省和东北区六家卷烟厂联合向全国的卷烟厂提出竞赛挑战，制定了提高产品质量，节约生产原料，提高利润的目标。<sup>③</sup> 那时最大的一次竞赛可能发源于 1959 年 3 月。在郑州全国烟草工业生产会议的支持下，84 个烟厂、6 个雪茄烟厂、7 个丝烟厂和 3 个复烤厂参与了各类生产技

---

① 轻工业部食品局：《关于卷烟工业大跃进以来技术革命情况的报告》，1960 年 3 月 28 日，上海烟草博物馆藏，卷烟工业 1960，第 13—16 页。

② 东北三省和华北三声工业厅：《卷烟工业技术革命的先进人物》，1958 年 4 月 1 日，上海烟草博物馆藏，卷烟工业 1958，第 53—54 页。

③ 东北区卷烟工业协作组：《东北区卷烟工业协作组向山东省应战向全国挑战书》，1958 年 4 月 1 日，上海烟草博物馆藏，卷烟工业 1958，第 51 页。

术的竞赛。这次厂际竞赛有大约七万名职工参加。<sup>①</sup>

对危害视而不见成为当代卷烟生产的一个标志。<sup>②</sup>我们通常将这种回避与对病因的模糊处理联系起来，即忽视烟草和特定种类疾病之间的因果联系（例如，癌症和心脏病）。卷烟工业的管理者如何学会忽视这种危害？一个答案是他们长期被鼓励掌握一套更为普遍的技能：对各种危害（不单是烟草造成的危害）视而不见，以及持续聚焦于其工作的技术管理细节（technocratic specificities）。“大跃进”肯定不是中国的卷烟厂及其主管机关第一次训练这套技能，但绝对是影响深远的一次。到1959年夏，饥荒已经影响到中国大部分地区。那时，可以想象，如果说某个政府部门应该投入资源以缓解这场迅速升级的人道主义危机，轻工业部的食品工业管理局应该冲在前列。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政治勇气，敢于批判毛泽东的“大跃进”运动，而那个时期鲜有政府官员具备这种勇气。本章的研究表明，1959年间，食品工业管理局分散自身注意力、忽视饥荒并显示自己全力投身于繁忙技术工作的方法之一，就是激励卷烟厂创新和竞赛。

6月，食品工业管理局发布报告，表扬了此类管理的成果。这份报告概述了食品工业管理局通过全国烟草工业厂际竞赛委员会发起的“技术革命”，介绍了全国烟草工业厂际竞赛委员会通过引进包装机和打叶机，在全国卷烟厂用自动化加工代替手工操作

---

① 轻工业部食品工业局管理局：《全国烟草工业开展厂际竞赛的情况和进一步开展厂际竞赛意见的报告》，1959年10月1日，上海烟草博物馆藏，卷烟工业1959，第14页。

② 参见本书第五章高迈德撰写的关于中国烟草博物馆的研究。



上取得的巨大成绩。<sup>①</sup>这种努力一直延续到秋天。9月，全国烟草工业厂际竞赛委员会向各省、市轻工业厅、局和全国各烟厂发出了一份通报，号召大家学习联新烟厂的成功经验并加倍努力。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的联新烟厂采取充分利用烟秸的新技术，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sup>②</sup>不久，食品工业管理局和全国烟草工业厂际竞赛委员会将另一家工厂——青岛第一卷烟厂作为全国模范。在这个食物供给越来越匮乏的时期，这家工厂对“食品管理”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在卷烟生产中有效地增用烟权。<sup>③</sup>

### 难题就在这里

“大跃进”还有助于确立中国当代卷烟业的另外两条基本管理原则。第一，人民有获取卷烟的基本权利，第二，烟草税应该被最大化，但不能妨碍民众获取卷烟。

民国时期，国民党政权既没有将卷烟消费视为一种基本的公民权利，也不认为有必要确保绝大多数人都买得起机制卷烟产品。

① 《轻工业部食品工业局、全国烟草工业厂际竞赛委员会关于卷烟厂自力更生实现机械化生产自制包装机和打叶除梗机情况的通报》，1959年6月22日，上海档案馆藏，B189-2-349-17。

② 《轻工业部食品工业局、全国烟草工业厂际竞赛委员会关于转发济宁联新烟厂反右倾鼓足干劲大闹技术革新利用烟秸卷烟保证了全面超额完成1959年8月份生产计划总结的函》，1959年9月16日，上海档案馆藏，B189-2-349-72。

③ 《轻工业部食品工业局关于介绍青岛第一卷烟厂增用烟秸生产卷烟的函》，1959年9月19日，上海档案馆藏，B189-2-349-77。

事实上，国民党政权还通过宣传，批评卷烟消费不仅危害健康，而且浪费金钱。<sup>①</sup>

将之与 1950 年代末关于卷烟的“党的路线”进行对比。这条党的路线在这十年间以多种方式传播，但 1958 年轻工业部在一次卷烟工业会议上对此做了最为简明扼要的传达。在这次会议上，中央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新元向刚完成国有化的卷烟工业的各级负责人表示，卷烟工业对于实现两个目标有着重要作用。根据优先顺序，这两个目标是“既要满足人们需要，又要为国家积累资金”。<sup>②</sup>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一词的含义当然有十分特殊的含义。它创造了一个超越阶级的、理想化的、统一的公民群体。在这种认知体系中，如果卷烟是人民的一种需求，那么它就是一种不能被收入阻碍的需求。无论一个人的生活多么困难，他都应该能够购买和吸食卷烟。而且如果政府有责任满足这种需求，那么它就有责任确保所有人的这种需求都能得到满足。

党的路线的第二部分更容易理解。从 19 世纪末开始，卷烟业就成为了中国历代政权的重要财政来源。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 年），卷烟统税约占财政收入 10%。1934 年，由于经济危机蔓延全国，其他税收减少，卷烟统税在税收总额中所占

---

① 皇甫秋实，《新生活运动的“变奏”：浙江省禁吸卷烟运动研究（1934—1935）》，《近代史研究》2010 年第 6 期，第 95—112 页。

② 东北三省和华北二省工业厅：《王新元副部长在北方五省卷烟生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58 年 4 月 20 日，上海烟草博物馆藏，卷烟工业 1958，第 65—68 页。

的比例提高至 20%。<sup>①</sup> 1949 年以后，北京对卷烟税收有很高的期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 年），卷烟工业共计积累了 46 亿余元的政府收入。鉴于 1950 年代末的政治氛围，政府的计划者期待看到财政收入的跃进。所以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的 1958 年，他们设定了 100 亿元的收入指标，是前一个五年计划的两倍。<sup>②</sup>

但如何达到如此之高的收入指标呢？最简单的方法是主要生产高级烟（甲级和乙级）。共和国的卷烟工业都倾向于生产甲级烟和乙级烟。据说高级烟给企业带来更多声誉，而且由于其价格和税率更高，高级烟创造的国家收入要多得多。至今仍保留着这种税收差异：每支高级烟为国家赚取的利润都多于低级烟。但在 1950 年代，卷烟厂没有足够的、“合格”的原材料来主要生产甲级烟和乙级烟，而且主要生产高级烟还有另一个问题，即背离了“满足人民需求”的原则。

今天，中国不仅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烟民，而且中国最穷的公民也吸食卷烟，而不是烟丝。在 1950 年代，情况有所不同。许多人倾向于吸食烟丝，尤其是农民，他们有时把烟丝卷在旧报纸里或者更常见的是用旱烟袋吸食，原因在于烟丝比卷烟便

---

① 江苏省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编写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三辑（下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4667—4668 页；杨荫溥：《民国财政史》，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年，第 47 页。

② 东北三省和华北二省工业厅：《王新元副部长在北方五省卷烟生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58 年 4 月 20 日，上海烟草博物馆藏，卷烟工业 1958，第 65—68 页。

宜。二十世纪后半叶吸卷烟如何在民众中变得如此普遍？一个原因就是廉价卷烟变得更容易获得了。

这并非偶然发生的。这是共和国早期制定的计划，并且在“大跃进”开始时被专门负责卷烟工业的政府机关进一步加码。在1958年轻工业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副部长王新元表示，烟丝和卷烟完全属于不同的价格区间，烟丝的价格比卷烟便宜一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税收结构。王新元指出：“难题就在这里，出路也就在这里”。<sup>①</sup>他说：“这就需要我们千方百计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节约原材料、降低成本”。<sup>②</sup>参会的另一位轻工业部副部长狄景襄阐明：

低级烟比高级烟的积累的确要少些，如多产多销或许会多些，低级烟多销是真积累，因为销得出去，实现了利润，高级烟产值虽大，放在仓库里没有实现利润，不会为国家创造财政积累。<sup>③</sup>

本章参考的政府档案为王新元和狄景襄两位副部长的计划提供了佐证。表 3.1 展现出 1957 年至 1961 年之间，一个关键地  
87 点——上海的卷烟销售比重发生的重要变化。这些变化与轻工业部的指导方案紧密相关。在这四年间，甲级和乙级烟在上海生产和销售的比重越来越小，而丙级烟和丁级烟的份额却显著增加。

---

① 同上。

② 《狄副部长在北方五省卷烟会议上的总结报告》，第 60 页。

③ 同上。

此外，1959 年低档的戊级烟开始在上海出现，而且此后其产量和销量都有所增长。不能忽视的是所有这些变化发生在上海。相比于中国其他地方，上海有更多卷烟厂商以生产中国最贵的品牌为荣。

表 3.1 还佐证了我们的观点，即“大跃进”时期，为消除将卷烟消费视为一种资产阶级精英主义陷阱的刻板印象做出了努力，吸卷烟的行为被重行定位成适合不论出身的所有人。轻工业部是这一计划的主要推动者。

表 3.1 历年来上海卷烟销售等级比重比较表

项目	1957 年实绩	1958 年实绩	1959 年实绩	1960 年预计			1961 年计划
				合计	上半年 实绩	下半年 预计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甲级	3.55	2.02	1.75	1.54	1.93	1.11	2
乙级	62.65	53.23	47.13	44.86	47.88	41.47	50
丙级	28.46	37.47	40.97	43	39.30	47.17	40.19
丁级	5.34	7.28	9.78	9.32	8.99	9.70	7.81
戊级			0.37	1.28	1.90	0.55	

资料来源：关于历年来上海卷烟销售等级比重比较表，1960 年，上海档案馆藏，B98-1-775-49。

## 结 论

“大跃进”对中国卷烟工业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它削弱了上海等地的生产领导权，促使许多新的地方卷烟厂发展起来。它有助于将政府相对于卷烟工业的角色重新定义为一个焦虑的管控者、一个时刻准备帮助解决物流问题的家长，包括短缺、损坏，以及运销过程中的失误。它促进卷烟的设计和配方步入现代。“大跃进”将卷烟大众化，将之从一件主要由精英享用的物品转变为

88 “人民”有权使用、获取和吸食的东西。它推进卷烟制造的机构安排，国家官员可以赞美技术上的成就，却忽略卷烟消费者遭受的苦难。大跃进帮助奠定卷烟工业作为全国一切安好的基石，极端动荡也好，相对平静也罢，每天烟还在手，日子就能照常过。

以视觉文化与历史操纵获取合理性



2





## 第四章

### 资产阶级堕落还是无产阶级享受？ 对比 1949 年前后中国男性吸烟的视觉文化

Carol Benedict

在今天的中国，吸烟的性别差异非常明显。中国吸烟者超过 95 3 亿人，是全世界吸烟率最高的国家。不过，中国大部分吸烟者是男性。2010 年全球成人烟草使用调查发现，15 岁以上男性人群 53% 吸烟，而成年女性只有 2.4% 吸烟。<sup>①</sup> 中国今天男性和女性吸烟行为的这一显著差异，常被归因于据信有数百年历史的反对女性吸烟的文化禁忌。但是实际上，在中国只有男性吸烟是最近的事情，仅能追溯到 20 世纪中期。20 世纪前几十年，许多中国女性吸旱烟，有些甚至吸卷烟。不过，逐渐地越来越少的中国女

---

① Qiang Li, Jason Hsia, and Gonghuan Yuan, "Prevalence of Smoking in China in 2010,"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64.25 (June 23, 2011): 2469-70.

性开始吸烟，到 1949 年，女性吸烟率已经大幅下降。<sup>①</sup> 1949 年以后，女性吸烟率又大幅降低：1940 年前出生的所有都市女性 25 岁前吸烟的占 10%，1950 到 1964 年出生的都市女性吸烟的仅占 1%。<sup>②</sup> 与此相反，男性吸烟率一直居高不下，在整个 20 世纪消费最高的年代，每十个男性约有七个使用烟草制品。<sup>③</sup>

多个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促使中国出现了吸烟率的性别差距。<sup>④</sup> 一方面是社会和政治常态的转变，逐渐使女性吸烟有损体面而不是更受尊重。1900 年，吸旱烟对各个年龄的中国女性来说完全是受尊重的行为，但是 20 世纪，越来越把吸烟视为只有年长的  
96 妇女才保留的老套习惯。与此同时，卷烟与上海快节奏都市生活方式以各种方式联系起来，在 1930 和 40 年代成为一种污名化的

---

① 近期一项按出生年份分类的人口群体分析发现，1908 到 1912 年出生的中国农村女性中，25% 以上吸烟（年龄 50 到 54 岁），但是在后续年份的人口群体中，吸烟率下降了。1908 到 1912 年出生的城市女性吸烟率也是最高（50 到 54 岁，吸烟率为 27%），1918 到 1922 年出生的人口群体与 1908 到 1912 年出生的人口群体，吸烟率几乎相同。两个更年轻的人口群体（1928 到 1932 年出生和 1933 到 1937 年出生）显示，在每个年龄吸烟率都低许多，最高只有约 12%。见 Albert I. Hermalin and Deborah Lowry, *The Age Prevalence of smoking among Chinese Women: A Case of Arrested Diffusion?* 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 Research Report 10-718 (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October 2010), p. 9.

② Bo-Qi Liu et al., “Emerging Tobacco Hazards in China: I. Retrospective Proportional Mortality Study of One Million Death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17 (November 21, 1998): 1411-22.

③ Hermalin and Lowry, *The Age Prevalence of Smoking among Chinese Women*, p.12.

④ Carol Benedict, *Golden-Silk Smoke: A History of Tobacco in China, 1550-201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p. 199-239.

“新女性”（“摩登女郎”）标志。在流行文化中，在政治语汇中，摩登女郎被描绘为挥霍无度、举止轻浮，她们对奢侈的追求代表了资产阶级腐败和可能对国家不忠诚。这些联系一直延续到解放后，结果，1949年后出生的大多数女性选择根本不吸烟。

虽然女性吸烟者面临的常态发生了变化，男性面临的常态在1949年前后保持相对稳定。一些形式的烟草制品（比如雪茄和进口卷烟）与奢侈过度相关，但是解放后吸烟的大部分男性没有面临什么特别的社会或政治评判。从1949到1978年的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吸烟越来越男性化的年代。总体来说，女性避免吸旱烟和卷烟，烟草使用逐渐被视为完全男性的习惯。女性吸烟被视为是资产阶级恶行，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男性吸烟成为合情理的无产阶级享受。

这一章审视中国1920到70年代烟草广告、漫画和宣传画中男性吸烟的视觉呈现，认为造成中国20世纪烟草使用率的性别差异有重要的视觉因素，既反映了也促进了吸烟相关的性别常态的变化。虽然许多女性传统上吸烟，她们只在家里吸烟。只是在20世纪头20年，勇敢的“新女性”开始公开吸烟，在别人能看到她们吸烟的地方公然吸烟。与此同时，吸卷烟女性的图片开始出现在蒸蒸日上的平面媒体，到1930年代，女性吸烟的形象随处可见。女性吸烟者可见度激增，鼓励更多女性公开吸烟。不过，解放后，女性吸烟者从公众场合和视觉媒体几乎完全消失了。这些形像消失，反映了1930和40年代女性吸烟因为与“资产阶级”摩登女郎相关而形成的新的不得体，这种相关性继续延伸到解放后，并进一步加强。

与女性吸烟者突然消失不同，男性吸烟者的可见度从未降低。中国男性至少从17世纪初就开始公开吸烟，到了20世纪也没有停止。1949年后，男性继续在工作时、在开会时和在马路上大量吸烟，新中国成立后的视觉文化充分展示了这一点。1949年到1978年官方批准的出版物和招贴画中出现的男性吸烟者的许多形象，描绘吸烟是成年男性无产阶级消费的合情理形式。这些图像进一步巩固了吸烟与中国人理想中的男性气质之间长久的联系，即便这些图像为男性抹去了民国时期（1912—1949年）卷烟与“资产阶级”奢侈之间的联系。

### 民国时期男性吸烟情况：好汉交际，文人鉴赏， 以及资产阶级开明个性

从明朝（1368—1644）末年烟草引入中国开始，男性吸烟就是非常公开的活动。在整个20世纪，男人之间分享卷烟十分常见，与清朝（1644—1911）时期男人招待朋友或客人时的吸烟礼仪相差无几。由于这样的招待常常在茶馆、餐馆或其他半公开的场所进行，男性吸烟行为总是高度可见。各个社会阶层的男性出门后到处可以随意吸烟，清朝许多卷轴绘画和木刻版画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sup>①</sup>精英男性的吸烟文化通过习得的烟草品鉴传统也得

---

<sup>①</sup> Lucie Olivova, "Tobacco Smoking in Qing China," *Asia Major*, 3rd series, 18.1 (2005): 225-50.

到充分展示。<sup>①</sup>不仅是农民、劳工，士绅吸烟也很常见，所以精英阶层吸烟者仔细地遵循鉴赏家吸烟指南列出的吸烟礼仪，使自己有别于吸烟的平民大众。<sup>②</sup>他们也使用鼻烟壶，鼻烟是一种昂贵的烟草制品，普通消费者消费不起。这样，抽吸和鼻吸优质烟草是优雅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标志着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属于一个特有的群体。同时，士绅精英与社会下层人士一样，也需要对客人和朋友慷慨大方。向客人提供烟草制品成为精英和非精英人士共有的表达热情好客的典型方式，一起吸烟至少从清朝早期开始就成为男性之间欢快友好气氛的重要内容。<sup>③</sup>男人们吸烟首先是一种社交行为，就是要分享、被人看到。

因此，清朝末年男性吸烟文化代表了历史上影响中国男性气质构建的两个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性别理想：一个是有才华的士人（才子/文人），一个是强壮的武人（英雄/好汉）。<sup>④</sup>好汉让我们想到身体强壮、无畏、忠诚的“汉子”，他们忠于同伴，对朋友慷慨，食量大，酒量大。<sup>⑤</sup>好汉主要是对其他男人忠诚；友情和忠实首先通过交换物品（比如旱烟袋、鼻烟或卷烟）表示。与此不同，才子是举止文雅、有成就的绅士，他们努力培养内在的才

① Benedict, *Golden-Silk Smoke*, pp. 65-73.

② Timothy Brook, "Is Smoking Chinese?" *Ex/Change* (Newsletter of the Centre for Cross Cultural Studie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3 (February 2002): 5-6.

③ Benedict, *Golden-Silk Smoke*, p. 68.

④ Kam Louie, *Theorising Chinese Masculinity: Society and Gender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⑤ Song Geng, *The Fragile Scholar: Power and Masculinity in Chinese Cultur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63-65.

华，使自己跃升为被社会尊崇的文人，能担任士绅公职。“好汉”和“才子/文人”两种理想，构成 Kam Louie 讨论的“文武两分（文成一武就）”，是过去和现在中国男性的一个决定性特征。<sup>①</sup>虽然“才子/文人”和“好汉”常作为中国男性文武两种相反的形象，Louie 指出，历史上文和武常相辅相成。<sup>②</sup>

在 20 世纪的前几十年，吸卷烟开始替代烟草消费的其他模式，才子文人型烟草品鉴者和慷慨大度的好汉这两种历史理想形象持续影响男性吸烟文化。在烟草公司的广告中，两种形象都用于向男性营销。虽然卷烟是批量生产的，面向各个社会经济阶层销售，恰当的品牌定位使营销者能迎合当代爱好者微妙的敏感心理，比如 1923 年宝塔牌卷烟广告描绘的“爱国君子”（图 99 4.1）。<sup>③</sup>同时，即便最优雅的吸烟者也参与和其他男性分享卷烟这一不可或缺的礼仪，表明好汉慷慨大方的男性品德（图 4.2）。<sup>④</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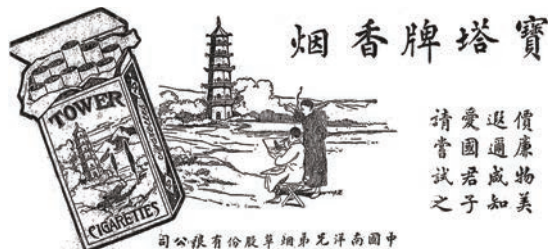


图 4.1 宝塔牌卷烟广告。《申报》，1923 年 4 月 15 日，第 8 版。

① Louie, *Theorising Chinese Masculinity*, p.4.

② 同上，p.11.

③ 《申报》，1923 年 4 月 15 日，第 8 版。

④ 《申报》，1928 年 7 月 4 日，第 8 版。



图 4.2 金鼠牌卷烟广告。《申报》，1928 年 7 月 4 日，第 8 版。

民国关于吸烟的视觉文化再现了中国“传统”男性理想，也反映了新近的借鉴自国外的吸烟与男性之间的关联。19 世纪后半叶英格兰和北美出现的男性“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吸烟文化”充斥了民国时期对吸烟的图像和文学呈现。<sup>①</sup>重要的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对个性的彰显：把受尊重的男性吸烟者表现为有品鉴能力的鉴赏家，他们的吸烟习惯很好地反映了其性格。Charles Laughlin

<sup>①</sup> Matthew Hilton, *Smoking in British Popular Culture, 1800-200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7-40.

指出，1930年代开始流行的文学杂志中出现了对吸烟乐趣的许多回忆，尤其是林语堂（1895—1976）编辑的杂志中，将吸烟与自由、个性、遐思和创造性才华相联系。<sup>①</sup>在《论语》杂志和其他“休闲文学”出版物中，吸烟是性格古怪的象征，就像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文学描绘大侦探福尔摩斯这类特立独行的吸烟者。<sup>②</sup>林语堂在《论语》首期发刊词中描述他几个同事的个人吸烟习惯，说他们是现代的有怪癖的人：一个喜欢吕宋雪茄，一个喜欢烟斗，一个喜欢卷烟，还有一个不吸烟却专门为别人提供烟雾，等等。<sup>③</sup>歌颂烟草“嗜好”是非常规的怪癖，是想说明人们相信每个男性应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吸烟。他斟酌选定某个品牌，使他成为有所偏好的追求者，不是随波逐流的普罗大众消费者。

在传统中国文人学士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审美中，男性在一起吸烟，具有精神创造和高尚讨论的基调。林语堂和1930年代其他知识分子非常羡慕徐志摩（1897—1931）所说的英格兰的“抽烟主义”，他用这个词指热烈的辩论和讨论（伴随一根接一根地吸烟）。<sup>④</sup>遵循“休闲文学”风格创作的许多文章反映徐志摩对吸烟与精神生活关系的感受。<sup>⑤</sup>林语堂创办的杂志，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杂志一样，也包括了许多关于（世界和中国）卷烟和

---

① Charles Laughlin, *The Literature of Leisure and Chinese Modernit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p.124.

② Hilton, *Smoking in British Popular Culture*, pp. 17-20.

③ Laughlin, *The Literature of Leisure*, p. 114.

④ 徐志摩：《吸烟与文化》，《晨报副刊》，1926年1月10日，第21页。

⑤ Laughlin, *The Literature of Leisure*, p.127.



烟草使用的历史故事，与吸烟有关的趣闻轶事，以及欧洲和历史上海上吸烟名人的故事。用这种方式把烟草使用与知识和学识联系起来，不仅延续了烟草赏鉴的才子/文人传统，也使男性知识分子感到男性舒适地消费烟草是重要的合情合理行为，而如果女性这样做就会被贬低为轻浮、奢华。

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吸烟文化对民国时期视觉图像的影响在《良友》等大众画刊中比比皆是。《良友》面向的读者群是上海 101 的白领职员，他们中许多是城市“小市民”。该画刊包括许多照片集和漫画，其中卷烟有突出的角色。比如，幽默的《吸烟的姿势与性格》描绘吸烟者手持卷烟的多种姿势，每种姿势反映了他具有哪种独特性格（图 4.3）。<sup>①</sup> 另一个照片系列表现抽烟休息对现代办公室职员的重要性。<sup>②</sup> 一名年轻男职员一天从早到晚的 14 张照片按顺时针依次排列。这一圈照片的中央是一个机械钟，进一步强调办公室工作对这名男性的时间约束。他第一次吸烟休息是从办公室回家吃午饭，躺在安乐椅上，领结歪斜，人疲惫不堪。下午，他返回办公室，继续完成一天的工作。晚上，他又在家斜躺着，翘起二郎腿抽烟，这一次他把卷烟放在一支优雅的长烟嘴里抽吸。这个照片集表明，吸烟能使现代男性完善个人性（individuality），暂时带他远离竞争世界的压力，以便又能充满活力地回到公众面前。<sup>③</sup>

---

① 《良友》，第 155 期，1940 年 6 月，第 36 页。

② 《二十四小时之生活》，《良友》第 102 期，1935 年 2 月，第 40—41 页。

③ Hilton, *Smoking in British Popular Culture*, p. 21.



图 4.3 吸烟的姿势与性格。《良友》，第 155 期（1940 年 6 月），第 36 页。

《良友》、《申报》和民国时期其他报刊出现的许多烟草广告，同样宣告现代“新”男性的个人性：他们即便在吸烟，也是一种高级休闲，只有富到能欣赏“美好生活”的人才能享受。许多广告显示男性穿着晨袍吸烟（图 4.4）。<sup>①</sup>表面上看，这些图像让我们想到女性躺在扶手椅上吸烟的样子。<sup>②</sup>但是，独处的女性吸烟者常常摆出引发性想象的慵懒姿势，头往后仰着，眼睛微闭，双臂垂于体侧，或者抬起露出腋窝（图 4.5）。<sup>③</sup>一些图像甚至显示女性在床上吸烟（图 4.6）。<sup>④</sup>男性的形象与此不同，他们在椅子上坐

① 《申报》，1921 年 5 月 24 日，第 3 版。

② Weipin Tsai, *Reading Shenbao: Nationalism, Consumerism, and Individuality in China, 1919-37*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35-42.

③ 《申报》，1928 年 1 月 5 日，第 6 版。关于中国的图像中露出腋窝的性含义，见 Francesca Dal Lago, "Crossed Legs in 1930s Shanghai: How "Modern" the Modern Woman?" *East Asian History* 19 (June 2000): 103-44.

④ 《申报》，1928 年 2 月 23 日，第 7 版。

得笔直，吸烟时气定神闲。<sup>①</sup>而且，许多显示男性在家吸烟休闲的广告也包括妻子关爱地在一旁侍候丈夫的形象。比如 1928 年 5 月 105  
《申报》刊登的三星卷烟广告，一名体态肥硕的男性坐在宽大的扶手椅上吸烟，他妻子从内室往外看，看他是否需要照顾一下（图 4.7）。<sup>②</sup>这样的构图虽然显示了个人吸烟者的自主和个人选择，但是强化了男人主宰的性别层级关系。



图 4.4 吉士牌卷烟广告。《申报》，1921 年 5 月 24 日，第 3 版。

102

① 《申报》中有许多例子，比如 1935 年 5 月 19 日，第 1 版。

② 《申报》，1928 年 5 月 8 日，第 3 版。



103 图 4.5 美丽牌卷烟广告。《申报》，1928年1月5日，第6版。

香煙

美六麗牌



華成煙公司出品

煙香麗美伴清閨寒  
紅爐頰夢儂到櫺宵  
。燈。笑。。梅。擁  
底。底。底。底。底  
豕。豕。豕。豕。豕

（伴豕包）



图 4.6 美丽牌卷烟广告。《申报》，1928 年 2 月 24 日，第 7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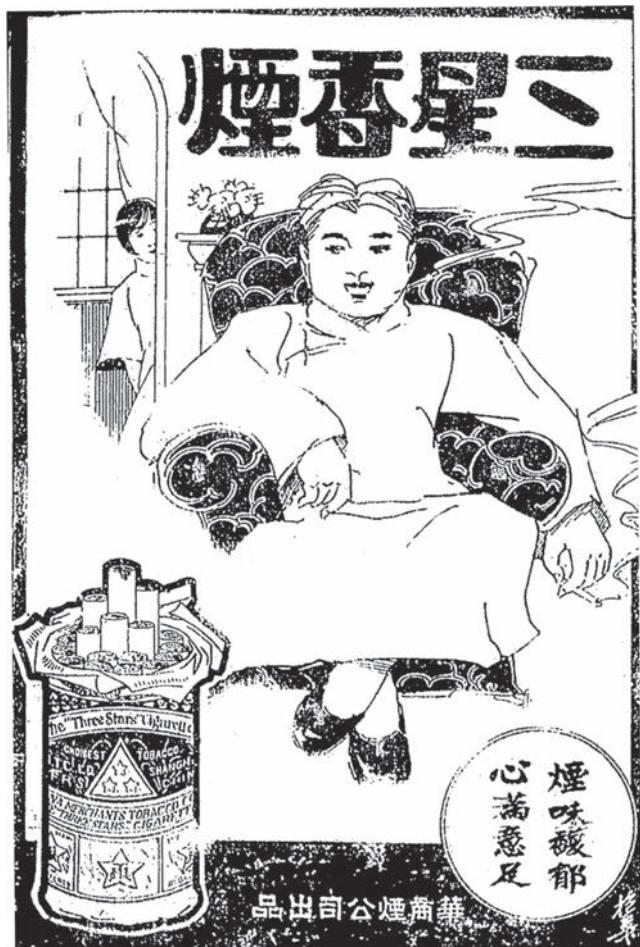


图 4.7 男人在家里悠闲地吸烟。三星卷烟广告。《申报》，1928年5月8日，第3版。

民国时期烟草业广告没有羞于显示女性与男性在亲密或浪漫的环境吸烟（图 4.8）。<sup>①</sup> 常常表现女性为男性点烟，表情十分暧昧。<sup>②</sup> 许多广告也显示男性和女性在半公开的场所社交、吸烟，比如餐馆、网球场、舞厅或酒店大堂。<sup>③</sup> 广告也显示男性和女性在聚会或婚礼上一起吸烟（图 4.9）。<sup>④</sup> 广告偶尔显示女性在大街上与男性一起吸烟（图 4.10）。<sup>⑤</sup> 但是，一般不显示女性和男性在工作场所一起吸烟。这样的形象仅限于男性之间社交吸烟。这段时期的广告屡屡显示男性吸烟创造的兄弟情谊。<sup>⑥</sup> 男性在咖啡馆一起吸烟，在去工作的路上一起吸烟，在办公室一起吸烟（图 4.11）。<sup>⑦</sup> 这些图像借鉴了好汉的男性形象，以及全球流行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对吸烟的规定，认为只有男性的社会场合是受尊重的绅士沉醉于吸烟习惯的唯一场所。

民国时期的图像把爱社交的“好汉”型吸烟者与在烟雾缭绕的房间讨论要事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想形象结合起来，但是，其他图像则把吸烟和灵感之间的传统“文人”相联系，与吸烟有利于增强工作表现的新观念联系起来。比如，1934年6月《良

---

① 《申报》，1928年1月17日，第1版。

② 比如《申报》，1934年5月25日，第1版的卷烟广告。

③ 参见 Shu-mei Shih 对这类图像的分析，“Shanghai Women of 1939: Visuality and the Limits of Feminine Modernity,” in Jason C. Kuo (ed.), *Visual Culture in Shanghai, 1850s-1930s* (Washington, DC: New Academia Press, 2007), pp. 213-18.

④ 《申报》，1928年3月6日，第1版。

⑤ 《申报》，1928年6月2日，第9版。

⑥ 比如《申报》，1935年5月3日，第6版；1929年11月7日，第8版。

⑦ 《申报》，1931年11月1日，第1版。

# 好運道香烟

## 申報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第五二七二號  
 本報地址：上海福州路  
 電話：二四四四  
 零售每份五分  
 廣告費另議  
 訂閱費另議  
 本報代售處：上海各書報社  
 外埠代售處：上海各書報社

美人審美  
 之天資最  
 香煙運道  
 所替許為  
 上等至美  
 之香煙好  
 運道之名  
 音從此可  
 知已

永通茂和昌新  
 永安先施麗華  
 永泰棧福和  
 中銀源及各大  
 煙店均有經售

華達煙草公司出品

每元二听  
 陰曆年內  
 贈送一張  
 牌一季

图 4.8 针对女性吸烟者的浪漫主题。好运气道卷烟广告。  
 《申报》，1928年1月27日，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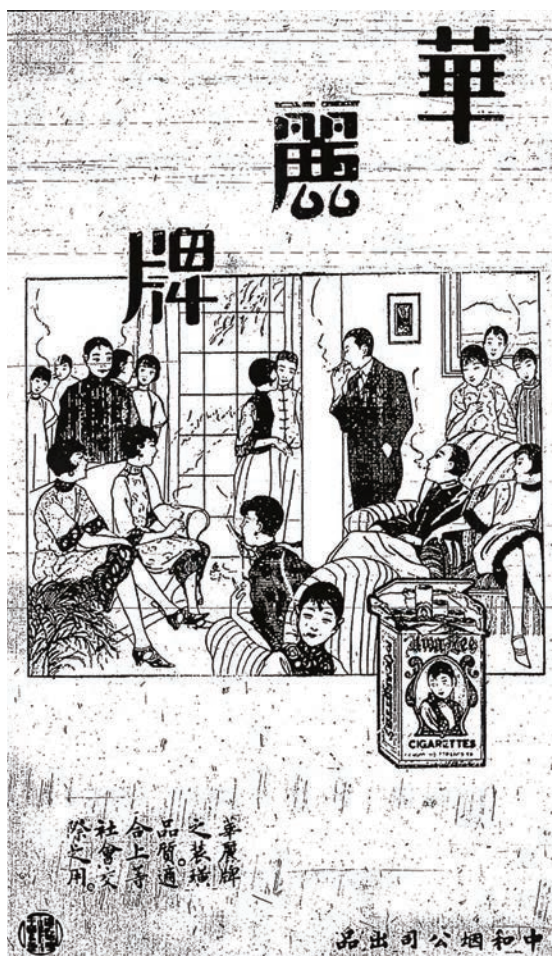


图 4.9 男性和女性聚会吸烟。华丽牌卷烟广告。  
《申报》，1928 年 3 月 6 日，第 1 版。



109

图 4.10 女性与男性在公共场合吸烟。美丽牌卷烟广告。  
《申报》，1928年6月2日，第9版。

友》刊登了一幅名为《杰作的完成》的漫画，描绘作家坐在桌前，显然为才思枯竭所困（图 4.12）。这个年轻人吸了许多支烟，一阵烟雾氤氲之后，他迅速完成了才思飞扬的作品。<sup>①</sup>烟草广告也把生产效率 and 吸烟联系起来。1928 年 7 月在《申报》反复刊登的金鼠牌卷烟的一则广告中，一名职员向另一名职员诉说自己上班老是犯困，后者递上一支烟说：“吸烟一枝”。最后一张图片显示犯困的职员精神百倍，手里夹着卷烟，手中的笔写个不停（图 4.13）。<sup>②</sup>



图 4.11 男性吃饭时吸烟交往。大英牌卷烟广告。  
《申报》，1931 年 11 月 1 日，第 1 版。

110

① 《良友》第 89 期，1934 年 6 月 15 日，第 35 页。

② 《申报》，1928 年 7 月 6 日，第 7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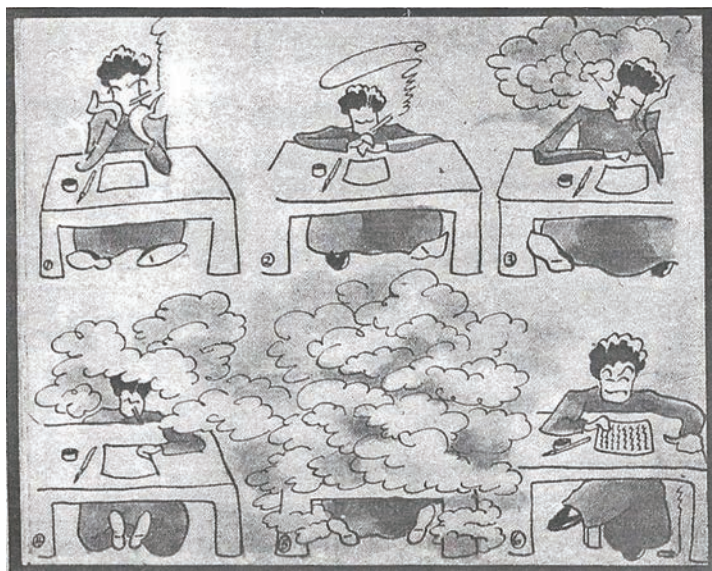


图 4.12 《杰作的完成》。《良友》，  
第 89 期（1934 年 6 月 15 日），第 25 页。

112 还有其他一些广告侧重表现男性身体的健康，而不是吸烟获得的思维敏锐。比如，顶尖运动员出现在华成烟草公司美丽牌卷烟广告中（图 4.14）。<sup>①</sup>英美烟草公司三炮台牌卷烟广告显示一名铁匠赤裸上身打铁，露出满是肌肉的躯干（图 4.15）。<sup>②</sup> Matthew Kohrman 指出，这类图像“用宣扬男性吸烟抵抗了那套将中国人贬为‘东亚病夫’的殖民话语，也即将中国人的身体形容为羸弱

① 《申报》，1934 年 5 月 4 日，第 1 版。

② 《申报》，1925 年 5 月 8 日，第 4 版。另一个例子是前门牌烟的广告，显示一位斗牛士，也是裸露上身到腰部，《申报》，1925 年 6 月 9 日，第 4 版。



图 4.13 吸烟增强工作表现。金鼠牌卷烟广告。  
《申报》，1928 年 7 月 6 日，第 7 页。

无力的政治话语。”<sup>①</sup> 这些广告利用更贴近“好汉”男子气概的肌肉发达的工人图像，而不是有修养的“才子”绅士形象，不仅利用  
114 了中国相对于西方和日本等国的国际地位的焦虑，也反映了至少在一些地方和一些职业人群中，吸烟已经成为劳动阶层文化的重要内容。



112 图 4.14 美丽牌卷烟广告。《申报》，1934 年 5 月 4 日，第 1 版。

① Matthew Kohrman, “Depoliticizing Tobacco’s Exceptionality: Male Sociality, Death, and Memory-Making among Chinese Cigarette Smokers,” *China Journal* 58 (July 2007): 100.

# 大炮台香烟



图 4.15 大炮台香烟广告。《申报》，1925 年 5 月 8 日，第 4 版。

## 1949年前后的男性吸烟：从资产阶级奢侈到 无产阶级愉悦

1949年以后，此前卷烟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联系虽然被削弱了，但是男性吸烟仍然是社会主义男子气概和现代性不可缺少的内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在公共场所，在官方批准的出版物中，男性吸烟者一直高度可见。1950年代报纸烟草广告不再出现吸烟者的形象，但是许多漫画和插画仍保留了吸烟者形象。1960、70年代的宣传画和画报常常表现吸烟的工人或抽旱烟的农民。当然，这样的表现形式经过了调整，以适应新的社会主义审美。民国时期男性吸烟的视觉文化是享受“美好生活”，新中国早期的视觉文化突出男性同志情谊、男性身体健康和男性权威的主题。早些年的视觉作品中暗中表现了每个非主流吸烟者的独特个性，但是解放后的视觉作品明显地把吸烟方式（卷烟或旱烟）与新形成的干部、工人或农民阶层相联系。1949年以后出版物中很少有年轻男性吸烟者，表明出现了之前几十年还不明显的对青少年吸烟的新的敏感。另外一个重要区别是，新中国早期视觉语言中完全没有女性吸烟者形象。不过，成熟男性吸烟，包括中国首要领导人吸烟，在1949到1978年整整三十年间都很常见。

1949之后的最初十年，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把所有烟草公司收归国有，把所有广告业务都整合为一个国有企



业。<sup>①</sup> 1950年代，烟草广告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进入60年代就消失了。5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烟草广告很简单，主要是文字，或者产品本身的图示。<sup>②</sup> 即便这些图示显示吸烟者，也无一例外是男性（绝不会是女性）。比如，1950年《上海市电话簿》一则烟草广告显示，社会主义新人去工厂上班，边走边得意洋洋地吸国际牌卷烟（图4.16）。<sup>③</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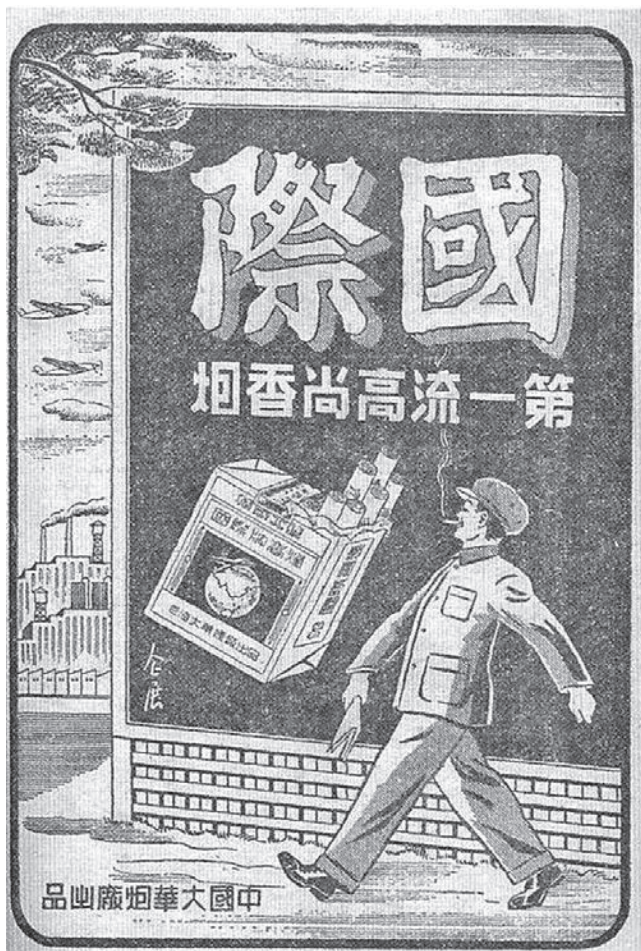
以图像呈现的烟草广告大量减少，并不意味着男性吸卷烟的图像就完全消失了。恰恰相反，新中国早期的多种视觉媒介中，都很容易找到男性吸烟者的形象，包括报纸漫画、宣传画、画刊。当然，对男性吸烟者的描绘在1949年之后有些不同。一方面，男性在家中安静躺着吸烟的形象几乎完全消失不见了。男人独自吸烟的时候，一般是与工作或生产活动相关的场景。比如，1973年刘志德著名的宣传画《老书记》表现一个村支书在体力劳动（打石头）后休息，一边学习，一边抽旱烟。<sup>④</sup> 1950年代的幽默漫画也显示男性在休息时吸烟，但是一般是在工作单位吸烟，不

① James Chu, "Advertising in China: Its Policy, Practice, and Evolution," *Journalism Quarterly* 59.1 (Spring 1982): 40-45, 91; Hong Cheng, "Advertising in China: A Socialist Experiment," in Katherine Toland Frith (ed.), *Advertising in Asia: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Consumption*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77.

② 例如《工人日报》，1951年1月1日，第7版，1951年6月15日，第2版的广告。

③ Andrew S Cahan, *Chinese Label Art* (Atglen, PA: Schiffer Publishing, 2006), p. 148.

④ 刘志德：《老书记》（1973），Stefan R. Landsberger Collecti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Amsterdam), call number: BG E27/321, <http://hdl.handle.net/10622/6CBBFA94-C913-44F5-AA3A-187C3F6ABBBF>.



115 图 4.16 1950 年《上海市电话簿》里的国际牌卷烟广告。Andrew S. Cahan, *Chinese Label Art* (Atglen, PA: Schiffer Publishing, 2006), p. 148.

是在家里。比如，1955年《工人日报》的一个漫画显示一名干部在公社阅览室看报纸。看完后，一边往外走，一边点上一支烟，阅览室里报刊一片狼藉（图4.17）。<sup>①</sup>在其他许多表现粗心大意或不负责官员的幽默漫画中，卷烟是重要的内容。比如一张漫画显示一名体形肥胖的干部张贴火灾风险警告，自己却还在吞云吐雾（图4.18）。<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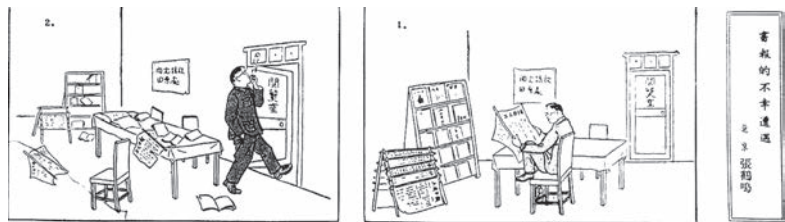


图 4.17 张鹤鸣，《书报的不幸遭遇》。《工人日报》，  
1955年1月30日，第4版。

116

很显然，1949年以后，没有男性与女性一起吸烟的形象，不管是亲密地在一起吸烟，还是其他场景，因为在新生的社会主义视觉文化中，不再把女性描绘成吸烟者。不过，与民国时期一样，显示男性经常一起吸烟，这与好汉的传统并无二致。他们不在咖啡馆或餐馆吸烟，而是在工作时吸烟。《工人日报》1954年刊登的一幅漫画表现了一名工人在会议室门口请求领导批示。领导责  
117  
备道：“你没看见天天开会，哪有时间管！”在他身后是烟雾缭绕

① 《工人日报》，1955年1月30日，第4版。

② 《工人日报》，1956年10月23日，第3版。

的房间，干部们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讨论（图 4.19）。<sup>①</sup> 报纸漫画不管是说教的还是幽默的，伏案工作的官员手里几乎都拿着卷烟，说明在办公室吸烟是完全可接受的行为。<sup>②</sup>《人民画报》是 1950



117 图 4.18 无题漫画，嘲讽粗心的官员自己一边吸着烟，一边张贴火灾安全警示。《工人日报》，1956 年 10 月 23 日，第 3 版。

① 《工人日报》，1954 年 7 月 4 日，第 3 版。

② 例如，《工人日报》，1952 年 1 月 3 日，第 3 版；1956 年 1 月 6 日，第 2 版；1956 年 7 月 29 日，第 3 版；1956 年 8 月 21 日，第 3 版。



休息间隙吸卷烟或旱烟放松（图 4.20）。<sup>①</sup> 另一幅关于吸烟和休闲主题的招贴画《雪夜春风》（1976 年），显示一家城市商店里商品琳琅满目，几个男人在桌子边一边阅读聊天，一边吸烟。<sup>②</sup>



119 图 4.20 郭志明，《侂队长》，1976 年。Stefan R. Landsberger 收藏，国际社史学院（阿姆斯特丹），典藏号：BG E15/93。http://hdl.handle.net/10622/B5BF7442-232C-4030-90FB-5F2FF14D61B6。

① 郭志明：《侂队长》（1976），Stefan R. Landsberger Collecti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Amsterdam), call number BG E15/93, <http://hdl.handle.net/10622/B5BF7442-232C-4030-90FB-5F2FF14D61B6>.

② 陆一飞、张桂铭、徐志文：《雪夜春风》（1976），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Amsterdam), call number BG E16/350, <http://hdl.handle.net/10622/9B624BEE-73F7-48DC-81F5-1DE4E8BEAD0D>. 另见 Stefan Landsberger's collection, <http://www.chineseposters.net/gallery/e15-98.php> (accessed August 28, 2016)

农民偶尔会表现为吸卷烟的样子，不过吸短杆旱烟的农村男性其实更为常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宣传画里，吸旱烟的老农民形象无处不在<sup>①</sup>，而吸卷烟的农民只是偶尔出现。卷烟一般是城里工厂工人吸的，比如1964年的宣传画《上海黄浦江的早晨》（图4.21）。<sup>②</sup>宣传画一般不表现人民解放军吸烟，但是有些也会表现士兵吸烟，比如1965年的宣传画《传授武艺》，显示一名年长的士兵吸卷烟，旁边是一名老农民吸旱烟（图4.22）。<sup>③</sup>有意思的是，这些图像显示的吸烟者总是比周围的人更成熟，表明在官方审批的出版物中，有针对代际和性别的规定。针对女性吸烟的社会禁令也进而包括受过教育的年轻男性，这在文革期间的文件和回忆录中有据可循。<sup>④</sup>

120

① 短杆旱烟袋1930年代出现，代表了农民群众的勤俭品德，参见 Benedict, *Golden-Silk Smoke*, pp. 189-95。

② 瞿昉：《上海黄浦江的早晨》（1964年），Jean-Yves Bajon Collecti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Amsterdam), call number BG E39/810, <http://hdl.handle.net/10622/2E05CE31-BA48-43FE-9726-3A7592F5F60B>。

③ 唐广铁，《传授武艺》（1965年），Stefan R. Landsberger Collecti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Amsterdam), call number: BG E15/558, <http://hdl.handle.net/10622/93B829D0-C90F-45FC-836E-1CFC78473F36>。

④ 比如，北京二十六中的红卫兵把吸烟列为“绝对不得养成”的坏习惯之一，命令35岁以下的立即戒烟戒酒。Michael Schoenhals, ed,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Not a Dinner Party* (Armonk, NY: M.E. Sharpe, 1996), p. 220. 当然，许多年轻男性还是学会了吸烟，尤其是上山下乡的男性。



119 图 4.21 瞿昉,《上海黄浦江的早晨》,1964年。Jean-Yves Bajan 收藏,国际社史学院(阿姆斯特丹),典藏号:BG E39/810。http://hdl.handle.net/10622/2E05CE31-BA48-43FE-9726-3A7592F5F60B。

成年吸烟者,尤其是权威人物就不同了。毛泽东手持卷烟或吸卷烟的许多形象最能反映男性气概和男性权力之间的联系(图 4.23)。<sup>①</sup>其他作品,比如根据刘文西 1972 年的《延安新春》画作改编的宣传画,显示毛泽东与人民代表一起吸烟,富有人情味(图 4.24)。<sup>②</sup>这种迎合平民主义敏感心理的另一个例子是 1970 年

① Lincoln Cushing and Ann Tompkins, *Chinese Posters: Art from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Books, 2007), p.124.

② 刘文西:《延安新春》(1972年), Stefan R. Landsberger Collecti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Amsterdam), call number BG E3/713, http://hdl.handle.net/10622/2220B9A5-0300-4DCC-AA52-9AA68700AA86.



代早期的《知心话》，表现毛泽东一边吸卷烟，一边与吸旱烟的农民和蔼地聊天（图 4.25）。<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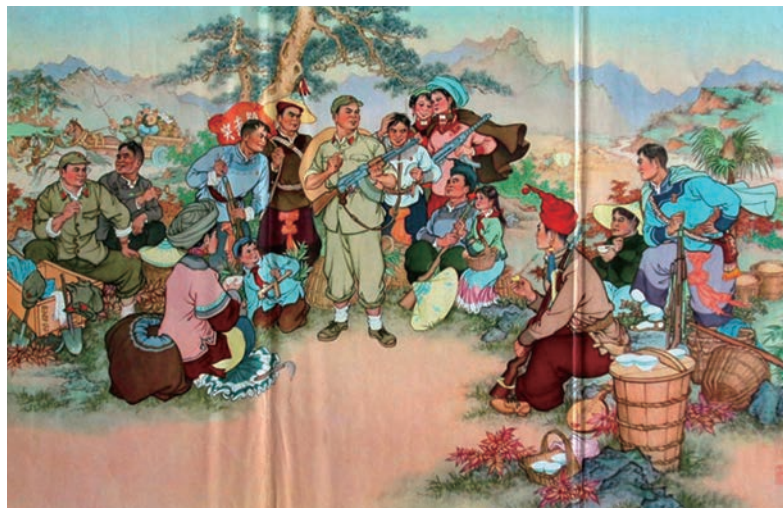


图 4.22 唐广铁，《传授武艺》，1965 年。Stefan R. Landsberger 收藏，120  
国际社史学院（阿姆斯特丹），典藏号：BG E15/558。http://hdl.handle.  
net/10622/93B829Do-C90F-45FC-836E-1CFC78473F36  
（2016 年 8 月 28 日登录访问）。

① 刘文西：《知心话》（1972 年），Stefan R. Landsberger Collecti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Amsterdam), call number: BG E13/125, <http://hdl.handle.net/10622/98C6BAF0-D613-4667-BD34-45EE0397C9E4>. See also Stefan R. Landsberger's collection at <http://chineseposters.net/posters/e13-125.php> (accessed August 28, 2016).



- 121 图 4.23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 万万岁!》，1967 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7 年。Lincoln Cushing and Ann Tompkins, *Chinese Posters: Art from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Books, 2007), p. 124.



图 4.24 刘文西,《延安新春》,1972年。Stefan R. Landsberger 收藏, 122  
国际社会史学院(阿姆斯特丹),典藏号 BG E3/713。<http://hdl.handle.net/10622/2220B9A5-0300-4DCC-AA52-9AA68700AA86>。



123 图 4.25 刘文西,《知心话》,1972年。Stefan R. Landsberger 收藏,国际社会学史学院(阿姆斯特丹),典藏号 BG E13/125。http://hdl.handle.net/10622/98C6BAF0-D613-4667-BD34-45EE0397C9E4。

123 毛泽东的许多图像描绘他与农民或工人一起吸烟,让人们想起广交朋友的好汉形象,也有其他一些图像让人们联想到才子/文人,将吸烟与学者成就联系起来。1972年宣传画《一定要根治海河》中,毛泽东站在桌前,面前是刚写完的一副卷轴书法作品(图 4.26)。<sup>①</sup>桌子上摆放着学者工作所需的物品:毛笔、墨汁砚台、茶杯、烟灰缸。毛泽东坚毅地望着前方,左手夹着卷烟。毛泽东的照片,比如表现他身穿睡袍一边吸烟一边读报的照片,也

---

① 费正:《一定要根治海河》(1972年)(毛泽东1963年11月发表讲话),Stefan R. Landsberger Collecti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Amsterdam), call number: BG E12/740, http://hdl.handle.net/10622/7A1C3493-BFC1-4E7E-BDFC-7A5FEE3A635F.

延续了伟大的舵手本人更完善的男性气概与吸烟之间的联系。这张照片也是新中国早期反映男性（此处是毛主席）悠闲姿势吸烟的罕见形象，让人们想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家一边吸烟一边放松享受美好生活的情景。<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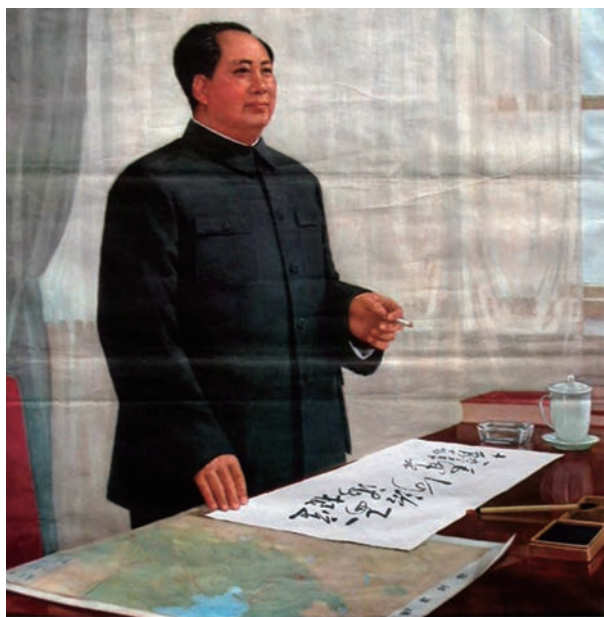


图 4.26 费正，《一定要根治海河》，1972 年。（毛泽东 1963 年 11 月的讲话。）Stefan R. Landsberger 收藏，国际社会史学院（阿姆斯特丹），典藏号 BG E12/740。<http://hdl.handle.net/10622/7A1C3493-BFC1-4E7E-BDFC-7A5FEE3A635F>。 124

① See Getty image of Mao Zedong smoking that accompanies Martin Patience, “China to Ban Smoking in Public Places,” BBC News, March 24, 2011.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pacific-12844671> (accessed August 28, 2016)

## 结 论

125 视觉文化对塑造中国 20 世纪两性吸烟行为的模式起到重要影响。当然，不管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人们吸旱烟或卷烟的形象都无处不在，并不是这些视觉形象催使中国人吸烟。在印刷技术实现这些图像的大规模印刷流通前，烟草使用就早已在中国社会深深扎根了。但是，视觉文化的确帮助使吸烟常态化，让人们更相信该行为是普通、受尊重和日常生活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对吸烟者形象进行审查，或者从视觉领域直接消除对人们吸烟的表现，视觉文化也成功地用于使吸烟“去常态化”。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缔约国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内在逻辑。

20 世纪早期，中国女性吸烟者在视觉文化中的呈现有了转变，可以说既促进了 1920、30 年代女性吸卷烟增加，也促进了 1940、50 年代女性吸烟率骤减。在 20 世纪的最初二十年，这些图像使女性吸烟在公众场所吸烟受到尊重，中国新女性以沉迷消费的摩登女郎形象（曾主宰 1930、40 年代烟草广告的审美）深入社会各个角落，长期来看实际上弱化而不是增强了女性吸烟受到的尊重。新中国成立之初，女性吸烟被视为“资产阶级”或“腐败堕落”，结果，女性吸烟者的形象几乎完全消失了，除非是作为负面角色模型。女性吸烟形象变得稀少，其影响应该很深远，当

真的有女性在公共场合吸烟时，一定很让人惊讶。<sup>①</sup>

虽然 1949 年之后女性吸烟成了资产阶级堕落的代名词，但是对于男性来说，吸烟完全可接受。新中国早期的视觉文化呈现吸烟完全是正常的行为，巩固了吸烟和男性气概之间长久存在的联系，尽管新的革命审美对其社会和文化意义做了调整。20 世纪前五十年，男性吸烟与优雅品味、特殊习惯和资深品鉴相关，解放后，男性吸烟作为一种新的中国男人的标志，更接近好汉的理想模式，126而不是学者型才子 / 文人模式。在民国时期，吸卷烟首先是一种优雅消费，目的是展示一个人的个性，而在 1949 年之后，男性吸烟图像显示的主流性别理想是好汉型，对同志（并延伸至国家）忠诚，反映在一起吸卷烟的简单的无产阶级乐趣。不过，在中国领导人的形象中也一直存在才子 / 文人理想，尤其是显示毛主席一边吸烟，一边阅读、写作等脑力劳动或在家放松。毛主席身穿晨袍吸烟的照片十分罕见，是民国时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吸烟文化在新中国图像中的昙花一现。

不论具体是哪种比喻，吸烟与男性气概之间的联系已经存在很久，1949 年以后经官方宣传的准许，一直深深扎根于社会，似乎无可动摇。1970 年代末中国恢复了商业广告以后，烟草公司在向中国男性推广卷烟时，需要诉诸吸烟的文化意义和视觉图像，这方面他们可以借鉴一个不曾中断的丰富传统。20 世纪一直都持续存在的主题，尤其是吸烟对男性社交的重要性，在 1980 年代的

---

① 李兰妮：《看女人吸烟》，见杨国安选编：《烟事闲趣》，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95—397 页。

卷烟广告中迅速再次出现。<sup>①</sup>肌肉型好汉气概也存在，比如 Philip Morris 公司从 1990 年到 1997 年的中国农历新年在电视上播放的精心制作的万宝路广告，以及 2001 年祝贺中国赢得 2008 年奥运会主办权的广告。这些广告展示勇猛的男性列成方阵敲出激昂的鼓声（万宝路男性广告中使用的《七侠荡寇志》主题曲），在高山长河之中，展示一只手臂挥舞巨大红旗或者高举红旗的形象。根据 1991 年实施的中国法规，禁止直接提及卷烟或者展示人们吸烟，因此这些广告最后只是出现这样的词句“万宝路祝您新年快乐”。<sup>②</sup>广告想表达的信息当然明白无误：吸万宝路烟，让你很有男人味。

这一章强调了视觉图像的连续性有助于维持吸烟是中国男性常态化行为的观念。吸烟与中国好汉男子气概和男性社交之间的持续联系，以及 1978 年后再次出现的吸烟与“美好生活”的联系，基本可以解释过去三十年为什么中国男性吸烟率如此之高。不过，有必要认识到中国男性气概就像每个地方的性别建构一样，不是固定、一成不变的。虽然传统的好汉和才子/文人比喻在当代中国依然有共鸣，中国男性在日常生活中有多种多样的男性气概。人类学家 Derek Hird 指出，把复杂的中国男性气概简单地归结为文武两端，就是忽视了“性别构建必定是混合物，尤其是在

---

① Michael H. Anderson, *Madison Avenue in Asia: Politics and Transnational Advertising* (Rutherford, NJ: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9.

② Nan Zhou and Russell W. Belk, "Chinese Consumer Readings of Global and Local Advertising Appeals," *Journal of Advertising* 33.3 (Fall 2004):71.



当今全球化的世界。”<sup>①</sup>而且，性别理想和规范是动态的，就像 20 世纪女性吸烟率的巨大变化一样，吸烟行为也会变化。做一个中国男人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吸卷烟。2007 年 Derek Hird 在北京对中国白领男性的田野调查发现，在那些认为自己特别见多识广、社交练达的男性中，关注健康，包括不吸烟，正成为新的男性理想特征。<sup>②</sup>

现在一些白领男性认为不吸烟比以一支接一支吸烟来表现的粗野、好斗型男性气概更胜一筹，受篇幅所限，这篇文章对其中原因不做深究。不过，我们可以猜测，过去二十年中国政府对烟草广告的限制导致视觉领域变化，对改变态度起到了重要作用。1991 年以来，禁止出现有人吸卷烟图像的规定执行得越来越严格。<sup>③</sup>2013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要求政府官员不得在公开场合吸烟，树立积极的榜样。中国领导人不再被拍到吸烟也是重要一步。近些年，政府规定禁止在电影电视节目中展示卷烟品牌或间接广告，不过，为确保吸烟不再是符合男性

---

① Derek Hird. "White-collar Men and Masculinity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2009), p. 36.

② 同上，p. 182. 另见 Geng Song and Derek Hird, *Men and Masculinit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Leiden: Brill, 2014), pp. 194-97.

③ Zhihong Gao and Sion Kim, "Advertising Law and Regulation in China in Hong Cheng and Kara Chan (eds), *Advertising and Chinese Society: Impacts and Issues* (Copenhagen: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9), p. 151.

规范的做法，还需要做更多工作。<sup>①</sup> 只有当大多数中国男性开始认识到吸烟不是受尊重的行为，才会打破烟草使用与男性气概之间的强大联系，就像半个多世纪以前中国女性所经历的那样。看看过去一个世纪，表现男性吸烟者的正面形象如何无处不在，明白历史上中国视觉文化如何促进了男性吸烟，不管是通过广告直接促进还是通过宣传间接促进，都有助于实现这一转变。

---

① Lin Li and Hua- Hie Yong. "Tobacco Advertising on the Street in Kunming, China," *Tobacco Control* 18.1 (February 2009): 63; Tingzhong Yang et al "Tobacco Advertising, Environmental Smoking Bans, and Smoking in Chinese Urban Areas," *Drug and Alcohol Dependence* 124.1-2 (July 2012), doi:10.1016/j.drugalcdep.2011.12.02; and Dan Xiao et 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in China: An Arduous and Long-Term Task," *Cancer* 121, Suppl 17 (September 1, 2015): 3061-68.

## 第五章

### 守护员工伦理：中国烟草博物馆在慢性暴力中自我陶醉

Matthew Kohrman

中国当前的建设热潮常常受到批评，新，但是抹去了历史，<sup>133</sup>但至少有一种构建记忆的设施成效显著。过去十年，中国建起了几百座新的博物馆。<sup>①</sup>其中一座位于上海市中心的长阳路，它看起来显然不伦不类，从外观看更像在墨西哥而不是中国。第一次经过这里，行人可能恍惚以为看到了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上著名景点城堡金字塔的复制品。这座建筑环绕着结实的没有窗户的灰色墙壁，硕大的外部石梯攀援而上，有象形文字一样的雕刻，还有图腾柱，简直就是玛雅圣庙的翻版。

这座建筑是中国烟草博物馆，2004年建成开放。它是全世界

---

<sup>①</sup> Xinhua, "Reviving Cultural Power of China's Museums," People's Daily online, November 29, 2012.

最大的专门为卷烟设立的博物馆。要知道，20世纪卷烟成为流通最广、消费最多、受到批评也最多的商品。<sup>①</sup>不过，中国烟草博物馆不仅是向卷烟致敬的地方。我认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技术，<sup>②</sup>作为一个建筑，为烟草业员工提供反思和道德慰藉的场所。

我在本文中使用的阐述方式同样也是反身性的（reflexive），以下对研究对象博物馆的呈现就像一次导游参观。我将带你从一个展览馆逛到另一个展览馆，指出博物馆向其目标受众传播伦理道德观的方式。随着我们游览这座博物馆，我将详细说明布展人如何利用各种主题，培养中国烟草业劳动者队伍的个人品德和自

- 
- ① 在英语学术界，Shanta Varma et al. “China: Tobacco Museum’s ‘Smoky’ Health Information,” *Tobacco Control* 14, no. 1 (2005): 4-5, 以及 Fan Wang et al., “The Museum as a Platform for Tobacco Promotion in China,” *Tobacco Control* (2014), <http://dx.doi.org/10.1136/tobaccocontrol-2014-051633>, 已经讨论过中国烟草博物馆。这些开创性但较简短的研究没有提到该博物馆在烟草业员工中培养伦理意义感的制度性使命。在北美学术界，已经有人讨论过各地的烟草博物馆，Peter Benson, *Tobacco Capitalism: Growers,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Changing Face of a Global Indust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6-7, 95-97; 还有人讨论过另一种形式的烟草业制造记忆的方式，Evan P. Bennett, “Dubious Heritage: Tobacco, History, and the Perils of Remembering the Rural Past,” *Agricultural History* 86, no. 2 (2012): 23-40. 专门为烟草制造业建立的博物馆在欧洲及全球各地都有，包括古巴、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日本等。
- ② Michael Foucault,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 ed. Luther H. Martin, Huck Gutman, and Patrick H. Hutton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8).

我慰藉。<sup>①</sup>

在我们的参观开始前，我先说一下研究方法。这也是反身性的体现。在过去十年里，我的田野研究经常将我带到中国西南部云南省，但也包括其他地方研究，比如出差去上海。迄今为止，我在烟草博物馆里总共度过了20多个小时，看展览，与人聊天，对各种展品拍照。我第一次去参观时，复旦大学的一位同事安排我与博物馆的主任们见面。他们热情地与我握手欢迎我，带我进他们的办公室和图书馆，开始谈到长期合作，还赠送我目录和其他背景信息等礼物。不过，这样的热情到了当天晚上就结束了，一位博物馆经理在互联网上搜索了我的学术记录，发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之前资助过我，我在出版物中对烟草业公开作出有倾向性的评价。复旦大学的同事解释说，这些发现让他们最初的热

---

① 烟草工业以及烟草业员工如何认识他们自己及其工作，我对这两者之间关系的分析有别于此前两个在美国语境下的研究。Roger Rosenblatt, "How Do Tobacco Executives Live with Themselve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rch 20, 1994, 根据访谈记录，指出烟草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实际用的最多的机制还是心理上的否认、升华、合理化，这些机制会因为烟草工业所做的诸如企业责任支出之类的努力而更容易实现。Proctor 通过研究企业档案，记录了20世纪后期烟草公司是如何发展出一套话语程序，来鼓励并且管制其北美员工的无知，他称这类话语程序为“内在的比较无知学”，见 Robert Proctor, *Golden Holocaust: Origins of the Cigarette Catastrophe and the Case for Aboli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292-99。与之相比较，我的讨论沿着福柯“自我技术”的思路推进，讨论的是一个由中国烟草总公司的各个分公司合力建造的机构，这个机构如何赋予其员工一套基于历史叙述的伦理框架，鼓励他们将自己想象成为了荣耀的使命做出重要贡献的良善之人。

情戛然而止。我真诚的学术伦理，也可以说我的职业道德，与博物馆要培养的伦理道德相差太大。这层关系突然停止，让我后续去这座建筑物参观时少了拖累。我故意间隔几个月才去参观，也不事先通知，于是我在展馆度过的时光十分愉快且无人干扰。

\* \* \*

今天的上海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博物馆供人们选择。任何人第一次迈进中国烟草博物馆，都很容易觉得它不过是直言不讳的公关项目，展示工业辉煌和产品类别，富裕的国营企业支撑起卷烟这一广受诟病的主打产品的社会地位。对烟草业来说，就好比现金流管道越来越粗，但是管道下面却是流动的沙。中国过去五十年，卷烟制造和销售迅猛增长，2015年一年的利税超过1700亿美元，基本上没有任何外国竞争介入。<sup>①</sup>妨碍这个巨无霸的是持续不断的新的市场不确定性和伦理波动。最大的波动因素是烟草烟雾有毒的证据，而且中国卫生倡导机构和人士近期与全球卫生项目的合作也将卷烟重新定义为高度致病的产品。市场不确定性有许多，包括越来越多中国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健康风险，以及党和国家努力重组国内卷烟制造。从1990年代开始，中央政府推动因各省保护主义割裂的国营卷烟行业合并产能，形成几

---

① “Tobacco Sector Contributes More to China’s Revenue, Xinhua, January 15, 2016,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6-01/15/c\\_135013454.htm](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6-01/15/c_135013454.htm).”

个卷烟大品牌。市场变化也包括规则变化，尤其是广告方面。<sup>①</sup>

中国国内烟草业通过各种方式应对所有这些不确定性和起起伏伏，包括通过大众媒体。区域性的制造商聘请了营销专家设计新颖的信息传播平台，绕过对烟草广告的新限制，促进对卷烟的总体尊敬，尤其是对中国品牌（“中华”、“云烟”、“熊猫”等众多品牌）。这些公关努力的受众远不止每天吸烟的3亿多中国人，而是全国不吸烟的大多数。<sup>②</sup>烟草业对这个大多数群体，尤其是比较年轻的成员满怀期待，期待他们开始吸烟，作为替代消费者，接替因死亡和疾病失去的消费者，至少希望他们未来能容忍别人吸烟。不过，对吸烟的容忍还不稳固。甚至中国主流媒体也经常报道卷烟现在每年夺去一百多万人的生命，如果目前的吸烟率持续下去，到2030年，死亡人数会再增加两倍。<sup>③</sup>

所以，我2011年第一次参观位于上海的中国烟草博物馆时，我很快就以为我走入了烟草业为了促销它的“摇钱树”卷烟搞的

---

① 要考虑到在1949年到1970年代末之间，中国很少能看到卷烟广告（或者说任何产品的广告）。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的二十年里，中国开始看上去像20世纪初的样子，各种品牌的卷烟广告在全国铺天盖地。参见 Sherman 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Sino-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 1890-193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30-34. 不过，1990年代以后，又颁布了许多禁止各种类型的卷烟广告以及要求烟盒上有警示标签的新规定。

② 现在，超过97%的中国女性以及约半数中国男性不经常吸烟，不过他们中许多人经常暴露在二手烟中。Qiang Li, Jason Hsia, and Gonghuan Yang, “Prevalence of Smoking in China in 2010,”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64, no. 25 (2011): 2469.

③ “Experts Raise Estimate of Death Caused by Tobacco-Related Illness in China,” *People's Daily online*, January 6, 2011, <http://en.people.cn/90001/9078290880/7252785.html>.

又一个愚笨的公关招数。去过几次之后，我也以为这个博物馆花费不菲，但是收效甚微。因为如果衡量博物馆成功的指标是鼓励普罗大众继续把吸烟视为值得称赞的习惯（而不是受国家认可的致病原因），就需要大量人群进入这个建筑物观看。但是，几乎每次我去参观，这个地方空旷得就像一座鬼城。即使是上海最炎热的日子，允许免费参观，空调凉风习习，也没能吸引多少人离开街头走进这座建筑。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烟草博物馆现在每周只开放两天给没有预约的参观者。

136 不过，我后来理解了，建这座博物馆绝不是为了任何想象中的普通公众，而是针对一小群中国公民，包括监管这座博物馆建设的人。博物馆是为了最常来观看这些展馆的人，他们通常组团而来，有时为了他们观看，还暂停对公众开放。它的目标受众是烟草业中那些以男性为主、受过良好教育、在城市工作的从业者，包括工厂一线工人、经理、研究人员、营销人员、会计、供应链人员和技术员等。在这个机构的成立文件中说得明白，比如，博物馆监管机构国家烟草专卖局前局长姜成康在祝贺博物馆建成开放时强调：“博物馆是沟通的窗口和平台，促进对行业的了解……加强行业职工对自身的认识。”<sup>①</sup>

换言之，上海的这座烟草博物馆是烟草业员工自我升华的宏大工程。用福柯式术语说，它本身就是一项技术，把实践和逻辑结合在一起，一群个体向自己呈现对自我伦理的理解。不过，与

---

① Wang Chuanqing, *China Tobacco Museum Album (Zhongguo yancao bowuguan huace)* (Shanghai: Shanghai Tobacco Industry Press, 2004), pp. i-ii.



福柯创造“自我技术”一词时描述的“道德手册”不同，我们要参观的是道德博物馆，在人民共和国政体内由一群神秘的人为自己设计的一座建筑。<sup>①</sup>

世界上许多地方有某个行业为本行业建造的博物馆。<sup>②</sup> 中国烟草业有许多特点，首先是规模大。按照现在的统计，中国烟草业每年生产超过 250 万亿支卷烟，占全世界卷制烟草制品总产量的 40% 以上。除了自动化以外，大批劳动人员需要供应卷烟供应链。需要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按照政府固定价格种植和采摘烟叶）。还有约 50 万非农业工人，包括：采购、烤烟、工厂一线人员，还有研究从物流到生物化学、工程、财务、法律、管理、医药、保险、运输、营销、会计等方面的各种专家。

当然，与其他行业相比，烟草行业员工待遇优厚。<sup>③</sup> 过去 50 年，他们的工资和奖金令其他工业行业羡慕不已。从 2000 年开始，他们开始获得额外的福利。随着外国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商业逻辑进入中国，与毛泽东时代对劳动光荣和忠于党的教育相结合，烟草业工作人员获得新型的员工自我提升服务。比如，在中 137

---

① Foucault,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21

② 世界上有许多自我标榜的工业博物馆，比如阿根廷的国家石油博物馆，马来西亚的自然橡胶博物馆，密歇根的钢铁工业博物馆，中国的化工博物馆，以及法国的飞行器博物馆（在空客飞机工厂旁边）。

③ 我有位住在昆明的熟人提供了一些中国西南地区收入的信息。昆明一家卷烟厂生产车间里工龄两年的正式工人每年的税前收入大约是人民币 20 万，约合 33,400 美元。与之相比，昆明钢铁厂（也是家国有企业）生产车间里工龄四年的正式工人，每年的收入大约是 10,000 美元。五年工龄的昆明市政府初级公务员，税前收入大约是每年 13,400 美元。

国西南部，员工现在可以获得新设立的心理咨询服务，帮助缓解精神压力。<sup>①</sup> 中国烟草博物馆也是一项类似的努力。它提供了烟草业人员继续教育的“洗礼盆”，是烟草业工作人员的成人资源中心（adult resource center），为他们提供主要是精神上的而不是物质上的额外福利。博物馆最关注的是帮助下属员工把自己看作道德上有追求、有较高上进心的人，能抗拒行为不当、腐败和自我怀疑等诱惑。

过去十年，我与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不同行业或部门的几十个人交谈过，他们有的就职于当地专卖局，有的在企业工作。这些人有时候很坦率，有时候对卷烟带来的危险不屑一顾。但是，不管他们对烟草毒性持什么观点，他们给我的大体印象是他们自认为是正派的好人，他们参与生产的产品对国家和社会都有重要价值。许多媒体评论者批评烟草业唯利是图、恶毒，甚至谋杀，当我进一步询问这些烟草业人士，迫使他们维护自己的行业时，他们都会回复说，虽然常规的烟草燃烧本身固有一些问题，但是他们认为自己是正在为一些相互联系的更崇高事业做贡献，包括通过科技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安全更愉悦的选择，建设更强大更现代的国家，为党和国家在当地和全国的战略优先项目提供资金等等。

中国烟草博物馆如何从各个角度增强这一自我理解？博物馆

---

① Li Zhang, “The Rise of Therapeutic Governing in Post-Socialist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Chicago, April 12, 2013

具体采用了什么布展策略，支撑起职业上的这种主观认识？

在这一章，我将提供中国烟草博物馆的导览，介绍展馆设计者推动烟草业员工自我道德教育的方式。<sup>①</sup>我将从一个展览馆逛到另一个展览馆，展示博物馆如何用特定的布展主题将行业史塑造成一个道德纪元，将烟草业从业者塑造成不只是制造消费品的生产者。我尤其注意到，在这些展馆内，博物馆反复描述史料的来源是历史的实际参与者，他们不仅有照片，还有名有姓。这种具体到人的呈现策略，在中国并不鲜见。毛泽东时代的宣传工作者早就树立了模范工人形象，有名字，有照片。此处新颖的是这种人物具象化的方法现在用于激起肯定自我价值的感觉，在烟草作为一种消费品的正当性受到生物政治（biopolitical）挑战时，维系对烟草行业的忠诚。

138

---

① 此处说明一下，以我的理解，“自我技术”和“自我伦理”这两个相互关联但并不是一个意思。自我技术是某些话语和实质上的项目，设计它们的目的是为了在参与社会生活诸领域（有时是非常特别的领域，有时更宽泛）的日常行动者中产生伦理。我的想法受到福柯的启发，在其中伦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正如 Bob Robinson 解释的（“Michel Foucault: Ethics,” *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2015, ISSN 2161-0002, <http://www.iep.utm.edu/fouc-eth/>），在福柯笔下，伦理涉及“就自我的道德能动性而言的，自我和它本身的关系。更具体地说，伦理代表了个体对它自己有意识做的事，为了让它自己服从一系列对行为的伦理建议，结果使这一自我形塑的行为或者说‘主体化（subjectivation）’形成了它自己的道德存在。”

## 博物馆的背景，游览之始

对博物馆的正式规划从 1980 年代末开始，十年后，中国国务院批准建设。当时倡导建设一座烟草博物馆的是政府的一个新部门——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它 1980 年代初成立，监督管理全国的卷烟生产和销售。国家烟草局领导人不仅倡导建设国家博物馆，还安排各级烟草专卖局为博物馆出资。上海烟草局在与昆明市的竞争中获胜，成为博物馆所在地，因此上海局和上海卷烟厂出资超过建设成本的一半。其他一百个地方局和国家局管理的许多卷烟厂也贡献资金。上海市以外的机构出资共计 1.8 亿元（2300 万美元）以上，云南省卷烟厂和烟草局遥遥领先，提供 2000 万元。海南等烟草生产无足轻重的省份出资只有 10 万元。西藏没有提供任何资金。博物馆 2004 年夏天建成开放，位于上海卷烟厂对面，1949 年之前这里是英美烟草公司一家工厂所在地。<sup>①</sup>在这个企业自我庆祝的新灯塔中，展览空间占据了一到三楼和一部分地下室，四五两层是行政管理办公室和图书馆。

\* \* \*

在任何地方进入一家博物馆，总少不了接受观念和身体的管理。中国烟草博物馆也不例外。我每次去参观，都需要在正门出

---

<sup>①</sup> 关于对英美烟公司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经营的历史，参见 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示身份证件、签到。门卫指示参观者径直走上外部楼梯，沿着石壁上雕刻的表现劳苦无产阶级手持扳手和革命旗帜的社会主义表现派形象，从楼梯顶层第三层进入博物馆。在楼梯的顶点，石壁最后是两个三米高的工人操作卷烟机，头顶上鸽子盘旋。进入博物馆后，参观者要步行穿过每一层的展览空间，一层一层走向下观看。每进入或离开一个展览空间，头顶的灯光自动开启或关闭。坐在中控室的保安通过闭路电视监控器注视参观者，通过广播系统批评任何违反行为（比如触摸展示柜或使用闪光灯照相）。139

这个受管理的环境一直在传达数个说法或主题。这是我此处要提供的导览的组织框架。我将逐个为你介绍对这些主题的解说。

### 主题 1：卷烟本来是外国产品，但很快进入“本土化”的过程

在博物馆内看任何东西前，参观者必须首先穿过三楼的一个大型圆形入口通道，在这个地方让参观者了解中国吸收外部事物和本土化的能力。入口通道有整面墙的金叶墙画，表现广为人知的中国本土景观如天安门城楼、乐山佛像、上海当代天际线、西藏拉萨著名的布达拉宫等等。

穿过入口通道，真人大小的美国土著人模型欢迎参观者进入灯光暗淡的房间，周围是表现烟草起源于美洲、跨越大洋传播的展示。参观者周围是黑白色调、鹅卵石地面和原木展示框。地图解释烟草离开美洲的传播路线，17世纪到达亚洲，以及在传统中国的传播。图像描绘中国不同的反应，包括明朝的敌视、清朝的赞美、公众种植烟叶的努力等等。

再走过几米，就来到展览的核心：制造现代卷烟。尽管烟草250多年前引入亚洲，当时还没有发明卷烟机，<sup>①</sup>博物馆的设计者最感兴趣的还是卷烟时代。最初几个展览墙壁表现卷烟和卷烟的批量生产。首先是在清朝末年，一开始是舶来品，所以人们既怀疑又着迷。这里早期的卷烟生产主要通过黑白照片展示，包括：140 英裔美国商人；外国人设计、出资和管理的工厂；在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组装线上辛苦劳作、破衣烂衫的中国人。这些照片传达的困难，不是因为制造有害的商品（比如害人的鸦片），而是能力欠缺的当地人民面临的困难，他们还没有能力管理现代机器，还没有能力不受外国影响运营卷烟厂。

## 主题 2：卷烟本土化是因为中国爱国者开展的令人自豪的行动

博物馆有数个展室从视觉上褒奖曾经属于外国产品如何成为本土化的商品。着重介绍的是明显属于“中国人”的努力和工作的场所，他们的行动令人自豪、积极主动。而且领导者都是男人，几乎没有例外。

在一个展室里，我们看到颐中烟厂工作车间按实际大小的复制品，领班在车间里主导各项事务。旁边一组照片显示 1926 年创建的两家企业：福新烟草公司和民风公司（中国国内第一家烟纸制造商）。一些照片是建筑物外观，另一些是穿着得体的当地工作

---

<sup>①</sup> Carol Benedict, *Golden-Silk Smoke: A History of Tobacco in China, 1550-201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人员管理公司的大型机器运转。民丰公司的共同创始人金润庠和竺梅先的肖像也摆在显著位置。

下一面墙的标题是“烟草业的爱国反帝活动”。20世纪初，中国消费者可选择多种卷烟，一张说明牌解释说：“爱国牌广受欢迎”。在旁边，一份报纸剪报描述1919年上海600名烟草工人参加五四运动大罢工，这场民族主义运动中诞生了中国爱国君子，要中国民族主义而不是封建和外国敌人。同样摆在显著位置展示的是两位早期共产党领导人向警予和李立三的肖像。向女士是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初期的重要人物，作为中国共产党积极分子，她在一家烟草公司组织了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帮助组织了1924年在上海的一次罢工。同样被置于显著位置的李立三是192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一，后来担任多个政府高层职务，直到1960年代末去世。说明牌显示，他也是来自烟草公司的同一个党支部。 141

下一面墙用两个展览直白地说明，烟草业是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新中国崛起的培育基地之一。左侧的展览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军事占领。我们看到三张图片，一张比一张让参观者感到不舒服，激发参观者对工人的认同，让他们感受到工人英勇地代表着中国人和烟草生产。第一张图有一段说明：“英国和美国烟草厂的资本家侮辱中国雇员。工人需接受搜身。”在日本占领期间，保安在工厂门口检查身份证件，对工人搜身。第二张照片表现日本帝国士兵挥舞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把国内烟草工人押上卡车。最后一张照片显示一个士兵砍一个仰面躺着的男人的头，一个日本帝国军官站在一边，手插在兜里。解说词说：“日本

侵略者残酷屠杀中国烟草工人”。<sup>①</sup>

右侧的展览提供一个安抚人心的政治主题，彰显制造业具有治愈和支撑国家民族的力量。<sup>②</sup>这个展览专门介绍在中国共产党战时革命根据地保护下开展的卷烟制造。几张照片显示共产党的三个卷烟厂位于简单的农舍内。展览包括于金彪和宋长和先生的肖像，他们分别是新四军第三师 1942 年设立的东海卷烟厂的厂长和副厂长。这些肖像的旁边，有一张灯光照得很亮的解说牌，说在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卷烟工厂的工人不得不竭力争取资源，获得工厂手摇机器所需的材料，尽管如此，产量最高时，这家工厂每天为红军生产 2 万支卷烟。

### 主题 3：中国卷烟制造厂尽职地服务共和国最重要人物

谁代表了革命年代的卷烟消费者？如果不是士兵，就是毛主席。下一个展厅专门介绍中国共产党和烟草业在狂热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中对毛主席吸烟习惯的特殊照顾。一段解说词

---

① 对中文标题原文的英语翻译是我自己做的，博物馆在中文标题下提供的翻译不准确。

② Joan Burbick, *Healing the Republic: The Language of Health an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Frank Dikotter,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London: Hurst, 1992); Wolfgang Schivelbusch, *The Culture of Defeat: On National Trauma, Mourning and Recovery*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3); and Jian Wang, "The Politics of Goods: A Case Study of Consumer Nationalism and Media Discourse in Contemporary China,"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6, no. 2 (2006): 187.



说，贺龙元帅 1964 年建议四川什邡卷烟厂设立一个专门部门，供应毛主席和其他最高领导人的特制雪茄。什邡卷烟厂往北京发送了样品，领导人选择了四种。1971 年，在文革的高潮期间，中央政府办公厅安排什邡厂工人和设备在北京南长街 80 号设立制造设施，就在中国最高领导人驻地中南海的街对面。<sup>①</sup> 进入这个地址的大门 2006 年运来上海，现在立在烟草博物馆里。就像获得进入内部密室的特权一样，我们走过原来的一组石狮，迈步走进（已改了用途的）南长街入口通道。映入眼帘的是毛主席躺在藤椅上一边读报，一边吸专门为他定制的 2 号小雪茄的大照片。这个展厅里还有南长街小厂的厂长范国荣。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一张照片显示他展示给北京卷烟厂年轻女工他在文革期间怎样为中南海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物选择材料和卷制 2 号小雪茄等特制产品。

这不是参观者看到政府高层的唯一一处展厅。在其他展厅，共产党的其他伟人也会通过视觉呈现出现。刘少奇、周恩来、胡锦涛、陈毅、贺龙、宋庆龄（也称为孙中山夫人）等都出现了，不管是本人吸烟，还是帮助了卷烟行业。对邓小平和上海卷烟厂生产的专供他个人的熊猫牌卷烟有特别的展示。这些卷烟包装为蓝色，今天仍然是抢手货，在商店里极少能买到（橘红色包装的熊猫更容易找到）。强调邓小平使用熊猫牌卷烟，政治上国产化卷烟的故事似乎完整了，比如在博物馆里“伟人、名人和烟草”这个展区，持续地播放 1986 年邓小平在北京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

---

<sup>①</sup> 关于南长街 80 号工厂的更多背景信息，参见 2008 年 9 月 30 日《中国老年报》刊登的文章《“132 小组”的诞生》，此文后来在中文网络上广为流传。

公司新闻节目记者华莱士采访的短片。邓小平拿出一盒为他特供的熊猫烟，礼貌地问华莱士：“我抽烟可以吧？”华莱士热切地同意，当然知道他没有选择，他恳求邓小平也给他一支烟。按照中国当时的习惯，向上级要烟抽是不礼貌的，但是邓小平泰然自若，递给他一支烟，揶揄地笑着，好像说了句表示他对中国烟草业喜爱的话，为他提供专门的产品，使用精湛技术生产表面看来更安全的卷烟。邓小平说：“我这个是他们对付我特殊制造的，过滤嘴长。哈，过滤嘴比烟还长！”

#### 主题 4：在烟草文化引领下，卷烟制造商不仅促进一个行业的生产，还有助于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在几乎每个展馆里，博物馆假定中国卷烟行业和中国社会的互相促进是古已有之的主题。二楼专门介绍烟草文化，这一点尤为明显。在这里，一张硕大解说牌上写着：“烟草从国外引入中国以来，已经有 400 多年的历史。烟草已经融入社会生活，进入中国传统，形成丰富多彩的烟草文化。”按照这句概括的思路，这个展馆在展示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展的同时，也呈现了 20 世纪建筑的变化。一系列照片显示国家烟草专卖局及其前身的建筑变化。首先是曾经容纳中国烟草工业公司（1964 年成立）的位于北京右安门的已荒废的红砖简陋厂房建筑。接下来是越来越现代的国家烟草专卖局（1982 年设立）建筑，与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城市建筑和经济鼎盛时期同步。

在博物馆看来，什么推动这些“文化”？就像烟草本土化一

样，烟草文化的形成是许多有名有姓的人的功劳。一些著名人物起了推动作用，我们将通过视觉呈现一个一个认识他们。展厅设计者呈现的是赋予中国烟草文化的众多面孔，不过都是男性。除了高级别党政官员，烟草文化馆呈现多位真人大小的代表 20 世纪中国革命的吸烟者，有共和国最著名的作家鲁迅，也有顽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坚毅军人杨靖宇等等。

把国家烟草专卖局更直接地呈现为个人，从 1965 年的一张照片开始，这离文革开始只差一年。我们看到中国烟草工业公司某位厂长与一群友好的卷烟厂工人合影，前排女工手拉着手。下一个展示更进一步呈现为个人，在一面红色的名人墙上有长十米的玻璃柜，挂着从 1982 到现在国家烟草专卖局历任最高领导人（全是男性）的大幅肖像。在这面有姓名的红色权贵墙的正对面是一张解说牌，写道：“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发展中国烟草业给予厚望和关心……鼓励一代又一代烟农战胜贫困，走向美好生活。”

144

在不远处，是企业社会责任宣传，进一步说明慷慨的道德准则已经融入中国烟草文化，也减少参观者对国家烟草局待遇优厚的领导可能产生的任何疏远感。这里有国家烟草局前局长姜明和上海烟草局局长董浩林的照片，他们分别向中国慈善基金会和中国儿童发展基金会捐赠支票，在捐赠仪式上移交硬纸板做的支票。

### 主题 5：国家烟草专卖局是高尚人士建立的庄严机构

到现在应该已经说得清楚了，博物馆的很多展区不仅是为了

使国家烟草专卖局 / 中国烟草系统更显人道，也是为了颂扬它。在博物馆最大的展区烟草管理馆，这一点表现得最强烈。展区墙壁用褐色点缀，配以优雅的灰色金属柜，几十幅展品记录国家烟草专卖局的起源，在清朝末年和 20 世纪初政治事件似乎有逻辑的演进中逐渐诞生。在所有这些介绍中，国家烟草专卖局是一个神圣的终极目标，为中国烟草业提供早就需要的“统一领导、垂直管理……日臻完美”。

在这个展区，肖像画也很显眼。清朝末年盛宣怀、熊希龄等人是国家烟草专卖“理论”的创始人。苏维埃根据地时代财政部局长的照片也令人敬畏。题为《时代英雄，金叶卫士》的展厅展出的是国家烟草专卖局员工在共和国旗帜下登上舞台领奖的当代照片。这些获奖员工身穿类似军装的深蓝色制服，佩戴国家烟草专卖局徽章，因为不顾生命安危打击制售假烟工厂获得表彰。这个展区的最后一个展柜展示了中国烟草专卖系统和中国走上国际舞台，国家烟草专卖局、Philip Morris、日本烟草和英美烟草公司的男性领导人（互相尊重、友好和谐地）在新千年伊始签署合同，资助国际烟草打击假冒卷烟联盟。

## 主题 6：烟草业领导者引领产品的现代化，生产越来越洁净、科学的卷烟

博物馆的地下室收藏着怀旧机械师的梦想。这里有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没有的古老卷烟制造设备的最大规模展示，从 20 世纪初使用的手摇卷烟机，到过去十年淘汰下来的各种自动化设备，包

括切丝机、卷烟机、包装机、滤嘴接装机等等。这些机器走下生产线后经过清洗，没有润滑油也没有气味，只是在讲述工业进步。最老的机器常常伴有穿着得体的真人大小的中国人面孔的蜡像在上面操作，标牌说明这些设备原来是在哪里制造的。

一系列机器设备照片中，也有中国人拥有的卷烟厂的照片，帮助把机器放入本土化和现代化的宏大叙事。最早的照片是黑白色，显示 1920 年代、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工厂外观。接下来是彩色照片，显示 1980 到 1990 年代建设的工厂，其中一些工厂在 2000 年左右投入使用，另有一些工厂过去十年经过了升级改造。最后一组照片“现代卷烟生产”展示了中国最近升级的工厂的典范内景，看不到工人，只有流水线生产的机器。这一组照片哪里都没有提到机器的原产地，更不用说产生的伤害了。照片中许多最新的设备来自欧洲。比如，一幅大照片显示全球销售的最快的过滤嘴卷烟机器之一：德国汉堡 Hauni 公司生产的不锈钢包裹的 Protos-M5，一天能卷制 2000 万支卷烟。在这个图像下面，解说词只是提到“上海卷烟厂超高速生产设备”。

博物馆地下室展厅彰显以自动化和洁净现代化生产为目的的叙事，而烟草农业馆展示的是人类的成就。首先是表现烟叶生产的愉悦情景的风景画。比如，“烟叶收获和晾晒”展现了美好的蓝天，远处是碧绿起伏的山峦。在这个展馆，我们看到穿着干净的四英尺高的农民蜡像捆束绿色的烟叶，用小推车整齐地运送煤炭，从干净的白色烤烟房搬运金色的烟叶。旁边的展示是更乡土化的情景，真人大小的白族妇女身穿白色的节日盛装，坐着整理烟叶，准备挂到原始的土窑上。这两个展示表现的是汉族的精湛技艺和

少数民族的温顺两种民族特征，<sup>①</sup> 向人类劳动致敬，同时隐去收获和晾晒烟叶的风险，比如烟草萎黄病，以及接触煤尘和烟雾诱发的呼吸系统疾病。<sup>②</sup>

不过，烟草农业馆主要是介绍农学家而不是农民。重点放在男性科学家，他们帮助改善 20 世纪中国卷烟使用的烟草“质量”。这里赞美的是烟草创新者和发明家，包括 20 世纪初英美烟草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那些无姓名的穿着实验室服装的中国面孔的人，以及解放后开发适应云南和贵州气候的新品种（比如云烟 98、201、203）的有姓名的科学专家。中间还穿插着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1950 年毛泽东视察河南，2002 年胡锦涛视察云南）视察烟田和祝贺农学家取得科学成就的照片。有朱尊权等有远见研究者的照片，他们“为中国烟草业做出了广泛贡献”。朱尊权 1919 年在湖北出生，从南京中央大学和美国肯塔基大学获得农学学位，1949 年后回国，为烟草业做出重要发现，并且在中国工程院和中国国家烟草公司的主要研究机构郑州研究院任职。

---

① Louisa Schein, *Minority Rules: The Miao and the Feminine in China's Cultural Politic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② Thomas A. Arcury and Sara A Quandt, "Health and Social Impacts of Tobacco Production," *Journal of Agromedicine* II, nos. 3-4 (2006): 71-81; and Natalie M. Schmitt et al., "Health Risks in Tobacco Farm Workers -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5, no. 4 (2007): 255-64.

## 主题 7：中国烟草业工作人员和同盟帮助世界发现吸卷烟的危害，用创新坦率地应对这些危害

博物馆的设计者并不回避 20 世纪公共卫生对卷烟的指控，而是按照外国烟草公司过去的做法，<sup>①</sup> 直接应对，博物馆的一部分以 147 对烟草市场友好的口吻介绍“问题”。由四面墙围起一个大型展览区：吸烟与控制烟馆，位于博物馆的中心。在这里，赞扬党和国家认识到烟草的危害；称赞中国烟草业 / 研究院为减害做出的贡献；最关键的是个人的选择，不是烟草业对吸烟可能带来的风险难辞其咎。

在这个展厅的中央是密集摆放的机器，比地下室摆放的机器小。这些机器来自青海烟草公司、长沙卷烟厂、郑州烟草研究院的捐赠，以测量工具为主，比如多通道吸烟机、自动偏振测量仪、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以及检测卷烟密实和燃烧速度的仪器。为什么在这个展厅展览这些分析仪器？这需要从周围墙上的展品推断，墙上有许多照片、文字和小物品。

四面墙的第一面墙讲的故事包括两部分。它不温不火地承认烟草烟雾存在固有的危害，一个解说牌平淡地写道：吸烟有害。然后，重心转向为公众健康做的一些负责任的调整，最重要的是中央政府 2005 年批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不过，展厅的其余部分讲的是不同的次要故事，说的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科学届和烟草业联手生产“更安全的卷烟”保护消费者的故事。

---

① Elizabeth Smith, “Corporate Image and Public Health: An Analysis of the Philip Morris, Kraft, and Nestlé Website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17, no. 5 (2012): 582-600.

吸烟与控烟馆最重要的内容不是危害，不是公共卫生专家及他们提出的限制获得卷烟的办法，而是为消费者提供吸“淡味”卷烟的选择，过滤嘴和烟叶的加工保留味道但“减少焦油和尼古丁”。这个展厅的基本叙事是中国卷烟制造商的进步，从1959年尝试向政府高官推出中国首次国产的过滤嘴卷烟，到推出添加中草药的品牌，烟草业研究者在实验室穿着白大褂工作，到2003年在昆明举办全国低焦油行业会议。这些展示聚焦“质量”和“安全”相结合的历次里程碑。展览的最后是每支五毫克焦油国产品牌的超大图片和重要成分的展品。在第三个墙壁的末尾是用毛笔画出的中南海超淡味卷烟，以胜利者姿态悬挂在过滤嘴设计和烟叶切丝配方等各种创新的玻璃展示柜上方。这里没有提到“淡味”和“低焦油”卷烟是假新闻，<sup>①</sup>虽然实证研究反复证明，这类产品比它们替代的普通卷烟更危险。<sup>②</sup>

在吸烟与控烟馆，有几位有姓名和照片的男性形象突出。在入口通道处，是江泽民总书记的肖像，他是共产党第三代卓越领导人。江泽民的肖像照是1997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上发表大会致辞时拍摄的，并配有他在那次大会的一些讲话摘要，他赞扬公民采用健康生活方式，劝告青少年不要吸烟。几步之外，展示以同济医科大学吕富华教授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是烟

---

① 科学研究已经完全证明了“低焦”或“淡味”卷烟的说法是骗局，见《烟草控制框架协议》第11条，第9页，它将其描述为“虚假、误导、欺骗性”。See “WHO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2005, <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2003/9241591013-pdf?ua=1> (accessed August 5, 2015).

② Proctor, *Golden Holocaust*.



草控制研究的先驱。在这方面相形见绌的是美国。墙上展览显示，“人们为什么吸烟”，解释说“1948年，美国医学会刊物报道……烟草能放松神经紧张。因此，没有必要反对吸烟。”下一幅图片解说道，吕教授是世界上分离出烟草致癌成分的最早科学家之一，他最早的发现发表在1934年德国医学杂志上，帮助奠定了烟草焦油与癌症的关系。<sup>①</sup>

## 慢性暴力的伦理动力

中国烟草业建造了一个历史博物馆，培养员工的自我伦理，突出介绍当代市场不言自明的事实。任何一种商业产品（汽车、啤酒、手机）受到欢迎，并不是来自道德或世俗的真空。对大批量生产，又广受批评的对健康有害的产品，可能更是如此。为了维系长期的市场存在，必须奠定一些伦理和历史基础，否则，该

---

① 吕富华的公开履历显示他生于1904年，1930年代中期在德国留学，最初在弗莱堡大学著名病理学家Karl Aschoff实验室工作，在那里他参与确定烟草焦油与兔子皮肤癌之间的联系，后来他在柏林大学的实验室工作。但是，广泛搜索德文医学文献并没有找到吕富华在这一时期任何研究中共同署名的证据。不过，1930年代，德国的医学确实在最早确定烟草致癌方面的实验室研究上走在最前列。参见Otto Schuirch and Alfred Winterstein, “Experimentelle Untersuchungen zur Frage Tabak und Krebs,” *Zeitschrift für Krebsforschung* [Journal of Cancer Research] 42, no.1 (1935):76-92, 当今控烟领域的学者对这段历史大多所知甚少（参见Proctor, *Golden Holocaust*），因此很可能吕富华确实在其留学德国期间参与这类实验室研究。

产品就可能被忽视、拒绝或斥责。从当地文化输入中巧妙选择优点编制进道德宣言里，必须定期将这些宣言灌输给消费者，对生产一线的员工似乎也应如此。

149 把历史和技术本身融入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对学者来说并不稀奇。尤其是党和国家的多个部门投入大量精力，塑造中国居民对过去重要事件的认知和感受。<sup>①</sup>这些努力与政府的国民塑造项目重叠，培养符合党各种多变需求的公民，一开始是革命的农民、无产阶级工人和士兵，最近是对政府友好的企业家、网民、购房者、购车者和愿意提供廉价劳力的农民工。<sup>②</sup>1949年以来，中国

---

① Prasenjit Duara,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Culture*, ed. Kam Loui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Joshua A. Fogel,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Rana Mitter, "Behind the Scenes at the Museum: Nationalism, History and Memory in the Beijing War of Resistance Museum, 1987-1997," *China Quarterly* 161 (2000): 279-93; Jonathan Unger, *Using the Past to Serve the Present: Historiography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rmonk, NY: M.E. Sharpe, 1993); and Rubie S. Watson, *Memory, History and Opposition under State Socialism* (Santa Fe, N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1994)

② Ann Anagnost, *National Past-Times: Narrative, Representation, and Power in Modern Chin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Lisa Rofel, *Other Modernities: 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Li Zhang, *Strangers in the City: Reconfigurations of Space, Power, an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Xin Liu, *The Otherness of Self: A Genealogy of the Self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and Fengshu Liu, *Urban Youth in China: Modernity, the Internet and the Self*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国营烟草业精心制造其产品，来帮助区分和维系这些不同的主体，生产各种各样的卷烟品牌，在象征意义上产生诸多区隔，适应各个不同的国民群体。它还迎合榨取劳动的需要，为工作者提供易于获得的高度成瘾的刺激物尼古丁，它能对人的行为产生多种影响。

上海的烟草博物馆也指向中国国内新的焦虑，比如对烟草业带给健康的危害有越来越多焦虑。越来越多呼声要求严格审查烟草业，不是因为烟草业让人加班加点干活，而是因为烟草业危害健康。要理解这一社会变化的重要性，请考虑柴静 2015 年制作的《穹顶之下》，这部关于空气污染的纪录片在线发布后三天内观看超过 1.5 亿人次。<sup>①</sup> 随着向这类问题意识的转变越来越明显，随着关于工业生产产生的有毒物质的新问题涌现，劳动力管理面临的挑战不再是简单地维持不懒散、不腐败、对党忠诚、无不满的劳动者队伍。现在有一个新的挑战：培养行业员工的自我认同，让他们觉得自己是高尚的人，在从事无可指摘的工作。

国家烟草专卖局玛雅风格外观的博物馆对促进烟草业员工士气起到多大作用，本章不去探讨。博物馆内许多展厅在我看来是直白甚至滑稽的给烟草业工作人员打气的尝试。但是，我遇到的参观这座博物馆的任何一位烟草业员工没有这种感受。也许是因为这个建筑物自身不是一项新技术，只是烟草公司和国家监管部门与员工沟通的多个信息平台之一。其他渠道包括行业新闻通讯、网站和杂志，以及周末娱乐活动和节日庆典。所有这些媒介渠道

150

---

① Daniel K. Gardner, "China's 'Silent Spring' Moment? Why 'Under the Dome' Found a Ready Audience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March 18, 2015.

加在一起，帮助行业员工不仅对高额工资心满意足，而且成为褒扬中国卷烟制造的道德伦理的一部分。

最后一点与大规模死亡的理论相关，这个话题近些年在欧美学术界有越来越多讨论。在评价如何形成 Rob Nixon 所说的“慢性暴力”理论时，Lauren Berlant 鼓励学者沿着两条路线思考。<sup>①</sup>她让我们认识到制造大规模人类灭亡的力量常常通过市场机制慢慢弥散开。她劝告我们避免过于强调任何单个国家主权的意向和个体决定的重要性。中国烟草博物馆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在研究慢性暴力时，我们需要不仅注意暴力本身的弥散，也要注意暴力如何弥散进入自我伦理。我们需要考虑众多参与者组成的宏观系统如何具备并维护那杀人的力量，Judith Butler 把这样的网络称为“小主权体”。<sup>②</sup>卷烟行业是依托于小主权体网络的一种大规模、弥散性的慢性暴力机器。即便面对公共卫生的批评，这些小主权体网络如何感到伦理动力，并能保持伦理动力，是一个重要但是较少研究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烟草博物馆是促进伦理动力的工具。它本身就是一项“自我技术”，大量运用正面褒奖和具体人格化的方式，为在当今全球卷烟行业最重要的地区运营的小主权体的伦理观注入动力。这是一门致命生意的道德博物馆，它赤裸裸地表明即便是最引发伤害的现代制造业，也有自我疗愈的方式。

---

① Rob Nixon, *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 (Cambridg,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Lauren Berlant, “Slow Death (Sovereignty, Obesity, Lateral Agency),” *Critical Inquiry* 33, no. 4 (2007): 754-80.

② Judith Butler,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London: Verso, 2004).



金钱和读职



## 第六章

157

### 圈起“现金牛”：毛泽东时代以来的烟草税改革

Matthew Kohrman、甘泉、胡德伟

#### 中国当代烟草业概述

今天中国的烟草业是一个独特的混合体。它自称是一个国家专卖制度，总部设在北京，但是组织结构又严格按照区域化创收和司法管辖。国家烟草专卖局（又称国家烟草局、中国烟草总公司）成立于1982年，管理星罗棋布的本地烟草业/政府卡特尔，它们历史上按照各省的边界，划分各自的影响范围。<sup>①</sup> 这些卡特

---

① 在1950年代，中国的卷烟厂国有化，许多卷烟厂合并。国家烟草专卖局1982年成立后不久，开始鼓励卷烟厂合并，合并成更大的国有“公司”，甚至更大的“烟草集团”。与1950年代一样，这些新的并购几乎都是在省内发生的。形成的公司和集团是我们这里所称的卡特尔的组成要素，与空间/行政管理单元（一般是省，有时候是直辖市）相联系的卷烟生产组合。卡特尔的操作政治单元是省级，这是人民共和国授予省级的政治权限，也包括上海、北京、天津等（转下页）

尔有几项特征。第一，保护主义：鼓励当地生产的卷烟品牌自由流通，阻碍外省卡特尔生产的品牌在本地市场销售。第二，区域政府主管部门（党和国家的省市县级部门）和区域性卷烟生产实体（国有企业，今天称为“公司”和“集团”）之间一直有密切协调。这些生产实体归国家烟草专卖局管理，但是与区域政府有很深的纠葛，在促进“当地”经济繁荣的口号下团结在一起。第三，大肆制造和销售当地生产的卷烟。到2000年，中国的卷烟厂过剩。如果把当年的卷烟厂在中国地图上用大头针标记出来，会像一个插满针头的针插包。全国许多地方卷烟生产能力过剩，当时已经非常严重，国家烟草专卖局开始敦促关闭小厂，恳求大  
158 厂在年底前暂停生产，因为当地市场没有售出的卷烟已经极其饱和了。<sup>①</sup>

要遏制这个专卖加卡特尔制度危害人们健康的能力，需要深入了解促使它形成和帮助它在政府官员和普通公民心中常态化的因素。本章介绍了其中一个因素：税收。国际烟草控制的倡导者今天越来越把税收看作有前景的干预工具。本章介绍烟草相关税收改革史，就我们所知，这段历史过程还从未曾向英语读者介绍过。人民共和国制定税法的主管部门由中国共产党最高层控制。新中国成立以来，共产党领导人针对烟草已经多次行使这一权力，

---

（接上页）大直辖市。卡特尔的发展依赖省、直辖市人民政府享有的权限。近些年，在规模经济逻辑指引下，国家烟草局协调一些“烟草集团”跨省扩张。最重要的表现是原本在上海市和云南省的烟草集团到外省兼并。国家烟草局帮助这些集团在远到北京、新疆和海南等地获得卷烟厂的权益。这些跨省交易涉及对相应省、直辖市之间分享利税的细致谈判的条款。



微调和重订税率已有十几次。本章先介绍毛泽东时代烟草税的屡屡变化，然后专门介绍两轮税制改革。第一轮改革 1990 年代开始，第二轮改革在本书付印时刚刚开始。

我们求解的问题：税收政策的变化如何影响烟草业专卖加卡特尔混合体中卡特尔这一侧？国家税法的变化如何鼓励地区保护主义、当地工业和政府的协调，以及过量生产？近期反烟草的积极人士如何试图修订税收政策，从而限制卡特尔每年向中国公民兜售数万亿支卷烟的能力？在不远的将来，烟草税改革应如何设计，才能控制卡特尔，实现现代的健康治理理想（税收收入和更健康的公民都“增加”）？

## 1994 年改革前的烟草税

从明朝最后的崇祯皇帝统治时期（1627—1644）开始，中国政府主管部门就以各种方式征收烟草税。20 世纪，共产党领导人也急不可待地制定了烟草税法规。新中国成立后仅仅几个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现称国务院）颁布了全国税法。1950 年 1 月颁布的《货物税暂行条例》对晾晒烟（土烟）和熏烟（后来称烤烟）的销售征收 40% 的税。卷烟按“质量”分为四等，征收从 90% 到 120% 的商品税。<sup>①</sup>

---

① 陈文东，《中国烟草税收的历史沿革》，胡德伟编《中国烟草税收：历史沿革、现状及改革》。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9 年，第 1—15 页。

接下来十年，中央以几种方式微调了烟草税率。1953年改革把烤烟税改名为“商品流通税”，保持40%的税率不变，把晾晒烟的商品税提高到45%。1953年改革也对卷烟按新的商品流通税征收，对四档卷烟降低了税率，从原来的90~120%，降到60~66%。1958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工商统一税条例》（草案），新的统一工商税成为对烤烟和晾晒烟销售征收的唯一税种（分别为50%和40%）。四档卷烟也同样按照新的统一工商税征收，再次调低税率，按40~69%征收。<sup>①</sup>

1970年代初和1980年代，中央再次修订了税法。1971年，财政部把烤烟和晾晒烟的工商税统一为40%。1984年，国务院制定了新的产品税法规，财政部制定了实施细则。根据这些新的安排，烟草制品划分为三类（卷烟、雪茄和烟丝），按照七个不同税率等级征税。卷烟仍旧分为四档，但是又一次调低税率。晾晒烟和烤烟的税率按统一的38%征收。<sup>②</sup>

从1950年代初到1980年代末，这么多次涉及烟草的税制改革的指导逻辑是什么？我们在北京开展了访谈，显示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确保烟草税始终是共产党和国家稳定的税收来源，但是决不能妨碍烟草业正常运行和吸烟者吸烟。第二，向省市主管部门提供如何监管征税的明确指导。第三，随着烟草商品从田间走上货架，应主要在生产环节而不是在消费环节征税。

---

① 陈文东，《中国烟草税收的历史沿革》，胡德伟编《中国烟草税收：历史沿革、现状及改革》。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9年，第1—15页。

② 同上。

这三个逻辑都与中国卷烟卡特尔的重要特征吻合度很高。第一个逻辑显然是亲烟草业的，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政策制定者想方设法确保烟草税决不阻碍卷烟生产和消费。第二个逻辑（把征收、组织和发放烟草税的许多责任授予省内政府部门）赋予这些部门设立自给自足的行业卡特尔的动力。第三个逻辑重申了省市官员不仅要促进还要保护当地烟草业。 160

要理解第三个逻辑，请考虑一下另一个卷烟生产大国美国。美国从事机制卷烟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如果一盒好彩牌（Lucky）或任何其他品牌卷烟在一个州生产，比如说北卡罗来纳州，销售给另一个州的吸烟者，比如亚利桑那州，吸烟者购买卷烟所在的州收取销售税。不过，因为中国的商业最初是按照共产主义原则设计的，政府倾向于对生产环节征税，只是最近才开始包括一些零售层面的税收。这样，上海烟草公司1961年、1981年或2001年生产的一盒卷烟，一年后卖给广东省广州市的吸烟者，对广东省当地主管部门几乎没有产生任何税收，今天基本上还是这样的财政安排。

总的来说，所有三项逻辑都意味着中国的税收政策，至少在不久前，赋予省市政府许多动力建立卷烟厂，与这些卷烟厂密切合作，推动当地卷烟品牌的生产和销售，阻挠来自外部的竞争。

## 上世纪末的烟草税改革

1990年代开始，中国领导层准备对国家税收制度进行新一轮

改革。不过这次改革的目的是不是微调，而是大改。大改的主要动力是地方政府不听话。不管是哪个行业，在1990年代前，中央要求大部分税收由地方主管部门征收，然后按一个固定比例从省转移到中央政府财政。共产党统治四十年后，省政府报告征收的税  
161 收经常低于实际的数额，发现这是增加自身财政的捷径。到1990年代初邓小平从所有领导职务退下来时，这种做法已十分普遍，一些省政府富得流油，开始向中央政府提供贷款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和国防。这种状况让党的领导人耿耿于怀，认为这是对中央至高权威的直接威胁。因此，他们授权国务院重新制定税收法规，原则是让税收尽可能直接从源头流到中央政府。

1994年“分税制改革”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实行，这是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税收法规最彻底的改变。分税制改革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中之一是用新的税负代替旧的税负。比如，消除了产品税，取而代之的是两种新的主要税种：增值税和消费税。这次改革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税收系统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即在全国设立国税局网络。还有一项变化是对国税和地税的定义。把税收重新划分，分为（a）国税，由中央的国税局网络直接征收，不劳地方政府参与；（b）地税，由省内税务局自己征收；（c）共享的税负，由国税局网络征收，然后按一定比例返还给各省。这就涉及到这次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引入了退税机制，每年中央政府把中央征收的税收按一定比例发还给各个省。最明显的例子是增值税。所有增值税直接交给中央政府，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每年

返还 25% 的增值税给其来源各省。<sup>①</sup>

1994 年分税制开始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的几乎各个支柱产业，对中国的烟草业尤其如此。针对烟草业，这次改革当然成功地实现了中央把大部分烟草税收直接上缴中央政府的目标，主要是因为采用了增值税和消费税机制。新的机制开始占烟草税的主要部分，从推出以后，中央政府就牢牢地控制着这两项税收。国税局在各地的分支机构确保按照规定的比例收取增值税和消费税，并且所有资金直接上缴中央财政。

有人可能会认为，因为这是中央政府夺取权力，再加上这个 162 个时机，1994 年改革措施可能消除了中国烟草卡特尔根深蒂固的特征。在中央确认对全球健康和公司效率的承诺之时，这样夺权会不会弱化当地烟草业与政府的联盟、市场保护主义、卷烟过量生产？毕竟，到 1994 年，邓小平领导的对外开放已经在中国牢牢扎根，中国共产党对解散低效的国有企业和遵循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原则（国家的权威与其保护公民健康的能力一致）越来越热情。但实际上 1994 年的改革方案和后续的微调对消除卡特尔的关键特征没起到什么作用。如果有什么作用的话，改革和当地的反应反而更强化了这些特征。

比如，在上世纪最后几年对消费税法规的微调，确保卷烟尤其是低价卷烟无处不在。1994 年首次推出时，卷烟消费税的差别不大，对甲等烟收取 45%，对所有其他各等卷烟收取 40%。同一

---

<sup>①</sup> 陈文东，《中国烟草税收的历史沿革》，胡德伟编《中国烟草税收：历史沿革、现状及改革》。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9 年，第 1—15 页。

时期，中央放松了对卷烟零售价格的管制。这两项措施激励卷烟厂增加高档卷烟的生产和营销，价格是最便宜卷烟的一百倍以上。高档卷烟面向社会快速分层和 GDP 增长年代的消费者，对生产商来说比便宜品牌有更大利润空间。到 1990 年代末，低档卷烟相对较小的利润率导致大部分吸烟者习惯抽的品牌产量不足。为了平衡这个制度，国务院在 1998 年对消费税进行了调整。把卷烟由 1994 年的两档重新分为三档。<sup>①</sup> 卷烟等级（甲、乙、丙）按照卷烟价格确定，对每一档适用不同的消费税税率。按照新政策，甲等卷烟，出厂价每箱 7,500 元及以上（包括增值税），征收 50% 消费税；乙等卷烟，出厂价每箱 2,500 到 7,500 元（包括增值税），征收 40% 消费税；丙等卷烟，出厂价低于每箱 2,500 元（包括增值  
163 税），征收 25% 消费税。（一箱等于 50,000 支卷烟。）结果，许多卷烟厂又开始生产低档卷烟，不过必须强调指出，烟草业持续把大部分营销努力花在推销更高端 / 更赚钱的产品上。<sup>②</sup>

1994 年的改革方案还在哪些方面支持了卡特尔特征呢？这

---

① 为简化的目的，21 世纪初，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又采用两级体系，使用甲等和乙等两个术语。对一些读者来说，这个系统和当前介绍中国卷烟文献里出现的另一个系统可能有些混淆。今天中国烟草业使用自己内部的分级系统，来规划生产和分析市场份额。烟草业系统按照调拨价，把全国最贵的卷烟划为甲一级，按照价格梯度，其他依次是甲二级、乙、丙、丁、戊。因为这一章是关于税收的，我们选择讨论重点放在财政部和国税总局采用的体系上。

② 出厂价是卷烟厂把卷烟销售给调拨站的价格。1994 年，新设立的卷烟增值税率定为 17%，而对烟草制品的消费税，依据从价税计算，对进口卷烟和甲等卷烟征收 45%，对雪茄和所有其他卷烟等级征收 40%，对烟丝征收 20%。见陈文东，《中国烟草税收的历史沿革》。

次改革把新的税收负担加给卷烟厂，要求卷烟厂承担增值税和消费税，合计约 50%。这促使许多卷烟厂在地方政府同盟的保护下，寻求新的利润机制。好几家卷烟厂意识到烟草消费税机制里有一个漏洞，提供了减少卷烟厂本来应付给中央政府税负的机会。1994 年税收法规要求只在生产环节征收消费税，估算消费税的基础价格按照出厂价。首先是云南省的卷烟厂，然后是其他省的卷烟厂，意识到如果自己建立自己的调拨站（这在 1994 年税法制度下是允许的），让这些调拨站按照比中国国家烟草总公司的采购站更低的价格从工厂购买卷烟，卷烟厂就可以少付消费税。<sup>①</sup>有太多的卷烟厂和地方政府同盟在利用这个漏洞，以至于 2001 年中央发布了一轮新的税收政策微调。中央禁止卷烟厂设立自己的调拨站，实施了一系列对税法的其他小幅调整。<sup>②</sup>

20 世纪末税收政策巩固了中国烟草业的运作，而其巩固效应最显著的莫过于在农村地区。1994 年改革方案收紧了征收烟叶税的条款。这次改革把农业和林业特产税与农林牧渔产品税合并，归在一个新的统一的农产品税下征收。七种农产品（包括烟叶）

---

① 调拨站按照出厂价从卷烟厂采购卷烟，然后在调拨站管理的区域把卷烟批发给批发商。见同上。

② 除了禁止卷烟厂设立自己的调拨站，2001 年的改革方案还要求在消费税中引入从量税，要求卷烟厂每箱卷烟额外支付 150 元。为此形成了一个新的术语“调拨价”（出厂价加从量税），增加了一道程序，国家税务总局必须验证调拨价的有效性，卷烟厂几乎没有可能继续往低报告消费税了。2001 年的微调还进一步把卷烟等级数量减少为两个。甲等卷烟指的是调拨价格大于等于每箱 12,500 元（不含增值税），乙等卷烟指的是调拨价格低于每箱 12,500 元（不含增值税）。消费税中从价税的计算也调整为甲等卷烟按 45%，乙等卷烟按 30%。

按照这种简化的机制纳税，新法规规定，在中国境内生产农产品的任何人都有法定义务向国家缴税。对晾晒烟和烤烟的征收额之前按照不同税率，1994年起统一为31%。烟草种植者被要求在出售烟叶时就包含烟叶税，当地政府也受敦促征收烟叶税，并根据需要使用这笔财政收入。<sup>①</sup>

164 为当地政府提供新的简化的征收烟叶税的权力，就强化了农业种植者、卷烟厂和省政府在农村部门之间业已存在的攫取关系。全国许多地方的农民发现，与1994年之前相比，县乡村干部更可能迫使他们种植容易征税的烟叶等商品。在后毛泽东时代（从1976年开始），烟叶早已成为一个相对容易征税的农产品，因为对烟叶从农村的流出管制越来越多，不像新鲜蔬菜等产品。1980年代以来，农民发现越来越容易向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销售蔬菜，但是对烟叶销售的管制收紧了。今天，农民只能把烟叶按照固定价格卖给隶属于当地卷烟厂的机构和国家烟草专卖局当地办公室的收购者。

1994年改革方案进一步强化了当地烟草业和政府合谋从农民手中攫取烟叶，因为改革方案改革了政府治理的财政责任的关键条款。简而言之，1994年改革要求当地主管部门承担起省里基本服务的更大责任，比如医疗和教育，在此之前是由中央提供资金的。当地官员突然感到迫切需要筹集更多财政收入。

1994年改革对烟叶生产的推动如此显著，以至于几年内，中

---

① 胡德伟等，《论烟叶税的改革——兼谈烟草控制》，胡德伟编《中国烟草税收：历史、当前现状和改革》。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9年。



国烤烟库存远超卷烟厂装入卷烟所需的数量。这促使国务院发布1998年《国务院关于调整烟叶和卷烟价格税收政策的紧急通知》。《紧急通知》是对1994年改革的微调，目的是微调征税与农民产量的关系，保持烟草业获取更平衡的烟叶供应（不能太多，不能太少）的能力。<sup>①</sup>

共产党第四代领导人上台不久，再次重申用税收来确保烟叶的流通有序且有利可图。因为后毛泽东时代市场自由化偏向对城市居民有利，中央2005年对农民安排了一项福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废除了中国农业税制度，取消了中央批准的对农民的各种征税。这对全国大多数农民来说是很大喜讯。但是，有一个例外。在全国人大看来，一项农业种植应牢牢掌握在中国税收制度下。国家将继续对烟草种植征税，只是改了名称，现称为“烟叶税”。除此之外，覆盖烟叶的现有税制的几乎各个方面都原封不动（从如何收取烟叶税，到计算方法，到支付责任，到税率——沿用1998年确定的20%）。

废除农业税没有包括烟叶，证明了卡特尔制度存在，尤其证明了种烟大省和各省卷烟厂的影响力和既得利益。中央在准备2005年废除农业税时，我们应该可以假定云南、四川、贵州和其他省政府游说仍旧保留烟叶税。这些地区的政府当然想避免陷入因失去农村税收收入而削弱其县一级政府权威的境地。它们当然想避免损害其与当地卷烟厂一起制定的掠夺性的烟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村政府部门对农民采取鼓励烟叶种植的立场，烟叶

---

<sup>①</sup> 陈文东，《中国烟草税收的历史沿革》。

税用来资助当地政府的服务，而农民则从这一利润丰厚的资源上获益较少。毕竟，如果没有这个掠夺性烟叶制度，农民会自由地选择想种什么就种什么，一些农民必然会改种其他更赚钱又不用交税的作物，这种情况会当地官员预算收入减少，使卷烟厂面临失去最重要物资的稳定供应。

在烟叶税之外，1990年代末引入的一些其他微妙的法规也影响了中国当前烟草税的构成。比如，教育附加税和城市建设维护税，这两项都是1994年之后的发明。这两项税收定向用于当代中国治理的重要方面，都是按照一个省收取的卷烟消费税和增值税的固定比例计算。也就是说，一个省生产和销售的卷烟越多，能用于支付中小学和大学、城市公园、市属医院、政府办公楼、卫生系统和城市可持续项目的资金就越多。

在这个组合中还有其他三个税收机制，都是1994年之后设立的返还机制。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谈到，每年征收的增值税的25%  
166 自动从中央返还产生增值税的省份。第二个返还机制复杂一些，涉及增值税和消费税。1994年以来，中央根据一套消费税/增值税计算公式，每年向各省财政局返还一定金额。这些计算依据一个固定数额和一个浮动额。固定额是中央确定的每个省1993年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合计财政收入。浮动额是每个省1993年与当前征税年度的消费税和增值税总额之间的差异。对1993年到当前年度数字的增加额按比例（1:0.3）返还。比如，如果1994年一个省的消费税和增值税总额比1993年增加了1%，返还部分就是增加部分的30%。第三个返还机制是2002年设置的，涉及企业所得税。在1994年改革后，中央政府征收和保留了省内与烟草相关的所有

企业所得税。2002年后，这一所得税的50%返还给省政府。<sup>①</sup>

不论有多复杂和多少名堂，所有这些方案传达给许多省份的信息是一致的。虽然1994年改革为省领导人提供了新的宏观经济挑战，卷烟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在那个时代，保持当地GDP增长是公务员晋升之黄金大道，卷烟提供了应对税制改革的一个方案。表面看来，这个税收改革使中央政府从国家总体税收的蛋糕中切走更大一块，同时卸下毛泽东时代政府的一些责任。

这一系列税收改革和地方应对的综合结果是，到上世纪末，中国烟草卡特尔一路高歌猛进。地区主管当局对建设和保护卷烟卡特尔的热情高涨到向来严肃的官方媒体开始提出质疑。比如，2009年，新闻媒体广泛报道了湖北省的案例，湖北省公安县人民政府要求干部帮助推销当地生产的卷烟，确保人们不买“不合规”（外部）品牌的卷烟。公安县的干部被安排了卷烟销售份额，被要求批评吸非本地卷烟品牌的居民。在处罚威胁下，一些干部进入学校，检查教师的烟灰缸，公开羞辱吸错卷烟品牌的当地教师。其他干部选择挪用政府资金购买个人领到的份额，谎称是由工作相关支出购买。<sup>②</sup>

---

① 陈文东，《中国烟草税收的历史沿革》。

② Peter Foster, “Chinese Ordered to Smoke More to Boost Economy,” Telegraph, May 4, 2009,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newstopics/howaboutthat/5271376/Chinese-ordered-to-smoke-more-to-boost-economy.html> (2015年4月30日访问); 新华社,《红头文件“卖烟”,吐出“权力烟圈”》,2013年10月29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9/c\\_117916582.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9/c_117916582.htm) (2013年12月14日访问)。

## 烟草税遭遇防烟控烟

2009年，中央再次宣布修改卷烟税法规。中央2009年这一轮改革的目的据称是平衡当时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下行财政压力。中央担心金融危机会影响税收流入，所以宣布会提高烟草税负。甲类卷烟消费税的现有从价税从45%提高到56%，乙类卷烟从30%提高到36%；在批发分销环节征收一项新的5%从价税。总的来说，2009年改革将使甲类卷烟消费税增加16%，乙类卷烟消费税增加11%。<sup>①</sup>不出所料，这些变化引起各个利益群体的关注。其中一个相对较新的群体是团结在防烟控烟事业下的卫生专家。这些专家从改革声明中看到他们期待的事情的曙光：提高税负可能减少卷烟消费。

2009年改革方案对抵消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央政府烟草税收入下行压力的效果如何？本轮改革对满足防烟控烟专家的希望效果如何？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这个改革方案是迅速生财之道。它使中央财政收取的烟草税每年蹿升了估计500亿元。不过，新增加的这么多收入对许多控烟倡导者希望实现的降低吸烟率收效甚微。为什么？因为2009年的提税没有传导给消费者，卷烟零售

---

① 应注意，因为甲等和乙等烟的区分价格从一箱12,500元提高到17,500元（不含增值税），一箱12,500元到17,500元（不含增值税）的调拨价卷烟的从价税实际从45%降至36%，如果也考虑新出台的5%的批发环节税，总的税率下降了4%。每箱150元的从量税保持不变。见陈文东，《中国烟草税收的历史沿革》。

价格保持不变。税收改革者在消费者周围打造了支持吸烟的保护墙。2009年改革创造的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全部由烟草业丰厚的预算提供。<sup>①</sup>

2009年的改革令健康倡导者失望，说明中国当前对烟草税的斗争还在持续。从1990年代起，许多国际和国内经济学家就热切倡导修改中国烟草税政策。在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彭博慈善基金会、盖茨基金会等国际机构的资助和支持下，经济学家们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表明提高烟草税（导致零售价格小幅上涨）对中国政府是双赢的结果，不仅创造更多税收收入，而且使吸烟对公民来说财务可行性降低，挽救生命，减少医疗成本。<sup>②</sup> 经济学家们在中国多场研讨会上介绍他们的结论，常常邀请

---

① Teh-wei Hu, Zhengzhong Mao, and Jian Shi, “Recent Tobacco Tax Rate Adjustment and Its Potential Impact on Tobacco Control in China,” *Tobacco Control* 19, no. 1 (February 2010): 80-82.

② Teh-wei Hu et al., *Tobacco Taxation and Its Potential Impact in China* (Paris: International Union Against Tuberculosis and Lung Disease, 2008); Hu et al., “Recent Tobacco Tax Rate Adjustment and Its Potential Impact on Tobacco Control in China”; Song Gao, Rong Zheng, and Teh-wei Hu, “Can Increases in the Cigarette Tax Rate Be Linked to Cigarette Retail Prices? Solving Mysteries Related to the Cigarette Pricing Mechanism in China,” *Tobacco Control* (2011), doi:10.1136/tobaccocontrol-2011-050027; 郑榕、高松、胡德伟：《烟草税与烟草控制——来自《烟草税管理技术手册》的全球经验即在中国面临的挑战》，见石坚、胡德伟编：《提高烟草消费税政策研究》，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204页；David Levy et al., “The Potential Effects of Tobacco Control in China: Projections from the China SimSmoke Model,” *BMJ* 348 (February 18, 2014); and Lian Yang et al., “Economic Costs Attributable to Smoking in China: An Update and an 8-Year Comparison, 2000-2008,” *Tobacco Control* 20 (2011): 266-72.

卫生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改委、国务院、人大和政协等相关政府部门的代表一起参会。他们也通过官方渠道或私人关系，把政策简报呈交给政府最高领导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一直试图发挥中国在 20 世纪初加入的全球卫生条约——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作用。公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成员国应积极地利用传导给消费者的提税作为遏制吸烟的工具。

一些媒体观察家以为，2009 年中央宣布修改烟草税，是经济学家们实现的一场公共卫生胜利。不过，经济学家们很快就看清了，这是想法被误导了。如上所述，卷烟厂吸收了 2009 年的税率增幅，卷烟零售价没有改变，相应地吸烟率也没有受到影响。经济学家们毫不气馁，继续倡导。2010 年，他们发布了一项研究，显示中国一盒卷烟有效的各项税率大大低于公约要求的税率。他们计算一盒卷烟的有效税率在 40% 到 43% 之间，远远低于世卫组织要求的 70% 的水平。<sup>①</sup> 世卫组织当时的最佳实践指出，要达到 70% 的总税率，增加的税负应限于那些最有效影响消费的税种，或者是那些对卷烟相对于其他商品和服务的零售价格有最大影响的税，比如消费税。<sup>②</sup>

如何计算中国卷烟平均税率的问题在 2014 年进入高潮。这年

---

① Hu et al., “Recent Tobacco Tax Rate Adjustment and Its Potential Impact on Tobacco Control.”

② See page 12 of *WHO Technical Manual on Tobacco Tax Administration*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1). Also see pages 10 and 16 of *IARC Handbooks of Cancer Prevention, Tobacco Control*, Vol. 14, *Effectiveness of Tax and Price Policies for Tobacco Control*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1).

暮春，防烟控烟倡导者在北京组织了一场研讨会，庆祝世卫组织世界无烟日（2014年5月31日）。在研讨会上，几位经济学家再次详细介绍了中国卷烟的有效烟草税率相对较低，根据消费税和增值税数据，估计在43%到50%之间。<sup>①</sup>没过几个星期，中国国家烟草公司的经济学家就予以驳斥，向新闻媒体和国务院发布了与此不同的评估。中烟的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只强调消费税和增 169  
值税等有效税率的计算方法漏掉了中国卷烟从土地到消费者口中这条供应链上其他重要的税负。使用中烟经济学家的内部计算，他们宣称一盒零售卷烟的平均总税率是59.5%，大大高于防烟控烟学者估计的水平。<sup>②</sup>

此前中烟的经济学家一直不理睬防烟控烟学者，现在为什么突然屈尊反驳防烟控烟学者呢？而且还用这么公开的方式？因为当时中央的主流政策风向已经发生变化。到2014年夏天，中国领导层通过内部沟通，已经向参与各方表明，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不再是中央政府是否要提高卷烟税率，以更好地遵照世卫组织和公约的要求。要解决的难题现在是需要制定多大的增幅和使用哪个税种实现增幅。为解决眼下的新问题，两个阵营的经济学家之间的辩论就变成了确定基线水平，确定中国一盒卷烟当前相关的平

---

① Hu et al., "Recent Tobacco Tax Rate Adjustment and Its Potential Impact on Tobacco Control in China"; Zheng, Gao, and Hu, "Tobacco Tax and Tobacco Control"; 白景明:《中国烟草业生产成本及价格和机制分析》(烟草控制经济学会议报告, 2014年5月29日), 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白景明等编写的报告。

② 严定非:《控烟派、烟草系隔空对战以税控烟: 愿望丰满, 现实骨感》,《南方周末》, 2014年7月4日。

均税率是多少。这影响颇大：如果政府领导人确定当前相关的平均税率如中烟的经济学家所说，接近 60%，那么领导人会认为中国已经基本上遵照了世卫组织建议的 70% 的目标税率。但是，如果领导人确定当前相关的税率如防烟控烟经济学家所说，比 70% 低不少，中央有可能坚持较大幅度地提高烟草税。

问题的核心不只是钱，还涉及方法：如何把中国的税率制度换算成世卫组织所说的“有效税率”。回过头看，在 21 世纪初，中国生产和销售卷烟征缴的税费不止消费税和增值税。各项税费中，还包括其他项目：烟叶税，所得税，城市建设维护税，财产税，印花税，城市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教育附加税，税后利润缴纳。在确定基线时，是否应包括这些税负，如果包括，应包括哪些？

两个阵营的经济学家对计算方法的争执原本可能拖好几年，但是实际上相当快就解决了。2014 年 10 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场  
170 研讨会上，中国烟草总公司、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代表同意修改之前的方法，采用防烟控烟经济学家使用的世卫组织方法。是什么导致了政策方向突然改变，以至于两个阵营的经济学家在 2014 年就走到了一起，并且烟草业的经济学家在具有决定性的计算方法等重要问题上让步？几十年的反烟宣传（国内和国际）当然为政策风向变化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两个因素似乎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一，与 2013 年 11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三中全会建议，不仅应再次微调中国所有商品的税负制度，包括与消费税相关的税负，而且应进行重大改写。为了兑现这一建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开始展开讨论。不过，



与前几轮改革不同，中国领导层指示，在筹备讨论期间，另一组利益攸关方也应到场。为使中国更好地履行公约义务，世卫组织专家等防烟控烟研究人员获邀参加会议，介绍不同方式改革如何影响政府烟草税收入和烟草消费的模型。第二个也许是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三中全会闭幕后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在北京的一位著名防烟控烟研究人员勇敢地致信中国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请求他支持公约确定的两项措施：提高烟草税和采用图片式警告标签。同样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习近平的回复。他没有让这封信消失在官僚文件堆里，而是迅速给予积极回应，要求政府部门采取步骤，支持写信者的目标。

对于习近平的认可，税法官员的初步回应也并不太不完善。2015年5月，中央在对烟草税的长期改革中续写新的篇章。中央宣布，为一个前所未提的目的：预防疾病，即将出台新一轮烟草税改革。中央宣布，税率变化将因此涉及提高卷烟零售价。宣布后几个星期内，全国许多地方卷烟零售价格的确在十年里首次上涨。每盒售价20元以上的品牌增加了大约2元，售价低于20元的品牌增加了0.5到1元。这一轮统一价格微涨是通过三个规则变化实现的：中央把批发环节的从价消费税率从5%提高到了11%；要求批发商额外每盒支付0.10元的从量消费税；禁止烟草业承担这些提税，要求传导给消费者。 171

我们认为2015年5月的改革既是历史性的也是不足够的，两方面旗鼓相当。在2015年改革后，中国卷烟消费自1995年以来首次增长放缓，降低了2.4%。我们赞同市场分析师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一微小降幅可能部分是2015年5月改革使卷烟每盒平

均零售价格提高所致。<sup>①</sup>但是，不管多么有历史性，不论它如何证明烟草税对减少人们接触烟草的力量，2015年改革毫无疑问还不足够。它只把中国每盒卷烟平均有效税率提高到占零售价格的56%，仍大大低于世卫组织建议的占70%水平。此外，改革对减少不同品牌之间巨大的价格差异或解决其他系统性问题收效甚微。甚至中央政府的喉舌新华社似乎也同意我们的评价。在2015年春季改革生效后不久，新华社就平静地预测到，改革可能“收效不大”。<sup>②</sup>

## 我们的政策建议

在这一章我们对提出政策建议有些迟疑犹豫，以免落入意外后果法则的陷阱。不过，我们一致认为，中国烟草带来的健康危害违背良心，必须进一步改革税制，将来的改革应与之前尝试过的不同。我们建议的一些改革涉及上文详细讨论过的问题：人民共和国的税收政策如何激励了省市部门与当地卷烟厂合谋生产和销售便宜卷烟，极力保护当地市场，以及迫使农民种植烟草。

我们提出的第一条建议涉及烟叶。对上个十年的研究表明，

---

① Paul McClean and Lucy Hornby, “China Tobacco Sales Fall for First Time in Two Decades,” *Financial Times*, June 20, 2016.

② “China Hiked Its Cigarette Tax Early This Month, and the Extra Cost has Pushed up Retail Prices,” Xinhua,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5-05/30/c\\_134284069.htm](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5-05/30/c_134284069.htm) (accessed June 15, 2015).

中国许多地区烟草种植者不种其他作物而只种烟，让他们在财务上收入更少。<sup>①</sup>并且，因为种烟需要投入劳动力多，中国种烟的农民常常没有多少时间从事其他经济活动。此外，密集的烟草种植伤害土壤，很长时间不适合再种其他作物。因为这些原因，在中国，种烟对许多烟农来说应该没有吸引力。一位粗心的观察者可能把中央 2006 年废除各种农业税但不包括烟叶税的决定当作进步的公共政策和健康促进。毕竟，为了阻挠烟草这类伤害公众健康的作物的供应，除了使农民种它比种其他作物付出代价更大，还有什么办法是更有效的？不过，如以上我们已经介绍过的，2006 年改革反而鼓励烟叶生产，强化了烟草业和县级政府部门的联盟。失去了所有其他形式的农业税，县政府官员与卷烟厂更紧密地合谋，威逼利诱农民种植烟草。

因此，应制定废除烟叶税的时间表。阻力可能来自烟草公司和当地政府，尤其是密集种植烟草的地区。要减轻这些阻力，可以设立另一个中央政府管理的返还体系。可以是类似于现有的返还消费税和增值税的体系，定向支付给县政府。返还金额可以根据改革前三年县政府的平均烟叶税。采用这种返还体系，也许从

---

① Teh-wei Hu et al., "China at the Crossroads: The Economics of Tobacco and Health," *Tobacco Control* (June 2006) 15 Suppl 1: i37-41; 张秀兰等,《中国烟叶生产成本与收益比较分析》,参见胡德伟编《中国烟草税收:历史、当前现状和改革》。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9年; Virginia C. Li et al., "Tobacco Crop Substitution: Pilot Effort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2, no. 9 (September 2012): 1660-63; 王诚尧:《改革烟叶税,严控烟叶和卷烟生产与消费》,《中国税务报》,2012年8月15日。

现有的消费税中支出，将意味着靠近农民的政府官员对烟草种植没有那么多直接利益，希望这些官员因此不再那么多干涉农业活动，使农民有更多选择自由在现在种植作物以外种植其他作物。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个返还体系需要有时间期限，也许在取消烟叶税后实施最多五年，然后在几年时间里逐渐关闭，这样当地官员最终将完全戒掉烟叶税。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应该采取措施，增加卷烟对消费者的成本。不论税率怎么递减（让穷人承受的负担比富人大），不断增加那些抬高卷烟零售价的税负是减少吸烟者需求的灵验方法。过去十年，为了公众健康，许多国家采取措施调高烟草税，推动卷烟零售价格上涨。这些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由于卷烟需求弹性低，提高烟草税提高人们吸烟必须支付的成本对政府而言是双赢。一方面，减少烟草消费，挽救生命；另一方面，并不减少政府预计收缴的总体财政收入，至少在短期到中期不会减少。<sup>①</sup>

国内最贵和最便宜卷烟现在存在巨大价格差异，使人民共和国采取这些措施面临复杂性。任何把新的提税传导给吸烟者实际自己支付的金额，都不要加大卷烟的价格差异，否则会使吸烟者更容易对付提税，只是转吸与原先消费的价格相同或更便宜的品牌，而不是戒烟或减少吸烟。

现有可以调整的税收类别包括两种消费税：从量税和从价税。这两个消费税中，对提税最好的是从量税。这一税种按照实际消

---

① Prabhat Jha et al., Tobacco Taxes: A Win-Win Measure for Fiscal Space and Health (Mandaluyong City, Philippine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2).

费了多少卷烟形成政府财政收入，提高从量税不仅提高各种卷烟对消费者的成本，而且缩小不同卷烟品牌之间的价格差异。<sup>①</sup>当前，从量税在一盒卷烟的成本中只有 0.06 元，太低了，对烟草控制和财政收入没有任何显著影响。我们建议，大幅增加从量税，对在消费者中不受欢迎的品牌提高到每盒 1 元，对最受欢迎的品牌提高到每盒 4 元。

从价消费税是中国便宜和昂贵卷烟之间价格差异大的重要因素。要降低从价消费税扩大价格差异的影响，我们建议消除一个关键区分。当前，对更贵的甲类卷烟适用更高的从价消费税（56%），对更便宜的乙类卷烟适用更低的从价消费税（36%）。这种两级体系扩大了中国便宜卷烟和昂贵卷烟的差距。应消除这种两级体系，对所有卷烟适用统一的税率，也许按 56%。

我们进一步建议改变征税的主要征收环节。目前的体系主要在卷烟厂环节征税，其次在批发环节，政府部门应更多在零售环节征税。这更能确保将来税费由消费者直接承担（从而降低烟草使用者需求），而不是被生产 / 分销成本吸收。更多在零售环节征税，将进一步消除当前卡特尔体系背后的保护主义动力。

174

我们的最后一项建议是在防烟控烟的规划方面。中央需要制定政策，要求中央政府预算编制官员在烟草税中指定一定份额，专门资助实施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下的承诺。在这项条约制定后，多个国家采用了预留一定比例烟草税收

---

<sup>①</sup> Teh-wei Hu et al., *Tobacco Taxation and Its Potential Impact in China* (Paris: International Union Against Tuberculosis and Lung Diseases, 2008).

入支持公约实施的做法，但是中国还没有这样做。2006年以来，中央为烟草控制分配了经费，纳入中央政府补贴机制。这些经费的声明用途是为防烟控烟创造支持性的全国环境，加强当地实施公约的能力。<sup>①</sup>不过，中央分配的经费金额对应对国家如此巨大的烟草问题杯水车薪。说得更具体些，过去十年，中央预算的做法系统性地让中国防烟控烟倡导者经费不足，而同时，政府从烟草收取的总收入像滚雪球一样已经滚到每年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必须结束政府拨款不足的状态。只有这样，中国才可能扭转外交上尴尬、流行病学上的悲剧性发展：中国2005年批准了公约，但是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全国卷烟总消费量增加了近三分之一。

---

① 卫生部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领导小组办公室，《2007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http://www.moh.gov.cn/open/web\\_edit\\_file/20070529161216.pdf](http://www.moh.gov.cn/open/web_edit_file/20070529161216.pdf)（2013年12月13日访问）。

## 第七章

179

### 治理烟草业：精英政治、省市级利益攸关方和历史背景

李 成

对希望在中国开展更有效反烟运动的机构和人来说，必须首先确定烟草控制的利益攸关方和障碍，然后探索劝说决策者的可能方式。<sup>①</sup> 他们也必须更好地理解，针对烟草，政治精英、地方政府和其他利益群体如何互相作用。考虑到在中国，烟草生产和消

---

① 2012年3月26至27日，斯坦福大学 Shorenstein 亚太研究中心的亚洲卫生政策项目组织、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举办的探讨20世纪中叶到现在中国卷烟行业的创新历史研讨会上介绍过。更早的版本作为一章出现在李成著《中国烟草业政治地图和反吸烟运动》专著中。（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专著系列，2012年）。作者感谢 Eve Cary、John Langdon、Jordan Lee 和 Yinsheng Li 的研究协助和编辑帮助，感谢 Lincohn C. Chen、Sarah England、Matthew Kohrman、甘泉、Susan V. Lawrence、Kenneth Lieberthal、刘文楠、Andrew Marble、Andrew C. Mertha 和 Robert Proctor 对修订提供的宝贵全面的建议。

费在政治权力、商业激励、国家和行业同盟、区域利益、政府机密、人为制造的文化规范等迷雾重重的遮蔽下进行，要研究这些相互关系很有挑战性。并且，中国烟草业和中国反吸烟运动的现有文献对许多关键问题，包括各级烟草业管理层之间的紧张关系和烟草治理如何滋生腐败，洞见并不多。

烟草治理的主要利益攸关方是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层和国家烟草管理局。不过，我们不能轻视在这个多层级的“烟草经济”中省市利益攸关方的作用。中国遏制烟草的公共卫生努力扰动省市政府的一些最敏感神经，尤其是严重依赖烟草业经济活动的省市。

180 如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世界上最大的卷烟消费国，也是吸烟导致多种疾病的最严重的受害者。中国吸烟者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他们消费全世界卷烟的近一半。中国三亿多人每天吸烟。中国生产的卷烟占全世界的近一半。烟草相关疾病每年导致中国 120 万人死亡，占有所有死亡人数的 12%。预计到 2020 年，烟草相关疾病导致死亡人数将增加至每年 200 万人，其中一半死于 35 岁到 64 岁。<sup>①</sup>

控烟倡导者希望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层和政府机构更加关心这一灾难。他们尤其希望中国最高领导人认识到卷烟流行引发的持续健康危机，以及生产销售这种致命成瘾性产品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危害，从而更严格地实施《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公共卫生倡导者通过阻挠大型烟草公司推广卷烟的一些基本策略，包括广告、

---

①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和中国医院协会编，《医院控制吸烟指导手册》，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9 年，第 27 页。



公共关系和政治游说，挑战大型烟草公司的权威。

与此相反，中国当地政府官员似乎想要不一样的东西。他们主要关心当地经济增长。烟草业规模较大的省市常常致力于使自己管辖区域内的烟草垄断利润最大化，极少关心中国的国际承诺。烟草对国家总体的长期健康和经济影响似乎对这些当地政府的思维没有影响。<sup>①</sup>在这些省市，领导人（包括省委书记、省长和市长）常常亲自参加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烟草专卖局等全国领导机构的谈判，尤其是生产、经销和税收收入 / 税收分配问题。烟草公司则使用各种策略性工具，有时候是见不得光的手段，最积极地推动烟草发展。

在卷烟领域，政府与烟草业的联盟关系使中国烟草治理复杂化。烟草业是政府的附庸，反过来说也对。国家和烟草业的界限模糊、有冲突，是中国烟草企业的一项明确特征（也是一项主要的促进因素）。政府官员与烟草相关的腐败比比皆是，不过（迄今）被抓和判刑的人数很少。过去十来年中国最广泛报道的一些腐败丑闻，根子在烟草业，败坏了国家、省市和企业三个层面的政治领导层。一个合理的结论是迫切需要更有效地治理烟草业，尤其是考虑到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正在酝酿。

这一章深入分析了省市层面的两个例子。在省一级，我们关注云南省，烟草是该省最大的行业，烟草税占当地政府收入的近

---

① 刘伟著，《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产业重组：以烟草业为例》。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78页。

一半。<sup>①</sup> 在烟草公司或工厂层面，我们关注云南省玉溪市红塔集团。通过研究中国烟草环境中这两个突出的省市级实体，我希望揭示烟草治理中的主要紧张关系，包括各级政府如何分配税收收入的紧张关系，也包括烟草相关的腐败如何渗透政治，省市和工厂领导人如何在北京开展政治游说、建立基于烟草业的联盟。

### 发展不均衡和当地保护主义

各地区烟叶和卷烟成品生产不平衡，是中国烟草业的一个显著特征。虽然目前中国大部分省份种植烟草（准确地说，大陆 31 个省中 27 个省市），烟叶生产大部分集中在云南、贵州、河南和四川省。<sup>②</sup> 2001 年，这四个省占中国烟草种植总面积的 61%（见图 7.1）。根据一项官方统计，2004 年，一般认为属于中国经济上欠发达地区的中西部省份生产的烟叶占全国烟叶生产的 70% 以上。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胡德伟和他的中国同事的研究，510 个烟叶种植县中，185 个是国家级贫困县，其余是省级贫困县。<sup>③</sup>

烟草生产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很重要。2004 年，在一些省市，

---

① Alexi A. Wright and Ingrid T. Katz, "Tobacco Tightrope-Balancing Disease Preven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vol. 356, no. 15 (April 12, 2007): 1493-1496.

② 没有任何烟草种植面积的四个省级辖区是北京、上海、天津和西藏。

③ 胡德伟编，《中国烟草税收：历史沿革、现状及改革》，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9，第 41 页。

烟草业占政府收入的 40 ~ 80%。<sup>①</sup> 比如, 安徽省蚌埠市和滁州市, 2009 年烟草税收和利润占利税总额的 70%。<sup>②</sup> 2009 年, 几个省份 (比如云南、湖南、贵州、河南) 的烟草利税占政府利税收入 183 的两位数。<sup>③</sup> 即便在上海, 那里已经有很大规模、多元化、发达的经济, 2007 年卷烟仍然占上海总税收收入的 10%。<sup>④</sup>

表 7.1 2010 年中国烟叶种植面积 (按省、直辖市)

182

省、直辖市	烟叶种植面积 (1,000 公顷)	烤烟烟叶 种植面积 (1,000 公顷)	烟叶种植面 积占各种作 物种植总面 积的百分比	烟叶种植面 积占中国烟 叶种植总面 积的百分比
云南	405.7	387.4	6.39	29.15
贵州	197.8	184.9	4.14	14.21
河南	127	111.7	0.90	9.13
四川	121.5	102.3	1.28	8.73
湖南	96.3	93	1.20	6.92

- ① 刘铁男和熊必琳编,《烟草经济与烟草控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引用于 Hong Wang, Tobacco Control in China: The Dilemma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ealth Improvement (New Haven, CT: Yal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2006), p. S142.
- ② 另一面, 网易, 2012 年 2 月 28 日, <http://news.163.com/special/00012Q9L/tobaccoindustry.html>.
- ③ 《中国经济周刊》, 2011 年 1 月 11 日。
- ④ Gordon Fairclough, "Taxing Addiction: China Confronts Price of Its Cigarette Habit,"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3, 2007, p. A. 1, <http://search.proquest.com/docview/399036755?accountid=26493>.

续表

省、直辖市	烟叶种植面积 (1,000公顷)	烤烟烟叶 种植面积 (1,000公顷)	烟叶种植面 积占各种作 物种植总面 积的百分比	烟叶种植面 积占中国烟 叶种植总面 积的百分比
湖北	74.6	55.9	0.99	5.36
福建	69	68.5	3.05	4.96
重庆	52.6	43.9	1.59	3.78
山东	45.7	45.3	0.42	3.29
黑龙江	37.3	32.3	0.31	2.68
陕西	36.8	36	0.89	2.65
广东	24.7	22.6	0.55	1.78
吉林	23.4	12.9	0.46	1.68
广西	20.1	16.3	0.34	1.44
江西	18.1	17.5	0.34	1.30
辽宁	12.5	11.4	0.32	0.90
安徽	10.4	10.2	0.12	0.75
甘肃	4.4	3.5	0.11	0.32
内蒙古	4.2	2.9	0.06	0.30
山西	3.8	3.6	0.10	0.27
河北	3	2.4	0.03	0.22
浙江	1.5	0	0.06	0.11
新疆	0.6	0.6	0.01	0.04

续表

省、直辖市	烟叶种植面积 (1,000公顷)	烤烟烟叶 种植面积 (1,000公顷)	烟叶种植面 积占各种作 物种植总面 积的百分比	烟叶种植面 积占中国烟 叶种植总面 积的百分比
宁夏	0.4	0.4	0.04	0.03
江苏	0.2	0	0.01	0.02
青海	0.2	0	0.04	0.01
全国总计	1,391.9	1,265.4	0.88	100

注：北京、上海、天津和西藏的烟草种植面积为零。

来源：国家发改委工业经济技术研究所，《我国烟草产业转型研究》，2011年2月10日，第3—4页。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年鉴出版社，2011年）。

表7.1也表明，按照烟草种植面积占所有作物种植面积的百分比，有几个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许多。云南烟草种植面积占所有农业用地的6.4%；贵州，占4.1%；福建，占3.1%；重庆，占1.6%；四川，占1.3%；湖南，占1.2%。在中国的其他省、直辖市，这个比例都没有超过1%。在全国范围内，根据最近的国家发改委报告，有500余个县、4400个村镇仍然种植烟草，有570,000户以及2200万农民从事烟草种植。<sup>①</sup>这些人中很多位于云南和贵州。

<sup>①</sup>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经济和技术研究所，《我国烟草产业转型研究》，2011年2月10日，第2页。

##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烟草税分配

1980年前，是省、直辖市政府而非中央政府来管理中国烟草行业的几乎各个方面。两个重大事件（1980年代初成立国家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1994年实行中央地方分税制）在中央和省、直辖市关系方面，对烟草行业的管理和商业激励产生深远影响。总的来说，烟草业贡献三种烟草税收入：1）烟草税；2）利润；3）其他税费。烟草税收入是主要来源，其他两项相对来说较小。<sup>①</sup>

表 7.2 显示 2009 年中国烟草相关税收分配情况。烟草税总收入 3850 亿元，其中 2080 亿元（54%）来自烟草消费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分别占 23% 和 13%。城市维护建设税、烟叶税和烟草公司个人所得税分别占烟草税总额的 1~5%。其他税收（烟草生产相关的物业税、印花税、城市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所占份额很小。

表 7.3 显示烟草税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情况。烟草  
184 消费税是烟草相关税收中最大的一种，全部归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还收到增值税的 75%，增值税是烟草相关税收的第二大税种。企业所得税是第三大税种，中央政府从 2002 年后成立的公司征收 100% 企业所得税，从 2002 年前成立的企业征收 60%。中央政

---

<sup>①</sup> 刘铁男和熊必琳编，《烟草经济与烟草控制》，第 168 页。

府和地方政府也共享烟草行业个人所得税，60% 归中央，40% 归地方。

表 7.2 2009 年中国烟草相关税收收入

184

税收类型	纳税额 (亿元)	占烟草税比例
烟草消费税	2084	54.2%
增值税	873	22.7%
企业所得税	483	12.6%
城市维护建设税	194	5.0%
烟叶税	81	2.1%
烟草行业个人所得税	40	1.0%
其他税种	91	2.4%
总计	3846	100.0

\* 其他税种包括烟草生产相关的物业税、印花税、城市土地使用税和土地增值税。

来源：王力等，2010 年《中国税务年鉴》(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10)，第 552—595 页。李成计算并制表。

表 7.3 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烟草税收入分配

184

归中央政府税收	中央和地方政府共享税收	归当地政府税收
烟草消费税	增值税 (中央 75%，地方 25%)	烟叶税
企业所得税 (2002 年后成立的企业)	企业所得税 (2002 年前成立的企业，60% 归中央，40% 归地方)	城市维护建设税

续表

归中央政府税收	中央和地方政府共享税收	归当地政府税收
	烟草行业个人所得税（60% 归中央，40% 归地方）	卷烟销售税
		教育附加税

来源：胡德伟编，《中国烟草税收：历史沿革、现状及改革》（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9年），第63页。李成制表。

185 地方政府收到烟草增值税的25%，所以对这一部分税收格外关心。其他一些相对较小的烟草相关税收（烟叶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卷烟销售税、教育附加税等）完全归地方政府。<sup>①</sup> 根据中国学者的研究，1994年到2000年，中央政府平均收到中国烟草税总收入的81%，其余19%归地方政府。<sup>②</sup> 即便中央政府收到所有烟草相关税收的大部分，归地方政府的小部分实际上仍是一些省市的主要收入来源。国家发改委2011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烟草税收入高于其他所有产品，烟草税收入对一些省市来说好比“印钞工厂”。<sup>③</sup> 云南省尤其如此，云南号称“烟草王国”。

① 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税制，详见胡德伟编，《中国烟草税收：历史沿革、现状及改革》。

② 陶明，《专卖体制下的中国烟草业：理论、问题与制度变革》，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第249页。

③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经济和技术研究院，《我国烟草产业转型研究》，第10—11页。



## 省一级分析：云南省

云南是中国烟草生产的中心。过去二十年，云南省烟草业对全省经济和全国烟草行业的贡献最显著。在所有省市中，云南省“著名品牌数量、总产量、销售额、市场份额、外汇收入、税收、设施和技术”均首屈一指。<sup>①</sup>如上所述，近些年云南烟草种植面积占全国烟草种植面积的29%，云南卷烟贸易额占全国总贸易额的28%，云南烟草相关税收占当地政府收入的49%。2007年，云南省供应了全国烤烟的三分之一和全国机制卷烟的五分之一。<sup>②</sup>

不过，云南之前并不是中国烟叶生产的主要省份。截止1978年，云南烤烟产量排全国第三位，落后于河南和山东。香港科技大学的Irene Eng注意到，1978年云南卷烟产量占全国产量的5%，排第六位，落后于河南（14%），山东（11%），安徽（7%），上海（7%）和河北（7%）。<sup>③</sup>

进入1980年代，云南烟草产业才突飞猛进。1979年，云南 186

---

① “The Biggest Tobacco Planting-Yunnan Province,” Busiunion.com, January 20, 2010, <http://www.busiunion.com/10-1//3830.jsp>.

② “Yunnan Province of China,” *China Provincial Update*, published by the Confederation of Indian Industry, vol. 1, no. 3 (June 1, 2007): 2.

③ Irene Eng, “Agglomeration and the Local State: The Tobacco Economy of Yunnan, China,”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ew Series, vol. 24, no. 3 (1999): 318-19.

烟草生产只贡献了全省 GDP 的 7%。但是，到 1995 年，所占份额增至 30%。与此类似，1978 年，云南烟草利税只占全省政府收入的 25%，到 1988 年，增至 63%，到 1997 年更增至近 80%。<sup>①</sup>到 1990 年代末，云南 4000 万人口中，大约 1000 人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事烟草种植、加工或销售。<sup>②</sup>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的烟草企业密度都比不上这里。

什么促进了 1970 年代末和 1980 年代初云南烟草业的迅速发展？从古巴大量进口食糖导致甘蔗种植减少，当然是一个因素；蔗糖替代品越来越容易获得，也是一个因素。这两个因素促使政府领导人审视农业工业化发展的替代品种。1980 年代中期烟草价格和税收收入的大幅增长，也激励了当地领导人促进烟草发展。不过，云南烟草胜利的最重要原因可以追溯到与省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和政治联系，他们的政治能量通过烟草相关的经济活动进一步增大。

表 7.4 提供了云南省 1977 年到现在（2014 年）的最高领导人（省委书记和省长）的个人信息。大部分似乎在北京或云南强大靠山的帮助下在政治生涯中平步青云。多名领导人，尤其是云南本地出生的领导人，对当地烟草的快速发展起到关键作用。比如，普朝柱、和志强两人都是云南人，是近期历史上担任云南省最高领导人时间最长的两个人。普朝柱从 1983 到 1985 年担任云

---

① 同上，第 320 页。郑天一、徐祖根编，《烟幕：烟草市场大扫描》，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第 40 页。

② 字国瑞、高发元编，《红塔集团跨世纪发展战略思考》，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第 11 页。

表 7.4 1977 至 2011 年云南省省委书记和省长

姓名	任期	出生年份	出生地	主要职业履历	政治背景
省委书记					
安平生	1977—1985	1917	陕西	广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1968—1975), 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 (1975—1977)	陶铸 (前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培养提拔对象
普朝柱	1985—1995	1929	云南	玉溪行署书记 (1979—1983), 云南省省长 (1983—1985)	安平生培养提拔对象
高严	1995—1997	1942	吉林	吉林省副省长 (1988—1992), 吉林省省长 (1992—1995)	李鹏 (前总理) 培养提拔对象, 2002 年叛逃澳大利亚
令狐安	1997—2001	1946	山西	劳动部副部长 (1989—1993), 云南省委副书记 (1993—1997)	太子党* (李东冶 [令狐俊文] 之子, 冶金工业部部长, 团派)
白恩培	2001—2011	1946	陕西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1993—1997), 青海省省长 (1997—1999), 青海省委常委 (1999—2001)	未知

续表

姓名	任期	出生年份	出生地	主要职业履历	政治背景
秦光荣	2011—2014	1950	湖南	长沙市委书记（1993—1998）， 云南省副省长（2003—2006）， 云南省省长（2006—2011）	团派**
(189) 省长					
安平生	1977—1979	见上			
刘明辉	1979—1983	1914	江西	云南省副省长、副书记（1968— 1979）	陈锡联（前中央政治局 委员、副总理）培养提 拔对象
普朝柱	1983—1985			如上	
和志强	1985—1998	1934	云南	云南省副省长（1983—1985）	
李嘉廷	1998-2001	1944	云南	哈尔滨市市长（1991—1992），黑 龙江省助理省长（1992—1993）， 云南省副省长（1993—1998）	尉健行（前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委员）培养提拔 对象，2001年被清除， （因为腐败指控）获死 刑，缓期两年执行，改 判无期徒刑

续表

姓名	任期	出生年份	出生地	主要职业履历	政治背景
徐荣凯	2001—2006	1942	重庆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1993—1998），国务院副秘书长（1998—2001）	李岚清（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培养提拔对象
秦光荣	2006—2011			见上	
李纪恒	2011—2014	1957	广西	广西自治区区委副书记（2003—2006），云南省委副书记（2006—2011）	未知

\* 太子党指的是高级别官员的子女。

\*\* 团派（或“共青团派”）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个非正式的派别，包括通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晋升的领导人。

来源：新华社。李成制表。

南省省长，之后从 1985 年到 1995 年担任省委书记。和志强担任省长 14 年（从 1985 到 1998 年），在此期间，云南烟草业发展尤其迅速。其他云南省最高领导人只担任了几年。比如，高严，受到前总理李鹏提携，从 1995 年到 1997 年担任云南省委书记。高严后来因腐败指控受到审查，据报道 2002 年叛逃澳大利亚。他是中国历史上叛逃到西方的最高级别官员之一。

普朝柱的个人背景及其在云南省烟草行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  
187 很能说明问题。他在云南黎县（近华宁）玉溪市出生。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云南，包括 1949 年前参与共产党学生运动活动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1950 年代，他担任玉溪市税务局局长，后担任玉溪市财政商业部副主任和主任。1979 到 1983 年，普朝柱担任玉溪地委书记，红塔卷烟厂（今天强大的红塔集团的核心）就在这里。普朝柱对扩大红塔厂功不可没，他帮助吸引资金投入，购买最先进的卷烟生产机器（包括英国制造商的机器）。<sup>①</sup>在他的领路人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的帮助下，普朝柱 1983 年从地委书记跃升省委副书记、省长。

作为省长，普朝柱把云南烟草行业发展列为优先重点。在之后三年，云南省从英国和日本购买了先进的烟草生产设备。1984 年一年，云南就购买了价值 5000 万美元的外国设备，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支出，尤其对一个贫困省来说。<sup>②</sup>

---

① 更详细讨论，见普朝柱的回忆录，《普朝柱：我的成长与云南的变革》，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

② 郑天一、徐祖根编，《烟幕：烟草市场大扫描》，第 40 页。

普朝柱对云南省烟草业也采取了两项新的政策措施。第一项是云南省利用高质量烟叶，生产更高档（即更贵）的卷烟。结果，高档卷烟占云南省总产量的比例从1983年的3%，到1995年增加至30%。<sup>①</sup>在这段时间，高档卷烟品牌（红塔山、玉溪和云烟）成为全中国最著名的品牌。第二，普朝柱分配了更多资源，制定了优惠政策，帮助红塔集团快速发展。他本人就出生在红塔集团所在地玉溪市，曾担任这里的领导人。在普朝柱和省政府的强大支持下，红塔采取了三合一系统，统一管理烟叶种植、卷烟生产和销售。由此，红塔在国内和国际市场更有竞争力。1991年，红塔成为全国第一个获得“国家级企业”称号的烟草厂。<sup>②</sup>

在普朝柱担任省委书记期间，他和他的同事和志强省长经常当面或通过信件游说国家领导人（比如李鹏总理），对云南省烟草行业采取优惠政策，包括为扶贫和自然灾害减税。<sup>③</sup>在2003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普朝柱骄傲地提到，云南省烟草行业尤其是红塔集团的壮大是他最大的遗产。<sup>④</sup>可以说，这种造神故事夸大了普朝柱、和志强等省级领导的作用。不过，一个区域行业的关键人物的意见和决定在缺乏更正式的政策制定过程的政治系统中确实可能极其重要。

---

① 《生活新报》，2008年4月24日，[http://www.shxb.net/html/20080424/20080424\\_89071\\_2.shtml](http://www.shxb.net/html/20080424/20080424_89071_2.shtml)。

② 普朝柱，《我的成长与云南的变革》。

③ 对游说的更详细讨论，见和志强的回忆录，和志强著，《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云南经济发展宏观决策回顾》，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④ 普朝柱，《我的成长与云南的变革》。

## 烟草：云南省官员腐败的最大来源？

在 1990 年代，普朝柱和和志强都被怀疑涉嫌烟草相关腐败，但是两人都没有受到指控。<sup>①</sup>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云南省政府官员为了免费获得大量高档卷烟，给省内烟草公司和工厂批小条子尤其有名。这些似乎微小的行为，实际上能把腐败官员瞬间变成百万富翁。<sup>②</sup>

不过，过去十年中，受到腐败指控的烟草业官员相对很少，包括国家烟草专卖局各个级别的官员。根据 2009 年的官方数据，全国当年 7,730 人因烟草相关违法活动被捕，3,905 人被判入狱。<sup>③</sup>同一年，烟草行业因腐败指控被捕的仅有 22 名官员。<sup>④</sup>2008 年，因腐败被送入监狱的烟草业官员只有两名。<sup>⑤</sup>这令人奇怪，因为在许多中国公众看来，国家烟草局的各级官员，包括贫困地区的官员，肆意挥霍和腐败的名声远扬。2011 年，官方媒体《中国青年报》披露，广东省一个贫困县烟草专卖局的官员在专卖局自己的

---

① 例子见 Supersite Net, 2001 年 11 月 13 日, <http://bbs.lasg.ac.cn/?action-viewthread-tid-28544>.

② 同上。

③ 国家烟草专卖局, 2009 年《中国烟草年鉴》,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年, 第 216 页。

④ 同上, 第 223 页。

⑤ 同上, 第 103 页。



食堂摆宴花了 130,000 元。商务宴请的月度支出是令人瞩目的 200 万元。<sup>①</sup>

过去十年间，云南最大的两起腐败丑闻与烟草相关。第一起导致云南省前任省长李嘉廷被免职并判死刑。第二起涉及李薇，她一开始从事烟草走私，后来成为中国几个省部级领导的公共情妇。过去十年，她涉及多起大型腐败案件。下文详细讨论这两起丑闻。

### 前云南省省长李嘉廷案

191

李嘉廷，彝族，1944 年出生在云南省红河州石屏县（近玉溪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63 到 1968 年，他在清华大学学习。毕业后，他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工作了 24 年，在此期间，他成了尉健行培养提拔的对象。尉健行是一位重量级的政治家，后来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党纪。1970 年代，尉健行和李嘉廷都在哈尔滨的机械行业工作。尉健行 1981 到 1983 年担任哈尔滨市市长。1985 年尉健行进京担任位高权重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李嘉廷被任命为哈尔滨市常务副市长，后升任哈尔滨市长、黑龙江副省长，1992 年调回原出生省份云南。在云南，李嘉廷先担任常务副省长。1998 年，尉健行成为中常委一年后，李嘉廷被任命为云南省省长。

---

<sup>①</sup> 《中国青年报》，2011 年 1 月 26 日，也可在线访问，[http://zqb.cyol.com/html/2011-02/26/nw.D110000zgqnb\\_20110126\\_4-05.htm](http://zqb.cyol.com/html/2011-02/26/nw.D110000zgqnb_20110126_4-05.htm)。

作为云南本地人，在中南海有这么强大的靠山，李嘉廷担任省长有个好的开始。他给中央的一些高层领导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包括江泽民总书记，比如1999年昆明国际园艺博览会的组织工作。<sup>①</sup>据报道，李嘉廷与邓小平的遗孀卓琳建立了强有力的联系，卓琳自己出生在云南宣威县。（卓琳父亲是该县国民政府的烟酒专卖局局长。）李嘉廷也是邓小平儿子邓朴方的密友。在他1993年到2001年担任云南省领导期间，李嘉廷经常去北京游说中央政府（有时候通过位高权重的朋友），希望获得对云南省的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尤其是对云南省最重要、最赚钱的产品烟草制品。<sup>②</sup>

李嘉廷也与云南省的主要烟草公司建立了很密切的关系。新华社报道说（在李嘉廷被捕后），李嘉廷有五个卧室的豪宅就像个烟铺，装满了卷烟生产商作为礼物送给他的各种名贵卷烟。<sup>③</sup>对他的两项主要腐败指控都与烟草相关。第一项发生在1994年，李嘉廷希望把他的儿子李勃送到国外读书。李勃已经是哈尔滨科技大学的毕业生。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是云南省领导的常见做法，在中国其他地方也一样。一个例子是当时李嘉廷的上级、省委书记普朝柱的儿子普翔。1992年，云南省把在昆明当医生的普翔作为访问学者送到美国读书。普翔后来放弃了他的医学职业，移民到加拿大，在那里成为一名商人，主要从事与其原籍云南省的

---

① 根据未经验证的来源，江泽民一次评论说，未来应考虑李嘉廷作为副总理人选。

② 上述讨论基于作者2010年3月在昆明和昭通的访谈，以及2011年3月到4月在昆明、丽江和大理的访谈。

③ 新华社，2003年5月20日，[http://www.yn.xinhuanet.com/ynnews/zt/2003/szdl/xlym/\\_001.htm](http://www.yn.xinhuanet.com/ynnews/zt/2003/szdl/xlym/_001.htm)。

贸易。<sup>①</sup>

为了获得儿子海外学习的资金，李嘉廷 1994 年请香港焕德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商人杨荣帮忙。杨荣首先用 500,000 元贿赂了广东的一个公安局，使李勃获得进出香港的长期通行证，后来向李勃在香港的银行账户转入总计 640 万港币。为了回报帮助，李嘉廷向云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打招呼，“照顾”杨荣出口 13,000 箱卷烟的申请，杨荣从中立即赚取了 1000 万元以上的利润。<sup>②</sup> 不过，李勃从未留学。他成为企业家，在昆明、哈尔滨、香港从事房地产、土地租赁、汽车销售、道路建设和其他业务。比如，他是奥迪汽车公司在云南的总代理。

2001 年秋，李嘉廷被捕。对他有多项非法活动的指控，包括受贿总计 2100 万元。2003 年他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之后改判无期徒刑）。他的儿子李勃被判 15 年。李嘉廷被捕后不久，他的妻子、曾是清华同学的王骁自杀。

李嘉廷家庭的悲剧显然与烟草业的权力相关，反映了政府官员对这一获利丰厚的业务的贪婪。这也许有助于解释李勃说过的一句“名言”，这句话在中国互联网上流传很广：“高干子弟哪个不做生意？没个千儿八百万就干脆别在‘太子党’里混，别的高

---

① 生活时报网，2008 年 9 月 7 日，[http://www.shxb.net/html/20080907/20080907\\_108651\\_2.shtml](http://www.shxb.net/html/20080907/20080907_108651_2.shtml)。

② 李清川，《多面人李嘉廷：从省长到人民公敌》，《新民周刊》，2003 年 7 月 25 日，<http://news.sina.com.cn/c/2003-07-25/22061414275.shtml>。

干子弟也瞧不起你。”<sup>①</sup>毫不奇怪，云南省许多官员及其家庭成员都似乎有意从云南烟草业 700 亿元税收收入和 400 亿元著名品牌卷烟中分一杯羹。

### 193 “公共情妇”李薇案

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起腐败丑闻能像李薇案一样，涉及这么多不同行业的这么多高级领导，包括十多名省部级领导，其中多名领导现在还在监狱服无期徒刑。包括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山东省前省委副书记杜世成、中国石化前 CEO 陈同海、最高法院前副院长黄松有、北京前副市长刘志华、国家开发银行前副行长王益、公安部前助理部长郑少东。<sup>②</sup>

据称，其他高级官员也与李薇有染，包括前财政部长金人庆、前外交部长李肇星。<sup>③</sup>一本在海外出版的中文书在提到李薇时，用“公共情妇”这个词。<sup>④</sup>这些坊间流传的性丑闻没有能得到独立证实。但是，2011 年 2 月，中国一家主要的新闻杂志《财经》对李薇案做了长篇封面报道，列出了她位高权重的后台，介绍了一些“利益交换”的细节。<sup>⑤</sup>

---

① 夏汉东、程功义，《十八大常委名单：派系和变数》，《内幕》，2011 年 9/10 月，第 46 页。太子党，指共产党重要官员的后代。

② 夏汉东、程功义：《十八大常委竞争人物》，《内幕》，2011 年 9/10 月，第 119 页。

③ 同上。

④ Yang Yun and Fang Yanhong，《公共情妇》。（New York: Mirror Books, 2008）。

⑤ 罗昌平，《公共裙带》，《财经》第 4 期，2011 年 2 月 14 日。

李嘉廷 2001 年因腐败指控被捕时，李薇曾接受调查。不过，她没有像李嘉廷的其他情妇一样受审。罗昌平的调查报道引用了一条李薇对她朋友说的评论，提到她早年学到的经验教训：“不能将所有的资源与机会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要组成一个巨大的关系网，伞一样的网。”<sup>①</sup>显然，在李嘉廷案之后，她建立了这样的网络。2001 年后，她把业务从中国南部和西南部扩大到中部和东部，在北京、青岛、深圳、香港和海外成立了大约 20 家公司。这些公司包括烟草、房地产、广告、石油和证券业务，合计总资产在 100 亿元左右。李薇似乎受到位高权重的后台的保护。她似乎也掌握了中国记者所谓的“性、权、钱的网络”。<sup>②</sup>

2003 年，在与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相恋时，李薇要求他把太平角区域的一块 61000 平方米的土地租赁给她的公司。太平角是海港城市青岛最美的地段之一。李再把这块土地卖给首创集团和青岛城市开发公司，几乎立即就获得了 8400 万元利润。<sup>③</sup>作为贿赂，李薇送给杜世成 170 万元，后来杜世成因这次受贿被判入狱。同样，2006 年，李薇的另一个情人，中国石化前 CEO 陈同海通过中国石化控股公司泰山石油的股权转让，帮助她在一个半月内赚了 2 亿元。2007 年，陈同海据说因受贿 1.95 亿元被捕。2009 年，他被判死刑，后来缓期两年执行，然后转为无期徒刑。<sup>④</sup>有趣的是，虽然杜世成、陈同海、以及李薇的其他情人都被判处死

194

---

① 从上文引用。

② 同上。

③ 对这起土地转让的更详细讨论，见上文。

④ 同上。

刑或无期徒刑，李薇只是 2006 年因逃税被短暂控制。目前李薇自由，其海外资产显然还在继续增长。

## 公司层面的分析：红塔集团

红塔集团（以及主要工厂玉溪卷烟厂）总部位于云南中部玉溪市，距离昆明约 90 公里。玉溪被称为烟草之城，该市 80% 的税收收入来自烟草税。<sup>①</sup> 玉溪卷烟厂成立于 1956 年，当时是一家小型烟叶复烤厂。1995 年，它与其他几家烟草厂合并，成为一家集团公司。<sup>②</sup> 几十年来，已经发展成为一家现代化跨国企业。红塔集团年产 930 亿支卷烟，是中国最大的卷烟生产厂、世界最大的烟草公司之一。<sup>③</sup>

2007 年，报道说红塔集团的红梅牌卷烟超过了 Philip Morris 的核心品牌 L&M。最近，红塔集团的官员对外国媒体说，玉溪卷

---

① Louisa Lim 注意到，“玉溪有红塔大道、红塔酒店、红塔体育馆，甚至专门探讨吸烟愉悦的烟草文化博物馆。”见 Louisa Lim, “China Dependent on Tobacco in More Ways Than One,” National Public Radio, February 18, 2011, <http://www.scpr.org/news/2011/02/18/china-dependent-on-tobacco-in-more-ways-than-one>。

② 对红塔集团历史的更多讨论，见字国瑞、高发元编，《红塔集团跨世纪发展战略思考》，1999 年，第 10 页。

③ 《红塔致力于成为世界顶尖卷烟制造商》，2008 年 12 月 18 日，<http://chinarealnews.typepad.com/chinarealnews/2008/12/hongta-group-aims-to-become-worlds-leading-cigarette-maker.html>。

烟厂“每天能处理 25 亿支烟”。<sup>①</sup> 2002 年，在全国十大卷烟品牌中，红塔集团独占四个（红塔山、玉溪、恭贺新禧、红梅）。<sup>②</sup> 公司的主要品牌红塔山连续七年获得“中国最具价值品牌”一等奖；2000 年，红塔品牌的价值估计 439 亿元。<sup>③</sup> 2011 年，红塔山为中国贡献了 685 亿元利税，而 2003 年只贡献了 260 亿元。<sup>④</sup> 在中国烟草行业，红塔集团常被赞誉为“中国国有工业的旗帜”。<sup>⑤</sup> 195

值得一提的是，1975 年，玉溪卷烟厂只有 1000 万元资产；不过，到 1995 年，已经成为一个企业巨头，有 70 亿元资产。玉溪卷烟厂的收入从 1980 年的 1.1 亿元，到 1996 年增长到 200 亿元。<sup>⑥</sup> 云南和其他地方都普遍认为，玉溪卷烟厂的总经理褚时健对红塔集团及其前身玉溪卷烟厂的迅速崛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对工厂现代化的策略性方向，加上他传奇的个人生活，为他赢得了“红塔帝国”“烟草大王”的绰号。<sup>⑦</sup>

---

① Mark Godfrey, “China’s Largest Selling Cigarette Brand Shapes up for Exports with Low Tar and Better Packaging,” March 9, 2011, <http://www.thefreelibrary.com/China's+largest+selling+cigarette+brand+shapes+up+for+exports+with...-a0226476958>.

② 胡德伟、毛正中编，《中国烟草控制的经济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第 117 页。

③ 刘铁男、熊必琳编，《烟草经济与烟草控制》，第 126 页。

④ 《红塔时报》，第 826 期，2011 年 2 月 15 日，第 20 页。

⑤ Tobacco Market Net, March 5, 2012, <http://www.etmoc.com/firm/FirmShow.asp?id=92>.

⑥ 陶明，《专卖体制下的中国烟草业》，第 224—225 页。

⑦ 《褚时健：把烟草管理成印钞工厂》，《南方人物周刊》，2008 年 9 月 23 日，<http://news.hexun.com/2008-09-23/109127819.html>。

## 褚时健：中国烟草行业旗舰公司的“教父”

褚时健 1928 年出生在云南华宁县一个农民家庭。高中毕业后，褚时健到多个不同的糖厂、酿酒厂、农场和畜牧场、造纸厂工作。<sup>①</sup>他 195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科长，之后 1979 年被任命为玉溪卷烟厂总经理。他担任玉溪卷烟厂总经理的时候，他的靠山、华宁县老乡普朝柱刚好同时被任命为玉溪地区财政局局长。1979 年，普朝柱开始担任玉溪行署专员和地委副书记，1983 年开始担任云南省省长。

不清楚是普朝柱还是褚时健首先想到了三合一制度，把烟草种植、生产和销售结合到一起。不过，玉溪卷烟厂是在褚时健领导下首先实施这个制度。褚时健把烟草种植称为玉溪卷烟厂的“第一车间”。在褚时健的引导下，工厂把业务也拓展到烟叶种植和生产。从管理的角度，玉溪卷烟厂、玉溪烟草公司和玉溪烟草专卖局合并成为一个实体。1980 年代中期，褚时健是工厂总经理、公司董事长、当地烟草专卖局局长。

196 在玉溪地区和省最高领导人的强大支持下，褚时健在后续几年做了两项重要举措。第一项，作为 1980 年代初企业改革的一部分，企业资金从“拨款”改为“贷款”。褚时健抓住这个机会，获得了云南省几乎全部外汇（2300 万美元），他把外汇用于从英国购买最新的烟草设备。1985 年，玉溪卷烟厂实现了技术革新，成

---

<sup>①</sup> 同上。



为一家现代化烟草工厂。

1988年，云南经历了一次大地震。在地震灾害后，褚时健敦促省政府向中央政府寻求“扩大产量，弥补地震损失”的政策。中央政府面临财政压力，因此接受了褚时健的建议。结果，云南省的烟草产量配额增加了一倍，还有3000万美元贷款。因为获准建立全国技术上最先进的卷烟生产线，玉溪卷烟厂是这项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到1990年代，玉溪卷烟厂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烟草生产技术，凭借这些技术获取了巨额回报。1994年，玉溪公司获得61亿元利润，比全国第二大烟草厂上海卷烟厂高很多，后者利润只有9.4亿元。<sup>①</sup>

褚时健的第二个重要行动从1994年开始。红塔集团在全国设立了大约12,000家红塔烟草专营店。这一专营分销的新方法使公司1996年的年产量提高到900,000箱，获得利润410亿元。<sup>②</sup>后来，红塔集团也在中国六个主要城市（昆明、成都、深圳、上海、郑州、西安）的机场设立了专门销售红塔品牌卷烟的商店。为了推广红塔牌卷烟，红塔集团还在深圳机场设立了两个吸烟室。<sup>③</sup>褚时健还发起了积极的公关宣传。比如，1988年，玉溪卷烟厂是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主要赞助商，中国大部分人口都收看这个节目。<sup>④</sup>

---

① 这一讨论根据：陶明著，《专卖体制下的中国烟草业》，第225页。

② 刘伟著，《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产业重组》，第131页。

③ 红塔烟草集团有限公司，《红塔集团志（1956—2005）》，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223页。

④ 同上，第471页。

在褚时健担任玉溪卷烟厂总经理的 18 年间，烟草年产量从 197 275,000 箱增加到 2,183,000 箱。工厂总收入和利润 991 亿元。公司年均销量增加幅度达到 44%。<sup>①</sup>从 1988 年到 1996 年，红塔集团的收入和利润是如此可观，一直位居全国十大“模范公司”之列。1996 年，玉溪卷烟厂收入和利润占云南省各行业活动总收入和利润的 56%。<sup>②</sup>褚时健从省政府和国家政府收到许多荣誉奖励，包括“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和“年度十大改革者”。多位国家领导人（包括胡锦涛、朱镕基和吴邦国）在褚时健主事期间参观了玉溪卷烟厂（见表 7.5）。政治局委员田纪云、吴邦国、姜春云和吴仪，省领导人普朝柱、和志强、令狐安和李嘉廷都参观过红塔集 198 团。<sup>③</sup>这些参观访问常常（并且也理应）被看作是共产党领导层的强烈肯定。

197

表 7.5 国家领导人参观玉溪红塔集团

领导人	参观时职位	参观日期
胡启立	中央政治局常委	1989 年 1 月
田纪云	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	1991 年 4 月
朱镕基	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	1992 年 12 月

① 张赋宇，《红塔山：一个品牌在专卖制度下的沉浮》，《二十一世纪经济导报》，2003 年 6 月 30 日，<http://finance.sina.com.cn/b/2003-630/1455358374.shtml>。

② 字国瑞、高发元编，《红塔集团跨世纪发展战略思考》，第 11 页。

③ 字国瑞编，《红塔集团跨世纪发展战略实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 193 页。

续表

领导人	参观时职位	参观日期
胡锦涛	中央政治局常委	1993年12月
吴邦国	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	1995年11月
刘华清	中央政治局常委	1996年4月
姜春云	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	1996年11月
李瑞环	中央政治局常委	1999年3月
田纪云	中央政治局委员	2001年4月
吴官正	中央政治局常委	2003年6月
曾培炎	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	2003年8月
王兆国	中央政治局委员	2004年1月
罗干	中央政治局常委	2004年7月
黄菊	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	2005年9月
曾培炎	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	2006年8月

来源：红塔烟草集团有限公司，《红塔集团志（1956—2005）》，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另外，<http://www.tobaccochina.com/zt/hongta100w/index.html> 和 [http://www.tobaccochina.com/zt/2006\\_50years/eneve.html](http://www.tobaccochina.com/zt/2006_50years/eneve.html)。李成制表。

讽刺的是，中国这个国有企业家模范人物突然摔了个大跟头。1996年春，褚时健因腐败被查。那一年12月，据说在褚时健在试图进入越南时，公安部门在云南南部的边境检查站拘留了他。一个广为传播的谣言说，褚时健随身携带了一个小行李箱，里面有国家各级别领导人批的许多小条子，要求免费调拨大量昂

贵卷烟。这个行李箱在后来对褚时健长达两年的审判中从未提及。1999年初，褚时健因收受贿赂174万美元，被判无期徒刑。他的女儿褚映红也被指控受贿至少三次，分别为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和300,000美元。褚映红没有在法院出庭受审，因为在他的父亲被调查后，已经自杀。玉溪卷烟厂的其他高级领导也因为经济犯罪被判多年徒刑。<sup>①</sup>不过，这个案件没有牵涉省或国家领导人。字国瑞1996年被任命为新的总经理，他后来为了帮助李嘉廷和他的情妇，购买了招摇的昆明佳华广场一栋楼（红塔集团1979到2012年的总经理名单，见表7.6）。

198

表 7.6 红塔集团历任总经理，1979—2012

姓名	总经理任期	出生年份	出生地	这一职务前任职
褚时健	1979—1996	1928	云南（华宁）	玉溪行署人事科科长
字国瑞	1996—2002	1946	云南（凤庆）	红塔集团党委书记
姚庆艳	2002—2005	1957	山东	云南烟草研究院院长
柳万东	2005—2006	1950	云南（易门）	红塔集团党委书记
李穗明	2006	1957	山西	红塔集团副总经理

来源：红塔烟草集团有限公司，《红塔集团志（1956—2005）》，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第541—554页。李成制表。

199

几年后，褚时健的刑期从无期徒刑减至17年。2002年春，他因健康原因保外就医。中国烟草业的传奇人物现在住在云南中

<sup>①</sup> 红塔烟草集团有限公司，《红塔集团志（1956—2005）》，第143页。

部的哀牢山上，经营着一大片橙园，雇佣着约 200 个工人。从 2007 年起，一种新型的橙子（“褚橙”）在昆明和玉溪的几乎每个水果摊位都可以买到。

褚时健离开后的玉溪卷烟厂在 1996 到 2004 年间经历了剧烈滑坡。<sup>①</sup> 国家烟草专卖局禁止红塔山牌卷烟在其他地区直接销售，结束了褚时健开创的做法。2000 年，红塔山销售了 560,000 箱（利润 13 亿元），意味着与 1996 年相比，销售额下降 40%，利润下降 70%。<sup>②</sup>

### 结论：领导者个人，工业利益，机构发展

中国控烟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国家机构内固有的冲突。国家烟草专卖局既是国家烟草业的管理者和经营者，是一个享有巨大烟草利益的中央政府机构，又负责履行中国在《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下的义务。推广和管理中国烟草市场的主要机构实际上也是协调控烟的主要机构。

政府领导人与公司实体之间密切的联系显然不是中国新出现的现象。不过，这些联系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官员腐败比比皆是，随着这些公司获得钱和权，涉及的资金数额巨大。中国最

---

① 见红塔集团网站，2012 年 3 月 5 日，<http://www.tobaccochina.com/zt/hongta100w/index.html>。

② 陶明著，《专卖体制下的中国烟草业》，第 255 页。

近新造了一个词“黑领”，指国有企业和行业精英，包括在银行、石油、电力、煤炭、电信、航空、铁路、航运和烟草等垄断行业工作的人。这些有钱有权的精英穿黑色衣服，开黑色汽车，有隐藏收入，与情妇过隐秘的生活，甚至与地下犯罪分子（黑社会）有联系，最重要的是，以不透明的方式经营业务、施展经济力量。

200 中国媒体广泛报道说，这些商业利益群体经常贿赂地方官员，与地方政府形成“邪恶联盟”。<sup>①</sup>

这些企业利益群体可能与西方国家的利益群体一样强大。比如，在美国，数百个游说群体在华盛顿特区游走，他们构成现在美国政治的一项基本特征。这些商业游说不时被人发现，试图为某个公司或某种产品的商业利益，操纵民主系统。不过，在一个民主的政治系统中，人们会期待机构性和法律机制成为限制这些游说群体必不可少的力量，防止金钱和权力的结合。对今天的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界限常常模糊不清，我们迫切需要防止政治裙带关系并促进更高透明度的法律。从更广的角度看，中国公共卫生要依赖中国政治体系的健康发展，以及中国民间社会组织所起到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概念设想和实际操作的角度看，中国公众和反吸烟非政府组织应动员起来，致力于让公众更深入了解烟草相关企业各个方面的利益攸关方的利益和动机。这一章试图审视烟草业的历史背景，以及在省和企业层面的烟草领导层的关键人物的个人背景、

---

<sup>①</sup> 《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1月13日；《瞭望》，2005年12月5日；另见 <http://www.chinesenewsnet.com>，2005年12月12日。

政治网络、经济利益和商业联系。这一章显示，有效的烟草控制面临许多政治障碍，进一步表明公共卫生倡导者需要绘制出策略性地图，据此更好地在这个复杂、基本不透明和高度政治化的领域航行。







阻撓控烟



## 第八章

207

### 中国的过滤嘴卷烟与降焦减害的谎言

Matthew Kohrman, 孙鹏, Robert N. Proctor, 杨功焕

“她根本不抽烟，所以她身体不好。”

“我这个是他们对付我特殊制造的，过滤嘴长。哈，过滤嘴比烟还长！”

——邓小平，1980 年与乔治·H·布什谈论妻子卓琳时开玩笑；  
1986 年与一名记者聊天时，谈及医生和家人因为担心自己的健康而安排专门为他生产的熊猫牌卷烟。

围绕烟草有很多神话，其中最为有害的莫过于以下观念：如果一个人要吸卷烟，那么选择后面有干净白色滤嘴的低焦油品牌会更加安全。这一想法荼毒甚广，它基于一种人们通常持有的错误观念，即认为通过过滤有害物质便可以降低吸烟对健康的损害。

几十年来，烟草制造商一直致力于为卷烟添加过滤嘴并给其中的一些卷烟打上“低焦油”的标签。令人惊讶的是，公共卫生

界的许多人士实际上也是最近才纠正了过滤嘴卷烟更安全的认知谬误。直到 2000 年左右，学者们通过接触欧洲和美国烟草业界的部分档案才更正了这一认识。这些档案资料揭示了有过滤嘴的所谓低焦油卷烟并不能减少吸烟者吸入肺中的有害物质的量。事实证明过滤嘴并不能真正滤掉烟雾中的任何东西，吸低焦油卷烟也不会让吸烟者少吸入焦油。实际上，低焦油产品更加危险，因为它助长了将烟雾深吸入肺的倾向，并且因此会导致更多种类的癌症；与此同时，过滤嘴也改变了烟雾的化学成分，并生成了新的有毒物质。<sup>①</sup>

208 那么在中国，过滤嘴和低焦油卷烟是如何被创制、生产和营销的呢？在中国，这一过程与过滤嘴及低焦油卷烟在其他国家的兴起与发展情况迥然不同。最早，过滤嘴卷烟在 1950 年代末期在中国被创制出来，为国庆献礼，并且仅供应党的领导阶层。若干年后，昂贵的过滤嘴卷烟品牌成为借助科学之威望赚取更高利润的有效手段。再往后，则涉及到更为严重的公然欺骗。1990 年代末，烟草工业界公然宣称低焦油卷烟更安全，当有见识的消费者越来越多地了解吸烟的毒性时，烟草业反而成功地利用了这一骗局牟利。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在中国也是受教育程度最好的人反而被过滤嘴降焦减害的神话欺骗最深。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何一位隶属于烟草工业的科技工作者，所谓的“中国低焦油卷烟之父”，会在 2011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

① USDHHS, *The Health Consequences of Smoking: Fifty Years of Progress. A Report of the Surgeon General*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4).

## 中国之外的过滤嘴狂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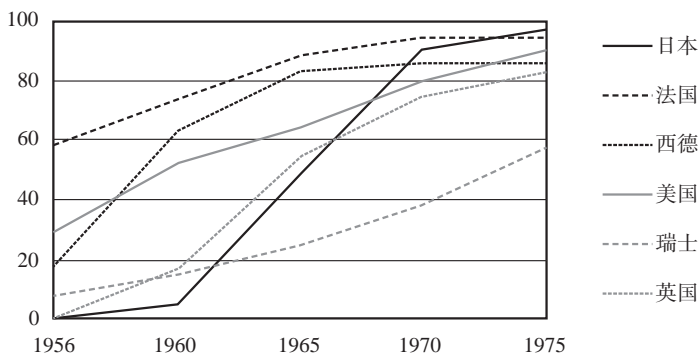
为卷烟添加所谓滤嘴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当时欧洲的烟草制造商首先试验用棉絮或纸屑放在卷烟的末端，使吸烟感受不那么呛烈。1925 年，Boris Aivaz 在英国本茨尔造纸厂（Bunzl Paper Mill）的奥特曼（Ortmann）工厂工作时进行了一些实验，并申请了一项利用皱纹纸和纤维素生产卷烟过滤嘴的专利。然而，对吸烟造成健康危害的恐惧当时还不是美国或欧洲主流文化的重要部分，因此少数几个带有过滤嘴的卷烟品牌在市场上表现不佳；在这些品牌中，总督牌（Viceroy）算是在美国最有名的。

在 1950 年代关于卷烟与肺癌之间关联性的研究发表后，这种情况开始改变。1952 年到 1954 年，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吸烟者为他们的生命健康担忧，因此开始戒烟或减少吸烟，卷烟的销量因此大幅下降。面临“健康恐慌”冲击的烟草业紧接着进行了相应对策调整，这一过程为历史研究者所熟知，并被认为是一场阴谋。烟草业努力引导吸烟者将所谓的过滤嘴、低焦油卷烟作为替代产品，而不是戒烟停吸<sup>①</sup>。万宝路（Marlboro）、温斯顿（Winston）和健牌（Kent）在这一时期成为了流行的过滤嘴品牌，这都要归

---

<sup>①</sup> Robert N. Proctor, *Golden Holocaust: Origins of the Cigarette Catastrophe and the Case for Aboli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209 功于烟草企业激进的大规模营销和新一代消费者对烟草可能危害生命的担心。过滤嘴卷烟当时被认为是一种更安全的吸烟方式，其市场占有率从 1950 年的 1% 增长到 1970 年代中期的 80%， “安全” 卷烟的时代随之到来了（见图 8.1）。



209 图 8.1 1956-1975 年，在 20 世纪全球六个主要卷烟生产国中，过滤嘴卷烟占全部卷烟产量的百分比变化图。

在中国，过滤嘴烟的创制、推广和普及的方式和过程与此略有不同。这种全新卷烟品类的诞生，发生在有历史传统的中国烟草业中心——上海，是为了向 1959 年的国庆 10 周年献礼。上海卷烟厂的领导们机敏地利用了即将到来的国庆庆典机会，创制了中国的过滤嘴卷烟。他们将国产过滤嘴卷烟作为拟向国庆十周年和领导人的重要特殊献礼，说服了在北京的国家中层管理者给予他们特别的进口权，从而获得了多种相关新型设备。从日本供应商处，上海卷烟厂获得了过滤嘴，同时在一个香港公司的帮助下，上海卷烟厂购买了一小批西德 Hauni 公司制造的机器设备。值得

注意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造成重大灾难与生产破坏的“大跃进”运动（1958—1962）初期。尽管混乱不断升级，上海卷烟厂的工作人员仍克服了海关的阻力和技术上的困境，成功生产了一定数量的试制批次过滤嘴卷烟。

随着1959年10月国庆迅速临近，上海卷烟厂正式推出了新 210  
中国第一种过滤嘴卷烟，并作为其旗舰品牌“中华”的新产品。包装装箱后，第一批货迅速发往北京并分发给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高级领导人。

随后的几十年，中国过滤嘴卷烟的产量在总体占比上一直微乎其微，此类产品大部分仍然主要供应政府高层官员。直到1980年代初，中国只有几家卷烟厂在生产过滤嘴产品，仅占全国总产量的6%；与此同时，因为新中国建国后设置的严格外贸管制，国外制造商生产的卷烟仍然基本无法到达中国消费者手中。然而到1990年代末，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外国卷烟仍然不能进入中国市场，但到了2000年几乎中国所有的卷烟产品都已经加装了过滤嘴。这一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又为何转变的如此迅速？更为有趣的是，这一切仅仅只用了10年时间，从1985年到1995年，过滤嘴卷烟在中国卷烟总产量的占比从13%提升到了87%（见表8.1）。<sup>①</sup>

---

① 雷樟泉、杨进、储国海、胡清源：《我国卷烟降焦历程回顾、现状与展望》，《烟草科技》2003年第5期，29—31页。

## 过滤嘴——匡扶财政的品质烟

是什么导致了这一戏剧性的巨变？一种解释认为这与党和国家对烟草工业的新期望有关。在毛泽东领导的时代（1949—1976），国家希望烟草工业创造稳定收入，稳定政府财政。但1980年代以来，烟草工业作为中国计划内经济的重要分支被寄予了更高期望。

210 表 8.1 中国生产的过滤嘴卷烟占全部产量的百分比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占全部产量的百分比 (%)	6	10	11	13	18	28

211 为了恢复改革开放之前被破坏的政府机构及治理能力，北京的国家财政机关向烟草工业提出了明确的指示，要求大幅增加收入。这绝不是一个容易达成的期望，尤其是考虑到当时原材料、技术、工人培训水平等诸多方面现状的限制。一种解决办法是提升高端卷烟产品的产量，并借助其更高的利润率和税率来提升收入。但根据烟草工业的标准，高端产品所用高质量烟叶有着更为严格的具体要求。如何增加国内高质量烟叶的供给呢？为卷烟增加滤嘴起到了降低每支卷烟烟叶消耗量的作用，同时也借助过滤嘴在外观和抽吸感受上的不同，将高档卷烟和一般产品巧妙区别开来。



为此，中国烟草总公司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确保过滤嘴优先用于高档卷烟生产，同时政策禁止在无过滤嘴卷烟中使用A级烟叶。这些政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对高级烟叶的浪费最小，从而能够提升烟草工业利润并充实国库财政储备。<sup>①</sup>这一系列措施确实起到了效果。

在“六五”计划（1981—1985）期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达到了11%，卷烟工业也达到了差不多的增速，年均增长9%。但烟草税利增长更快，达到了年均17%！与此相似，“七五”计划（1986—1990）期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速达到了年均8%左右，烟草工业生产增长达到年均6%，但烟草税利增长达到了惊人的年均21%。

如何才能保持这一利税增长的势头？最显而易见的答案是生产更多的过滤嘴卷烟和创造越来越大的品牌差异化，从而以足够高的价格继续保持高额利润。如上计划是烟草工业在“八五”（1991—1995）期间完成增加国家利税储备任务之种种努力的核心，尽管“八五”期间卷烟产量仅有1.3%的年增幅，但卷烟税利却实现了令人惊讶的18%年增幅，大大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增速。事实上，烟草税利在“八五”期间比其他所有类型的国有收入增长都快，以至于到90年代中期，烟草业创造的收入已经占整个政

---

① 中国卷烟中的烟草含量从1981年超过每箱56千克，跌至1990年的每箱52千克，到1995年更减至每箱44千克。每支卷烟中烟叶量减少意味着同样数量的烟叶可能生产更多数量的卷烟。参见国家烟草专卖局编：《中国烟草年鉴，1981—1990》（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第37页；另见国家烟草专卖局编：《中国烟草年鉴，1991—1995》（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第26页。

府财政支出的 1/10 强。<sup>①</sup>

但不仅仅是来自北京的国家政策使得更多的过滤嘴卷烟持续  
212 向市场投放，各地方政府的具体政策也在其中起到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对试用过滤嘴材料生产卷烟的厂家给予特别税收优惠，目的在于通过鼓励“高质量”卷烟的销售提高产量和利润，这也意味着高价格的卷烟品牌要配备“过滤嘴”。<sup>②</sup>

## 滤嘴难寻

对滤嘴材料和成品滤嘴棒的激烈竞争迅速在不同厂家之间展开。自 1950 年代末上海卷烟厂开始生产过滤嘴卷烟以来，中国卷烟业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的醋酸纤维素“丝束”来制造过滤嘴的纤维材料。只有政府批准的代理才被允许进口这类丝束。醋酸纤维进口到国内后，再分销到各处，且其价格水平在 1980 年代后期的价格改革下开始允许浮动。双轨制价格改革下，“官倒”垄断了醋酸纤维货源并掌控了价格，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价格急

---

① 国家烟草专卖局编：《中国烟草年鉴，1981-1990》，第 50 页；国家烟草专卖局编：《中国烟草年鉴，1991—1995》，第 25 页。T. W. Hu and Z. Mao, “Effects of Cigarette Tax on Cigarette Consumption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Tobacco Control* 11 (2002): 105, <http://tobaccocontrol.bmj.com/content/tobaccocontrol/n/2/108.full.pdf>.

② 关于这是如何在 1980 年代初从一个省份开始的讨论，参见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烟草志》，第 27 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 314—315 页。

剧快速上升。到1988年，当全国过滤嘴卷烟产量突破1000万箱（5000亿支）时，醋酸纤维的国内价格已经达到75000元/吨，高出18000元的额定进口成本数倍。<sup>①</sup>

这导致了中国烟草总公司先后下达《关于加强烟用滤嘴材料进口管理的通知》和《关于加强烟用滤嘴成本、价格管理的规定》两个文件，试图以有效措施大力整顿多头进口、无序管理的滤嘴材料市场。另一方面，丝束的国产化工作也初步开始，烟草工业的领导层结合国际烟用丝束发展的新情况，在美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先后试制成功丙纤纤维过滤嘴后，国产丙纤滤嘴也于1988年底在部分地区有序开展生产试验；同时，也与美国签署了新办南通中美合资醋纤厂项目的协议。

如果一切按部就班地进行，那么南通醋纤厂的醋酸纤维丝束将毫无悬念地成为中国第一种大量投入生产的国产烟用丝束，而丙纤丝束的大量投产与应用也会适当延后。然而，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却意外地改变了这一进程。它在短时间内震荡了国

---

①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第9卷“工业矿业志·烟草业”（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5页。应该注意到，有些烟厂曾经试图自己制造过滤嘴。根据新闻报道保留的口述史，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江西、福建等地的烟厂制造了少量过滤嘴，加装在其生产的卷烟上，见林军容：《福建省第一支过滤嘴香烟》，《东方烟草报》，2005年9月23日（[https://paper.eastobacco.com/html/2005-09/23/content\\_15\\_1.htm](https://paper.eastobacco.com/html/2005-09/23/content_15_1.htm)）。1980年代末，当制造过滤嘴的材料短缺，河南一家工厂试图用纸来做过滤嘴，见河南省烟草甜菜工业科学研究所：《试制纸质卷烟过滤嘴工作报告》，《烟草科技》，1973年第3期，第4—6页；杭州造纸厂：《《烟草科技》1975年第1期，第27—29页；《烟草科技》1977年第3期，第1—7页。

- 213 内外局势，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产生了较为巨大的影响。在烟草工业，这一巨大变故的后果之一就是中国烟草工业领导者江明所谓的“爱国丝束”上马与快速推广，以及南通中美合资醋纤厂的合作失败。

可以说，开发和应用烟用聚丙烯丝束体现了贯彻和落实自力更生方针，体现了我们抵制西方反动势力对我国的孤立、制裁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烟用聚丙烯丝束是爱国丝束。……当然，如果我们自己能多生产一点，还可以少进口。所以应用烟用聚丙烯丝束早用早主动，迟用迟主动，不用更被动。总公司对发展烟用聚丙烯滤材的方针不会改变。省级公司和各烟厂要重视这个问题，一定要看到大形势、大趋势。如果把握不住这个大形势、大趋势，今后就可能要吃苦头。因此，大家要坚定信心，要开发应用我国的丝束，或者叫爱国丝束。<sup>①</sup>

正如这段讲话所反应的，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空前紧张的中外关系使得中国政府与企业对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预期大增，完全依赖进口的烟用丝束供给更是令其深感不安。这一形势也为中国烟草工业向党和政府领导层要求资源分配的特殊照顾提供了条件，它借国际制裁形势说服中央政府增加向烟草工业的投资；与此同时，尚未经过完全检验的丙纤滤嘴材料也被直接用于

---

① 江明：《烟草行业要大力推广烟用聚丙烯丝束》，《中国烟草工作》，1989年第11期。<http://www.echinatobacco.com/101588/102220/102403/102414/35489.html>.

内销卷烟的生产。

但是，国内丙纤材料的生产远非一番风顺。由于大多数丙纤早期生产线只是以前用于制造纺织纤维的石油化工设备生产线改良而来，因此其初期产品往往坚固而柔韧，并且导致难以加工（丝束坚固而柔韧，导致容易切割不均匀，也难以塑形为圆棒状；同时由于粘接性不好，无法通过粘结剂有效增加密度）。结果就是与类似规格的醋酸纤维滤嘴对比，新型滤嘴要么气阻合格但硬度不足，要么硬度达标但是气阻过高。由于无法达到醋纤滤嘴的原有技术指标，故而丙纤只能用于当时的丙等及以下卷烟的生产，如全面推广还需要较大的改进。

至1990年代初，市场力量和政府的干预缓解了大部分的紧缺。甚至由于进口快速增长，在中国市场还出现了过剩。在1992到1997年间，醋酸纤维价格一直在2万元到3万元区间内上下波动并大致保持平稳，基本恢复到了1987年价格改革之前的水平。<sup>①</sup>同时，由于丙纤丝束既有的问题，在诸多技术指标上无法替代醋纤丝束，中国烟草总公司随即说服中央政府继续引进国外技术，先后在昆明、珠海、西安等地建设醋酸纤维生产基地，使得国产醋酸纤维过滤嘴产量稳步提高，1997年达到6万吨，基本实现1989年提出的进口醋纤丝束、自产醋纤丝束、丙纤丝束“三三

---

① 基于1999年全国工厂生产卷烟过滤嘴的产能估算，见郑宝山：《中国烟用丝束的产业现状与发展趋势》，《化工商品科技》，1999年第2期，表2：烟用丝束生产厂家，第23页。

制”的目标。<sup>①</sup>

## 国内管理者与烟草业外援

丝束的故事告诉我们，尽管自 1982 年以来所有地方烟草企业都是中国烟草总公司的子公司，但卷烟厂之间却经常相互争夺资源。它揭示出的另一点是，对于烟草工业来说，改造工厂以生产过滤嘴卷烟的决定，与对“吸烟与健康”方面的认知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虽然“文化大革命”后，生产过滤嘴卷烟的热情及丝束生产的紧张气氛都在中国一度十分突出，但这均不是因为烟草工业或普通吸烟者充分认知到吸烟危害健康导致的。

但这并不是说烟草工业的领导者完全不相信卷烟有害健康。数百年来，中国的医学专家一直提示危险，警告烟草使用有其健康危害。1950 年代末，上海烟草首次生产带过滤嘴的卷烟时，关于吸烟的致命健康危害已经有足够的证据在中国境外流传。到 1958 年，中国学者开始听说英国、美国将卷烟烟雾与癌症关联的部分流行病学研究和动物实验。<sup>②</sup>至 1970 年代末，中国的期刊上已经发表了数十篇相关文章，将 1964 年美国卫生署长的报告作为

---

① 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年鉴 1991-1995》，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 年，第 37—38 页。

② S. Mittler, S. Nicholson, 顾锡坤：《大气污染与肺癌》，《武汉医学院学报》，1958 年第 1 期，第 22 页；王扬宗：《外伤后的原发性肺癌》，《兰州医学院学报》，1959 年第 4 期，第 33—35 页。

确定事实并多加引用，该报告有力地证明了吸烟与急性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sup>①</sup>但可以肯定的是，在19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的医学期刊上对吸烟与健康关系的看法并不一致，这为烟草工业的领导者们提供了道德上的掩护。例如，有一篇海外论文的译文发表在1963年的《天津医药》上，提供了反对吸烟与肺部疾病之间关联性的实验证据。<sup>②</sup>

但是在中国，我们并没找到类似美国发生过的那种臭名昭著的大规模否认吸烟有害的运动，我们也不能假设《天津医药》的论文译文是由与烟草工业有关的任何人资助的。我们唯一可以说 215 的是，这篇文章是自1960年代以来发表的众多试图把水搅混的文章之一。这导致的结果是，在2000年到来之际，中国学术界和大众认知仍然没能对吸烟带来健康危害达成具体共识。这对于烟草工业领导者来说，简直是天赐的礼物。由于缺乏明确的专家共识，加上长期以来公众的无知状态，虽然自1970年代后期人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质疑吸烟的健康安全性，但烟草工业领导者仍然得以持续放开手脚，对除工厂卫生之外的所有吸烟有关健康问题都

---

① Surgeon General, *Smoking and Health: Report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to the Surgeon General of the Public Health Service*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1964).

② Edwin L. Rothfeld 等原著，宋礼章摘译：《吸烟对肺功能的急性反应》，《天津医药杂志》，1963年第10期，第639页。Rothfeld、D. Biber、A. Bernstein 的研究最初发表在 *Diseases of the Chest*, 40(1961): 284-90，该文称没有办法用实验来确定吸烟对肺功能的急性反应。

置之不理。<sup>①</sup>

尽管如此，我们还不能将专家们对吸烟与健康关系的研究历史搁置一旁，因为它有助于揭示二十世纪末过滤嘴卷烟如何兴起的有趣过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学术期刊发表了有关吸烟与健康的一些相互矛盾的文章。紧接着，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期间，所有的学术活动都被暂停，所有研究都被迫停止了。随后与健康相关的研究逐步恢复，并于1970年代重新断断续续开始。之后随着当时更加务实的国家领导人开始引导中国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并坚持“实事求是”，研究人员开始再次探索吸烟与某些疾病之间的关系，国外文献和技术也开始更为丰富和更加频繁地进入中国。

这一寻求真相的过程应该至少影响了一部分在中国烟草工业中身居要职的研究人员，使其对烟草的毒性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并开始讨论可能的内部补救措施。早在1972年，我们就可以找到郑州烟草研究院《烟草科学与技术》期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内容涉及吸烟健康危害问题。<sup>②</sup>这篇未署名文章在该期刊成立的第一年就发表了，它承认吸烟确实会损害人的健康，并引用了美国卫生部1960年代的统计数据，接着提出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减轻此类危害，其中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手段是加装过滤嘴。

---

① 倪启贤：《判断之间的关系》，《前线》1962年第16期，第18页。在这份由北京市委办的刊物上，有这么一段话：“有人认为‘吸烟对健康是有害的’，也有人认为‘吸烟对健康是无害的’。这两种看法，那一种看法对，这需要实践和科学来回答。那么形式逻辑对于回答这样的问题有什么帮助没有？”

② 《吸烟与健康》，《烟草科技》1972年第3期，第21—24页。



但是，在非著名期刊上发表的此类文章是否可以解释为什么在1970年代烟草工业开始要求并获得了大量政府资金来改造工厂以制造带过滤嘴卷烟吗？我们还不能找到相关文件支持此观点。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行业研究机构中的一些人已经悄悄地承认了卷烟可能会造成健康危害，但这本身并没有影响工厂管理者们的决策方式和结果。当时他们的首要考量是如何增加过滤嘴卷烟的产量。这与在欧洲尤其是美国过滤嘴卷烟兴起的情况完全不同，当时过滤嘴卷烟推向市场，主要是因为烟草业想借此减轻公众对卷烟对健康有致命危害的担忧。 216

这提醒我们，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区分在郑州出版的技术期刊中的只言片语与整个行业更广泛的表述基调是多么重要。如果中国的烟草公司尚未向其雇员或广大中国民众告知卷烟有危险并需要增加过滤嘴，那么他们当时实际上在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在1970年代后期，他们是使用怎样的话术来合理化过滤嘴卷烟的生产的？1983年后，又是怎样将卷烟“降焦减害”合理化的？

正如之前提到，降低生产成本和增加收入是烟草工业的明确目标。过滤嘴材料通常比优质烟叶便宜得多，而且在中国生产定价较高的甲级过滤嘴卷烟比低档无滤嘴卷烟有着更高的利润率。但这是工厂管理者们突然转变的唯一理由吗？毕竟能够制造高利润、省烟叶的过滤嘴卷烟的前提是生产所需的所有设备已经到位。但是，在1970年代后期，中国烟草工业整体上尚不具备这一条件，很少有卷烟厂配备制造过滤嘴卷烟所需的机械，而这些设备机械需要大量投资。当时唯一可能的投资资金来源是中央政府，在既往几十年的动荡之后，中央政府正全神贯注地制定新的经济

政策。<sup>①</sup>那么，各地工厂又是如何说服中央政府为过滤嘴革命提供资金支持的呢？说服的话术又是怎样的？

境内外的档案都表明，与外国公司的重新接触是其中至关重要的话术来源。根据对 1970 年代中国烟草工业归档文件全面检索，我们可以明确看到各个层面的国际交流显著增加。<sup>②</sup>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国内卷烟厂多年来首次被允许组团出国交流，实地考察，同时加拿大、日本和其他地区的专家也应邀来华进行技术交流。<sup>③</sup>

因为有着获取更大利润的新压力，中国各地的卷烟厂管理者们迫切希望与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更高的公司互动，以学习新的盈利方式。得益于与 Philip Morris、德国 Hauni 公司、以及美国农业部（USDA）的农业研究服务力量（尤其是其顶级烟草研究员，T.C. Tso）等外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频繁交流，中国烟草业得以对全球烟草制造商如何制造和销售卷烟有了更详细的认知与了解。交流不仅限于共享技术信息和科学报告；这种交流进一步发展为调研访问、联合会议以及伴随技术转让的直接督导和指导。国际烟草巨头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中国市场在卷烟及其关联行业有着巨大潜力和丰厚利润，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和改革开放开始，

---

① Christine P. W. Wong, “Fiscal Reform and Local Industrialization: The Problematic Sequencing of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Modern China*, vol. 18, no. 2 (1992): 197-227.

② 要更多了解这类接触，参见 the Truth Tobacco Industry Documents archive，网页 <https://www.industrydocumentslibrary.ucsf.edu/tobacco/>。

③ 《加拿大专业人员谈烤烟生产》和《日专业人员来我国访问，介绍了日本烟草生产情况》，《烟草科技》1972 年第 4 期，第 35—36 页。

他们争相拜访中国各家烟草制造商，并开始相互竞争。此外，来自美国、英国、意大利和西德的烟草种子和卷烟机械供应商都在激烈竞争，以期获得中国卷烟工业技术升级的合同。总而言之，这些外国公司很乐意将自己目前在用的“先进制造”技术和话语加以炒作，并通过售卖或技术转移的方式照搬给中国生产商。<sup>①</sup>

“文革”结束后，经过了长期资金匮乏的中国卷烟厂，往往很愿意接受外国制造商的想法与设备建议。其中向上级游说得最早、最卖力的一批国内卷烟厂首先获得上级审批，得到了稀缺外汇进行卷烟工业基础设施升级。这些工厂制造的卷烟与国外售卖的所谓“现代”卷烟在外观、手感和质量上已经极为接近，这些新产品的销售带来很好的象征性和财务性回报，对于上级的特批外汇也是一个圆满交代。

最初，其中一些工厂管理者在从海外少量购买设备的基础上，对现有的 81 毫米包装机进行改装，使其可以生产滤嘴卷烟。但是工厂管理者们通常想要得到更多，他们想从国外采购各种各样的新机器，并希望获得批准建造新工厂以容纳这些新机器。在各地卷烟企业的历史文件资料中，有时我们会发现庆贺新近投资外国机器和新建工厂，从而节省烟叶的报道材料，但更多时候是因为 218 它们促进技术水平进步带来的荣耀而受到赞誉。<sup>②</sup>

这一切都表明，从“文革”结束后到过渡至生产低焦油过滤嘴卷烟的转变过程，并不能仅仅简单解释为党的领导人自上而下

---

① 《菲利普·莫瑞斯公司概况》，《烟草科技》1978年第3期，第33页；《西德烟商来华访问》，《烟草科技》1978年第4期，第97页。

② 《85mm 滤咀包装机改制成功》，《烟草科技》1973年第4期，第23页。

的决定。当然这一过程也不能解释为烟草工业仅为满足公众对更安全卷烟的渴望做出的决策。1970、80年代间向低焦油过滤嘴卷烟的转变，是各地卷烟厂管理者为应对具体问题而形成的结果，并且被外国厂商长期以来渴望和国内烟草企业接触并建立联系的意愿大力推动。这些联系激活了各地烟草工业及工厂管理者对过滤嘴、低焦油卷烟营销价值的敏感性，从而让其不仅仅以健康为新型卷烟卖点，而是力图吸引渴望新颖、科学创新产品的人群，进而推销一种全球化的感觉（虽然借助卷烟来实现）。总体上看，过滤嘴卷烟在中国从1970、80年代全面起飞，让烟草工业实现了全面升级改造，政府赚到的更多利润，而消费者可以选择到更加“现代”的产品。

## “焦油”，人民之敌：以“降焦减害”之名， 行卷烟销售之实

在2000年左右的世纪之交，围绕卷烟“减害”的新一轮诡计，在国家烟草专卖局的领导下，在中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所谓的“高香气、低焦油、低危害”的“中式卷烟”被创制出来，其中暗示了过滤嘴可以让吸烟更安全这一信息。<sup>①</sup>

如人们所知，“降焦”这一概念自1980年代已悄然兴起。中

---

① 《7月1日起我国禁产焦油超标卷烟》，《北京青年报》2004年6月22日，<https://news.sina.com.cn/c/2004-06-22/08313483849.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1月6日）。

国的卷烟生产者最初主要是简单复制外国技术，降低机器测试标准下的卷烟焦油含量，并将测量精度做到小数点后两位数（见图 8.2）。他们运用的两种主要降焦技术均来自外国专家指导，一种是通过在卷烟滤嘴棒的外侧打孔增加空气通量，一种是通过掺入膨胀烟丝降低每支烟中烟叶量降低焦油量。根据烟草工业的精确（也极具欺骗性）的测量结果，从 1983 年到 1992 年每支卷烟的焦油含量从平均 27.27 毫克降低到 18.72 毫克。人们或许会认为国内的卷烟生产者主要是为了营销才开展这一降焦举措，但事实上在 1980 年代早期，焦油含量仅仅是相对模糊的提升卷烟“质量”尝试的一个方面。<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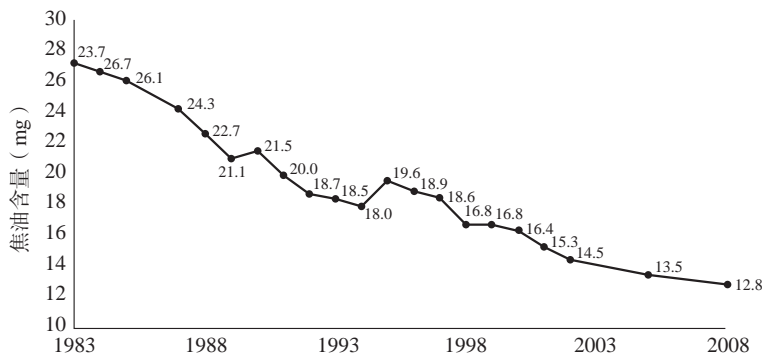


图 8.2 欺骗性手段：根据标准化的机器吸烟机来计算 25 年间中国卷烟焦油含量的降低，却不考虑“补偿”效应。引自 Quan Gan et al., “Chinese ‘Low-Tar’ Cigarettes Do Not Deliver Lower Levels of Nicotine and Carcinogens,” *Tobacco Control*, volume 19, issue 5.

① 王汉龙：《改变滤嘴烟支结构 提高滤嘴烟的经济效益和安全性》，《烟草科技》1987年第2期，第22—24页。

恐惧可以让思考聚焦。在 2000 年左右，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公司）处于恐惧当中，开始担心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一方面自 90 年代后期卷烟销量下滑，另一方面 2000 年左右正是中国考虑加入两项国际公约的风口浪尖。这两项令国家烟草专卖局担忧的公约，一个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于 2001 年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另一个则是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国于 2003 年签署加入。国家烟草专卖局担心，加入上述协议会从根本上损害本国的烟草工业，将其暴露在与外国烟草巨头的激烈竞争中，同时也要面对系统性的公共卫生批评。

为了自保，国家烟草专卖局将“焦油”作为“中式卷烟”战略中的核心要素。<sup>①</sup>在与国内烟草企业的密切协调下，国家烟草专卖局开展了大规模的公共关系和市场营销活动，目的是让所有人相信，中国生产的卷烟已经变得与国外生产的卷烟一样先进和安  
220 全。消息在国内各种新旧媒体平台上流传开来，赞扬中国烟草工业在减少危害方面的技术进步。许多国内卷烟厂多年前就一直在悄悄减少卷烟中的烟草量，现在却突然开始吹嘘完全相同的卷烟产品是“低焦油、低危害”的新产品，过滤嘴的作用和意义就这样被重新包装了。卷烟厂不再只是因为特别配制的过滤嘴而大肆宣传他们的卷烟更高级，转而以改善安全性的名义重新营销这些完全相同的产品。

---

① 《中国烟草的困局与希望》，《中国科技财富》，2006 年 5 月 9 日，<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observe/20060509/18562553659.shtml>（最后访问时间 2022 年 1 月 6 日）；彭嘉陵：《“降焦令”引发烟草业变革》，《人民日报》2004 年 7 月 5 日，第 6 版。

其中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中国的“降焦减害”具体实践中，测量焦油的特殊方式和作为营销卖点的做法，与曾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如出一辙。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国的烟草工业全盘继承了国外对卷烟焦油和尼古丁含量的机械抽吸测量法，然而这一测量方式现在已被公共卫生学者公认为具有极大误导性和欺骗性。<sup>①</sup>

因为补偿效应（有烟瘾的吸烟者在转为抽吸低焦油卷烟时，往往会采取更大的抽吸力度并且将烟雾更深地吸入肺部，或每支卷烟平均抽吸更多口，或直接抽吸更多支的卷烟进行补偿），用机器来测量尼古丁和焦油含量事实上并不能准确捕捉吸烟者转吸过滤嘴卷烟时，到底吸入了多少有害物质。这种情况意味着，沉迷于特定水平的尼古丁的吸烟者将调整其吸烟行为的强度，以最终获得恒定、一致的尼古丁摄入量。中国烟草和其他地区烟草制造商的既往做法一样，从未公开其在确定焦油和尼古丁含量测量方法上的这些具体缺陷，相反却通过广告信息（公开或暗示）宣传低焦油卷烟更安全，虽然实际上并非如此。

如上的欺骗伎俩不但被严谨的学术研究揭穿并广泛曝光，也受到法律手段的制裁与处理。美国的若干法庭早已裁定“淡味”和“低焦油”卷烟是有史以来对消费者的最大欺骗之一。2006

---

<sup>①</sup> 2008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不再承认这种衡量焦油和尼古丁含量的方法，称之为烟草业“欺骗性的营销手段”之一。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 Rescinds Guidance from 1966 on Statements Concerning Tar and Nicotine Yields,” press release, November 26, 2008, <http://www.ftc.gov/opa/2008/11/cigarettestesting.shtm> (last accessed on September 7, 2017).

年，哥伦比亚特区美国地方法院法官 Gladys Kessler 裁定，使用“低焦油”、“温和”和“淡味”等描述词的卷烟产品没有做到如实陈述，并且不可继续在广告或包装上使用上述词语。<sup>①</sup>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过去十年来许多国家已经禁止对卷烟使用“淡味”、“温和”和“低焦油”等不实和具有误导性的描述。在《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压力下，国家烟草专卖局也在 2007 年同意指令中国所有制造商从卷烟包装或营销  
221 中删除这些说法。但是同时，国家烟草专卖局也重申了其“降焦减害”的大战略，明确表示将继续在所有卷烟包装上显示焦油和尼古丁含量。<sup>②</sup>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降焦减害”神话仍然是烟草工业核心业务战略的基础。

## “研究和反思”

2004 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在海滨城市厦门举办题为“发展中  
式降焦减害卷烟”的研讨会。在会上，副局长张保振重申低焦油

---

① Judge Kessler, “Final Opinion,” *United States 2. Philip Morris*, Civil Action Number 99-2496 (GK), 2006, <http://www.tobaccolawcenter.org/documents/FinalOpinion.pdf> (last accessed January 31, 2013).

② “Rules on Cigarette Package Labeling 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MA, 2007, <http://www.tobaccocontrolaws.org/files/live/China/China%20-%20Rules%20on%20Cigarette%20Package%20Labeling%20-%20national.pdf> (last accessed on September 7, 2017).



卷烟对国内烟草贸易的长远未来至关重要。同时他还强调：“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和反思……降焦减害、开发中式卷烟，关系到中国烟草的生存和发展。”<sup>①</sup>

以前，“研究与反思”并不是中国烟草工业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但实际上，在国家烟草专卖局“科学技术发展计划”之下，烟草工业出资的烟草研究资金激增。仅在2009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就在该计划上花费了17亿元人民币（约合2.5亿美元），比2008年增长了27%。<sup>②</sup>在这笔资金的支持下，从2001年到2008年近千篇有关“低焦油”和“改良风险烟草产品”的科学论文发表在中国技术类期刊上。<sup>③</sup>这些文章的共同结论是，研究表明，低焦油卷烟比常规卷烟更安全，并且未来可以更安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章中并没有严格使用国际公认的公共卫生科学研究方法，例如流行病学研究或人类吸入有毒物质调查使用的研究方法。<sup>④</sup>相反，与烟草工业没有关联的独立研究者的研究表明，不论

---

① 张保振（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关注公共健康，促进和谐发展在‘中式卷烟降焦减害’发展论坛上的讲话”，2010年4月27日，<http://www.tobaccoinfo.com.cn/ztxw/2010/04/33312.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1月6日）。

② 姜成康：《2009年全国烟草工作会议报告》，2009年1月13日，[http://www.tobacco.gov.cn/history\\_filesystem/2009gzh/news.html](http://www.tobacco.gov.cn/history_filesystem/2009gzh/new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1月31日）。

③ 刘小舟：《中国烟草企业“减害降焦”行动对控烟工作的影响》，<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84501-2009203572.htm>（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1月6日）。

④ 朱茂祥等：《神农萃取液降低卷烟危害作用的细胞生物学评价》，《中国烟草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暨2002年学术年会》，2002年12月，第84页；谢剑平等：《卷烟烟气危害性指数研究》，《烟草科技》2009年第2期，第5—15页。

在哪个国家，低焦油卷烟都与传统卷烟构成同等的健康威胁，甚至是比传统卷烟更大的健康威胁。<sup>①</sup>最近在中国进行的两项研究比较了普通卷烟吸烟者和所谓的“减害”卷烟吸烟者的尼古丁和烟草致癌物的尿代谢产物。两项研究都表明，中式低焦油卷烟与普通卷烟带来同等的健康威胁。<sup>②</sup>并且，至少一项由烟草工业资助的研究人员进行的研究披露，不仅九个中国领先卷烟品牌的致癌能力与机器测得的各自焦油释放量均不相关，而且标有“低焦油”品牌中的苯并芘和亚硝胺的含量高于较高焦油水平的卷烟。<sup>③</sup>

尽管如此，中国烟草工业的研究人员在过去十年中对“降焦减害”的研究依然获得了六项国家科学奖。其中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剑平获得了其中三个奖项，郑州烟草研究院是与国家烟草专卖局密切合作并由其资助的组织。谢先生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于1982年获得理学学士学位，然后在郑州工业烟草研究院学习，1985年在该院获得工程学硕士学位。

谢剑平最著名的研究是“危害指数”下的“降焦减害”卷烟

---

① 那是2014年美国“Surgeon General’s Report on Smoking and Tobacco Use”的结论，[https://www.cdc.gov/tobacco/data\\_statistics/sgr/index.htm](https://www.cdc.gov/tobacco/data_statistics/sgr/index.htm)（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9月7日）。

② Quan Gan et al., “Chinese ‘Low-Tar’ Cigarettes Do Not Deliver Lower Levels of Nicotine and Carcinogens,” *Tobacco Control*, 19 (October 2010): 374-79; Quan Gan et al., “Chinese ‘Herbal’ Cigarettes Are as Carcinogenic and Addictive as Regular Cigarettes,” *Cancer Epidemiol Biomarkers and Prevention*, 18 (December 2009): 3497-501.

③ 杜咏梅、肖协忠、王允白：《烟气焦油与卷烟安全性》，《中国烟草科学》2002年第2期，第31—44页。

排名，这一研究存在很大问题。他坚称他的危害指数研究表明中国卷烟的安全性有了显著改善：“如果我们将 2008 年中国卷烟的危害指数定为 10，那么 2009 年和 2010 年的危害指数分别为 9.7 和 9.3。总体趋势很明显：我们在减少危害方面取得了进步。”<sup>①</sup> 公共卫生统计数据清楚地表明，自从中国引入“降焦减害”的花招以来，有关的死亡和疾病一直在增加而非减少。

那么是什么支撑了谢剑平的“进步”说呢？为了使卷烟毒性可以排名，他使用一种称为 ISO / FTC 方法的化学分析形式。该技术使用机器吸烟机评估从卷烟过滤嘴端吸出的烟雾。但因为它仅使用机器，完全忽略了人们的实际吸烟方式（人们通常将“低焦油”卷烟的烟气更深地吸入肺部）。自 1981 年以来的多项研究表明 ISO / FTC 方法显著低估了低焦油卷烟产品的真正毒性，因此这种方法已被广泛认为不可信。<sup>②</sup> 许多批评人士因此实际上禁止了 ISO / FTC 测量法的使用。

谢剑平先生的花招使他较容易在 2000 年代初期在中国科学界获得赞誉。与此类似，全国范围内科学界许多人在思想认知上也被烟草行业“低焦油，少危害”公关宣传蒙蔽。这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谢剑平先生在 2003 年至 2010 年期间获得了中国科技部不

---

① 王承丞：《中式卷烟减害新探索——写在“卷烟危害性评价与控制体系建立及其应用”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之际》，《中国烟草》，2011 年第 3 期。

②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cientific Advisory Committee on Tobacco Product Regulation, *SACTob Conclusions on Health Claims Derived from ISO/FTC Method to Measure Cigarette Yield* (Geneva: WHO, 2003), [http://www.who.int/tobacco/sactob/recommendations/en/iso\\_ftc\\_en.pdf](http://www.who.int/tobacco/sactob/recommendations/en/iso_ftc_en.pdf) (last accessed March 20, 2012).

- 223 下三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项是研究改善低焦油卷烟白肋烟质量的方法，另一项是研究减少卷烟烟雾中的有毒成分，第三项是设计卷烟危害性评估体系。<sup>①</sup>

2011年12月，媒体透露谢剑平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是中国学者的最高荣誉之一。烟草工业激动万分，再一次将他的最新科学成果用于营销目的宣传（见图8.3）。但是一些国内学者对此感到愤慨，特别是在公共卫生领域拥有真正善意并与控烟倡导有紧密联系的学者。争议很快随之而来，引起了一波又一波中英文新闻报道。到2012年5月，近百位中国最负盛名的学者向中国工程院请愿，要求对谢剑平的研究进行重新审查，并撤消对他的

224 推荐。<sup>②</sup>一些谢先生的强烈批评者将他称为“烟草院士”，<sup>③</sup>其他人

---

①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st of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wards,” 2003: No. J-211-2-03, “Research on Improving Burley Tobacco Qualit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Low-Tar Cigarettes,” [http://www.most.gov.cn/cxfw/kjllcx/kjll2003/200802/t20080214\\_59048.htm](http://www.most.gov.cn/cxfw/kjllcx/kjll2003/200802/t20080214_59048.htm) (accessed March 20, 2012); *ibid.*, 2004: No. J-211-2-03,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n Reducing Harmful Ingredients,” <http://www.360docs.nct/doc/info-101538fed15abe23482f4db9-7.html> (accessed August 23, 2017); *ibid.*, 2010: No. J-211-2-01, “Establish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 Hazard Assessment and Control System for Cigarettes,” [http://www.most.gov.cn/ztlz/gjloxjs\\_jldh/jldh2010/jldh10jlgg/201101/t20110115\\_84315.htm](http://www.most.gov.cn/ztlz/gjloxjs_jldh/jldh2010/jldh10jlgg/201101/t20110115_84315.htm) (accessed March 20, 2012).

② 魏铭言：《百位院士请求重审烟草专家谢剑平当选院士资格》，《新京报》，2012年5月30日，<http://news.163.com/12/0530/02/82NHNTV000014AED.html>（最近访问2013年1月31日）。

③ 《烟草研究学者成院士引网络争议》，《南方日报》，2011年12月9日，[http://china.nfdaily.cn/content/2011-12/09/content\\_34672668.htm](http://china.nfdaily.cn/content/2011-12/09/content_34672668.htm)（最近访问2012年3月20日）。

则强烈质疑他人选院士涉及的筛查程序的合法性，并指出尽管他的研究涉及对公共卫生至关重要的事项，但中国卫生部从未受邀评审院士提名相关材料。

实际上，关于其提名的所有支持都来自国家烟草专卖局，谢先生的档案也仅由中国工程院环境与纺织品分部的成员审核过，而这些成员都没有接受过医学或公共卫生方面的训练。随着围绕谢剑平入选工程院的争议持续到2012年，他以前获得的科学奖项也受到质疑，因为这些科学奖项也是由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提名的，未经卫生部或可信卫生专家的评审。<sup>①</sup>



图 8.3 科学谎言作为营销工具：颁给卷烟技术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223

① 《烟草院士“有违”法律，前卫生部副部长质疑评审》，CCTV（中央电视台），2011年12月14日，<http://news.cntv.cn/china/20111214/102667.shtml>（最近访问2022年9月19日）。

大概是由于这种持续的质疑，新入选的谢剑平没有被邀请参加 2012 年 6 月举行的中国工程院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但是，大会也没有按照请愿者的要求撤回他的入选通知。有报道称，会议上谢剑平的支持者坚持认为“必须严格遵守中国工程院的规则，选拔新院士的程序已经完成，不能任意更改。”因此，谢剑平先生目前仍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身份。<sup>①</sup>

### “降焦减害”谎言的效果评估

烟草工业的“低焦油低危害”计划在混淆公众试听方面效果如何？我们可以参考由世界卫生组织学者进行的 2010 年全球成人烟草调查中国调查的一些发现。该研究中，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同低焦油卷烟的危害性较小。<sup>②</sup> 调查还显示，这一谎言对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更加有效。受过较高教育的人，更有可能相信烟草工业声称的低焦油卷烟更安全的说法。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中超过 45% 同意该说法，而具有小学或以下学历的人中仅有 21% 同意。当以职业为区分维度时，我们看到更加令人不安的情况，一半的上班族和 55% 的医疗专业人员对低焦油意味着危害

---

① 《“烟草院士”缺席院士大会引猜想》，《中国青年报》，2012 年 6 月 12 日，[http://zqb.cyol.com/html/2012-06/13/nw.D110000zgqnb\\_20120613\\_3-01.htm](http://zqb.cyol.com/html/2012-06/13/nw.D110000zgqnb_20120613_3-01.htm)（最近访问 2022 年 9 月 19 日）。

②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0 全球成人烟草调查——中国报告》，杨功焕主编，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1 年版。

更低的这一观念表示认同。如上这些数据表明，烟草工业的“低焦油低危害”战略在影响全国人民的观点，特别是某些国内最有影响力公民的观点上，取得了可观的效果。



图 8.4 这幅中南海淡味卷烟广告的下方便写着：“低危害卷烟给您更多关爱！  
香烟，享受与危害的矛盾体。中南海始终致力于卷烟低危害技术和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每一款产品都凝结了世界领先的低危害卷烟生产技术，为您的吸烟生活提供健康保证。”（《中南海世界》，2006 年 9 月）

当评估烟草工业的“降焦减害”项目时，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是销售结果。1990 年代后期中国卷烟总销量实际在下降，但烟草工业开始实施“降焦减害”策略后，在欺骗之下卷烟销量再次上升。<sup>①</sup> 到 2014 年，全国卷烟总销量达到创纪录的 2.54 万亿

<sup>①</sup> 见 Matthew Kohrman 撰写本书序章中的图 I-1。

支，比 2002 年增长近 50%。<sup>①</sup> 特别是被宣传为“低焦油”类型的卷烟，生产和销售在此期间十分红火。2011 年前 10 个月，中国低焦油卷烟的产销量达到 289 万箱，同比增长超过 400%。在 2000 年至 2014 年的几年中，低焦油卷烟市场的增长速度是中国其他卷烟市场的近十倍。<sup>②</sup>

## 展望未来

展望未来，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完成，同时也有很多事情要制止。国务院必须立即授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所有烟草制品进行监管，包括低焦油产品以及迅速发展的属于“改良风险烟草制品”的任何其他产品。不仅要在上市之前和之后将各种烟草产品的审查和批准权移交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而且还要  
227 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总局负责。并且，质检总局必须禁止国家烟草专卖局 / 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子公司提出的所有误导性的安全声明和诡辩。广告宣传“降焦减害”的

---

① Euromonitor, “Big Cigarette Sales Rise in 2008 for China,” 2008; Euromonitor, “Tobacco in China,” 2017. Both items accessed via Euromonitor’s Passport database (accessed January 31, 2013). 我国低焦油卷烟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2012 年 05 月 16 日, 产业信息网, <https://www.chyxx.com/industry/201205/3341285PT8.html> (最近访问 2022 年 9 月 19 日)。

② Zhang Yu, 《经验低焦油卷烟, 开启“掘金”新时代》, 2011 年 11 月 30 日, 烟草在线转自《新烟草》, <https://www.tobaccochina.com/html/glyx/ppfz/343332.shtml> (最近访问 2022 年 9 月 19 日)。



卷烟并不比传统卷烟更安全，即使以柔和的色彩点缀或掺入中草药后也是如此。



图 8.5 在中国，“焦油含量”的数字化表征被用来放在烟盒正面，作为品牌营销。

226

同时，还有更多工作要做。我们应当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 5 条，因为它显然与世界卫生组织《框架公约》冲突。政府还应支持对国家烟草专卖局 / 中国烟草总公司的调查，厘清其在传播卷烟与健康安全关系方面所做陈述与所起作用，并要求提供烟草工业的内部档案与记录以供公众查阅。

我们还需要更多地了解普通中国人是如何看待过滤嘴和吸

烟对健康的益处（或危害）的。我们需要知道中烟公司内部进行着哪些类型的内部监督控制，中国烟草总公司的研究人员是否真的相信其所宣传的内容，以及哪些研究或数据受到了压制。我们也需要更多了解颜色、图像和符号是如何被用来暗示某些类型卷烟的安全性，以及心理学家或营销人员在这种欺骗中起了什么作用？

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如何鼓励行业内的吹哨人，如何帮助勇敢的少数（或许多）人挑战烟草工业统一的封锁力量，从而拉开被掩盖真相的帷幕。我们有必要从上到下均采取行动。中国政府不应允许继续在中国重演“降焦减害”的骗局，这一骗局在世界其他地区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丧失生命的惨剧。

同时，公共卫生活动者也必须更加不能自满、更少同流合污。他们必须更多地参与到将真相带给民众的努力过程中，毕竟有什么比国家和人民的健康更重要呢？

## 第九章

233

### 协助烟草业：中国学术界与烟草业的协作

甘泉、Stanton A. Glantz

为了保护市场和利润，Philip Morris、英美烟草、R. J. Reynolds 等跨国烟草公司赞助大学研究，质疑吸烟和接触二手烟的危险，动摇需要烟草控制的基础，这些是烟草公司系统性努力的一部分。这些努力从 1950 年代就开始了，在欧洲、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各种学术机构中扎根。<sup>①</sup> 愿意用“对卷烟友好的”研究换取跨

---

① Norbert Hirschhorn, “Shameful Science: Four Decades of the German Tobacco Industry’s Hidden Research on Smoking and Health,” *Tobacco Control* 9(2) (2000): 242-48; Robert N. Proctor, *The Nazi War on Canc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Monique E. Muggli et al., “The Smoke you Don’t See: Uncovering Tobacco Industry Scientific Strategies Aimed against Environmental Tobacco Smoke Poli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1 (2001): 1419-23; Lisa A. Bero, “Tobacco Industry Manipulation of Research,” *Public Health Report* 120 (2005): 200-208; Stanton A. Glantz, “Tobacco Money at the University of ( 转下页 )

国公司资助的科学家和医生是这项努力的关键。<sup>①</sup>美国联邦法官 Gladys Kessler 裁定大型卷烟公司和它们的研究机构形成了非法“团伙”，违反《反欺诈影响和腐败组织法》，欺骗公众，而且对卷烟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其裁定的核心就是针对这种错误行为模式。<sup>②</sup>

这种对科学的操纵，促使许多学术机构制定了正式政策，拒绝从烟草业接受资金。<sup>③</sup>多家资助机构因类似原因制定了政策，不向接受烟草业资助的机构授予拨款，多家学术期刊现在也制定了

---

(接上页) California,” *American Journal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 171(10) (2005): 1067-69; J. Barnoya and S. Glantz, “Tobacco Industry Success in Preventing Regulation of Secondhand Smoke in Latin America: The ‘Latin Project,’” *Tobacco Control* 11 (2002): 304-14; Joaquin Barnoya and Stanton A. Glantz, “The Tobacco Industry’s Worldwide ETS Consultants Project: European and Asian Components,” *Europe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6 (2006): 69-77.

- ① Hirschhorn, “Shameful Science”; Muggli et al., “The Smoke You Don’t See”; Robert N. Proctor, *Golden Holocaust: Origins of the Cigarette Catastrophe and the Case for Aboli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 ②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Plaintiff, and Tobacco-Free Kids Fund,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merican Lung Association, Americans for Nonsmokers’ Rights, and National African American Tobacco Prevention Network, Intervenor v. Philip Morris Incorporated, et al., Defendants, Civil Action No. 99-CV-02496 (GK),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2006: i2454.
- ③ Joanna E. Cohen, “Universities and Tobacco Money,” *BMJ* 323(7303) (2001): 1-2; Glantz, “Tobacco Mone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d Grimm, “Is Tobacco Research Turning Over a New Leaf?” *Science* 307 (2005): 36-37.

政策，甚至拒绝考虑烟草业资助的研究人员编写的出版物。<sup>①</sup>

1980年代末、1990年代，跨国烟草公司也在泰国、中国香港和大陆使用欺骗性策略。<sup>②</sup>作为协调在全球反对无烟立法的策略的一部分，1996年，Philip Morris公司与亚洲多个国家烟草专卖局包括中国烟草总公司签订协议，成立亚洲区域烟草业科学小组 (ARTIST)，后来发展成为一个烟草业科学代表组织。<sup>③</sup>中国烟草总公司的研究人员和中国学术机构的研究人员参与了这个小组，其活动包括共同开发据称“更安全”的卷烟。<sup>④</sup>

虽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市场，有世界上最大的烟草公

- 
- ① Susan Mayor, “UK Universities Agree Protocol for Tobacco Company Funding,” *BMJ* 329 (2004): 9; Fiona Godlee et al., “Journal Policy on Research Funded by the Tobacco Industry,” *BMJ* Editorial, *BMJ* 347 (2013), <http://www.bmj.com/content/347/bmj.f5193>.
- ② Ross Mackenzie and Jeff Collin, “‘A Good Personal Scientific Relationship’: Philip Morris Scientists and the Chulabhorn Research Institute, Bangkok,” *PLoS Medicine* 5 (2008): 1737-48; Belinda O’Sullivan and Simon Chapman, “Eyes on the Prize: Transnational Tobacco Companies in China 1976-1997,” *Tobacco Control* 9 (2000): 292-302; Monique E. Muggli et al., “‘Efforts to Reprioritise the Agenda’ in China: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s Efforts to Influence Public Policy on Secondhand Smoke in China,” *PLoS Medicine* 5 (2008): 1729-69.
- ③ E. K. Tong and S. A. Glantz, “ARTIST (Asian Regional Tobacco Industry Scientist Team): Philip Morris’ Attempt to Exert a Scientific and Regulatory Agenda on Asia,” *Tobacco Control* 13 Supp 2 (2004): ii118-24.
- ④ “Summary of Artist Mini-Symposium and 8<sup>th</sup> Meeting,” April 17, 2000, Luxury Hall, Minzu Hotel, Beijing, <http://legacy.library.ucsf.edu/tid/th92g00>; “Summary of the 10<sup>th</sup> Artist Meeting,” Four Seasons Hotel, Singapore, May 10-11, 2001, <http://legacy.library.ucsf.edu/tid/fbt34a00>.

司，但是，我们对中国烟草总公司与大学和其他学术研究人员的关系所知甚少。中国烟草总公司管理中国烟草的几乎各个方面，骄傲地宣称中国的制度继续击退外国竞争者，使外烟只占中国正式卷烟市场的不到1%。<sup>①</sup>中国烟草总公司是中央政府的一部分。在中国烟草总公司之下，每个省和许多城镇都有自己的中国烟草分公司。这一巨大的网络垄断卷烟生产和销售以及烟叶种植和收购。随着中国减少烟草导致死亡和疾病负担的努力日渐壮大，尤其是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制定以后，中国烟草总公司组织附属研究机构研究公约的影响，制定对策以削弱其影响。<sup>②</sup>

中国公众越来越了解吸烟的危害，在这种环境下发展卷烟市场，与西方几十年前经历的过程相似：公众对吸烟的危害越来越关切，保护人们不接触二手烟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中国正在经历的是全球趋势。随着这种意识提高，中国烟草总公司迫切需要开发出展示给公众“更安全”的产品，维持作为正当生意的地位。为此，中国烟草总公司越来越依赖学术机构，满足研发和社会常态化的要求。

---

① 中国烟草总公司2014年报告，进口卷烟市场份额降至只有0.17%。参见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年鉴》，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

② 周增瑞、程永照主编，《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对案及对中国烟草影响对策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

## 世界上最大的烟草公司赞助的研发

在国家层面，中国目前有三个主要的烟草研究机构，分别位于郑州、北京和青州。所有三个机构都属于中国烟草总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还拥有多家小型分公司，各自有自己的研究所（图 9.1 和表 9.1）。

最大的一家是郑州烟草研究院，1950 年代初在河南省北部 235 黄河以南的郑州成立。<sup>①</sup> 195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四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府把之前国民党政府拥有的中华烟草公司和之前英美烟草公司拥有的颐中烟草公司收归国有。两家公司的烟草研究部门合并，隶属新成立的上海卷烟厂。新成立的研究机构称为技术研究部，1950 年代末开始在郑州市建造研究大楼。1980 年代，并入中国烟草总公司后，更名为郑州烟草研究院。<sup>②</sup> 2015 年，郑州烟草研究院有工作人员 280 多人，其中有高级学位的研究人员 117 人以上。<sup>③</sup>

除了这些国家级的研究院所，中国烟草总公司在每个省和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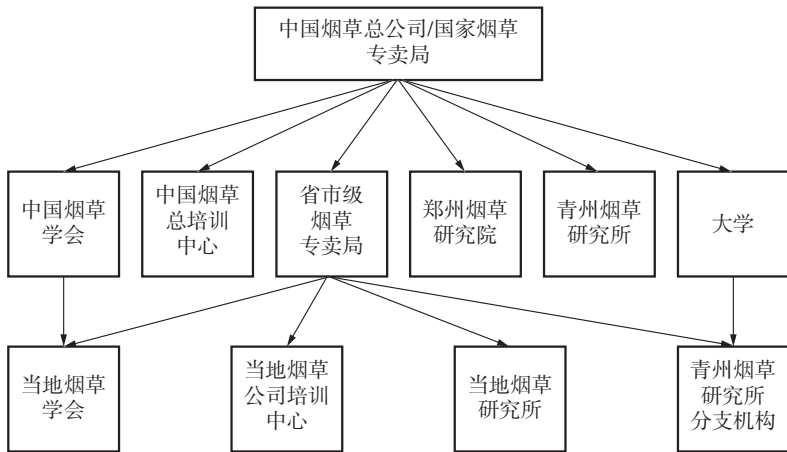
---

① 郑州烟草研究院，《郑州烟草研究院历史沿革》，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网站，2009，<http://www.ztri.com.cn/zzygk/2007/06/55331.shtml>。

② 《中华香烟》，参见互动百科，2009 年，<http://www.hudong.com/wiki/中华香烟>（2009 年 10 月 27 日访问）。

③ 《郑州烟草研究院》，中山市世纪金典锁业有限公司，2012 年 12 月 25 日，<http://www.elasic.cn/eg/aboutus/465/3134.html>。

239 多市县有分公司，这些分公司许多有自己的烟草研究所，支持当地烟草种植和产品开发（见表 9.1）。隶属于中国烟草总公司的许多实验室就在这些当地的研究院所中。由于中国烟草总公司是中央政府的一部分（在国家烟草专卖局主持下），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分公司、下属的烟草研究院所，都由政府资金支持。



235 图 9.1 中国烟草总公司研究能力和与学术机构关系架构图

来源：Quan Gan and Stanton A. Glantz,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Tobacco Industry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in China,” *Tobacco Control*, vol. 20, issue 1 (January 2011), ©2011, with permission from BMJ Publishing Group Ltd.

注：烟草公司拥有的研究院所用**粗体字**显示，学术机构用*斜体字*显示。中国烟草总公司培训中心位于郑州。



表 9.1 中国烟草总公司部分下属研究和培训机构

236

研究院所	院所名称	与烟草公司关系
直属中国烟草总公司的研究院所	郑州烟草研究院 <sup>1</sup>	中国烟草总公司在国家层面拥有的唯一一家烟草研究院
	湖北省烟草科学研究院	省级烟草研究院，隶属于湖北省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白肋烟试验站（中国烟草总公司直属）在这个研究院
	陕西省烟草科学研究所	省级烟草研究所，隶属于陕西省烟草专卖局
	江西省烟草科学研究所	省级烟草研究所，隶属于江西省烟草专卖局
	云南省烟草研究所 <sup>2</sup>	省级烟草研究所，隶属于云南省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育种研究（南方）中心（中国烟草总公司直属）在这个研究所
	贵州省烟草科学研究所 <sup>3</sup>	省级烟草研究所，隶属于贵州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西南农业试验站（直属中国烟草总公司）在这个研究所
	黑龙江省烟草科学研究所 <sup>4</sup>	省级烟草研究所，隶属于黑龙江烟草专卖局
	福建省烟草农业科学研究所三明分所	市级烟草研究所，隶属于福建省三明市烟草专卖局

续表

研究院所	院所名称	与烟草公司关系
	昭通烟草研究所	市级烟草研究所，隶属于云南省昭通市烟草专卖局
	南雄烟草研究所	市级烟草研究所，隶属于广东省南雄市烟草专卖局
	曲靖烟草研究所	市级烟草研究所，隶属于云南省曲靖市烟草专卖局
	楚雄烟草研究所	市级烟草研究所，隶属于云南省楚雄市烟草专卖局
	铜仁烟草研究所	市级烟草研究所，隶属于贵州省铜仁市烟草专卖局
中国烟草总公司培训中心	中国烟草总公司职工进修学院 <sup>5</sup>	国家级培训中心，也是中专，隶属于中国烟草总公司，位于河南省郑州市
	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培训中心 <sup>6</sup>	省级培训中心，隶属于云南省烟草专卖局
	山东烟草职工培训中心 <sup>7</sup>	省级培训中心，也是中专，隶属于山东省烟草专卖局。与山东大学和山东农业大学合作开展烟草培训
	黑龙江省烟草职工中等专业学校 <sup>8</sup>	省级培训中心，也是中专，隶属于黑龙江省烟草专卖局
	湖南省湘潭烟草中等专业学校 <sup>9</sup>	省级培训中心，也是中专，隶属于海南省烟草专卖局

续表

研究院所	院所名称	与烟草公司关系
	安徽烟草教育培训中心 <sup>10</sup>	省级培训中心，隶属于安徽省烟草专卖局
	吉林烟草职业培训中心 <sup>11</sup>	省级培训中心，隶属于吉林省烟草专卖局。由吉林省烟草专卖局和长春税务学院联合成立
	福建省烟草培训中心 <sup>12</sup>	省级培训中心，隶属于福建省烟草专卖局
	内蒙古烟草培训中心 <sup>13</sup>	省级培训中心，隶属于内蒙古烟草专卖局
	江西省烟草培训中心 <sup>14</sup>	省级培训中心，隶属于江西省烟草专卖局
烟草协会	中国烟草学会 <sup>15</sup>	隶属于中国烟草总公司
	当地烟草学会	隶属于中国烟草总公司对应的省市县级别
学术研究机构	中国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 / 中国烟草总公司青州烟草研究所 <sup>16</sup>	中国农业科学院分支机构，归中国烟草总公司联合管理。在烟草出版物方面位列前十名学术机构
	安徽省烟草研究所 <sup>17</sup>	省级烟草研究所，隶属于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与安徽省烟草专卖局联系密切

续表

研究院所	院所名称	与烟草公司关系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 <sup>18</sup>	省级烟草研究所，隶属于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受到河南省烟草专卖局的强烈影响。在烟草出版物方面位列前十名学术机构
	云南农业科学院 <sup>19</sup>	在烟草出版物方面位列前十名学术机构
	赣州烟草研究所	市级烟草研究所，隶属于赣州农业科学研究部，江西省赣州市烟草专卖局管理
大学	河南农业大学 <sup>20</sup>	中国烟草总公司在河南农业大学成立了国家烟草研究中心，直接隶属于中国烟草总公司。烟草出版物位居前十名学术机构
	湖南农业大学 <sup>21</sup>	湖南省烟草专卖局和湖南农业大学联合成立的中国烟草东南农业试验站在这所大学。烟草出版物位居前十名学术机构
	中国科技大学	与中国烟草总公司关系密切的烟草与健康研究中心 <sup>22</sup> 与中国烟草总公司联合开展教育项目 <sup>23</sup> 。烟草出版物位居前十名学术机构

续表

研究院所	院所名称	与烟草公司关系
	中国科学院 <sup>24</sup>	与中国烟草总公司联合授予博士学位项目。烟草出版物位居前十名学术机构
	东南大学 <sup>25</sup>	与中国烟草总公司联合授予博士学位项目
	云南大学 <sup>26</sup>	烟草出版物位居前十名学术机构
	山东农业大学 <sup>27</sup>	烟草出版物位居前十名学术机构
	云南农业大学 <sup>28</sup>	烟草出版物位居前十名学术机构

238

注：这张表不够全面，只包括了有网站的机构。

来源：Quan Gan and Stanton A. Glantz,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Tobacco Industry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in China," *Tobacco Control*, vol. 20, issue I (January 2011), ©2011, with permission from BMJ Publishing Group Ltd.

1. <http://www.ztri.com.cn/> (2013年7月13日访问)
2. <http://www.yntsti.com/> (2013年7月13日访问)
3. <http://www.gzyks.cn> (2013年7月13日访问)
4. <http://www.hljyczb.com/index.html> (2013年7月13日访问)
5. <http://www.ctt.cn/elms/newportal/index-8.jsp?parentType=2000> (2013年7月13日访问)
6. <http://www.ctt.cn/elms/portal/more.jsp?parentType=10&type=10&company=yn> (2013年7月13日访问)
7. [http://www.cnsdjxw.com/school\\_brow.asp?id=3906](http://www.cnsdjxw.com/school_brow.asp?id=3906) (2013年7月13日访问)
8. <http://www.ctt.cn/elms/portal/more.jsp?parentType=10&type=10&company=hlj> (2013年7月13日访问)
9. <http://www.xtyx.com/> (2013年7月13日访问)
10. <http://www.ctt.cn/elms/portal/more.jsp?parentType=10&type=10&com>

pany=ah (2013年7月13日访问)

11. <http://www.ctt.cn/elms/portal/more.jsp?parentType=10&type=10&company=jl> (2013年7月13日访问)

12. <http://www.ctt.cn/elms/portal/more.jsp?parentType=10&type=10&company=fj> (2013年7月13日访问)

13. <http://www.ctt.cn/elms/portal/more.jsp?parentType=10&type=10&company=nmg> (2013年7月13日访问)

14. <http://www.ctt.cn/elms/portal/more.jsp?parentType=10&type=10&company=jx> (2013年7月13日访问)

15. <http://www.ctt.cn/elms/portal/more.jsp?parentType=10&type=10&company=ah> (2013年7月13日访问)

16. <http://www.caas.net.cn/caasnew/jg/yzgsw/51195.shtml> (2013年7月13日访问)

17. [http://www.ati.org.cn/showjgsz.asp?art\\_id=2&cat\\_id=2&cat\\_id=16](http://www.ati.org.cn/showjgsz.asp?art_id=2&cat_id=2&cat_id=16) (2013年7月13日访问)

18. <http://baike.baidu.com/view/1477252.html?fromTaglist> (2013年7月13日访问)

19. <http://www.yaas.org.cn> (2013年7月13日访问)

20. <http://baike.baidu.com/view/299689.html> (2013年7月13日访问)

21. [http://hnndxb.cuepa.cn/show\\_more.php?doc\\_id=19930](http://hnndxb.cuepa.cn/show_more.php?doc_id=19930) (2013年7月13日访问)

22. <http://www.tobaccocollege.com/tcads/tccenter.htm> (2013年7月13日访问)

23. [http://www.tobacco.gov.cn/html/21/2101/67728\\_n.html](http://www.tobacco.gov.cn/html/21/2101/67728_n.html) (2013年7月13日访问)

24. <http://www.gsc.dicp.ac.cn/zsxx/lphybssg.htm> (2013年7月13日访问)

25. [http://kaoyan.eol.cn/yuan\\_xiao\\_xin\\_xi\\_3988/20061212/t20061212\\_209166.shtml](http://kaoyan.eol.cn/yuan_xiao_xin_xi_3988/20061212/t20061212_209166.shtml) (2013年7月13日访问)

26. <http://www.ynu.edu.cn> (2013年7月13日访问)

27. <http://www.sdau.edu.cn> (2013年7月13日访问)

28. <http://www.ynau.edu.cn> (2013年7月13日访问)

## 中国烟草总公司与学术机构的关系

中国烟草总公司除了管理烟草公司系统管辖的研究院所以外，还与许多学术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图 9.1 和表 9.1）。中国大部分学术研究机构 and 大学以及表 9.1 所列各所院校都归政府所有。中国农业科学院是中国最富盛名的公立农业研究机构，1958 年在山东省青州市成立烟草研究所。<sup>①</sup> 1987 年，中国烟草总公司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开始共同管理这个研究所，在它的正式名称之外，增加了一个名称：中国烟草青州烟草研究所。从 1983 年到 2012 年，青州研究所发表的期刊论文位居第二（683 篇文章），仅次于云南省烟草专卖局下属的云南省烟草研究院（809 篇）。<sup>②</sup>

几十年来，中国烟草总公司与多所大学保持密切关系，其中一些大学现在授予烟草研究学位。河南农业大学 1975 年设立了中国第一个烟草科学专业。1984 年，中国烟草总公司开始支持河南农业大学，帮助设立授予烟草种植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项目，还提供继续教育课程。<sup>③</sup> 1997 年，中国烟草总公司在河南大学成

---

① 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简介，2009 年，<http://www.caas.net.cn/caas/>（2009 年 10 月 27 日访问）。

② Quan Gan and Stanton A. Glantz,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Tobacco Industry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in China," *Tobacco Control* 20(1) (2011): 12-19.

③ 赵传兴、张利军，《在改革中发展壮大的河南农业大学烟草学院》，参见《大河日报》2009 年 9 月 2 日版，[http://newspaper.dahe.cn/hnrbcnb/html/2009-09/02/content\\_218745.htm](http://newspaper.dahe.cn/hnrbcnb/html/2009-09/02/content_218745.htm).

立了国家烟草研究中心，归中国烟草总公司直接管理。国家烟草研究中心是一个研究和教育机构，目标是促进烟草种植和卷烟制造的创新，培训烟草研究人员。<sup>①</sup> 青州烟草研究所和国家烟草研究中心与郑州烟草研究院一样，都已经成为国家级的主要烟草研究中心。

240 2004年，湖南中烟公司下属常德卷烟厂在湖南农业大学设立了烟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招收硕士、博士学生和博士后。<sup>②</sup> 三年后，中国烟草总公司在湖南农业大学设立了中国烟草中南农业试验站，主要研究杂交育种技术。<sup>③</sup>

根据教育部规定，只有大学和政府下属研究机构才可以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不过，中国烟草总公司是中央政府的一部分，郑州烟草研究院隶属于中国烟草总公司，所以，郑州的郑州烟草研究院可以有自己的烟草化学、卷烟制造和烟草种植硕士学位项目。郑州烟草研究院也有一个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培养的博士学位项目（烟草化学），与东南大学有一个联合培养博士学位项目（卷烟制造）。<sup>④</sup> 外人也许觉得奇怪，竟然还有卷烟制造博士学

---

① 中国国家烟草研究中心，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99689.html?fromTaglist>（2009年10月27日访问）。

② 烟草科学与健康重点实验室，百度知道，<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60406500.html>（2009年10月27日访问）。

③ 刘怡斌、李苗、张一杨，《中国烟草中南农业试验站新址揭牌》，红网，2007年10月23日，<http://hn.rednet.cn/c/2007/10/23/1353313.htm>（2017年8月19日访问）。

④ 郑州烟草研究院研究生教育，《郑州烟草研究院与东南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2009年，<http://www.ztri.com.cn/yjsjyweb/ArticleShow.asp?ID=1232>（2009年10月27日访问）



位，但是 2017 年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

中国烟草总公司 1989 年设立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并一直负责管理，<sup>①</sup> 1999 年并入中国最富盛名的大学之一中国科技大学，在中国科技大学成立了烟草与健康研究中心。<sup>②</sup> 烟草与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国烟草总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负责中国烟草总公司的科学评估，包括拨款评估。2003 年开始，中国烟草总公司和中国科技大学设立了烟草专业的继续教育电化课程，向中国烟草总公司员工颁发烟草种植和卷烟制造科学学士学位。<sup>③</sup> 2007 年，中国烟草总公司扩大了与中国科技大学的合作，为中国烟草总公司员工设立了联合培养工商管理硕士项目和技术工程硕士项目。<sup>④</sup>

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另一所顶尖大学，从 2012 年才开始与烟草业有紧密联系。2012 年 12 月，中国烟草总公司副总经理赵洪顺当选中国人民大学董事会成员。在庆祝当选的仪式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表示希望赵洪顺的当选将促进人民大学与

---

① 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cn/%E590%88%E8%82%A5%E7%BB%8F%E6%B5%8E%E6%8A%80%E6%9C%AF%E5%AD%A6>（2009 年 10 月 27 日访问）

② 同上；中国科技大学烟草与健康研究中心，2009 年，<http://www.tobaccocollege.com/tcads/tccenter.htm>（2009 年 10 月 27 日访问）

③ 中国烟草总公司职工技术培训中心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举办现代远程高等学历教育项目，2003 年 3 月 17 日，中国烟草总公司，[http://www.tobacco.gov.cn/html/21/2101/67728\\_n.html](http://www.tobacco.gov.cn/html/21/2101/67728_n.html)（2009 年 10 月 27 日访问）

④ 中国烟草总公司职工技术培训中心，《中国烟草总公司职工技术培训中心组织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2008 年 7 月 18 日，中国烟草总公司，[http://www.tobacco.gov.cn/html/31/3103/640957\\_n.html](http://www.tobacco.gov.cn/html/31/3103/640957_n.html)。

烟草业的协作。

241 中国烟草总公司和当地公司也成立了培训中心，为员工提供继续教育（表 9.1）。虽然培训是主要目的，这些培训中心的研究人员参加各种烟草研究，包括烟草使用的健康影响，自己或者与烟草业研究人员合作开展研究。这些培训中心，有五个设在专科学校内。专科学校与大学一样，是高等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只是级别低一些。

中国烟草业也参与对学龄儿童的教育。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办公室 2010 年的报告，全国 100 多所小学由烟草公司赞助，使用烟草公司名字冠名。中国烟草总公司发言人说，烟草业对这些学校的赞助是“对社会福利的贡献”。<sup>①</sup>

## 研究产出与中国烟草总公司的聚焦点

中国烟草总公司成立后三十年间，中国发表的烟草论文数量增加了（图 9.2）。<sup>②</sup> 烟草种植和卷烟制造是中国烟草总公司开展

---

① 《2010 年两会特刊控烟工作专辑》（2010 年 3 月），中国新闻，2010，<http://www.tcrc.org.cn/html/zy/cbw/jc/1583.html>（2010 年 4 月 10 日访问）；Glen Loveland, “Company Posts Pro-Tobacco Messages in Sichuan School,” San Francisco Examiner, December 29, 2009, <http://www.examiner.com/x-15615-Asia-Headlines-Examinery2009m12d20-Company-posts-protobacco-messages-in-Sichuan-school>（2010 年 4 月 10 日访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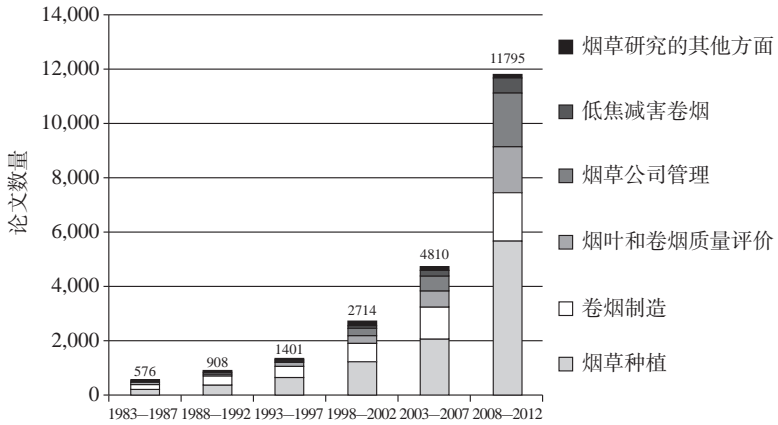
② 这一节和下一节参阅了 Gan and Glantz,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Tobacco Industry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in China.”

研究的聚焦点，1983年到1987年占有所有研究论文的79%，但是，到2008到2013年，降至只占64%。在此期间，针对烟叶和卷烟质量评价和质量控制以及烟草公司管理的出版物增加，表明中国烟草总公司为开发更精密复杂产品和提高烟草业管理效率投入了更多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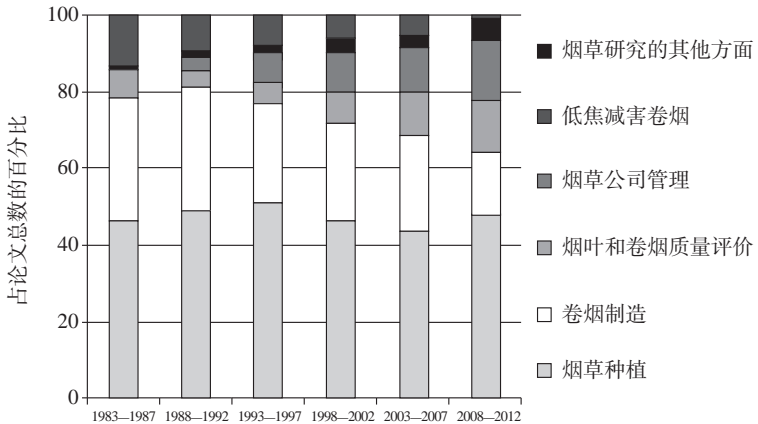
健康研究从未成为中国卷烟制造商的关注焦点，但是我们看到对“低焦油”卷烟的研究有了明显增加（图9.2），尤其是从2008到2012年。这一增加幅度表明中国烟草总公司从关注提高生产力过渡到更多关注产品开发和完善管理。2010年全国烟草工作会议上，中国烟草总公司总经理姜成康报告说，已经把开发“低焦减害卷烟”作为中国烟草总公司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份报告还设定了目标，到2011年1月1日把每支卷烟焦油最高水平降至12毫克以下，到2015年1月1日降至10毫克以下，这些指标由烟草业欺骗性的吸烟机器测定。这份报告还提出，“中国四个主要卷烟品牌开发低焦减害卷烟不仅是为了发展，更是为了生存。”<sup>①</sup>

---

① 姜成康，《全面推进“卷烟上水平”，努力保持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在2010年全国烟草工作会议上的报告》，2010年1月19日，中国烟草总公司，[http://www.tobacco.gov.cn/history\\_filesystem/2010ychy/hybg1.html](http://www.tobacco.gov.cn/history_filesystem/2010ychy/hybg1.html)（2010年4月10日访问）



(a) 1983 年到 2012 年烟草公司在烟草研究六个领域发表或赞助的研究论文的数量。



(b) 1983 到 2012 年烟草公司在烟草研究的六个领域发表或赞助的研究论文所占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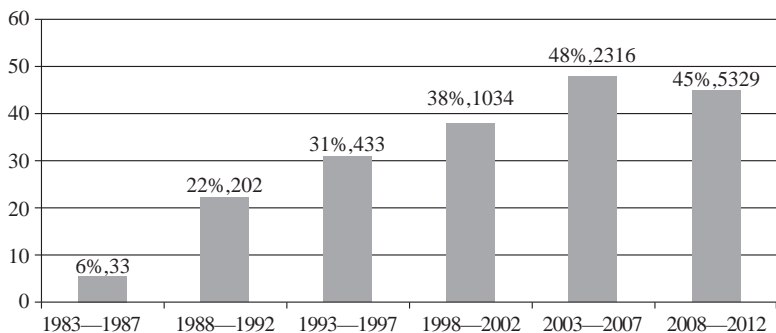
注：搜索与中国烟草公司合作开展研究或接受中国烟草公司赞助的中国学术机构用中文和英文发表的期刊文章的在线数据库，获得这些数据。对烟草公司、下属机构和学术机构的网站也搜索了关于合作的报道。关于方法的细节，请查阅：Quan Gan and Stanton A. Glantz,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Tobacco Industry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in China,” *Tobacco Control*, vol. 20, issue 1 (January 2).

2011年下半年，中国烟草总公司下属的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剑平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是一名学者在中国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谢剑平的主要研究是开发据说降低吸烟危害的低焦油、中草药卷烟。谢剑平当选院士，给了烟草业“低焦油低危害”宣传自圆其说的理由，估计将来会投入更多资源，用于这类误导性产品的研究和开发。

## 中国烟草总公司与学术机构在发表研究论文上的合作

学术机构深度参与烟草公司的研究。在烟草公司研究人员发表的或者烟草公司赞助的所有论文中，42%与学术机构合作。1980年代中期，该比例仅为6%，但是进入新世纪最初十年，增至近一半，之后在2008到2012年期间略降（至45%）（图9.3）。从中国烟草总公司成立到2012年的30年间，根据联合署名或披露烟草公司赞助的证据，中国烟草总公司与337所大学和160家公立研究机构合作或赞助了烟草研究。154所大学和68个公立研究机构声明在烟草公司赞助下开展了烟草研究，其余的大学和公

立研究机构以联合署名作者的方式与烟草公司开展了合作。<sup>①</sup>



243 图 9.3 按照在期刊文章中联合署名情况，历年来学术机构参与烟草公司发表或资助的论文的百分比。

注：百分比的分母是中国烟草公司发表或资助的论文数量。关于数据来源，见图 9.2 的注释。

各家学术机构与中国烟草总公司合作程度相差很大。与中国烟草总公司合作最多的十个学术机构（表 9.1）占与烟草业研究人员共同署名研究论文的 64%，而四分之三的学术机构与烟草公司联合署名发表的研究论文均不到五篇。

学术机构最积极参与的烟草研究领域有三个：烟草种植，对烟叶和卷烟的质量评价，研究“低焦减害”卷烟（图 9.4）。比如，

① 我们的数据来自在以中文和英文发表的期刊文章在线数据库中，搜索与中国烟草公司合作开展或赞助开展研究的中国学术机构。我们也搜索了中国烟草公司、下属机构以及学术机构网站上对合作的报道。关于我们的研究方法，参阅 Gan and Glantz,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Tobacco Industry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in China.”

从 2008 到 2012 年，发表的关于烟草种植的论文中，60% 有学术研究人员共同署名。54% 的质量评价论文和 43% 的“低焦减害”卷烟论文，有学术研究人员共同署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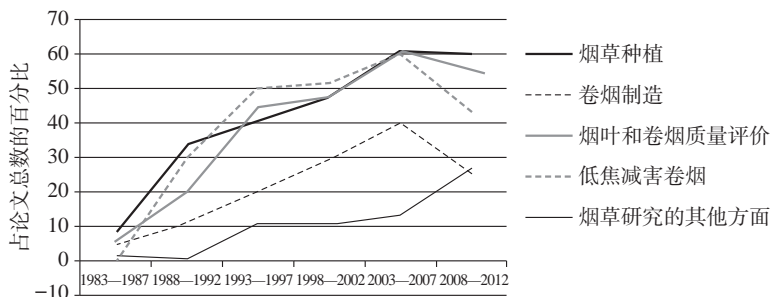


图 9.4 按发表的研究论文联合署名文章占烟草公司发表或赞助的全部论文的百分比，历年来学术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参与烟草公司烟草研究的各个领域。 244

注：关于数据来源，见图 9.2 的注释。

## 中国烟草总公司的研究对烟草控制的影响

245

中国烟草总公司拥有一个广泛的烟草研究机构网络。中国烟草总公司利用其作为政府机构的官方角色，在全国各地设立了研究中心，培训员工，推动研究议程，这些也涉及学术界学者。在烟草研究的每个方面，烟草业越来越多依赖学术研究人员，只有吸烟导致实际危害的研究是个重要例外。中国烟草业是否真的开展过对吸烟健康危害的研究（内部或外部赞助），这方面的证据很少。

在我们调查的出版物中，烟草业似乎没有资助引发吸烟与疾病联系争论的研究。这很可能是吸烟危害的证据在西方和中国的医学文献中已经非常确定。不过，中国卷烟生产商对开发（据称）“减害”技术的兴趣越来越高。针对低焦油、中草药卷烟已经发表了几百篇研究论文，中国烟草总公司宣称这两种卷烟的危害降低。<sup>①</sup>烟草业也利用学术机构作为代言人，为“低焦减害”策略辩护。<sup>②</sup>中国烟草总公司以保护公众健康的名义推广“低焦减害”研究和产品，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产品真的使吸烟的风险降低。

相反，独立的研究表明，低焦油和中草药卷烟传送的尼古丁或致癌物质并没有减少，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是如此。<sup>③</sup>因为难以获取中国烟草总公司内部文件，很难发现烟草业

- 
- ① 黄换贵、朱茂祥、赵明月：《应用神农萃取液降低卷烟危害的技术研究》，参见《2003年烟草生产与人体健康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研讨会暨中外烟草环保科技展示会法规、专题报告论文集》，上海：中国烟草协会，2003年。Zhu Maoxiang et al., “The Molecular Biological Assessment of Shennong Extract in Reducing Harms Caused by Smoking,” in Proceedings of the 5<sup>th</sup> Food Toxicology Conference and Bioactives Symposium (2004); 翁俊斌，《神农萃取液对降低卷烟主流烟气中TSNAs的作用》，《内江科技》2008年第10期，第127页。
- ② Zhu et al., “The Molecular Biological Assessment of Shennong Extract in Reducing Harms Caused by Smoking”; 朱尊权，《从卷烟发展史看“中式卷烟”》，2008年2月2日，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blog\\_4fes5dff01008dvj.html](http://blog.sina.com.cn/blog_4fes5dff01008dvj.html)（2017年8月20日访问）
- ③ Quan Gan et al., “Chinese Herbal Cigarettes Are as Carcinogenic and Addictive as Regular Cigarettes,” *Cancer Epidemiology, Biomarkers & Prevention* 18 (2009): 3497-3501; Quan Gan et al., “Chinese ‘Light’ Cigarettes Do Not Deliver Lower Levels of Carcinogens,” *Tobacco Control* 19(5) (October 2010): 374-79.



推广“低焦减害”卷烟是否是蓄意欺骗宣传的一部分，就像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一样。<sup>①</sup>但是，中国主要的“低焦减害”卷烟维护者谢剑平发表的一篇文章，表明他（可以假定烟草业其他研究人员也是如此）早在2006年，就意识到国际标准组织或联邦贸易委员会方法测量吸烟者从低焦油卷烟摄入量有缺陷。<sup>②</sup>不过，谢剑平仍旧继续推广基于“国际标准组织方法”的“减害”研究，在他的所有关于低焦油和中草药卷烟研究中，继续使用这个有缺陷的评估方法。人们对谢剑平作为研究者的可信度提出了严重质疑，尤其是他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谢剑平本人和中国烟草总公司都没有对这些批评公开做出回应。 246

随着烟草市场全球化和中国烟草总公司与大型跨国卷烟制造商的沟通增加，<sup>③</sup>中国烟草总公司可能制定和采取更复杂的推广策略，包括开展研究、赞助学术研究、让公众对吸烟和二手烟

---

① Silvy Peeters and Anna B. Gilmore, “Understanding the Emergence of the Tobacco Industry’s Use of the Term Tobacco Harm Reduction in Order to Inform Public Health Policy,” *Tobacco Control* 24(2) (2015): 182-89.

② Xie Jianping, “Priority Research Topics from CORESTA,” *Tobacco Smoke and Chemistry* 12(1) (2006): 13-16.

③ 中国烟草总公司信息中心,《红塔集团与帝国烟草签约合作》,烟草在线,2003年8月11日,[http://www.tobaccochina.com/news/China/highlight/20038/2003811143048\\_99680.shtml](http://www.tobaccochina.com/news/China/highlight/20038/2003811143048_99680.shtml) (2010年4月10日访问);胡先权、施惊雷,《中国烟草首个雪茄对外技术合作项目协议在京签署》,烟草在线,2008年9月19日,[http://www.tobaccochina.com/news/China/highlight/20089/200891812158\\_324163.shtml](http://www.tobaccochina.com/news/China/highlight/20089/200891812158_324163.shtml) (2010年4月10日);《首批国产万宝路湖南下线》,烟草在线,2008年7月22日,[http://www.tobaccochina.com/news/China/industry/20087/200872112466\\_313892.shtml](http://www.tobaccochina.com/news/China/industry/20087/200872112466_313892.shtml) (2010年4月10日访问)。

的健康危害更迷惑。<sup>①</sup> 现有证据有限，但是可以表明中国烟草业在某些方面就像跨国烟草公司过去的行为类似，包括使用受欢迎的运动员推广卷烟，以及宣传没有证据支持的低焦油和中草药卷烟。<sup>②</sup> 2009年9月，一位中国烟草业官员在上海一次无烟立法公开听证会上，公开质疑将二手烟与疾病联系起来的科学研究。<sup>③</sup> 不过，为引起对烟草的辩论，烟草业似乎知道需要动用看起来更学术因而更权威的声音。作者 Oreskes 和 Conway 在《贩卖怀疑的商人》(*Merchants of Doubt*) 中介绍了在美国如何招募顶尖科学家传播与主流科学界结论相反的意见，让公众感到困惑。<sup>④</sup> 同样，中国烟草业也积极支持自己的研究人员，比如谢剑平，当选最负盛誉的学术地位。尽管谢剑平对淡味柔和卷烟的学术研究遭到公共卫生界严重质疑，他的学术研究以及在媒体上对这个问题的评论，过去十年无疑帮助中国烟草业树立了淡味柔和卷烟的正当性并推广了这种卷烟。

- 
- ① O'Sullivan and Chapman, "Eyes on the Prize"; Tong and Glantz, "ARTIST (Asian Regional Tobacco Industry Scientist Team)."
- ② 《涉嫌违法发布烟草广告，刘翔“鹤舞白沙”被停播》，新华网，2004年11月3日，[http://news.xinhuanet.com/sports/2004-11/03/content\\_2171088.htm](http://news.xinhuanet.com/sports/2004-11/03/content_2171088.htm) (2009年10月27日访问)；Gan et al., "Chinese Herbal Cigarettes Are as Carcinogenic and Addictive as Regular Cigarettes."
- ③ 《上海召开控烟立法听证会，烟草商代表称二手烟基本无害》，中国烟草在线，2009年10月9日，[http://www.tobaccochina.com/news/China/society/200910/200910622916\\_379532.shtml](http://www.tobaccochina.com/news/China/society/200910/200910622916_379532.shtml) (2017年8月20日访问)。
- ④ Naomi Oreskes and Erik M. Conway, *Merchants of Doubt: How a Handful of Scientists Obscured the Truth on Issues from Tobacco Smoke to Global Warming* (London: Bloomsbury Press, 2010).

## 中国批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影响

中国烟草总公司是一个政府机构，在学术研究人员及其机构中树立了烟草赞助的正当性。几家学术机构公开对中国烟草总公司赞助的研究项目数量之多和能为该公司的研究和发展议程做出贡献感到骄傲。如上所述，中国烟草总公司也对多所大学的烟草研究中心有行政管理权。中国 2005 年批准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其中第 5.3 条明确规定，应防止一个国家的烟草控制政策受烟草业的影响和操纵。<sup>①</sup>烟草业对学术研究的赞助和烟草业参与对学术研究中心的管理，很容易使学术研究受到烟草业影响。 247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中国烟草总公司为保护自身利益，像跨国烟草公司那样经常系统地操纵科学进程，但是，Philip Morris 公司 1996 年启动亚洲区域烟草业科学小组项目后，跨国烟草公司首次联系中国烟草总公司，让它参与操纵科学、保护全球烟草业利益的全球努力，这时它已经与跨国烟草公司建立了更密切联系。<sup>②</sup>中国烟草总公司参与进入学术机构，提供了影响烟草控制政

---

① WHO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WHO FCTC); and “Guidelin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5.3 of the WHO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http://www.who.int/fctc/protocol/guidelines/adopted/article\\_5\\_3/en/index.html](http://www.who.int/fctc/protocol/guidelines/adopted/article_5_3/en/index.html).

② 关于 ARTIST 项目，见 Tong and Glantz, “ARTIST (Asian Regional Tobacco Industry Scientist Team)”.

策制定的渠道，这些关系违反公约第 5.3 条。

除了违反公约第 5.3 条，中国烟草总公司赞助小学违反了公约第 13 条，这一条明确禁止烟草业以任何形式赞助，包括向教育机构捐赠。<sup>①</sup> 中国烟草总公司的这一行为可能推动烟草使用，使烟草业常态化，也使烟草业参与教育常态化。<sup>②</sup> 中国学术机构也应考虑与烟草业的联系，尤其是在健康或推广烟草制品问题上，可能会损害其声誉，这类考虑已经使许多西方大学避开与烟草业的关系。

## 本研究的局限

虽然中国越来越多科学期刊要求披露出版物的资金来源，许多期刊并不要求披露。这会导致低估烟草公司赞助的程度。也应认识到，烟草业与学术研究人员合作不局限于科学出版物，本章审查的内容仅限于科学出版物。虽然本章考察的所有研究都受到烟草业的资助，但在中国的一些地方，烟草税占当地政府收入

---

① “Guidelin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13” of the WHO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http://www.who.int/fctc/guidelines/adopted/article\\_13/en/](http://www.who.int/fctc/guidelines/adopted/article_13/en/).

② Simon Chapman, “Advocacy in Action: Extreme Corporate Makeover Interruptus: Denormalising Tobacco Industry Corporate Schmoozing,” *Tobacco Control* 13 (2004): 445-47; Gerard Hastings and Jonathan Liberman, “Tobacco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airy Godmothers: The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Slays a Modern Myth,” *Tobacco Control* 18 (2009): 73-74.

的相当大比例，省市政府有时候支持通过其他部门，比如科技厅或农业厅对烟草进行研究。这些资金超出本章考察的范围，但是 248 应注意，在烟草业之外还有其他来源的支持，支持学术研究人员开展烟草研究。

与美国、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不同，由于美国的诉讼，可获得跨国烟草公司广泛的内部文件（通过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Legacy Tobacco Documents Library 可以查阅，<http://legacy.library.ucsf.edu>），但是我们能获得的中国烟草总公司内部文件很少。这限制了我们了解中国烟草业与学术研究人员关系的深入程度。比如，我们的分析包括了湖南农业大学周冀衡教授的一百篇文章，这些出版物中 60% 披露得到了烟草业资助。周教授是出了名的烟草业的说客，与中国烟草总公司签署了许多研究合同。但是，因为无法获取这些保密的信息，我们对关系真实情况的了解受到限制。

## 结 论

中国烟草业除了维护着一个属于自己的广泛研究网络，还开展与公立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合作，涵盖从烟草种植到卷烟制造等烟草研究各个领域。这些年来，这一合作增加了，现在占中国所有烟草出版物的近一半。公立大学和公立研究机构参与烟草公司的研究，提高了烟草公司效率，帮助烟草业开发更吸引消费者的产品，增强了烟草业竞争力。其中一个著名例子是低焦油和中草

药卷烟，烟草业大力宣传这些卷烟是减少危害的替代产品。

公立大学和研究机构与烟草业的亲密联系使烟草控制政策制定更加复杂，违反公约和公约第 5.3 条实施准则。烟草业几十年来销售致命产品，现在在减害的新面纱下继续销售致命产品，而这种亲密关系增加了烟草业的正当性。

### 阻挠手册：中国烟草业规划如何抵制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吴宜群 李金奎 庞应发

本书的读者现在应该很清楚，中国是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 FCTC 或《公约》）的缔约国。超过 160 个联合国成员国、非成员国和观察员国成为该条约的缔约国。不过，缔约国成员身份意味着随之而来的责任。《公约》序言中指出，不管缔约国在哪个洲，都须警惕烟草业压制条约的努力。缔约方“需警惕烟草业阻碍或破坏烟草控制工作的任何努力”。同样重要的是缔约国也“应了解烟草业对烟草控制有负面影响的活动。”<sup>①</sup> 这些必要性在《公约》序言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因为历史证明，只有我们对烟草业的战术和战略有充分的了解，烟草控制

---

<sup>①</sup>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3), p. 2.

才能取得进展。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缺少勇气的人无法承担。各个国家的大烟草公司及其代理商设计拖延、拒绝、分散注意力和阻挠的种种策略。他们的所作所为一直是毫不留情的。

在过去的十年中，有两本概述烟草业抵制 FCTC 策略的大部头著作，引起了中国公共卫生倡导者们的注意。其中最重要的一本是 2006 年中文出版的《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对案及对中国烟草影响对策研究》(以下简称《双对》)<sup>①</sup>；另一本是 2011 年出版的《全球控烟瞭望报告》(以下简称《瞭望报告》)。这两本书都是由北京有声望的出版社出版的。<sup>②</sup>

255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本书非常清晰地表明了中国烟草业如何弱化《公约》提出的各项控烟措施，淡化《公约》的影响，阻碍控烟的进程。这两本书是公开向公众发行的，这表明，卷烟制造商肯定已经认定，没有必要隐瞒他们试图破坏《公约》和烟草控制的企图。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第一本书产生的背景，以及它如何影响了 FCTC 在中国的实施。然后，我们将提供包括对第二本书《瞭望报告》的一些批判性思考，以及对烟草业的发展策略的评论。

---

① 周瑞珍、程永照：《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对案及对中国烟草影响对策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年版。

② 程永照：《全球控烟瞭望报告》，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1 年版。



## 背 景

2003年11月10日，中国正式签署了《公约》，但是中国签署的这份《公约》并没有完全排除烟草业的干扰。打个比方说，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并不是突然走到一起一蹴而就地制订了《公约》。在制订《公约》初期的步骤中，烟草业发挥了影响力。例如，2000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成立了一个政府间谈判机构，向世界卫生组织所有成员国开放，同时负责起草《公约》。就是在这个时候，烟草业《双对》的研究开始启动。2001年7月，世界卫生组织第五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决议，强调烟草行业在烟草控制问题上的透明度和不受烟草业干扰的重要性。在《公约》的政府间谈判机构第2次会议召开之际，中国的国家烟草专卖局（以下简称STMA）高层领导加快了速度，成立了由北京烟草专卖局局长周瑞增和云南省烟草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永照两位中国烟草界带头人领导的《公约》对案研究工作组（以下简称“FCTC对案研究组”）。周瑞增和程永照获得明确的指示，国家烟草专卖局责令“FCTC对案研究组”“做好前瞻性研究，服务领导决策，服务行业需要。”<sup>①</sup>

从那时起，“FCTC对案研究组”与中国出席《公约》政府间 256

---

①《双对》研究课题组：关于“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对案及对中国烟草影响对策研究”的总结报告，《双对》，第3—20页。

谈判机构的代表密切合作。虽然后者可能认为其任务是谈判一项有力和有效的条约，但“FCTC 对案研究组”努力削弱仍处于萌芽阶段的《公约》的效力。这项具有破坏性的任务得到了大量人力和财政资源。“FCTC 对案研究组”分别于2001年7月、2002年2月、2002年8月和2003年1月举行会议，就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次政府间谈判机构会议的文本起草《公约》对案的文本。“FCTC 对案研究组”成员还随同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所有四轮政府间的会议。<sup>①</sup>

在《公约》从谈判到诞生期间，“FCTC 对案研究组”对《公约》每一轮谈判前公布的主席文本都经过精心研究，提出高、中、低对案，其中经国家烟草专卖局研究同意后以专报形式上报，供中国政府谈判代表团修改的意见和建议共128条，其中有51条意见和建议被中国政府谈判代表团采纳，并写入了中方立场文件。这些意见和建议（主要是为了削弱条约和实施条件）大大削弱了《公约》对世界最大烟草生产国（中国）的约束力。<sup>②</sup>

2003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WHA56.1号决议，创建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三个月后，在中国即将签署该条约之际，“FCTC 对案研究组”整建制转为“FCTC 对策研究组”，并于当年8月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中国政府于11月10日签署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随后，在次年3月

---

① 赵百东：世界卫生组织框架公约概览，《双对》，第78—84页。

② 《双对》研究课题组：关于“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对案及对中国烟草影响对策研究”的总结报告，《双对》，第8页。

和8月，“FCTC 对策研究组”举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议（分别在海南省海口和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随后，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FCTC 对策研究组”整建制更名为国家烟草专卖局履约工作组。<sup>①</sup>

该小组还编写了大量的报告、专刊、特刊、通讯等书面文件，这些也都是为了帮助烟草业准备和消除《公约》对烟草业构成的威胁。简单地说，“FCTC 对策研究组”的使命是通过破坏该条约来维护烟草业的利益，即使这意味着削弱公共卫生。如果仅就其本身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赞扬该小组的多产，“FCTC 对策研究组”先后推出了一百多项旨在阻碍《公约》实施的“对策”（或建议），这些我们即将在下文中予以阐述。 257

“FCTC 对策研究组”为了争取获得有利于烟草发展的外部环境，于2001年3月至2002年6月邀请了多个中国政府代表团参观烟叶和卷烟主产区。在接下来的四年里，“FCTC 对策研究组”组织了数十场讲座，发表了数十篇研究论文，并分发了许多支持烟草业的小册子。据烟草业的一项估计，“FCTC 对策研究组”有一万多小时用于设计和推动《公约》的对案与对策。<sup>②</sup>

其最终效果是削弱了《公约》的措辞。烟草业的《双对》研究的总结报告显示 FCTC《双对》研究组在确保修改了 FCTC 的“一些严格规定方面取得了成功。”<sup>③</sup> 翻译（英译汉）是这种修改的

---

① 赵百东：世界卫生组织框架公约概览，《双对》，第84页。

② 《双对》研究课题组：关于“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对案及对中国烟草影响对策研究”的总结报告，《双对》，第17页。

③ 同前，第8页。

关键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间代表团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公约》中文版的谈判和核准。作为该过程的一部分，《双对》研究小组的成员与国家烟草专卖局的资源和翻译小组携手合作，审查最终将加入条约中的所有内容。《双对》研究组与翻译小组不分你我，尽一切努力将来自日内瓦的强有力英语词汇翻译成软化的汉语词汇。

例如，他们反复建议将文本中一些语气强硬的措辞，如“应”、“必须”等，用一些语气较为缓和的词如“可”、“酌情”、“宜”、“适当”等代替。烟草业的许多编辑意见被谈判该条约的我国政府代表团采纳。今天，这些建议许多条构成管理中国政府“烟草控制”目标的措辞。国家烟草专卖局对成功把有利于烟草业的措辞纳入条约的中文版十分满意，授予《双对》研究组和翻译小组成员嘉奖。<sup>①</sup>

258 许多其他的赞誉跃然出现在《双对》书中，特别是这本 445 页的书的前页部分，其中包括许多媒体和学术团体单位给予的赞扬。人们还可以看到来自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热情洋溢的成果应用推荐信。也许最重要的是序言，作者正是中国烟草总公司总经理姜成康。姜赞扬了参与该书制作的每个人，感谢他们为“领导人的决策和行业需求”服务。他传达的信息很明确：这本书自中国政府内部，支持中国政府，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

①《双对》研究组，收集、翻译和整理有用资料确保《公约》研究工作顺利开展，《双对》，第 220 页。

## 建立管理逻辑：狐狸怎么变成守鸡舍的

官僚思维一旦确立，就有一种成为常规的方式。《双对》研究者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公约》建立有利于烟草行业的思维方式。在整本书中，我们看到这些作者阐明的原则已经成为中国烟草控制的特征。例如，他们认为，中国的烟草情况是特殊的，因为“我们的行业是国有的，而不是私营的”<sup>①</sup>，而且既然是国有的，这个行业只能由它自己的国家机构从内部进行有效的监管和合作。因此，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全盘拒绝《公约》；事实上，烟草业应该“对烟草控制开放”<sup>②</sup> 国家烟草专卖局不会被《公约》削弱；相反，它将得到“加强和保护”。<sup>③</sup>

《公约》起草者大多数来自中国以外，他们当然无法想象烟草业和《公约》之间除了激烈对抗还可能有其他关系。但是，《双对》小组清晰地设想了另一种关系，一种更为相互支持的关系，一种“协调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国家烟草专卖局将在《公约》的形成和实施方面发挥关键作用。<sup>④</sup>

---

① 《双对》研究课题组：对 FCTC 具体条款的基本认识及对策建议，《双对》，第 263 页。

② 赵百东：专卖有利于控烟，履约控烟更需要专卖，《双对》，第 358 页。

③ 周端增：提高认识，采取措施，有效应对《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公约》对策研究工作小组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双对》，第 228 页。

④ 《双对》研究课题组：对 FCTC 具体条款的基本认识及对策建议，《双对》，第 263 页。

基于这一逻辑，将烟草行业代表纳入《公约》的中国代表团是完全合理的。《公约》于2006生效后，中国国务院2007年在中央政府内部设立了一个名为《公约》机构间履约协调办公室，以  
259 确保烟草行业与该履约办公室的密切合作。国务院没有授权卫生部管理这个新的办公室，相反，将该办公室并入了权力更大的政府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信部还掌管中国政府的哪个部门？对，是国家烟草专卖局，2007年它为中国政府创造年利税近4000亿元。换句话说，在同一个帐篷下，一个新的小型监管机构和一条极其富有的“现金牛”并肩而坐。一个负责执行世界上第一个公共卫生条约，另一个是庞大的制造业实体，负责制造和销售《公约》所要监管的烟草产品。还有比这更大的利益冲突吗？而这一切都源于《双对》研究所提出的逻辑。

2006年《双对》出版了，编辑们将出版任务交给了位于北京的经济科学出版社。在此书的所有文章中，编辑和作者都煞费苦心地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务实而有责任心的人。他们强调“中国的实际国情”、“公平客观”和“实事求是”等术语，坚持认为《公约》的所有参与者“需要充分认识到我国国民经济对烟草行业的依赖性”。还坚持认为有必要避免“片面的、主观的、甚至过激的行为。”<sup>①</sup>因此，该卷的撰稿人坚持认为每个参与烟草控制的人都要了解限制手头工作的重要性：“宣传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的形象，我们必须尽力只满足《公约》条款规定的最低要

---

① 《双对》研究课题组：关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及对中国烟草影响对策研究的总结报告，《双对》。

求。”<sup>①</sup> 这一最低标准应该如何实现？让我们来看看如下按战略分类的“对案”和“对策”。

## 否定科学证据，淡化烟草危害

管理与烟草相关的科学是其中一个步骤。也许这并不奇怪，但是《双对》的研究援引了许多美国和欧洲的卷烟制造商自 1950 年代以来所采用的否认烟害的策略。<sup>②</sup> 这本书努力鼓励人们把烟草 260 业幻想成科学的公正仲裁者，同时也传播一些错误的主张，鼓动人们进行更多的研究，诋毁公共卫生学者使用的科学方法。因此，这本书中没有一处承认卷烟会导致疾病或死亡，也没有承认每年有数十万中国人死于吸烟。相反，编辑们给出了一个惊人的信息：“大多数科学家们承认，在主流烟草烟雾中鉴别出的超过 4850 种成分中，99.4% 对人体无害。”<sup>③</sup> 这就像是说战争是安全的，进入你身体的大部分东西都不是子弹。这本书还宣扬了“接触烟草烟雾量的大小、个人体质的不同均会得到不同结果”，即“流行病学研究的局限性是众所周知的”（如：流行病学的研究结果只具有统计关系和某些理论性假说，而无明确的和最终的答案）；“只有全面

① 周端增：提高认识 采取措施 有效应对《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公约》对策研究工作小组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双对》，第 230 页。

② Robert N. Proctor, *Golden Holocaust: Origins of the Cigarette Catastrophe and the Case for Aboli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③ 郑富钢：烟草控制与公众健康意识的教育及交流研究，《双对》，第 318 页。

和更有针对性的研究才能产生科学、公正的结果”。<sup>①</sup>

挑战与烟草有关的科学是《双对》研究的重点之一。今天任何认真学过一点儿医学的人都不会怀疑接触烟草烟雾会导致死亡和残疾，这是事实，就像地球绕太阳转，或者疫苗可以预防疾病一样。

然而，《双对》一书的作者们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呼吁开展一场运动，“减少或最小化这种观点造成的负面影响”（指论证吸烟危害的科学观点），这项运动将“创造一个科学的学术环境”来“反对不正确的、有偏见的观点”，“客观界定吸烟的危害性”。这一切都是为了“正确宣传吸烟与健康问题，营造积极的社会舆论氛围。”<sup>②</sup>

然而，《双对》的编辑们并不认为他们的工作仅仅是煽动一场传播错误信息的运动。他们还想给世界卫生组织施压，迫使世界卫生组织改变《公约》传播烟草危害科学知识的方式。以下是他们对《公约》第4条《实施准则》的建议：

我们建议删除“健康后果、成瘾性和致命威胁。”理由：现在无法确定吸烟带来的成瘾性程度，“致命威胁”就更无依据了。我们还建议删除“引起的疾病、过早残疾和死亡的发生率”的词语。理由：不可能界定疾病、过早残疾和死亡是由烟草消费造成的。<sup>③</sup>

---

① 赵明月：“吸烟与健康”的争论与发展，《双对》，第312页。

② 《双对》研究课题组：对FCTC具体条款的基本认识及对策建议，《双对》，第262—278页。

③ 《双对》研究课题组：对INB6主席文本的修改建议，对案研究，《双对》，第20页。



## 更安全的卷烟？

261

“减少危害”的措辞是编辑“FCTC 对策研究”计划的另一个重点。中国以外的卷烟制造商在 20 世纪中叶开始欺骗性地推销“淡味”和“低焦油”卷烟，无视他们自己的内部研究，这些内部研究表明这些产品的致死率并不比普通卷烟低。<sup>①</sup> 国家烟草专卖局在世纪之交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比 2006 年《双对》出版早了几年，2003 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布了《中国卷烟科技发展纲要》，把发展“高香气、低焦油、低危害”卷烟列为优先发展方向。

“FCTC 对策研究组”的成员都是这项新的 STMA 战略的早期拥护者。编辑们建议，中国的烟草业应积极向所有人承诺（无论是吸烟者还是非吸烟者），尽一切努力生产一种危害更小的卷烟。我们要“积极应对，化压力为机遇，主动进取，为生存而奋斗。”“我们必须减少”烟草烟雾中的有害成分，并制造出高品质的‘高香气、低焦油、低危害’卷烟。”<sup>②</sup> 这个计划的虚伪本质体现在“FCTC 对策研究”中，他们当时已经完全知晓，国际烟草控制机构已经开始揭露“淡味”卷烟是彻头彻尾的欺诈，是“比传统卷烟更能伤害人们”的花招。无论医疗和公共卫生机构“多么

---

① 美国地区法官 Gladys Kessler 在 2006 年 8 月 17 日颁发了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诉讼案——美国 vs Philip Morris 烟草公司——的最终裁断意见，其中指出该公司用“低焦/淡味卷烟不像普通卷烟那么有害”的谎言来推荐产品是错误的营销手段。

② 程永照等：做好“双对”研究，应对控烟挑战，《双对》，第 62 页。

不赞成“低焦油、低危害”卷烟的发展方向”，都是无用的，因为公共卫生立场“与烟草业的努力背道而驰”。<sup>①</sup>

## 维护经济

散布经济恐慌是《双对》研究中惯用的伎俩。该书坚持认为，目前在中国“我们仍然需要依靠烟草来积累国家财富。”<sup>②</sup>“如果我们直接借鉴其他国家的烟草控制经验，或者完全遵循《公约》最初拟议内容中的条款来控烟，将会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sup>③</sup>烟草产业对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公约》对烟草生产经营的严格限制肯定会对中国的烟草业产生全方位的影响，“随着影响程度日趋增强，中国烟草经济的发展速度将逐渐减缓。”<sup>④</sup>

在使用这些恐吓战术时，编辑们明确表示，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支撑“国家财政收入、地方经济、吸烟者的利益和烟草工人

---

①《双对》研究课题组：关于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对中国烟草经济影响的利弊分析研究报告，《双对》，第36页。

②程永照等：关于吸烟与健康问题研究蓝皮书，《双对》，第369页。

③《双对》研究课题组：关于“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对案及对中国烟草影响对策研究”的总结报告，《双对》，第3页。

④双对课题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对中国烟草的主要影响及中国烟草应采取的主要措施建议（中期报告），《双对》，第251页。

的利益”。<sup>①</sup> 他们的主张不是维持现状，而是要扩大生产。在他们看来，“烟草业的财政安全只能通过增加卷烟产量来维持”。《双对》研究并不赞同卫生专家改变税法的意愿。这本书提供了从“刺激走私、生产假烟到不公平”等一长串的理由来反对提高烟草税，“在制订烟草发展的税收政策时，让烟草行业能享受到与其他行业同等的待遇，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生存和发展环境，确保中国烟草行业的生存和发展：稳定增长。”<sup>②</sup> 他们甚至建议，为了保护吸烟者，税率应该保持在低水平，因为“较高的税率将对烟草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导致科技投资减少，从而延缓降焦减害目标的实现。”<sup>③</sup>

相反，该书鼓励采取三种主要对策。首先，烟草业应该与政府机构，包括那些负责财政和税收的机构更紧密地协调。其次，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税收政策调整对烟草产品成本及消费需求的影响。最后，在税收问题上，应该淡化《公约》的相关条款。条约的中文译文应该使用“建议”“宜”“考虑”和“酌情决定”这样的措辞，而不是原文中关于税收的措辞，从而“限制 FCTC 的约束力。”<sup>④</sup>

---

① 程永照：第四次全球控烟浪潮的兴起与发展——《烟草控制框架公约》通过一周年述评，《双对》，第 47 页。

② 《双对》研究课题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对中国烟草影响研究的对策报告，《双对》，第 282 页。

③ 郝和国：价税政策调整对我国烟草行业影响的分析，《双对》，第 341 页。

④ 《双对》研究课题组：关于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对中国烟草经济影响的利弊分析研究报告，《双对》，第 30—37 页。

## 阻挠去常态化

《公约》的一个核心目标是使烟草使用去常态化（denormalize）。相反，《双对》研究的编辑们认为，烟草行业的一个共同使命必须是“在我们的消费者中培养一种吸烟是正常行为的观念”。<sup>①</sup>编辑们并不羞于提出将吸烟定义为是一种正常的行为。他们把吸烟描写成一种合理的、“快乐的基本来源”，是一项“基本权利”，甚至是一项“人权”。<sup>②</sup>他们把吸烟描述为“一种社会习惯”和“一种自由选择”。<sup>③</sup>

使吸烟行为常态化是一项任务，同样，任何寻求实施《公约》的卫生组织（与烟草业本身相比）都被指责为非理性。《双对》研究的编辑们则非常开放地提出了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建议。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将与《公约》结盟的组织描绘成无视本国国情的组织，称他们违背人民的利益，不负责任。烟草控制的倡导者们被污蔑为没有“实事求是”，而是鹦鹉学舌。<sup>④</sup>

---

① 程永照：以人为本 关爱健康——中国卷烟产品的社会责任，《双对》，第 58 页。

② 程永照等：中国烟草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双对》，第 377—378 页。

③ 周端增：提高认识、采取措施、有效应对《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公约》对策研究工作小组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双对》，第 229 页。

④ 程永照等：中国烟草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双对》，第 376 页。

## 警示标签

与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的烟草业也强力抵制要求加强卷烟包装上警示标签的法律。也许是为了规避未来的责任，国家烟草专卖局已经同意在 20 世纪末的几年里首次在包装上贴上“吸烟有害健康”的小而无力的标签。从那时起，国家烟草专卖局就与努力呼吁加强警告的公共卫生作斗争，只允许在 2008 年、2012 年和 2016 年对警示标识进行细微的修改。

《双对》研究中有很大一部分涉及到警示标签的问题。该书作者概述了《公约》中有关“烟草产品的包装和标签”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条款将如何在中国导致警示标签的实质性变化，包括增加图形警示。作者们坚持烟草行业必须尽其所能抵制《公约》的这些条款。<sup>①</sup>

《双对》的编辑们强调，一个至关重要的考虑因素是“高档卷烟”的未来。“高档卷烟”是过去 20 年来迅速增长的一个产品类别。高档卷烟的利润率如此之高，以至于业界认为，要想保持每年两位数的收入增长，高档卷烟是不可或缺的。《公约》关于警示标签的规定可能会扼杀“依赖高档卷烟的企业生命”，编辑们警告，对高档卷烟来说，尤其危险的是实施《公约》要求在包装上印有图形警告标签。这样的警告“可能导致高档卷烟价格下跌， 264

---

<sup>①</sup> 赵百东：《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研究，双对》，第 242 页。

致使烟草业利润大幅下降。”<sup>①</sup>由于卷烟传统上是“节日、假日、社交聚会、庆典和婚宴等特殊场合的必备消费品”，如果烟盒上印上大而醒目的健康警示，将对烟草行业产生“直接”影响，需要“引起高度重视。”<sup>②</sup>

关于实施《公约》“烟草产品包装和标签”的第11条，《双对》研究的作者认为，大的图片式警告“将完全破坏原有的包装设计”。他们认为烟草业应该采用让普通成年男性吸烟者“容易接受”的新警告，比如“吸烟影响胎儿发育”和“吸烟有害儿童健康”。<sup>③</sup>卷烟制造商应该允许烟盒轮换警告标签，但数量要少，间隔时间要长，以帮助消费者区分真烟和假烟。应拒绝更强烈的警告，理由是它们是不适当的，也不尊重中国国情。尤其应该拒绝图形警告，因为它是“审美畸形”，会“完全破坏原始的包装设计”。<sup>④</sup>

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国家烟草专卖局成功地避免了使用更强烈的警示标签。他们坚持的警示标识与1990年代末首次提出的警告相比，变化不大，没有任何图像，而且很少轮换文字警告，不会引起注意。

国家烟草专卖局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的

---

① 王玉麟等：《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对我国烟草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双对》，第246页。

② 周端增：提高认识、采取措施、有效应对《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公约》对策研究工作小组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双对》，第229页。

③ 同上。

④ 赵百东：《公约》谈判中的焦点问题分析，《双对》，第82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卷烟包装标签管理办法》对中国卷烟标签的管理作出了规定。当这些规定在 2008 年首次发布时，激起许多公共卫生专家的愤怒。他们写信给政府机构，呼吁要求加强监管，要求采用大幅、清晰、图形化的警告。他们还要求由卫生部门主持制定和批准包装警示标识，以避免让不诚信的狐狸看守鸡舍。专家们的建议屡次遭到相关部门的拒绝。

奇怪的是，尽管有以上这些抵制，中国大陆的卷烟制造商一直在悄悄地改变一些顶级品牌的包装，在上面加印醒目的图像警告。然而，大多数中国公民从未见过这些产品。这是因为它们都是为出口到当地法律要求使用图形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邻国泰国、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地而设计的。这种出口产品和国内产品之间的对比非常明显（见图 10.1）。 265



图 10.1 一包在中国销售的中华牌卷烟与两包在其他地方销售的同一品牌卷烟的比较

由作者吴宜群收集并提供

## 广告、促销和赞助

产品包装并不是卷烟营销的唯一形式。同样重要的是体育或文化活动方面的广告、促销和赞助，在这些领域，《双对》研究的贡献者也同样直言不讳，他们的推动始于确定《公约》文本的谈判。正如上文所述，“FCTC 对策研究组”的成功游说，淡化了该条约中文版本的关键语言。其中最重要的是它对今天涵盖禁止烟草营销的《公约》第 13 条的弱化，而该条款的英文版要求“全面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而中文版仅要求“广泛禁止”。<sup>①</sup>

然而，“FCTC 对案研究组”与营销相关的活动已经超出了操纵文字的范畴。在中国批准《公约》后，该研究小组建议烟草行业在广告和促销方面采取专门的战略，以当地条件作为限制因素，266 鼓吹《公约》已经得到充分实施。“根据中国的当地条件，我们应该强调‘限制’而不是‘广泛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sup>②</sup>烟草业应尽可能宣称，“我国对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管理已经非常严格，已基本达到公约要求、所以无需再提出额外措施”。<sup>③</sup>

“FCTC 对案研究组”同样建议烟草业支持赞助“公益事业”，

---

① 同上。

② 《双对》研究课题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对中国烟草影响研究的对策报告，《双对》，第 285 页。

③ 《双对》研究课题组：对 FCTC 具体条款的基本认识及对策建议，《双对》，第 268 页。



以规避广告的限制。<sup>①</sup>该计划旨在“通过回馈社会来提升烟草公司的形象”。这包括建议利用媒体保持卷烟品牌和工厂名称的流通：“随着烟草广告面临越来越多的限制，以烟草公司的名字命名一些辩论会与捐助活动。”<sup>②</sup>烟草业遵循了这一建议。不计其数的事件和活动得到了烟草业的赞助，从消除贫困到支持健康、教育事业，再到赈灾。

例如，希望工程（Project HOPE）的中国分支机构就获得了特别丰厚的回报。希望工程是一个人道主义组织，于1950年代在美国成立，于1980年代在中国立足。2000年北京卷烟厂成立“中南海爱心基金”，鼓动消费者购买带有“您每消费一盒中南海卷烟，就向希望工程献一份爱心”标记的卷烟产品。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通过希望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对小学的烟草赞助。烟草冠名的希望小学有数百所！多年来，在烟草业捐助的四川希望学校的屋顶上，竖立着中国烟草的标志，甚至打出醒目的汉字“烟草助你成才。”

## 《全球控烟瞭望报告》：烟草工业的第二份文本

《全球烟草瞭望报告》这本书由云南烟草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

① 双对课题组：关于开展“《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对案及对中国烟草影星对策研究”课题调研的汇报，《双对》，第64页。

② 双对课题组：关于云南部分烟草企业调研情况的汇报，《双对》，第68页。

267 《双对》的首席编辑程永照主编，获得烟草业资助和文章支持。报告编纂从2010年开始，一年后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这本大部头的著作号称是中国第一本回顾和预测全球烟草控制的专著，而且它自始至终都以独立思考自诩，作者试图淡化他们与烟草业的联系，暗示作者们要么只是对烟草控制感兴趣的独立专家，要么他们的观点根本不能代表雇主（烟草业）的观点。这种做法可能是有鉴于《双对》研究公开地成为了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一个工具引来的责难，《瞭望报告》的主编程永照先生当然会意识到这些批评，因为他也是第一本书《双对》的主编。

此外，到2011年1月，中国的控烟者已经连续五年在《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支持下，推动反烟草运动。此时，尽管烟草行业竭力拖延，但烟草控制推进的鼓声明显增强。意见领袖、专家、记者和各种非政府组织越来越积极地向公众宣传烟草控制的必要性以及烟草业破坏烟草控制的战术和伎俩。《瞭望报告》的作者清楚，在这种环境下，直接反对《公约》的立场，例如在《双对》研究中所持的立场，有可能被视为反动和不道德而不被接受。因此《瞭望报告》的表达需要采取更柔和、更微妙的语气，涉及更复杂的战略。这就是《瞭望报告》所给予的。

但是，无论它的文笔多么柔和，思维多么缜密，《瞭望报告》的意图仍然和前述的《双对》一样：阻碍《公约》的有效实施。<sup>①</sup>这并不奇怪，《双对》和《瞭望报告》是同一组烟草行业内部高层人士撰写的。

---

<sup>①</sup> 程永照：《全球控烟瞭望报告》，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瞭望报告》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采用相对中性的语言描述了世界各国烟草使用的普遍性、烟草控制的进展和立法、广告和促销的现状、烟草包装和标签以及围绕烟草税收的问题。该书的最后三分之一以更明显带有倾向性的语言，提出了烟草控制的观点，包括关于吸烟与健康的“辩论”尚未结束；<sup>①</sup>主张对减害进行更多的研究；声称增加烟草税只会助长走私；烟草控制将损害国家经济安全。在本章的剩余部分，我们将概述这些观点并加以反驳。 268

A.《瞭望报告》的主张之一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必过度热衷烟草控制，因为一个国家执行烟草政策的严格程度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天然的对应关系：“较为发达的国家其烟草控制政策往往非常严格，吸烟率呈下降趋势。”<sup>②</sup>

反驳：亚洲烟草控制的经验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像 GDP 这样的指标所定义的发展与烟草控制政策执行的积极程度并没有密切的联系。例如，泰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在发达之列，但它确有强有力和严格执行的烟草控制政策。中国许多城市的发展水平接近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水平，但中国内地富裕城市的烟草控制要比其他这些同样是中国文化背景的地方宽松得多。

---

① 同上，第 6 页。

② 同上，第 55—56 页。

B.《瞭望报告》的另一个观点是请政策制定者记住，应当充分考虑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及人民健康两方面的职责。在决定实施《公约》的哪些部分以及如何严格执行时：“在不违反《公约》规定的义务的同时，只应采取有益措施，避免采取有害措施，维护国家利益。国际组织对控烟的形式、范围、程度应尊重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作出的不同选择。”<sup>①</sup>

反驳：《公约》没有任何地方规定这种双重责任。《公约》缔约的宗旨，是要各缔约方“决心优先考虑其保护公众健康的权利”，是“虑及国际社会关于烟草消费和接触烟草烟雾对全世界健康、社会、经济和环境造成的破坏性后果”。<sup>②</sup> 签署和批准《公约》是每个缔约国作出的决定。意味着一个国家承认并同意遵守《公约》的条款。但是，如果《公约》的各方在执行过程中都可以自由地遵循自己的“方针、范围和程度”，那将使整个《公约》失去意义。

C.《瞭望报告》中两个相互重叠的假设是，吸烟是一项基本人权，而禁止吸烟是不合理的：“控烟是件好事，我举手表示支持。但是禁止吸烟是不可能的……。任何国家、政府

---

① 同上，第5页。

②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3), p. 1.

或组织都不可能颁布法令，禁止人们在某一天、某一月、某一年的某一时刻吸烟……。你不能禁止吸烟……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中尊重人权的条款，吸烟是成年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必须得到尊重。”<sup>①</sup>

反驳：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顾名思义，就是为了控制烟草使用的危害，并不是禁止吸烟，更不是从地球上消除烟草。《公约》制定的所有条款与实施准则，也都没有一条是要限时限刻禁止吸烟。该条约确实要求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是为了保护非吸烟者不受烟草烟雾危害。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表明“人人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第二十九条又明确规定：“人人在行使他们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与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公共场所禁烟恰恰是《世界人权宣言》精神的体现。

D.《瞭望报告》同样声称，有一个由外国人煽动、不公平地针对中国烟草的阴谋。最近一项关于中国卷烟中重金属含量的研究就是证据：“控烟全球化使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问题不断增多，也给力图借控烟之名义和力量摧毁国家烟草财政体系，进而攫取国家财富的一些组织机构提供了可乘之机。最新的事件涉及在一些烟草产品中发现重金属的宣

---

<sup>①</sup> 同上，p. 3.

传。我们需要科学、理性和客观地对待某些组织和个人企图挑起阴谋、制造事端的行为，这些组织和个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尤其是挟洋人及美元以自重。”<sup>①</sup>

反驳：2006年，中国一个官方学术机构的研究人员和国外一所大学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合作进行了一项研究：检测了13种不同品牌的中国卷烟中的重金属含量。2010年，他们研究报告称，中国卷烟中的镉、砷和铅含量是加拿大卷烟的三倍多。<sup>②</sup>媒体报道了这些发现，导致一些读者开始担心他们使用的卷烟的安全性。这样一件科学界极普通的事情，几乎没有理由怀疑是外国阴谋或恶意。为什么《瞭望报告》的作者把一个常规的研究发现变成了一个国际阴谋？政治偏执不应在科学或公共政策中扮演任何角色。

## 结 语

《双对》的研究显然是国家烟草专卖局的“超前”谋划，《瞭望报告》一书则是烟草企业友好人士的“后续”追加。两个出版物都揭示了烟草工业操纵《公约》的策略，目的是继续扩大中国

---

① 同上，p. 312.

② Richard J. O'Connor et al., “Cigarettes Sold in China: Design, Emissions and Metals,” *Tobacco Control*, 19(2010): i47-i53.

烟草行业，削弱《公约》的效力。两本书的作者都声称他们的书是重大的“科研成果”，维护了“国家利益”和“消费者的利益”。

鉴于此，有必要再次回到《公约》的序言部分，《公约》序言中所说“认识到需警惕烟草业阻碍或破坏烟草控制工作的任何努力”是多么重要。“就中国而言，我们发现，《双对》课题组的“不懈努力”，已经谈判并实施了一个有利于烟草业的《公约》。由于中国政企合一的烟草业体制，国家烟草专卖局同时又是中国烟草总公司，这两个法律实体实际上是同一群人，他们有着非常强大的权力。在这种体制下，作为烟草行业管理者的政府部门不能约束自身企业行为，事实上，国家行政权力和财政实力的结合使得中国卷烟制造商能够有效地（公开地！）反对烟草控制和《公约》的实施。这种制度的缺陷已成为中国有效控烟的主要障碍。

在中国批准《公约》之后的几年里，中国的烟草产量有所增长，吸烟率保持很高的水平。根据这项条约，吸烟已成为中国可预防的主要死因。截至2011年，中国已加入《公约》5年，但中国在《公约》100多个缔约国中，除少数国家外，《公约》执行情况排名倒数第几名。中国履约评估得分继续低得惊人。<sup>①</sup>

让现行的政企合一的烟草公司来主导控烟，无异与虎谋皮，有如让狐狸看守鸡舍。不管用什么比喻，如果中国要以诚实和有效的方式履行《公约》，中国就必须取消烟草业在所有烟草政策问题上的权威地位。利润是卷烟制造商的终极追求。但这一目标

---

① 杨功焕、胡鞍钢：《“控烟与中国未来”——中外专家中国烟草使用与烟草控制联合评估报告》，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

的实现需要付出公众健康的高昂代价。“人类健康”和“烟草业利润”永远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于 2010 年 11 月在乌拉圭召开的缔约方会议致辞时说：“怀有良好愿望和善意的国家面临重重障碍。毫无疑问，最大障碍是来自烟草业的强烈阻挠。”“这种较量已经成为保护公众健康和追求企业财富之间一场旷日持久的恶战。”<sup>①</sup>

---

① Margaret Chen, “Address by Dr. Margaret Chen, Director-General of WHO” (speech, Punta del Este, Uruguay, November 15, 2010) WHO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for Information Sharing.



## 后 记

277

Robert N. Proctor

从某个角度看，再没有比这事更自然的了。每天早上，就像钟表一样精确，3.5 亿中国人点燃一支烟，然后又一支，接着又一支。农民种烟和烤烟，卷烟厂使用超薄的烟纸把烟叶卷成纸筒，零售商展示和销售最终产品。国家对它收税。

这可不是让我们得意洋洋的事。烟草每年夺去大约 120 万人的生命，这个数字要继续增长多年，才会下降。卷烟导致死亡是因为随卷烟烟雾会吸入大量有毒物质：在中国，每年几百万吨黑油烟和焦油直接输送到吸烟者的肺部，还有几千吨输送到不吸烟者的肺部。身体不受伤害的器官很少：肺部当然会患上癌症，但是卷烟也导致脚部坏疽，黄斑变性，性早衰，还有其他几十种疾病。

中国正遭受人类文明史上最致命的疫情——吸烟之害。就像人类导致的其他灾难一样，可以指责的方面很多。在中国，卷烟导致疾病，因为吸烟者吸烟，零售商卖烟，卷烟厂制造卷烟，农民种烟叶。卷烟也导致死亡，因为中国政府鼓励卷烟行业；的确，

中国作为国家拥有和控制着中国的全部烟草制品生产。所有这些都是导致卷烟灾难的原因，是复杂因果链条或网络的一部分，任何一个环节被打破，卷烟导致的死亡都会减少。

278 从历史的角度理解这些因果联系很重要。研究历史的目的之一，是理解我们如何走到现在，但是另一个目的是理解有可能会何种不同（包括现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不一定非得是这样。我们受历史力量影响，但是历史还没有完全超出我们的控制。

## 恶性大灾难

需要指出，在中国，吸烟的疫情是最近才出现的。1949年，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那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消费了约800亿支卷烟。今天，这一数字增加了30多倍。财富和人口增加只能解释其中一部分增长；我们也必须在国家专卖和尼古丁药理控制的背景下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隔绝，中国领导人（比如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个人习惯，以及政府对税收无法满足的欲望等方面来理解；也必须从漠视普通人的角度理解，进而可以追溯到中国卷烟制造商、教育者、医生和媒体领导人未能恰当警示公众吸烟的危害。

“每个人都已经知道”吸烟的危害，这是个随手拿来搪塞的说法。的确，在美国，“尽人皆知”的说法是卷烟行业开脱罪责的主要荒诞说法。在烟草业被指控掩盖真相或销售有缺陷产品时，烟草业反驳的论调是：对危害的知识早就“普遍”知晓了，吸烟者

不管遭受什么伤害，只能怪自己。律师把它称为“风险自担”辩护，但是在诉诸“个人选择”和“个人责任”等概念时，它有更广泛的说服力。

即便在美国，这三十多年来卷烟销售量一直在下降，受过教育的精英人士对吸烟也有许多不知道的东西。我在斯坦福大学有一个讲座课程，我问学生，他们是否**确信**吸烟是肺癌的**首要原因**，我发现班里只有约三分之二的学生作出肯定回答。对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调查发现，吸烟者不如不吸烟者知情，穷人不如富人知情。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吸烟已经成为弱势群体的一种习惯，他们被烟草公司捕获，忠贞不渝地使用烟草制品。1980年代，在被问及 R.J. Reynolds 烟草公司的行政管理层是否吸烟时，他们表达了这样的情绪：“你开玩笑吗？我们把这项权利留给穷人、年轻人、黑人和傻子。”<sup>①</sup> 279

民意调查表明，公众对烟草危害的性质和程度了解不够。2012年，世界心脏协会的一份报告发现，所有中国吸烟者只有一半知道吸烟导致心脏病。并且，公众对二手烟风险的了解存在“显著差距”。<sup>②</sup>关于中式卷烟的神话广泛传播。一个常说到的神话是中式卷烟与外国品牌显著不同，虽然完全缺乏支持这一观点的

---

① Bob Herbert, “Tobacco Dollars,” *New York Times*, Nov. 28, 1993, <http://legacy.library.ucsf.edu/tid/ojv68a00>.

② World Heart Federation, “Global Ignorance of Tobacco’s Harm to Cardiovascular Health Costing Lives,” April 20, 2012, <http://www.world-heart-federation.org/press/releases/detail/article/global-ignorance-of-tobacco-harm-to-cardiovascular-health-costing-lives>.

证据。中式卷烟向吸烟者肺部传送相似的一系列有害物质，包括：砷、尼古丁、氰化物、甲醛、一氧化碳和放射性同位素。中式卷烟以同样的方式抽吸，同样有成瘾性，导致的癌症和死亡相差无几。中式卷烟每吸一百万支，就导致约一例死亡，全球每个地方的卷烟基本都是如此。这就是说，中国今年吸的 2.6 万亿支卷烟会导致几十年后超过 200 万人死亡。

当然，有一些差别。卷烟的价格弹性在中国更低（-0.15 而不是 -0.4）。在税率提高时，中国吸烟者能够并且的确常常改换更便宜的品牌。中国卷烟的价格差异也比世界上其他地方大，一盒豪华品牌卷烟的价格可以高达 35 美元，而一盒便宜的卷烟可能只有 35 美分。2011 年 3 月 28 日，在形成这本书的会议开过后的第二天，我在北京一家免税店买了一条寒露（Cold Dew）牌卷烟，只花了 26 元人民币，算下来一盒还不到 40 美分。中国卷烟价格越来越亲民，比如，从 1996 年到 2006 年这十年间，中国卷烟的可负担性增加了 72%，这与大多数亚洲国家卷烟可负担性下降的趋势相反。<sup>①</sup>

## 忽视与无知的完美风暴？

我们必须在更广阔的趋势下理解卷烟使用。中国形成了针对

---

① Teh-wei Hu et al., “Tobacco Taxation and Its Potential Impact in China,” summarized in “Tobacco Taxes in China,” <http://www.worldlungfoundation.org/ht/a/GetDocumentAction/i/6558>.

卷烟的各种礼仪和浪漫，卷烟用于肯定各种人际联系，经常在电影中出现。比如，在电影《巨额交易》中，女主角张开外套，为恋人挡风，让他点上卷烟。发现卷烟危害的时间点也很重要。大家知道，发现吸烟最重要的危害是在1939年到1954年的德国、阿根廷、英国和美国，这段时间中国很难关注这些国家的医学文献。日本占领到1945年才结束，之后多年中国同样动荡不安，卷烟危害不可能引起任何人较多的关切。在1950年，中国人只吸了800亿支卷烟，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还没有多少人遭受吸烟导致的疾病，尤其是人们还有其他更为紧迫的关切（比如饥饿）。再说一遍，现在中国每年吸掉2.6万亿支卷烟，差不多是1949年抽吸支数的约三十倍。

大家也记得1950年代初的政治氛围，英国和美国发表了重要的流行病学和动物实验结果。我们真的期待中国在克服几十年外国占领和贫困的时候，还能比较多关注这些吗？在那些年里，上海人或北京人怎会阅读英语期刊，比如《美国医学会杂志》《癌症研究》和《英国医学杂志》？大家记得，在1959年到1960年，大跃进期间的饥荒导致几千万人死亡（有的来源说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500万），<sup>①</sup> 卷烟导致的疾病看起来多么不值一提。在这些痛苦折磨最严重的时候，我们能期待中国人重视英国皇家医师学会

---

① Frank Dikötter, "Mao's Great Leap to Famine," *New York Times*, Dec. 15, 2010, [http://www.nytimes.com/2010/12/16/opinion/16iht-eddikotter16.html?\\_r=i&](http://www.nytimes.com/2010/12/16/opinion/16iht-eddikotter16.html?_r=i&).

1962 年的报告或者美国卫生署长 1964 年的报告吗？<sup>①</sup>

在 1960 年代和 70 年代，“文化大革命”关闭了许多大学和  
学校，几百万城市人被迫移居乡下，卷烟也不可能获得多少关切。  
我们不应忘记，中国那时的人均卷烟消费只是当时欧洲或美国的  
约十分之一。<sup>②</sup>

281 这些和其他因素导致了一场“忽视与无知的完美风暴”，使  
我们更容易理解中国花了多长时间认真重视卷烟疫情。不过，故  
事还有更多方面，卷烟作为政府收入来源，一直有吸引力。从  
明朝烟草（从美洲）引入中国的最初几年，就把烟草视作“摇钱  
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后，这一点没有多大变化；的确，随  
着不受阻碍的商业活动萎缩，中国政府迅速介入，掌管了卷烟制  
造。当前专卖体制的优势主要是金色叶子带来的巨额税收的后果  
（2013 年一年就高达 1000 多亿美元，另外还有 200 多亿美元利  
润），直到卷烟导致的疾病成本和丧失的劳动力开始可见地消耗中  
国经济，我们可能才会看到中国领导人认真地对待卷烟问题。

另外也重要的一条是看清围绕卷烟的神话。本书内多篇文章  
提到中式卷烟的神话，但是还有围绕过滤嘴真能过滤（真的不能）  
和“低焦油”或“淡味”卷烟更安全（不安全）的神话。卷烟过

---

①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London, *Smoking and Health* (London: Pitman, 1962);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Report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f the Surgeon General*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4).

② 1960 年，6.8 亿中国人吸了大约 2000 亿支卷烟，差不多每人约 290 支。同一年，  
1.8 亿美国人吸了大约 4800 亿支卷烟，差不多每人 2700 支。因此，人均消费来  
看，美国大约是中国九倍。

滤嘴其实不是过滤嘴，因为不存在“干净的烟雾”。吸烟者渴求的正是脏的那一部分。装了过滤嘴的卷烟安慰公众，而且生产成本可能比普通卷烟更低，但是肯定不会更安全。有确凿证据表明，过滤嘴卷烟更危险，因为过滤嘴迫使吸烟者更深地吸入肺部，使一些烟雾颗粒进入到肺部更深处，那里的疾病更难诊断和治疗。<sup>①</sup>过滤嘴最近导致一种名为支气管肺泡癌的肺癌得病率上升，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这类肿瘤又叫“过滤嘴癌症”。过滤嘴也欺骗性地安慰吸烟者，使至少一些吸烟者不戒烟。美国烟草业的秘密文件对此毫不掩饰：推销过滤嘴和“低焦油”卷烟是让吸烟者持续吸烟的“心理拐杖”。<sup>②</sup>最早在1953年，世界上最大的卷烟公司就称过滤嘴是“商品包装和销售促销的办法”。<sup>③</sup>卷烟过滤嘴就像用湿面条做的安全带一样有用。

不过，过滤嘴只是让吸烟者认为卷烟安全或者至少相对更安全的多种方式之一。“低焦油”是1990年代以来的又一个大卖点，中国卷烟在销售时，显著标明不同品牌据信传送的“焦油”水平（见第八章的阐述）。这些数字是没有意义的，不应作为相对安全性的指标。如果在中国这不是广为人知的事实，并不令人奇怪，

---

①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The Health Consequences of Smoking – 50 Years of Progress: A Report of the Surgeon General*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4).

② George Weissman to Joseph F. Cullman, III, “Surgeon General’s Report,” Jan. 29, 1964, <http://legacy.library.ucsf.edu/tid/byg56b00>.

③ Hiram Hanmer’s assessment is memorialized in a memo from November 17, 1953, <http://legacy.library.ucsf.edu/tid/wti54foo>, p.4.

因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也是 2000 年以后才广泛认识到这一点。中国学术界的杰出人士被这个诡计欺骗了，比如 2011 年，全世界  
282 看到谢剑平当选享有盛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入选原因提及谢剑平开发“低焦油”卷烟的成就（他是中国国家烟草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的副院长），这个时候，全球科学界都已经知道低焦油说法是骗人的。要是按照这个道理，地平说学会会长、不承认达尔文进化论的人、用龙骨占卜未来的知名占卜师，也都可以得奖了。

中国卷烟制造商常常说，含有人参或银杏或绞股蓝等“草药”成分的卷烟比西方卷烟更安全。不过，科学研究已经表明，中草药卷烟吸烟者吸入的有毒物质与普通卷烟吸烟者吸入的一样多。<sup>①</sup>中国长久以来形成的健康理念也让中国人难以认识到卷烟实际上有多大危险。中医很早开始使用烟（或火）治疗，比如，艾灸有几千年的历史。烟雾一直用于熏肉，（近期）在世界许多国家用烟雾给医疗用品消毒，这当然也解释了全世界用了这么久才理解吸入卷烟烟雾是致命的：烟草一直列入许多国家的官方药典，烟雾常用于治疗从哮喘到瘟疫的许多疾病。

使吸烟的疫情加剧的还有广告不停地为它宣传。在中国 2005 年批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前，就已经从技术上禁止了烟草广告，但是，烟草广告仍在继续，只是采取了更微妙或更秘密的形式。赞助体育和文化活动成为广告的隐蔽形式，通

---

① Quan Gan et al., “Chinese ‘Herbal’ Cigarettes Are as Carcinogenic and Addictive as Regular Cigarettes,” *Cancer Epidemiology, Biomarkers & Prevention*, 18 (2009): 3497-3501.



过对赞助活动的命名（或播出），一个卷烟品牌（或卷烟厂）的名称仍能获得传播。在商店里显眼地陈列展示烟盒是另一种形式的广告，因为烟盒本身是彩色的微小广告。包装广告对区分品牌十分重要，可能比里面的卷烟更重要。在盲眼测试中，吸烟者一般没法区分不同品牌。这个意义上，卷烟更多是形象、印象和关联想象；偏爱不同的卷烟只是表面的：包装实质上是对里面起作用的尼古丁的装饰。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卷烟公司如此坚决地反对素面包装，现在（终于）有澳大利亚、英格兰、法国和其他几个国家这样做了。吸烟者购买一盒新的烟，上面印有烂脚丫、烂 283 牙齿和肺部肿瘤的图像，吸烟者报告说新的卷烟“口味变差了”，而实际上改变的只是包装。大型烟草公司将继续反对素面包装，在这场斗争中，它们可能继续遭遇失败。

中国卷烟的未来仍旧暧昧不明。按照一些指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卷烟超级大国。全世界卷烟的近一半产自中国（每年约2.6万亿支），这一产量可能继续增加一段时间后会下降。如此巨大的数额是复杂的自动化机械设备生产的，许多机械设备在国外设计生产，不过越来越多机械设备开始来自国内的原创。中国最先进的工厂现在采用的卷烟制造机械设备能以极低的成本，**每分钟生产 20,000 多支卷烟**。云南玉溪卷烟厂等工厂现在每年能生产900亿支卷烟，因为每抽吸100万支卷烟就会夺去一条生命，这意味着这一家工厂每年就能导致约90,000中国人死亡。与此类似，昆明卷烟厂每年生产710亿支卷烟，每年会夺走约710,000中国人的生命。中国有几十家这样的工厂，属于人类文明史上最致

命的工厂之列。<sup>①</sup>

存在一线希望是中国卷烟行业是国有的，中国国家烟草公司是国有垄断。政府对烟草业的控制也可以说是一项优势，因为国家可以采取其他情况下无法实现的措施。比如，1990年代，中国禁止了（高污染的）两冲程发动机的销售和进口，这是其他国家难以实现的一个大胆步骤。出于这个原因，我也希望中国实际上成为最早禁止卷烟销售的国家之一。<sup>②</sup>如果中国禁止销售卷烟，会带来史无前例的巨大影响，将挽救几千万甚至上亿人的生命。中国将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界的英雄。

## 未来的研究机会

这本书的目标是刺激探究，这是一个起点，不是终点。实际

---

① 关于这些和其他 480 家全球卷烟厂的地图和生产数据，参见 Matthew Kohrman 维护的 *Cigarette Citadels*（卷烟要塞），网址：<http://www.stanford.edu/group/tobaccopriv/cgi-bin/wordpress/>，以及 <http://www.stanford.edu/group/tobaccopriv/cgi-bin/map/>；以及 Robert N. Proctor, “The 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Cigarette-Lung Cancer Link: Evidentiary Traditions, Corporate Denial, Global Toll,” *Tobacco Control*, 21 (2012): 97-91.

② 本文中“卷烟”指的是用纸卷起来的可燃烧的烟草制品，传输尼古丁，烟雾 pH 值低于 8。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子烟不是卷烟，雪茄烟也不是。“小雪茄”实际上常常就是卷烟，因为小雪茄也是吸入的方式，卷烟纸使用再造烟叶制作。不同的烟草制品的健康后果差异很大，对其伦理或政治评价差异也很大。在中国，与烟草使用相关的负面报道中约 98% 是与常规的卷烟相关。

上有许多领域需要开展研究。

我们需要更多了解普通中国人怎样认识卷烟，比如，吸烟者是否知道卷烟含有放射性钋，或者吸烟导致脚部坏疽和男性勃起障碍。我们需要知道多少中国人意识到邻居的烟雾会导致致命的肺癌，或者几百万中国人因为吸入别人的烟草烟雾死亡。我们需要知道向吸烟者和潜在吸烟者传递什么信息，使他们更可能戒烟，或者降低开始吸烟的可能性：是关于肺部疾病的统计数字，还是脸部皱纹、阳痿、心肌梗塞、脑卒中的图片？ 284

我们也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卷烟设计的历史，比如，向卷烟添加了什么化学物质（包括从杀虫剂到化肥），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在世界其他国家，向卷烟添加了几百种化合物，中国可能也是这样做的。在其他国家，卷烟添加剂包括薄荷等咳嗽抑制剂，也包括可可碱等支气管扩张药（源自巧克力），用于提高尼古丁分子效力的化合物（比如氨），以及使尼古丁更容易与脑部结合的化学品（比如乙酰丙酸）。卷烟添加剂也包括海狸香，这是西伯利亚海狸肛门腺的分泌物，以及香猫类似提取物。中国卷烟制造商把这些化合物也添加到卷烟中了吗？

钾、柠檬酸钠或聚醋酸乙烯酯等助燃剂呢？中国制造的卷烟中多久发现一次有这些物质？在世界其他国家，向卷烟添加了許多不同的糖类物质，当然是为了刺激某些身体感受，也是为了降低烟雾的 pH 值，使形成的烟雾吸入时更容易耐受。中国卷烟是否也添加了类似化合物，例如甘油等糖醇，或巧克力、甘草等调味剂呢？美国卷烟制造商每年向卷烟加入几百万磅这些化学物质；中国卷烟添加了什么化合物，又是为了什么目的？什么化学物质

不小心进入卷烟，比如喷洒到烟叶上的杀虫剂，工厂的污染物，或者用于促进生长的肥料？

我们也需要更多了解烟草业资金渗透进入中国学术机构的程度。中国卷烟制造商是否使用第三方策略掩盖烟草危害，给科学家资金让他们为自己站台？中国的大学里多少位教授从卷烟制造商获得资金？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学有很长的与烟草业合作的历史，285 至少 25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接受过烟草业资金。中国的大学也有类似的屈尊纡贵吗？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讨论学者被这些资金腐蚀的情况？

另一个问题：中国军队对鼓励或劝阻吸烟做了哪些工作？向士兵免费发放卷烟吗？免费发放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的？一些工厂以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营的，这让军队戒烟变难了吗？我们需要解放军和军队其他军种或部门的卷烟史和卷烟使用史，了解对卷烟的做法、定价和政策是如何演变的历史。

我们也需要更总体地了解一下，比如与脊髓灰质炎或天花相比，烟草使用如何成为一个可接受的健康灾难。想一想你就会觉得奇怪，从毛泽东时代起，中国卫生部门大力采取了积极预防措施，消灭了脊髓灰质炎、天花、疟疾，彪炳史册；即便今天，在涉及“非典”或猪流感等传染性疫情时，仍会实施严格的边境控制。

但是请想一想对烟草是怎样额外开恩的。烟草致死人数远远超过脊髓灰质炎或天花（仅中国每年就超过 100 万人），为什么却采取这么柔和的方式？是因为没有强有力的政府机制从脊髓灰质炎病毒或导致疟疾的蚊子赚钱？是因为“非典”或猪流感病毒不能为中国国家带来数十亿美元收入？烟草流行病有显著不同的传

播机制；主要的疾病宿主不是没有头脑的病毒或一些细菌，而是一个强大的国营企业，为中国政府形成以数十亿美元计的税收和利润。烟草是摇钱树，如果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也奉行“烟草例外主义”，这种现金流（“第二成瘾性”）肯定听起来是一个可信的解释。

## 对社会政治研究提出的挑战

更多了解在中国法律体系内如何挑战卷烟会有益处。能像在美国那样，对烟草业发起法律诉讼吗？中国法律学说是否有空间去惩罚声称淡味、低焦油或过滤嘴卷烟更安全的公司？多个国家成功地状告烟草业；有没有可能代表承担了为吸烟导致疾病付费 286 的中国保险公司发起法律诉讼的空间？代表被迫吸二手烟的员工，或者代表因吸烟习惯遭受疾病的吸烟者发起诉讼呢？

美国诉讼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是披露了秘密的商业记录；我们对卷烟如何制造以及如何营销的很多知识，来自诉讼判决要求披露的文件。有没有让中国卷烟公司的文件对公众开放的办法？比如，这些公司什么时候第一次认识到淡味或低焦油或中草药卷烟并不更安全，采取了什么措施使卷烟更具成瘾性或减少成瘾性？如果无法获得档案文件，我们能从卷烟内部人士那里了解什么？能否设立一个网站，比如烟草维基解密，揭秘者可以分享他们知道的情况而不用担心被反控？

我们也需要更多了解中国对怪罪和责任的传统观念，共产

主义或儒家或道家或佛教伦理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对卷烟导致的痛苦该怪罪谁，该怎样做。吸烟者得了病，只能怪自己吗？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应该怪罪制造商或政府精英？如果卷烟这么严重地伤害人们，为什么我们仍旧容忍它呢？卷烟制造的哪些环节可以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或儒家伦理，或社会责任和企业责任的现代理念和谐一致？烟草不只是一个医学问题，也是一个道德和政治问题，我们需要更多了解如何利用不同的哲学体系，直面应对这一历史。今天中国政府领导人如何看待这一流行病的持续（和出口）？中国有没有可能认为全球流通的卷烟是违反人权，或者针对全人类的犯罪？

在美国，现在把烟草使用视为一种儿科疾病，因为大多数吸烟者从十几岁的年龄开始吸烟，然后迅速成瘾。在中国把卷烟使用视作儿科疾病，有多大可能？中国儿童如何获得卷烟？中国政府 2014 年禁止在学校里做卷烟广告、卖烟和吸烟，但是，我们对卷烟制造商仍旧瞄准青少年有什么证据？瞄准这一市场，以及总体上的品牌市场细分，有怎样的历史？在中国是否也与在美国一样，没有谁开始吸烟是为了看起来更年轻？

287 我们也需要更多了解中国对成瘾认识的历史。药理学家现在认识到，尼古丁分子与海洛因和可卡因一样高度成瘾，我们说，1964 年美国卫生署长报告表明吸烟导致疾病，而 1988 年卫生署长报告表明吸烟本身就是一种疾病。但是，中国对这一点的接受程度如何？具体来说，中国医学和哲学传统对成瘾是如何理解的？中国对帝国主义鸦片战争带来的痛苦有强大的文化记忆，把尼古丁成瘾与中国经受的鸦片成瘾放在一起比较有多公允？为什么中

国对卷烟的成瘾性极少关注，是因为不认为尼古丁阻碍体力或智力劳动？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思想对成瘾怎样认识，更古老的儒家、道家或佛教传统怎样理解成瘾？可以如何调整传统的成瘾（或依赖、奴役、解放）理念，以促进人们健康和福祉的方式用于现代的情形？

我们需要更多了解中国电影是否开始包括产品植入广告，美国好莱坞电影包含某个卷烟品牌的广告有很久的历史，但是中国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安排？中国电影电视现在浪漫地呈现卷烟，我们需要知道涉及什么回报机制。

我们需要更多了解中国人在何时何地允许吸烟，为什么在中国医院里没有更早禁止吸烟。为什么即便今天仍有一半医生还在吸烟！我们需要了解抗拒卷烟的历史，反对卷烟使用的论点经历了怎样的演变。我们需要探讨烟草和卷烟外围器具的“物质文化”，比如，中国烟灰缸、火柴和打火机的历史，以及中国零售展示的历史。我们需要中国吸烟姿势和形象的历史，吸烟礼仪的历史，中国烟草业行会的历史。具体品牌和工厂的历史。同样，我们需要内部人士走出来，讲述他们的故事。

我们也需要创新性研究，普通吸烟者如何理解他们从吸烟获得的疾病？中国人在得了癌症以后，怪谁？怪自己，怪卷烟，还是谁也不怪？为什么他们不怪罪卷烟制造商，或者从这些产品获利丰厚的政府？<sup>①</sup> 什么样的教育或媒体宣传会使他们更可能怪罪自

288

---

① Matthew Kohrman, "Depoliticizing Tobacco's Exceptionality: Male Sociality, Death, and Memory-Making among Chinese Cigarette Smokers," *China Journal*, 58 (2007): 85-109.

己之外的其他方面？

我们也需要研究单个卷烟厂的历史，对他们为销售卷烟（在内部或对外）发布的宣传进行研究。拒不承认与吸烟相关危害的事实的努力持续了多久？中国卷烟生产商什么时候从哪里学会了制造令人们无知的技巧？从外国生产商那里吗？美国文件中是否有这些联系的证据？

我们需要更多了解在何种程度上消解、缓和和转移话题的话术用于此处。在西方烟草公司拒不承认吸烟有害的过程中，所有这些话术都很常见（“每种东西都可以认为是有害的……如果苹果酱吃多了也有害”）。<sup>①</sup>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卷烟业采用的制造无知的技巧是否与其他行业有所不同，比如，为了压制以下事件信息采取的技巧：1976年唐山大地震（几十万人丧生），或中国空气和水污染程度高的信息。应审视媒体报道的不对称：为什么婴儿配方奶粉使几千人中毒（2008年使用了三聚氰胺）会成为这么大一场丑闻，而对卷烟毒害几百万人却这么容易忍受？对烟草这么冷漠处理，烟草享受例外主义，这种持续状态的源头在哪里？

最后一点，我们需要在反腐的大背景下，更好地了解中国卷

---

① 拿苹果酱打比方的是 Helmut Wakeham，他是 Philip Morris 公司主管研究的高权在握的副总裁，在 1976 年 Thames Television 制作的纪录片《Death and the West》的访谈中说了这番话；参见我的著作 *Golden Holocaust: Origins of the Cigarette Catastrophe and the Case for Aboli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p. 301-304. 关于更笼统的制造无知，参见 Robert N. Proctor and Londa Schiebinger, eds., *Agnology: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Ignoran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烟制造的历史。习近平主席发起了严厉打击腐败的运动，这场反腐运动大小都不放过，既打老虎，也打苍蝇。这有机会形成另一个机会，不把卷烟只是看作一种消费品，而是把烟草灾害与腐败和污染的更广泛历史背景相联系。卷烟危害身体，就像我们一般认为腐败危害人民和国家一样。反腐运动可能开始暴露卷烟巨型机构中的裂缝，从更多广泛报道和更大声疾呼的清洁中国城市空气运动中获得力量。如果不向专门对成瘾的吸烟者的肺部直接输送致命毒物的、数十亿美元计的行业开刀，对污染的担忧也就削弱了。类似的关切（以及类似的批判性历史研究）对许多国家打 289  
开眼界和清理肺部污染十分关键，我们希望类似的努力在中国也有类似的影响。同样，所需要的是努力追根溯源，找到“原因的原因”。所以，我们不只要发现是什么导致癌症或肺部或心脏疾病或对吸入生物碱的盲目成瘾，也要去发现针对世界上头号可预防死因我们还能做什么才能打破这样的自满态度。

不论看起来多么凶猛，各国卷烟行业内的人士和机构都是纸老虎。即便如此，最好还是用一条长棍子把纸老虎弄醒。批判性的历史研究能帮助我们塑造这样一条长棍子，长了适当尖刺的长棍子。

## 本书撰稿人

**Carol Benedict**，是美国乔治敦大学 Edmund Walsh 外事学院和历史系的历史学教授。她的研究聚焦中国医药和疾病的社会史、性别和中国消费文化史。她最近的著作是《金丝烟：中国烟草史（1550—2010 年）》。

**甘泉**，是国际防痨和肺部疾病联合会烟草控制主任。他的研究针对与中国烟草控制相关的各个话题。他研究了二手烟带来的疾病负担，烟草业对中国大学的赞助，淡味、柔和和中草药卷烟的欺骗性。

**Stanton Glantz**，是世界上最顶尖的烟草控制倡导者和研究者之一。他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医学教授，他领导该校的烟草控制研究与教育中心，对从二手烟的健康影响到不同控烟政策的有效性等各种话题开展研究。他是四本书和 350 多篇科学论文的作者，包括确定非自愿吸烟是心脏病的一个病因的第一次重要

文献回顾，以及关于 Brown and Williamson 文件的 1995 年 7 月 19 日的《美国医学会杂志》期刊。

**胡德伟**，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荣誉教授，该校公共卫生学院国际烟草控制中心主任。胡教授的专长领域是把计量经济学应用于卫生保健服务研究、精神健康经济学和烟草控制经济学。他是 200 多份出版物的作者，特别关注烟草税政策。他曾担任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政府的顾问，以及中国卫生部高级政策顾问。

**皇甫秋实**，是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副教授。她的学术工作聚焦本地和国际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她是《危机中的选择：战前十年的中国卷烟市场》一书的作者。

**Matthew Kohrman**，是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斯坦福大学医学院高级研究员。他的研究把人类学方法应用于健康、文化和政治交叉的方式，比如他的著作《有差异的身体：现代中国形成过程中的残疾经历和机构维护倡导》。他对中国背景下烟草的生命政治学著述甚多，共同成立了云南超轶健康咨询中心，设立了卷烟堡垒地图标示项目。

**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他年轻时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度过，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李博士的研究关注中国政治领导人的转变、代际变化

和技术发展。他撰写和编辑了多部著作，包括：《“中产”中国：超越经济转型的新兴中国中产阶级》《中国烟草业的政治关系图和反吸烟运动》《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重新评价集体领导》。

**李金奎**，从河北医科大学获得流行病学和卫生统计学硕士学位。他之前在河北省唐山市疾控中心工作，现在是位于北京的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的临床副主任，他的工作重点是疾病预防和治疗，尤其关注与烟草相关的问题。

**刘文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她的主要研究兴趣是二十世纪中国日常生活的历史，尤其关注政治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除了反吸烟运动，她还研究了上海十九世纪的“妨害”管理和19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她是《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的作者。

**庞应发**，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2001年更名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了35年，他领导卫生标准处十年时间。之后，他加入位于北京的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针对烟草相关问题开展工作。

**Robert N. Proctor**，斯坦福大学科学系教授，按惯例也是肺部医学教授。他研究知识和无知的政治史，研究课题从纳粹医学、人类起源，到宝石的政治史。他的著作包括《金色大屠杀：卷烟灾害的起源和废除的理由》。

**沙青青**，是上海市图书馆研究员，学术背景是历史和哲学。他的文章发表在《现代中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和《中国当代史研究》杂志。他是《毛泽东思想在基层：中国社会主义高潮时期的日常生活》的撰稿人之一。

**孙鹏 (Ronald Sun)**，复旦大学历史和经济史学本科毕业后，在清华大学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研究与烟草控制、献血和肥胖等问题相关的公共卫生、治理和市场。现居北京。

**吴宜群**，是位于北京的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的常务副主任。她是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教授，担任副院长。二十年来，她是中国更严格烟草控制政策的主要倡导者之一。2010年，她荣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特别表彰奖。

**杨功焕**，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教授、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基础医学研究院教授。她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流行病学家，曾担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一生许多时间专注于烟草预防工作，研究论文在许多最著名的英语和中文医学杂志发表。杨教授多次获奖，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卫生部、教育部的奖项。

# 索引

以下页码为原书页码，即中文版页边码

-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tobacco  
  industry, 26–27, 234, 239–46, 281,  
  284–85
- air-cured tobacco, 159, 163
- air pollution, 14, 149, 288
- Aivaz, Boris, 208
- allocation stations, 163, 175nn7–9
-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14
- An Pingsheng, 187, 188, 189
- Analects Fortnightly, The (Lunyu banyuekan)*, 100
- Analects group, 100
- Anhui Institute of Tobacco Research,  
  237
- Anhui Province, 181, 182, 185
- Anhui Tobacco School, 236
- Anti-Japanese War (1937–45), 17, 25,  
  37, 38, 39, 43–44, 50, 141
- ARTIST. *See* Asian Regional Tobacco  
  Industry Science Team
- Aschoff, Karl, 153n25
- Asian Regional Tobacco Industry Sci-  
  ence Team (ARTIST), 233–34, 247
- Australia: plain packaging in, 282
- Bai Enpei, 188
- Baojiafang, 141
- Beijing, 175n1, 201n5, 234; Nanchang  
  Road, 142
- Beijing Cigarette Factory, 142, 266
- Berlant, Lauren, 150
- Big China (*Da Zhongguo*) brand, 8
- Big Deal, A*, 279–80
- biogovernance/biopolitics, 158, 162
- Bloomberg Philanthropies, 167
- Bonsack, James, 4
- branding of cigarettes, 3, 7, 9–10, 41,  
  147–48, 162, 211, 282; megabrands,  
  135; relationship to masculinity,  
  98–99; relationship to normaliza-  
  tion, 8, 9; STMA/CNTC policies  
  regarding, 11–13, 149; variants within  
  brand families, 30n28; in Yunnan  
  Province, 185, 187
- Brandt, Allan: on the cigarette century,  
  4
- Brazil: cultivation of tobacco in, 3
-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BAT), 51,  
  54n12, 78, 80, 145, 146, 233, 235; mar-  
  keting in China, 8, 9, 112; Shanghai  
  factory, 138, 140; vs. STMA, 2, 22
- Butler, Judith: on petty sovereigns, 150

- Caijing*, 193
- caizilwenren* (Confucian scholar) ideal, 98, 100, 112, 114, 123, 126, 127
- cancer, 83, 148, 153n25, 214, 287–88; breast cancer, 19; filter cancers, 281; lung cancer, 15, 19, 24, 207, 278, 281, 284
- CCP. *Se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centralized planning, 58–59, 62–63, 64
- Chai Jing's *Under the Dome*, 149
- Chan, Margaret, 271
- Changde Cigarette Factory, 240
- Changsha Cigarette Factory, 20, 147
- Chen Tonghai, 193, 194
- Chen Xilian, 189
- Chen Yi, 142
- Chen Yun, 58–59, 65–66, 74
- Chen Yung-fa, 53n4
- Cheng Yongzhao, 255, 266–67
- Chennupati, Divakara Babu: on cartels, 31n41
- Chesterfield brand, 102
- Chiang Kai-shek, 37
- Chien-men brand, 129n41
- China: Eighth Five-Year Plan, 211; FCTC ratified by, 147, 168, 174, 219, 246–47, 254, 255, 256, 271, 282; First Five-Year Plan, 78, 85; Food Industry Administrative Bureau, 84; General Bureau of Taxation, 61–62; Interagency FCTC Implementation Coordination Mechanism, 258;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75–77; Ministry of Commerce, 77–78, 80, 81, 82; Ministry of Education, 240; Ministry of Finance, 66, 159, 168, 170, 175n6; Ministry of Food Industry, 57, 59, 60; Ministry of Health, 16, 52, 168, 224, 258–59;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OIIT), 259; Ministry of Light Industry, 66, 77–79, 80–81, 82–83, 84, 85, 86–87;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NDRC), 168, 180, 183, 185;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164–65, 168; National Taxation Bureau, 161;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168; Provisional Regulations on Goods Tax, 158–59; Second Five-Year Plan, 85; Seventh Five-Year Plan, 211; Sixth Five-Year Plan, 211;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axation, 168, 170, 175n6, 176n9; State Council, 127, 138, 158, 159, 161, 162, 164, 168, 226, 258; Stat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SFDA), 226–27; vs. United States, 19, 148, 160, 200, 209, 215, 216, 245, 246, 248, 259, 284, 285, 286, 287, 289n6. *See also*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unicipal governments; provincial governments
- China Charity Foundation, 144
- China Childre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144
- China General Merchandise Corporation, 66
- China National Tobacco Corporation/China Tobacco. *See* State Tobacco Monopoly Administration (STMA)/China National Tobacco Corporation (CNTC)
- China Tobacco Association, 237
- China Tobacco Industry Corporation, 66, 143
- China Tobacco Museum, 26, 133–50; directors, 134; and gender, 143, 144, 145; Lü Fuhua at, 148, 153n25; managed environment at, 138–39;

- modernization at, 145–46; public health at, 146–48; Smoking and Tobacco Control hall, 147–48; and STMA/CNTC, 136, 143–45; themes communicated at, 139–48; Tobacco Administration Hall, 144; Tobacco Agriculture Hall, 145–46; Tobacco Culture Hall, 143–44; and tobacco industry employees, 26, 133, 136–38, 141–46, 148–50, 150n2, 151n4
- China Youth Daily*, 190
-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CAAS), 239
-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CAE), 208, 223–24, 243, 245–46, 281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40
-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Central Committee, 52, 74, 127, 170; Central Finance and Economic Commission, 58, 59–60; Central Party School, 48, 49; at China Tobacco Museum, 140–43, 144, 148;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191; policies regarding cigarette advertising, 18–19, 127, 151n6, 286; policies regarding cigarette imports, 41–47, 48; policies regarding cigarette manufacturing, 5–6, 9–11, 14, 22, 25, 37, 38–39, 45–46, 48–52, 56, 59–61, 65–66, 67–68, 70, 85–86, 135, 197–98, 210–12, 213–14, 215–18, 281; policies regarding cigarette prices, 60, 167–68, 170–71, 172–73, 175nn6,7; policies regarding cigarette taxation, 41, 44–45, 46, 49, 61, 158–66, 169, 170–74, 175n9, 176n14, 281; policies regarding monopoly, 20, 45–46, 51, 57, 61, 62, 64, 66, 69, 144–45, 164, 234, 277, 278, 283–84; policies regarding nationalization, 25, 52, 56, 67–68, 70, 81, 114, 174n1; policies regarding public health, 18, 38, 43, 44; policies regarding self-reliance, 38–39, 47, 48; policies regarding smoke-free regulations, 18; policies regarding warning labels, 18, 151n6, 170, 263–65; Politburo/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188, 189, 191, 197; Tobacco Takeover Group, 56. *See also* China; Deng Xiaoping; Mao Zedong; municipal governments; provincial governments
-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ommon Program, 64
- Chongqing, 182, 183
- Chongzhen Emperor, 6, 158
- Chu Shijian, 195–99
- Chu Yinghong, 198
- Chunghwa brand, 9, 56, 79, 135, 210
- Chunghwa Tobacco Company, 66, 235
- cigarette butts, 81–82
- cigarette coupons, 11
- cigarette smuggling, 43, 46, 49, 51
- cigarette symbolism, 7–9, 11, 12–13
- cigars, 47, 96, 159, 175n7
- Clay, Henry, 5
- Cold Dew brand, 279
- consumption of cigarettes: as addictive, 1, 4, 7, 14, 18, 180, 260, 279, 286, 287; bourgeois-liberal culture of smoking, 99–101, 105, 123, 126; and *caizilwenren* (Confucian scholar) ideal, 98, 100, 112, 114, 123, 126, 127; death and disease from, 13–16, 17, 22, 24, 75, 83, 88, 135, 146–48, 150, 179, 180, 214–16, 222, 234, 245, 246, 260, 271, 277, 278–79, 280, 283–84, 287–89, 290n12; and *haohan* (martial hero) ideal, 98, 99, 105, 112, 114,



- 116, 123, 126–27; vs. manufacturing of cigarettes, 17–20; number of cigarettes smoked, 14, 174, 179–80, 278, 280, 289n6; number of smokers, 2, 6, 86, 95, 126–27, 135, 167, 171, 179–80; as politicized, 17–20; pre-1949 vs. post-1949, 95–97, 114, 116, 124, 126, 278, 280; relationship to gender, 6, 9–10, 11, 12, 25, 95–124, 125–29, 128n2, 129n41, 152n7; relationship to socioeconomic status, 12–13, 40–41, 44, 87–88, 101, 224, 225; secondhand smoke, 24, 152n7, 233, 234, 246, 269, 277, 279, 284, 286; smoker compensation, 219, 220, 222, 281; smoker self-blame regarding, 19, 23, 27, 278, 286, 287–88; smoking rates, 12, 14, 271; as toxic, 1, 6, 13, 17, 134, 137, 208, 215; visual representation, 25, 96–124, 127–28; during work/relationship to enhanced work performance, 105, 110, 116–18
- Conway, Erik M.: *Merchants of Doubt*, 246
- corruption, 186, 189; “Black Collar” elites, 199–200; as tobacco-related, 26, 179, 180–81, 190–94, 198–99, 288; underreporting of taxes collected, 160–61; in Yunnan Province, 26, 190–94
- Crow, Carl, 82
- cultivation of tobacco, 3–4, 60;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 tax, 163–64; farmers, 1–2, 3, 40, 136, 163, 164, 165, 171–72, 183; during Great Leap Forward, 73–79; overproduction of leaf tobacco, 164; policy recommendations regarding, 171–72; research into, 242, 244; tobacco acreage by provinces, 182, 201n5; tobacco leaf tax, 163–65, 169, 172, 183, 184, 185; Virginia tobacco, 40, 47, 48, 50, 80; in Yunnan Province, 3, 22, 26, 78, 146, 181, 182, 183, 185–87, 195
- Cultural Revolution, 7, 118, 120, 130n57, 141–42, 215, 217, 228n7, 280
- cut tobacco, 159, 175n7
- Daxihu brand, 41
- Democratic Reform campaign, 67
- Deng Pufang, 191
- Deng Xiaoping, 26, 161, 191; as cigarette smoker, 142–43, 278; Open Door policies, 17–18; program of “opening up”, 162
- Development Outline for China's Cigaret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261
- Di Jingxiang, 77–78, 86
- Dong Haolin, 144
- Donghai Cigarette Factory, 141
- Dongnan University, 240
- Double Happiness brand, 79
- Du Shicheng, 193–94
- Early Morning on the Huangpu River in Shanghai*, 118, 119
- East China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Commission, 65
- Eastern Tobacco Company, 54n12
- e-cigarettes, 290n12
- Eighth Route Army, 50
- Eng, Irene, 185
- ethics of self, 137, 148, 150, 152n14
- Etsong Company, 65
- Fan Guorong, 142
- Fang Yi, 67
- FCTC. *See*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 Fengche brand, 54n12
- Fengshou (Bumper Harvest) brand, 78
- filter-tipped cigarettes, 26, 143, 147, 207–18, 220, 228n7, 281, 285
- First National Cigarette Industry Conference, 25, 57–58, 59–63, 69; delegates to, 59; market demarcation at, 61, 62–65; taxation at, 61–62
- Five Anti campaign, 66–67
- flue-cured tobacco, 1, 3, 40, 79, 146, 159, 163, 164, 185
- Foucault, Michel: on ethics, 152n4; on technology of self, 136, 149–50, 151n4, 152n14
-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FCTC), 125, 180, 199, 220–21, 227, 234, 254–71; Article 4 of, 260; Article 5.3 of, 246–47, 248; Article 11 of, 153n23, 263; Article 13 of, 247, 265; China's ratification of, 147, 168, 174, 219, 246–47, 254, 255, 256, 271, 282; demand-side methodology in, 18; and *Global Tobacco Control Outlook*, 26–27, 254–55, 266–70; graphic warning labels in, 170; and 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ing Body, 255, 256; Preamble, 254, 270; and *Research on Counterproposals and Countermeasures*, 26–27, 254–55, 257–58, 259–60, 261–66, 267, 270; tax increases in, 168, 169, 170
- France: filter-tipped cigarettes in, 209; plain packaging in, 282
- Fudan University, 134
- Fujian Province, 182
- Fujian Tobacco Training Center, 237
- Fuxin Tobacco Company, 140
- Flying Horse brand, 51
- Gansu Province, 37, 39, 182
- Gao Gang, 43, 44
- Gao Yan, 186, 188
- Gates Foundation, 167; tobacco control by, 6
- GD, 7
- gender: and China Tobacco Museum, 143, 144, 145; masculinity and smoking, 25, 120, 127–28, 129n41; and rates of nonsmoking, 152n7; relationship to cigarette consumption, 6, 9–10, 11, 12, 25, 95–124, 125–29, 128n2, 129n41, 152n7; smoking as bourgeois decadence for females, 96, 125; smoking as proletarian pleasure for males, 96, 97, 114–24, 125–26
- General China Monopolies Corporation, 66
- Global Adult Tobacco Survey (2010), 95, 224
- Global Tobacco Control Outlook*, 26–27, 254–55, 266–70
- Gonghexinxi brand, 194
- Gongren ribao*, 116, 117, 118
- Good Chance brand, 107
- Great Leap Forward, 7, 73–88, 209; cultivation of tobacco during, 73–79; famine during, 84, 280; and normalization of cigarettes, 25, 73, 81–82, 88
- green tobacco sickness, 146
- Guangdong Province, 182
- Guangxi Province, 182; cultivation of tobacco in, 3
- Guizhou Province: cultivation of tobacco in, 76–77, 79, 146, 165, 181, 182; tobacco revenue and profits in, 181, 183
- Guizhou Tobacco Industrial Corporation, 20

- Guomindang/Nationalists, 37, 38, 39,  
41–42, 50, 58, 78, 85, 235
- Guo Ran, 63, 64
- Guo Zhiming: *Our Brigade Leader*,  
118, 119
- Hainan Province, 138, 175n1
- Hamilton, Alexander, 4–5
- haohan* (martial hero) ideal, 98, 99,  
105, 112, 114, 116, 123, 126–27
- Harbin City, 191
- Hauni Corporation, 7, 145, 209, 217
- He Long, 141–42, 142
- He Zhiqiang, 186, 187, 189, 190, 197
- heart disease, 24, 83, 279
- heavy metals in Chinese cigarettes,  
269–70
- Hebei Province, 182, 185
- Heilongjiang Province, 182, 191
- Heilongjiang Tobacco School, 236
-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37, 239
- Henan Institute of Tobacco Research,  
237
- Henan Province: cultivation of tobacco  
in, 73, 75, 76–77, 79, 146, 181, 182,  
183, 185; Mao's visit to, 73, 75, 76–  
77, 146; tobacco revenue and profits  
in, 181, 183
- herbal cigarettes, 147, 243, 245, 246,  
248, 282, 286
- Hird, Derek, 127
- historiography, critical, 288–89
- HIV/AIDS, 14, 19
- Hong Kong, 233, 265, 268
- Hongmei brand, 194–95
- Hongta Group, 20, 78–79, 181, 187,  
190, 194–99, 203n47
- Hongtashan brand, 187, 194, 199
- Hongyun Group, 78
- Hu Jintao, 142, 146, 197
- Hu Qili, 197
- Hu, Teh-wei, 181
- Huacheng Tobacco Company, 112
- Huafeng Factory, 48
- Huande Hong Kong Co., Ltd., 192
- Huang Ju, 197
- Huang Songyou, 193
- Huashan brand, 41
- Hubei Province, 182; Gonggan County,  
166
-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37,  
240, 248
- Hunan Province, 181, 182, 183
- Hwa Li brand, 108
- Imperial Tobacco, 2, 22
- imported cigarettes, 41–47, 48, 96, 175n7
-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vs. corporate  
liability, 8, 18, 278
- industry/government cartels, local, 20,  
31n41, 174n1; impact of tax poli-  
cies on, 26, 158, 160, 162–63, 164,  
165–66, 167, 183; local industry/  
government collusion, 26, 157, 158,  
159, 160,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71, 172, 179, 180–81, 190, 195–96,  
199–200, 239, 247; policies regard-  
ing overproduction, 157–58, 162;  
protectionism of, 157, 158, 160, 162,  
166, 174
- Inner Mongolia, 182
- Inner Mongolia Tobacco Training Cen-  
ter, 237
- International brand, 114, 115
-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269
- International Tobacco Anti-Counter-  
feiting Alliance, 145
- ISO/FTC method, 222, 245
- Italy, 7, 217

- Japanese filter-tipped cigarettes, 209  
 Japan Tobacco, 2, 145  
 Ji Bao, 141  
 Jiang Chengkang, 136, 241, 243, 258  
 Jiang Chunyun, 197  
 Jiang Ming, 144, 213  
 Jiang Zemin, 148, 191, 203n33  
 Jiangsu-Anhui Base, 50  
 Jiangsu Province, 182  
 Jiangxi Province, 182  
 Jiangxi Tobacco Training Center, 237  
 Jilin Province, 182  
 Jilin Tobacco Training Center, 237  
 Jin Renqing, 193  
 Jin Runyang, 140  
  
 Kent brand, 208  
 Kessler, Gladys, 220, 233, 273n22  
 Kohrman, Matthew, 112  
 Kunming Cigarette Factory, 283  
 Kunming International Horticultural Expo, 191  
  
 L & M brand, 194  
 Laughlin, Charles, 100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obacco Monopoly: Article 5, 227  
 Li Bo, 191–92  
 Li Jiating, 189, 190, 191–92, 193, 198, 203n33  
 Li Jiheng, 189  
 Li Lanqing, 189  
 Li Lisan, 140–41  
 Li Peng, 186, 187, 188  
 Li Ruihuan, 197  
 Li Suiming, 198  
 Li Wei, 190, 193–94  
 Li Zhaoxin, 193  
*Liangyou* (The Young Companion), 100–101, 105, 110  
  
 Liang Zhanhua, 4  
 Lianxin Cigarette Factory, 84  
 Liao Luyan, 77  
 Liaoning Province, 182  
*Liberation Daily*, 42–43  
 light cigarettes. *See* low-tar cigarettes  
 Lim, Louisa, 203n47  
 Lin Boqu, 43, 44  
 Lin Yutang, 100  
 Linghu An, 188, 198  
 Liu Huaqing, 197  
 Liu Minghui, 189  
 Liu Shaoqi, 142  
 Liu Wandong, 198  
 Liu Wenxi: *Heart-to-Heart Talk*, 120, 123; *New Spring in Yan'an*, 120, 122  
 Liu Zhide: *Old Party Secretary*, 116  
 Liu Zhihua, 193  
 locality: in cigarette marketing, 19–20; relationship to cigarette manufacturing, 9–12, 19–20, 135, 157; and STMA/CNTC, 12, 19–21, 157, 174  
*Long Live Chairman Mao, the Reddest Sun in Our Hearts*, 121  
 Long March, 37  
 loose-leaf tobacco, 86  
 Lorillard, 22  
 Louie, Kam, 98  
 low-tar cigarettes, 153n23, 218–27, 286; at China Tobacco Museum, 147–48; compensation by smokers, 219, 220, 222, 281; marketed as safer, 23, 24–25, 26, 207–8, 220–21, 273n22, 285; research into, 241, 242, 244, 245, 248, 261; sales of, 226–27; STMA policies regarding, 26, 218–21, 223, 224, 225, 227, 241, 243, 245–46, 248, 261; and Xie Jianping, 222–24, 281–82. *See also* filter-tipped cigarettes  
 Lü Fuhua, 148, 153n25

- Lu Xun, 143  
 lung cancer, 15, 19, 24, 207, 278, 281, 284  
 Luo Changping, 193  
 Luo Gan, 197
- Ma Jinming, 73  
 Macao, 268  
 manufacturing of cigarettes: additives, 284; cardinal principles in, 82–83; vs. consumption, 17–20; cost of raw materials, 49, 61, 65–66, 69; depoliticization of, 17–20, 22, 25, 26–27; during Great Leap Forward, 73–74, 75, 77–82; growth, 134, 211; nationalization, 25, 52, 56, 67–68, 70, 81, 114, 174n1; number of cigarettes produced, 2, 6–7, 13, 14–15, 134, 136, 211, 271, 283; overproduction, 15, 157–58; in pre-1949 China vs. post-1949 China, 5, 9–11, 25, 51–52, 57; production quotas, 20, 65, 84, 196; product quality, 3, 26, 46, 48–51, 79–81, 83, 85–87, 90n32, 146, 159, 162–63, 167, 173, 175n6, 176nn9,14, 187, 211–12, 213, 216, 242, 244; profits from, 2–3, 4, 6, 21–22, 52, 60, 61, 86, 134, 163, 183, 185, 195, 196, 197, 199, 216, 217, 263, 271; recon used in, 80–81; relationship to locality/region, 9–12, 19–20, 135, 157; research into, 242; in SGNBR, 37–38, 46, 48–51, 52, 57; as slow violence, 150; as wide-ranging process, 27–28
- Mao Zedong, 9, 10, 12–13, 17, 37, 47, 83, 85, 137–38; attitudes regarding cigarette industrialization, 5–6; attitudes regarding cigarette production, 52; attitudes regarding cigarette smoking, 56, 65, 69; attitudes regarding smoking and masculinity, 25, 120; attitudes regarding tobacco production, 73; as cigarette smoker, 5, 41, 44, 120–24, 126, 141–42, 210, 278; on communes, 74; Cultural Revolution, 7, 118, 120, 130n57, 141–42, 215, 217, 228n7, 280; death of, 11, 17–18, 151n6; “greater, faster, better” slogan, 74; Great Leap Forward, 7, 25, 73–88, 84, 209, 280; visit to Henan Province (1958), 73, 75, 146; visual representations of, 120–24, 126, 141–42
- market demarcation, 61, 62–65  
 marketing of cigarettes, 3, 8–10, 22, 148–49, 223, 227; advertising, 18–19, 98–99, 101–16, 125, 126, 127, 128, 135, 151n6, 220, 246, 265–66, 282, 286; high-end cigarettes, 3–4, 12, 162, 173, 175n6, 187, 208, 211, 263–64; locality in, 19–20; low-tar cigarettes marketed as safer, 23, 24–25, 26, 207–8, 219–21, 285; package designs, 9, 10, 11, 12, 20, 21, 23, 30n28, 170, 220–21, 263–65, 281, 282–83
- Marlboro brand, 30n28, 126, 208  
 May Fourth movement, 140  
 melamine, 288  
 Minfeng, 140  
 Ming dynasty, 76, 97, 139, 158, 280  
 Modern Girls, 96, 125  
 Mollins, 7  
 municipal governments, 174n1, 175, 181, 247  
 My Dear brand, 103, 104, 109, 112
- Nanjing Massacre: politicization of, 17  
 Nantong China-US Acetate Fiber Joint Venture, 212–13  
 Nanyang Brothers Tobacco Company, 8, 65, 146

- Nanyang Cigarette Factory, 79
- Nanyang Engine Factory, 79
-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Light Industry Trade Union, 80–81
- Nationalism (*Aiguo*) brand, 8
- Nationalists. *See* Guomindang/Nationalists
- National Tobacco Industry Inter-Factory Competition Committee, 84
- National Tobacco Industry Manufacturing Conference (Zhengzhou, 1959), 83
- National Tobacco Research Center (NTRC), 239
- New China (*Xin Zhongguo*) brand, 8
- New Fourth Army, 50, 51; Third Division, 141
- Ni Qixian, 229n14
- nicotine, 4, 7, 14, 18, 149, 220, 221, 278, 284, 287
- Ningxia Province, 37, 39, 182
- Nixon, Rob: on slow violence, 150
- No. 2 cigarillos, 142
- nonsmokers, 127, 135, 152n7
- normalization of cigarettes, 6–13, 14, 38, 69, 158, 262–63; defined, 6; and Great Leap Forward, 25, 73, 81–82, 88; relationship to branding, 8, 9; relationship to corruption, 26; relationship to taxation, 26; relationship to visual culture, 125, 126
- North Carolina Dept. of Agriculture, 1, 4
- Northeast China Liberated Zone, 51–52
- Northwestern Cigarette Factory, 48
- Northwestern Local Products Company, 49
- Oi, Jean: on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20, 32n41
- Old Party Secretary*, 116
- opium, 7, 53n4, 140, 287
- Oreskes, Naomi: *Merchants of Doubt*, 246
- Panda brand, 13, 135, 142
- Paotai brand, 54n12
- Passing on Military Skills*, 118, 120
- Patriotic Brand, 140
-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9, 118, 120, 285
- philanthropic whitewashing, 23
- Philip Morris, 30n28, 145, 194, 217, 290n14; advertising in China, 126; and ARTIST, 233–34, 247; vs. STMA, 2, 22; *United States v. Philip Morris*, 220, 233, 273n22
- pipe smoking, 8, 95–96, 114, 116, 118, 130n54
- plain packaging, 282–83
- policy recommendations, 171–74, 227
- politicization and depoliticization:
  - of cigarette-induced death, 16–25;
  - depoliticization of cigarette manufacturing, 17–20, 22, 25, 26–27;
  - depoliticization of disease and death, 22, 25;
  - politicization of cigarette consumption, 17–20;
  - relationship to differential problematization, 17–22;
  - tax revenues and depoliticization, 22
- Potluri, Rajasekhara Mouly: on cartels, 31n41
- prices of cigarettes: CCP policies regarding, 60, 167–68, 170–71, 172–73, 175nn6,7; differences in, 12–13, 30n28, 41, 171, 173, 279; high-end cigarettes, 3–4, 12, 85–86, 162, 173, 175n6, 187, 208, 211–12, 263–64, 279; in SGNBR, 42, 43, 44
- prices of tobacco, 3, 136

- Proctor, Robert: *Golden Holocaust*, 151n4
- Project HOPE, 266
- Protos-M5, 145
- provincial governments: relations with cigarette manufacturers, 26, 157, 160, 171, 174n1, 180–81, 183; revenue from tobacco taxes, 26, 159, 160–61, 164, 165–66, 171, 179, 181, 184, 185, 186, 247. *See also* industry/government cartels; Yunnan Province
- Pu Chaozhu, 186–87, 188, 189, 190, 192, 195, 197
- Pu Xiang, 192
- public right to cigarettes, 84, 86, 87–88, 263, 269
- Qianmen brand, 54n12
- Qin Guangrong, 188, 189
- Qingdao, 193–94
- Qingdao City's No. 1 Cigarette Factory, 84
- Qing dynasty, 74, 76, 97, 139, 144
- Qinghai Province, 182; Provincial Tobacco Corporation, 147
- Qingzhou Tobacco Research Institute, 234, 235, 237, 239
- Qu Fang: *Early Morning on the Huangpu River in Shanghai*, 118, 119
- Rat brand, 99, 105, 111
- Remin huabao*, 116
- Renmingongshehao (People's Communes are Good) brand, 78
- Renmin University, 240
- Republican period, 85, 97–114, 116, 126
- Research on Counterproposals and Countermeasures*, 26–27, 254–55, 257–58, 259–60, 261–66, 267, 270
- R. J. Reynolds, 22, 233, 279
- Robinson, Bob, 152n14
- robot smoking machines, 219, 220, 222, 230n24
- rolling tobacco, 40, 41, 42, 43, 44, 45
- Rosenblatt, Roger, 151n4
- Rothfeld, Edwin L., 229n13
-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report (1962), 280
- Ruby Queen brand, 110
- sales of cigarettes, 7, 8, 11, 19, 20, 58–60, 196; by cigarette grade, 86–87; decreases in, 2, 199, 208, 226; increases in, 134, 197, 226; regional restrictions on, 42, 43, 64, 199. *See also* marketing of cigarettes; prices of cigarettes
- secondhand smoke, 24, 152n7, 233, 234, 246, 269, 277, 279, 284, 286
-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17, 25, 37, 38, 39, 43–44, 50, 141
- Seffrin, John: on cigarettes, 14
- Selden, Mark, 51
- Shaan-Gan-Ning Border Region (SGNBR): Alcohol and Tobacco Monopoly, 45–46; cigarette manufacturing in, 37–38, 46, 48–51, 52, 57; cigarette prices in, 41, 42, 44; Department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 Import-Export of Goods and Materials, 42, 54n22; economic conditions, 39–40, 41, 44, 47, 53n4; Finance Bureau, 45, 48; Goods and Materials Bureau, 46–47; import of cigarettes in, 41–47, 48; vs. Northeast China Liberated Zone, 51–52; opium exports, 53n4; vs. other base areas, 49–51, 52n1; Public Security Bureau, 43; taxation of cigarettes in, 41, 44–45, 46, 49; Tax Bureau,

- 43, 46, 49; tobacco cultivation in, 47–48; Trade Bureau, 41, 42; Yan'an, 37–38, 39, 41, 42, 46, 52
- Shaanxi Province, 37, 39, 182
- shag, 40, 41, 42, 43, 44, 45
- Shandong Province, 83, 84, 182, 185
- Shandong Tobacco School, 236
- Shanghai, 101, 201n5; cigarette production in, 56–58, 59, 61–62, 63–68, 69, 70, 78, 79, 87, 140, 175n1, 183, 185; economic conditions, 56–57, 58; grade of cigarettes sold in, 87; vs. Northeast region, 62, 63–65. *See also* China Tobacco Museum
- Shanghai Cigarette Factory, 10, 138, 209–10, 235
- Shanghai Cigarette Industry Tobacco Leaf Joint Purchasing Bureau, 66
- Shanghai City Directory*, 114, 115
- Shanghai No. 3 Cigarette Factory, 79
- Shanghai State Tobacco Corporation, 66
- Shanghai Tobacco Company, 142, 144, 183, 196, 214
- Shanghai Tobacco Group, 20, 79, 80
- Shanxi-Hebei-Shandong-Henan Base, 50
- Shanxi Province, 79, 182
- Shenbao*: cigarette advertising in, 98–99, 101–13
- Sheng Xuanhuai, 144
- Shifang Cigarette factory, 142
- Sichuan Province, 165, 181, 182, 183
- Siling brand, 41
- Smedley, Agnes: *China Fights Back*, 37
- smoke-free regulations, 8, 18
- smoker compensation, 219, 220, 222, 281
- smoker self-blame, 19, 23, 27, 278, 286, 287–88
- smuggling, 43, 48–49, 190, 262, 268
- Snow, Edgar: *Red Star over China*, 37
- snuff, 8, 97
-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igarette smoking, 12–13, 40–41, 44, 87–88, 101, 224, 225
- Song Changhe, 141
- Song Qingling, 142
- Song Yuhe, 57, 63
- Spring Breeze on a Snowy Night, A*, 118
- Spring Festival TV Gala, 196
- State Tobacco Monopoly Administration (STMA)/China National Tobacco Corporation (CNTC): and China Tobacco Museum, 136, 143–45; corruption in, 190, 192; creation of, 6, 23, 138, 143, 174n1, 183; directors, 143–44, 195, 241; elementary schools sponsored by, 241, 247, 266; employee attitudes at, 137, 151n4, 227; FCTC Countermeasures Research Group/Implementation Work Group, 256–57, 270; FCTC Counterproposals Research Group, 255–56, 257, 258, 261, 265, 266; and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OIT), 259;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Commission, 258; policies regarding brands, 11–13, 149; policies regarding cigarette filters, 212, 213–14; policies regarding cigarette packaging, 264–65; policies regarding cigarette prices, 12–13; policies regarding consolidation, 12, 20, 135, 174n1; policies regarding low-tar cigarettes, 26, 218–21, 223, 224, 225, 227, 241, 243, 245–46, 248, 261; policies regarding overproduction of cigarettes, 157–58; R&D sponsored by, 234–39, 241–



- 46, 246, 282; relationship to locality, 12, 19–21, 157, 174; relations with academic institutions, 235, 236–48, 251n28; relations with ARTIST, 233–34; Resource and Translation Subgroup, 257; responses to health advocates, 17, 23–24, 26–27, 168–69, 170, 254–55, 257–58, 259–60, 261–70; size of, 2, 13, 19; subsidiaries of, 12, 17, 19–21, 23–24, 26, 29n16. *See also* cultivation of tobacco; manufacturing of cigarettes; marketing of cigarettes
- stroke, 24
- sugar cane, 186
- Switzerland: filter-tipped cigarettes in, 209
- Taiwan, 265, 268
- Taiyuan, 79, 81
- Tangshan earthquake (1976), 288
- Tao Zhu, 188
- taxation of cigarettes: CCP policies regarding, 41, 44–45, 46, 49, 61, 158–66, 169, 170–74, 175n9, 176n14, 281; in FCTC, 168, 169, 170; and filter-tipped cigarettes, 211–12; impact on local industry/government cartels, 26, 158, 160, 162–63, 164, 165–66, 167, 183; at points of production vs. points of consumption, 159, 163, 173–74; policy recommendations regarding, 171–74; pre-1949 vs. post-1949, 85–86, 280–81; as regionalized, 157; relationship to cigarette prices, 167–68, 172–73, 279; relationship to tobacco control, 23, 167–69, 170, 171–74, 262, 268; role of allocation stations in, 163, 175nn7–9; in SGNBR, 41, 44–45, 46, 49; as source of government revenue, 4, 21–22, 58–59, 81, 85–86, 134, 163, 167, 173, 181, 184–85, 195, 247, 278, 280–81, 285; tax rebates, 161, 165–66, 172; tax reform in 1994, 160–66, 183; tax reform in 2009, 167, 168, 175n14; tax reform in 2015, 169–71
- taxes, types of: ad valorem tax, 167, 171, 173, 175n7, 176nn9,14; agricultural product tax, 163–64; cigarette sales tax, 41, 160, 185; corporate income tax, 166, 169, 183, 184; education tax, 165, 169, 184, 185; excise tax, 161, 162, 163, 165, 167, 168, 169, 171, 172, 173, 175nn7,9, 176nn9,14; specific tax, 173, 175n9, 176n14; tobacco business personal income tax, 183, 184; tobacco consumption tax, 183, 184, 185; tobacco leaf tax, 163–64, 163–65, 169, 172, 183, 184, 185; urban maintenance and construction tax, 165, 169, 183, 184, 185; VAT, 161, 162, 163, 165–66, 168, 169, 172, 175n7, 183, 184
- technology of self: Foucault on, 136, 149–50, 151n4, 152n14
- Thailand, 233, 265, 268
- 359th Brigade, 47–48
- Three Anti campaign, 66–67
- Three Castles brand, 112, 113
- Three Stars brand, 105, 106
- Tiananmen protests, 148, 212–13, 288
- Tianjin, 201n5; cigarette production in, 78
- Tianjin Medical Journal*, 214–15
- Tian Jiyun, 197
- Tibet, 201n5
- tobacco control: in developing vs. developed countries, 268; focus on consumers in, 18, 19, 27; public

- health advocates, 17, 23–24, 158, 167–69, 170, 174, 179, 200, 223, 227, 254, 261, 262, 263, 264, 267, 285; public health warnings, 6, 8, 18, 23, 24, 26, 52, 134–35, 151n6, 170, 263–65; relationship to tobacco taxation, 23, 167–69, 170, 171–74, 262, 268. *See also*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FCTC)
- tobacco industry employees: and China Tobacco Museum, 26, 133, 136–38, 141–46, 148–50, 150n2, 151n4; compensation, 136, 152n12
- tobacco industry interest groups, 26, 179 *Tobacc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15–16
- tobacco supply chain, 19, 45
- Tower brand, 98–99
- Truth Tobacco Industry Documents website, 22
- Tso, T. C., 217
- Tuanjie Factory, 48
- UCSF Legacy Tobacco Documents Library, 248
- United Kingdom, 217, 248; filter-tipped cigarettes in, 209; James I, 6; plain packaging in, 282; smoking in, 99–100
- United Nations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269
- United States: vs. China, 19, 148, 160, 200, 209, 215, 216, 245, 246, 248, 259, 284, 285, 286, 287, 289n6; cigarette manufacturing in, 19; cigarette taxation in, 160; deaths from cigarettes in, 19;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Agricultural Research Service, 217;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230n24; filter-tipped cigarettes in, 208–9;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134, 167; Surgeon General report (1964), 214, 280, 287; Surgeon General report (1988), 287; tobacco cultivation in, 1, 4 *United States v. Philip Morris*, 220, 233, 273n22
-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USTC), 237, 240
- Viceroy brand, 208
- Virginia tobacco, 40, 47, 48, 50, 80
- visual representations of smoking, 96–124, 127–28
- Wakeham, Helmut, 290n14
- Wallace, Mike: as smoker, 142–43
- Wang Xiao, 192
- Wang Yi, 193
- Wang Yizhi, 143–44
- Wang Yuanxin, 85, 86
- Wang Zhaoguo, 197
- Wannan Incident, 38, 39, 47
- warning labels, 18, 23, 24, 151n6, 170, 263–65
- water-pipe tobacco, 40, 41, 42, 45, 47
- water pollution, 288
- Wei Jianxing, 189, 191
- West Germany, 217; filter-tipped cigarettes in, 209
- We Will Surely Bring the Hai River under Permanent Control*, 123, 124
- Winston brand, 208
- Wong, Bin, 74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24; tobacco control by, 6, 18, 26–27, 167, 168, 169, 170, 171, 254; World No Tobacco Day, 168. *See also*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FCTC)
- World Heart Association, 279

-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19
- Wu Bangguo, 197
- Wu Guanzheng, 197
- Wu Yi, 197
- Wuhan Cigarette Factory, 10
- Xi Jinping, 170, 288
- Xiandao brand, 54n12
- Xiang Jingyu, 140
- Xiangtan Tobacco School, 236
- Xie Jianping, 222–24, 243, 245–46, 281–82
- Xinhua News Agency, 171, 191
- Xinjiang Province, 175n1, 182
- Xinqun factory, 51
- Xiong Xiling, 144
- Xionghao brand, 9
- Xu Rongkai, 189
- Xu Zhimo, 100
- Yan'an, 37–38, 39, 41, 42, 46, 52
- Yang Jingyu, 143
- Yang Lisan, 64
- Yang Rong, 192
- Yao Qingyan, 198
- Yee Tsoong Cigarette Company, 54n12, 140
- Yizhong Tobacco Company, 235
- Yufeng Cigarette Factory, 48, 49
- Yunnan Academy of Tobacco Scientific Research, 23
- Yunnan Agricultural Institute, 237
- Yunnan Province, 134, 138, 163, 175n1; branding of cigarettes in, 185, 187; corruption in, 26, 190–94; cultivation of tobacco in, 3, 22, 26, 78, 146, 165, 181, 182, 183, 185–87, 195; elite politics in, 186–99; income of cigarette workers in, 152n12; manufacturing of cigarettes in, 185, 186; sugar cane farming in, 186; tobacco revenue and profits in, 181, 183, 185, 186
- Yunnan Tobacco Monopoly Bureau, 239
- Yunnan Tobacco Research Institute, 236, 239
- Yunnan Tobacco School, 236
- Yunyan brand, 13, 135, 187
- Yuxi brand, 187, 194
- Yuxi Cigarette Factory, 194, 195, 196–97, 198, 199, 283
- Yuxi City, 78–79, 181, 186–87, 194, 203n47
- Yuxi Tobacco Co., 195
- Zan Zheng: *We Will Surely Bring the Hai River under Permanent Control*, 123, 124
- Zeng Peiyan, 197
- Zhang Baozhen, 221
- Zhao Hongshun, 240
- Zhejiang Province, 182
- Zheng Shadong, 193
- Zhengzhou Tobacco Research Institute (ZTRI), 147, 222, 234–35, 236, 239, 240, 243, 282
- Zhengzhou Tobacco School, 236
- Zhongnanhai, 9, 142
- Zhongnanhai Love Foundation, 266
- Zhongnanhai Super Lights, 148
- Zhou Enlai, 62, 74, 77, 142
- Zhou Jiheng, 248
- Zhou Ruizeng, 255
- Zhu Meixian, 140
- Zhu Rongji, 197
- Zhu Zunquan, 146
- Zhuo Lin, 191
- Zi Guorui, 198
- Zimbabwe: cultivation of tobacco in, 3

ALSO PUBLISHED IN THE  
SHORENSTEIN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SERIES

*Uneasy Partnerships: China's Engagement with Japan, the Koreans, and Russia in the Era of Reform*

Edited by Thomas Fingar (2017)

*Divergent Memories: Opinion Leaders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Gi-Wook Shin and Daniel Sneider (2016)

*Contested Embrace: Transborder Membership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Korea*

Jaeun Kim (2016)

*The New Great Game: China and South and Central Asia in the Era of Reform*

Edited by Thomas Fingar (2016)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Ethnic Violence in India*

Ajay Verghese (2016)

*Rebranding Islam: Piety, Prosperity, and a Self-Help Guru*

James Bourk Hoesterey (2015)

*Global Talent: Skilled Labor as Social Capital in Korea*

Gi-Wook Shin and Joon Nak Choi (2015)

*Failed Democratization in Prewar Japan: Breakdown of a Hybrid Regime*

Harukata Takenaka (2014)

*New Challenges for Maturing Democracies in Korea and Taiwan*

Edited by Larry Diamond and Gi-Wook Shin (2014)

*Spending Without Taxation: FILP and the Politics of Public Finance in Japan*

Gene Park (2011)

*The Institutional Imperative: The Politics of Equitable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Erik Martinez Kuhonta (2011)

*One Alliance, Two Lenses: U.S.-Korea Relations in a New Era*

Gi-Wook Shin (2010)

*Collective Resistance in China: Why Popular Protests Succeed or Fail*

Yongshun Cai (2010)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Edited by Joseph W. Esherick, Paul G. Pickowicz, and Andrew G. Walder  
(2006)

*Ethnic Nationalism in Korea: Genealogy, Politics, and Legacy*

Gi-Wook Shin (2006)

*Prospects for Peace in South Asia*

Edited by Rafiq Dossani and Henry S. Rowen (2005)

